阿尔巴尼亚史纲

〔阿〕克·弗拉舍里著

樊　集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КРИСТО ФРАШЕРИ

ИСТОРИЯ АЛБАНИИ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Тирана, 1964 г.

根据地拉那1964年俄文版译出，校订译文时

曾参阅地拉那1964年出版的英文版

THE HISTORY OF ALBANIA

(A BRIEF SURVEY)

阿尔巴尼亚史纲

〔阿尔巴尼亚〕克·弗拉舍里著

樊　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根据1964年11月第1版重排

197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2　420　每册 1.25 元

内　部　读　物

目　　录

史前阿尔巴尼亚

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遗迹，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末叶的。这些遗迹是1939年在阿尔巴尼亚南部距布特林特八公里的维瓦利湖沿岸的查尔拉村附近发现的。这是用燧石和硬水铝矿石制造的原始工具，是一些粗陋的切具和手斧；在这些工具近旁，人们还发现在制造这些工具后留下来的石屑。

在查尔拉还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品——典型的“带鼻的”手斧，还有用凿子加过工的切具。在圣玛利纳洞穴(也在布特林特附近)内发现的物品，特别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的存在。在大量骨化石（在这些化石当中，可以辨认出野山羊[capra ibex]的牙齿和胫骨）近旁的一个洞穴里，人们发现了加工成为手斧的燧石，还有硬水铝矿石的切具，这个切具的刃部的某些地方由于使用而出现了缺口。在地拉那附近代提

山下修造公路时偶然发现的骨制切具和燧石物品也是属于同一个史前时代的。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物品也不多，并且是偶然发现的。这主要是在国内各地——格鲁耶米拉(斯库台)、杜什玛尼(杜卡吉因)、涅普拉维什塔(纪诺卡斯特)、非尼吉(德尔维那)、布特林特和其他各地——发现的石斧，它们大多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某些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的关于新石器时代阿尔巴尼亚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所根据的只是在发罗那地区维尔查村发现的少数物品。在这一村庄中发现的陶器碎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彩陶，它们大部分是由红色、灰色、栗色和黑色的直线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另一部分是刻花素陶，它们主要是刻画着弓形的和螺旋形的线条。

近年来由于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玛里奇镇（科尔察）的发掘地点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材料，我们今天就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

第一批这类的物品是1948年排干玛里奇沼泽时在玛里奇偶然发现的。1961年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开始了系统的发掘，这一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许多还未曾公布的材料都保存在地拉那市考古学一人种志学博物馆内。根据初步的资料，在玛里奇地方已经进行到四公尺深的发掘，表明在冲积土的下层有两个互不相同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公元前三千纪），而在上层则有青铜时代聚落的遗迹（公元前二千纪）。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下层里，我们发现了石制品（锤子、手斧、磨），燧石制品（小刀），角制品（锤子和刀），骨制品（针和矛头），陶制品（纺锤和渔网坠子）和铜制品（凿子、手斧和鱼钩）。陶制品占了大部分，它们基本上是不带把手的，有些陶制品的把手一直达到器皿的上端。也和在维尔查一样，这里的许多器皿上都有花纹，花纹大部分都是由直线构成的几何图形，另一种装饰则是凹凸的花纹。在这些层里，我们还发现了桩上住宅的遗址，在它旁边还有一些矮小的建筑物的残迹。还发现了一些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串珠和儿童玩具；此外还有谷物的种子和家

畜的残骸。

在玛里奇的考古站的下层所发现的物品，比维尔查的发掘物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新石器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中的一种文化在时代上要古老些，因为它是在最下面的土层中发现的。这种文化首先表现为彩陶、桩上住宅、带把手的器皿，大概还表现为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时代较近的另一种文化，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则以带有凹凸的花纹的陶器、矮小的建筑物和带有垂直把手的器皿为代表。

这两种文化代表从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是两个不同的部族，这一点在许多语言学家的著作里已经得到证明。

玛里奇和维尔查的彩陶在这一史前时期不仅分布于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帖撒利、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而且分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直到乌克兰那里（特里波利文化）；从这种彩陶来判断，可以假定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或中期，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存在着地中海人种语言集团的一个部族。属于印欧语系的阿尔巴尼亚语所继承下来的、地中海集团的语言要素诸如mal（山），hardhi

(葡萄蔓), shegë(石榴), shkabë(鹰), bisht(尾巴)等词, 地名Buna, Nish, Ishëm(在古代是:巴尔班那、纳伊苏斯、阿西莫斯), 数词njëzet(二十), dyzet(四十)(它们被认为是印欧的"二十进位"计算法的残余), 接尾语-assa,-ua,-anna,-at等等可能都是起源于这一部族的语言的。

相反, 在玛里奇和维尔查发现的刻有凹凸的花纹的陶器却和在帖撒利、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发现的陶器在很多方面相似, 并且一般而言和多瑙河地区的陶器相似。这种陶器使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 存在着一个属于印欧人种语言集团的、不知道彩陶的部族, 而人们认为这个部族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中欧或北欧进入巴尔干并且同当地的地中海部族混合在一起的。可能这里所说的正是被学者们称为原始印欧的或前希腊印欧的, 而被某些人称为原始伊里利亚的那个部族, 人们认为这个部族是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几个世纪便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上了。某些学者由于完全是实际的理由而把这一部族称为佩拉斯吉人。古代作家曾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佩拉斯吉人的相当多的传说和相互矛盾的报道。在这些古代作家当中, 希罗

多德告诉我们，他在伊庇鲁斯（这一地名在古代也包括现代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看到了从帖撒利移来的佩拉斯吉人的遗迹。斯特拉波则依据埃佛洛斯、赫西奥德、埃斯库洛斯和优里庇德斯指出，佩拉斯吉人古时的居住地是阿尔卡地亚，从这里他们移居伊庇鲁斯以及帖撒利、克里特、列斯波斯和特洛亚德。许多语言学家认为阿尔巴尼亚语也继承了这种原始印欧语言的因素。

但是这样一个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从文物方面得到证明的玛里奇、维尔查和阿尔巴尼亚其他地方的文化是否一种是“地中海”部族的文化，而另一种是“原始印欧”部族（佩拉斯吉人）的文化。

撇开当时居住在玛里奇地区的部族的人种起源问题不谈，我们仍可以就迄今我们很少知道的这一史前时期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结论。在不大的土地上发现的大量文物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少在这一地区，居民是相当稠密的而且是定居的。这一时期居民从事狩猎，但是从家畜的骸骨来判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也是懂得畜牧的。原始的角刀、陶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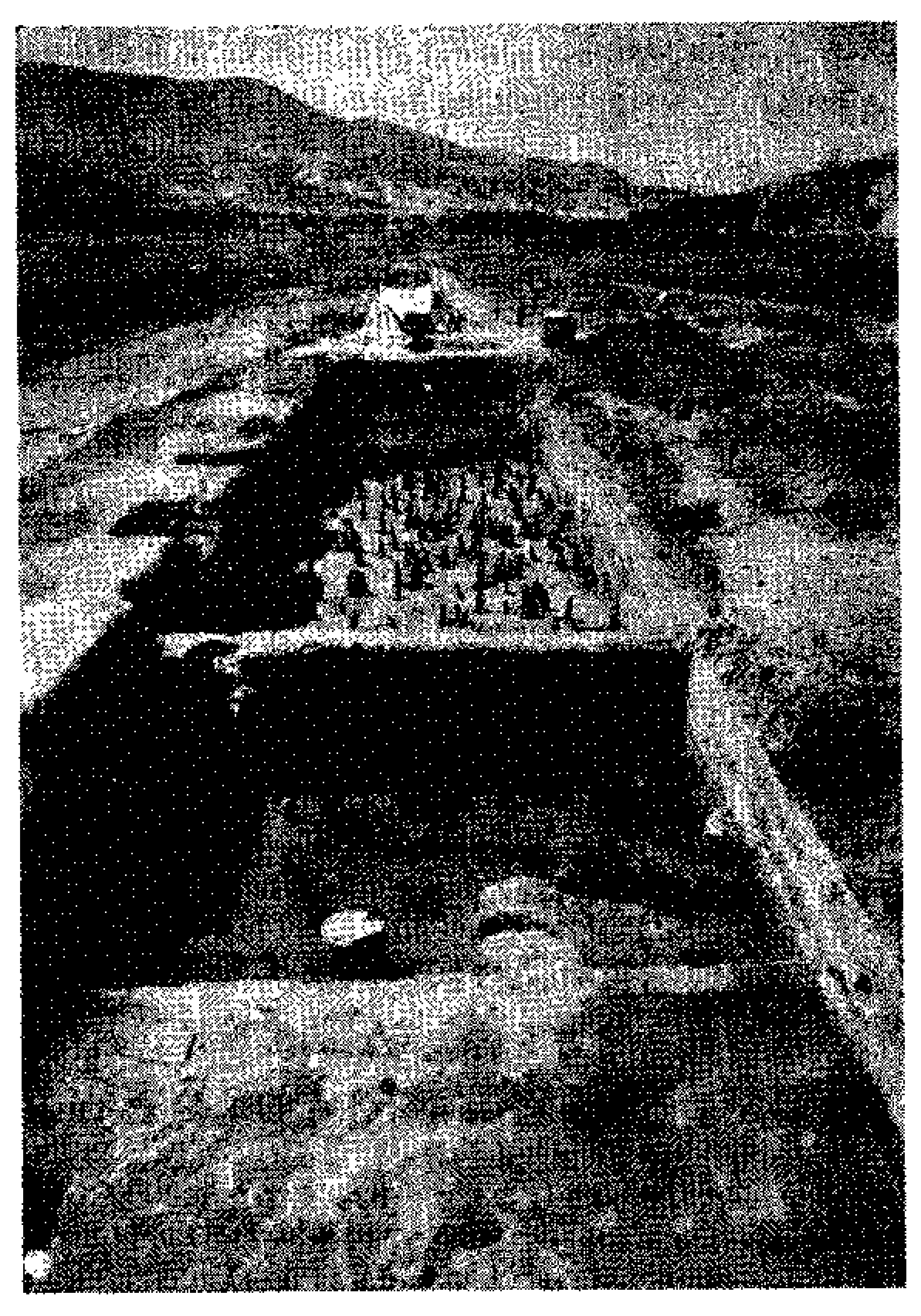
石磨和谷物的种子都证明，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他们还知道用钩钓鱼和用网捕鱼，这一点可以从在玛里奇发现的角制的（后来是铜制的）钓鱼钩和陶制的网坠子判断出来。骨针和陶制纺锤证明，他们懂得纺织的手艺。桩上住宅使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是懂得航海术的。表面光滑而且精美的器皿证明制陶业相当发达。迄今在阿尔巴尼亚所发现的、代表装饰艺术的最古老的遗迹的那些装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能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是多神崇拜的标志。总之，工具的性质、装饰和儿童玩具的单调都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具有这一或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过的是集体生活，其中并不存在居民之间的分化。

过去我们关于青铜时代（公元前二千纪）的知识极其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引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是两种类型的青铜手斧，他们把这两种手斧称为“达尔玛齐亚—阿尔巴尼亚型的”和“斯库台型的”，它们和在相邻各地区发现的手斧有显著的区别。人们认为它们是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制造出来的。由于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特别是在玛里奇、帕若库（爱尔

巴桑)、盖塔尼(斯库台)等地的发掘，现在我们关于这一时代的知识已相当充实了。

在玛里奇的新石器时代层上面发现的物品是属于青铜时代初期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器。在这里，带有别具一格的侧孔的彩陶越来越少，而在上面的一层，这种彩陶就完全不见了。相反，刻有凹凸的花纹、并带有垂直把手的陶器却越来越多，而且这种陶器并没有脱离前一个新石器时代层的形式和装饰要素。在这一层里我们看到的只是矮小建筑和炉灶的残迹。这些材料说明了原始印欧部族(佩拉斯吉人)的长期存在。

在帕若库平原上离爱尔巴桑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1960年开始对散布在无名的沼泽和德沃利河之间二十五座以上的坟墓进行了发掘。在进行这些发掘时，我们得到了有关坟墓建筑的珍贵资料，还发现了各种物品——青铜武器(刀、剑、枪头)，妇女用的一个螺旋形的黄金饰物，一个燧石箭头，许多陶器，其中有一些是从爱琴海地区输入的，有一些是当地的产品(按照克里特—迈锡尼类型制造的)，再有一些是按照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制造的。同一部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科尔察地区玛里奇的村落遗址。
1961—1963 年发掘地现场

族所生产的物品较之在玛里奇发现的那些物品时间略晚；它们属于青铜时代较晚的时期，其中某些甚至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的产物。

1961—1963年在斯库台以东五公里的盖塔尼村进行了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物品是属于较近的一个时期的。在下面各层发现的物品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在上层发现的物品甚至属于罗马占领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在盖塔尼，我们发现了一座小城市的残址，这个小城市和斯库台、玛尔设伊以及其他等城市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阿尔巴尼亚最早一批伊里利亚人设防居住地。从显然属于青铜时代初期即属于公元前一千纪初的陶器碎片，可以看到同玛里奇的凹凸花纹陶器的相似（特别在装饰方面），这一点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末以来从未间断的继承性，从而也就说明了这个部族的继承性。这个部族不再是早期的希腊作家所称呼的佩拉斯吉人，而是伊里利亚人了。

伊 里 利 亚 人

根据在历史科学中一般通行的意见，在整个青铜时代和在铁器时代的初期，伊里利亚人都居住在欧洲中部。在奥地利发现的奥涅提茨文化、劳西茨文化和哈尔什塔特文化，按照考古学家的意见，是代表青铜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的伊里利亚文化的。还有，根据学者们的意见，在公元前一千纪印欧各部族自北欧移居南欧的时期，继定居于巴尔干南部的希腊人和定居于希腊人以北的色雷斯人之后，大量的伊里利亚人在青铜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也进行了迁移。由于这些迁移，新的伊里利亚部族占居了巴尔干半岛的整个西部（约略相当今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并且同跟他们非常相似的“原始印欧的”或“佩拉斯吉的”或“原始伊里利亚的”部族溶合起来。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说明新的伊里利亚人的物质文化何以一方面同玛里奇和帕若库文化相似，而另一方而又同劳西茨与哈尔什塔特的文化相似。某

些伊里利亚部落（美撒皮人、雅普吉人等等）则大概从今天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而定居于南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后来受到罗马人的无情的同化政策的迫害。

在希腊人（荷马、赫西奥德、斯库拉克斯、希罗多德、赫卡泰欧斯、修昔底德等人）的最古老的文献里，伊里利亚人被说成分成几个不同的部落。古代罗马的作家彭波尼乌斯·梅拉和老普林尼指出了北方伊里利亚人和南方伊里利亚人之间的某种区别；他们把南方伊里利亚人称为“真正的伊里利亚人”。从古代的文献以及根据在他们的居住地发现的铭刻，我们知道许多大大小小的伊里利亚部落的名称。例如南方有这样的名称：恩凯莱人、阿尔迪安人、陶兰特人、达尔丹人、帕尔西尼人、阿廷坦人、皮鲁斯特人、拉贝亚特人、卡昂人、提西洛特人、莫洛斯人，而在北方则有里布尔恩人、雅波德人、达尔玛特人、德西迪雅特人、奥塔里雅特人等等。伊里利亚人按照他们所属部落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别的民族，首先是希腊人、罗马人等等把他们的国土称为伊里利亚，而把他们本身称为“伊里利亚人”。

只有维约萨河以南直到安布拉奇亚湾的各个地区，也就是住着许多伊里利亚部落（其中包括卡昂人、提西洛特人、莫洛斯人等等）的地区才叫伊庇鲁斯——这个名字是从一个有“大陆”的意义的词变来的。伊奥尼亚诸岛的希腊居民所以给这些地区以这样的称呼是为了区别他们岛上的土地和对岸大陆的土地。

伊里利亚人有自己的伊里利亚语。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本用伊里利亚语写的文献。我们只是从古代作家的作品中知道伊里利亚语中的几个词，几个伊里利亚语的阴文铭刻和许多作者的匿名、地名。伊里利亚语是印欧语系的一个特殊分支，同色雷斯语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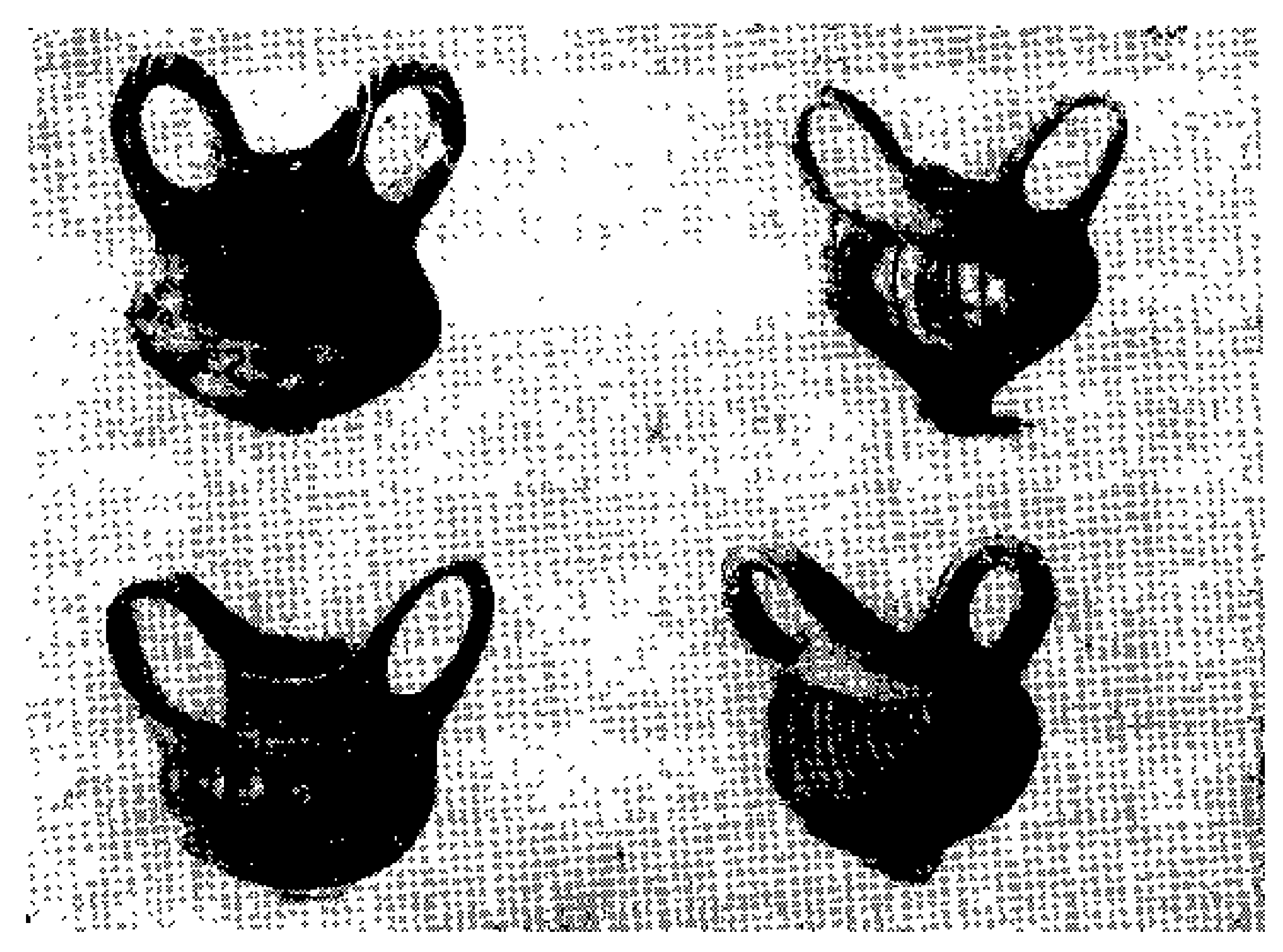
语言学家在研究伊里利亚语的语言材料时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语就是伊里利亚语的直接继续。伊里利亚语的许多词和名字可以借助于阿尔巴尼亚语的日常用词而得到理解。例如：“bile”—bije（女儿）、“brention”—brini（角），“barka”—barku（肚子），“bauria”—burri（男子）等等。部落的名称：Delemat——阿尔巴尼亚语“delme”—dele（绵羊），Dardan——阿尔

巴尼亚语 dardhë(梨)，地名 Dimalum——阿尔巴尼亚语 dy male（两座山），“Bardys”——阿尔巴尼亚语 bardhë（白色的），“Bardylis”——阿尔巴尼亚语 bardhe yll（白色的星）等等。其他语言要素也证实了伊里利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之间的继承关系。学者们还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其他各种要素来说明这一联系。

在伊里利亚人所占居的人种区域里，有个别的岛屿居住着色雷斯人，他们必定是从他们移入的时候起便留在那里的。阿尔巴尼亚语中保存的某些色雷斯的词可能就来自这些岛屿，而这种情况使某些语言学家有理由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是色雷斯语的子语。这些词的产生部分地是由于伊里利亚人同色雷斯人是邻居。伊里利亚人和色雷斯人甚至在某些相邻的地点组成了混合居民区。某些语言学家采取了折中的看法，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是由伊里利亚语和色雷斯语混合而成的。但是，大家知道，一些语言材料并不足以说明民族的世系。考古学的、人种志的和历史的文献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一种看法，即伊里利亚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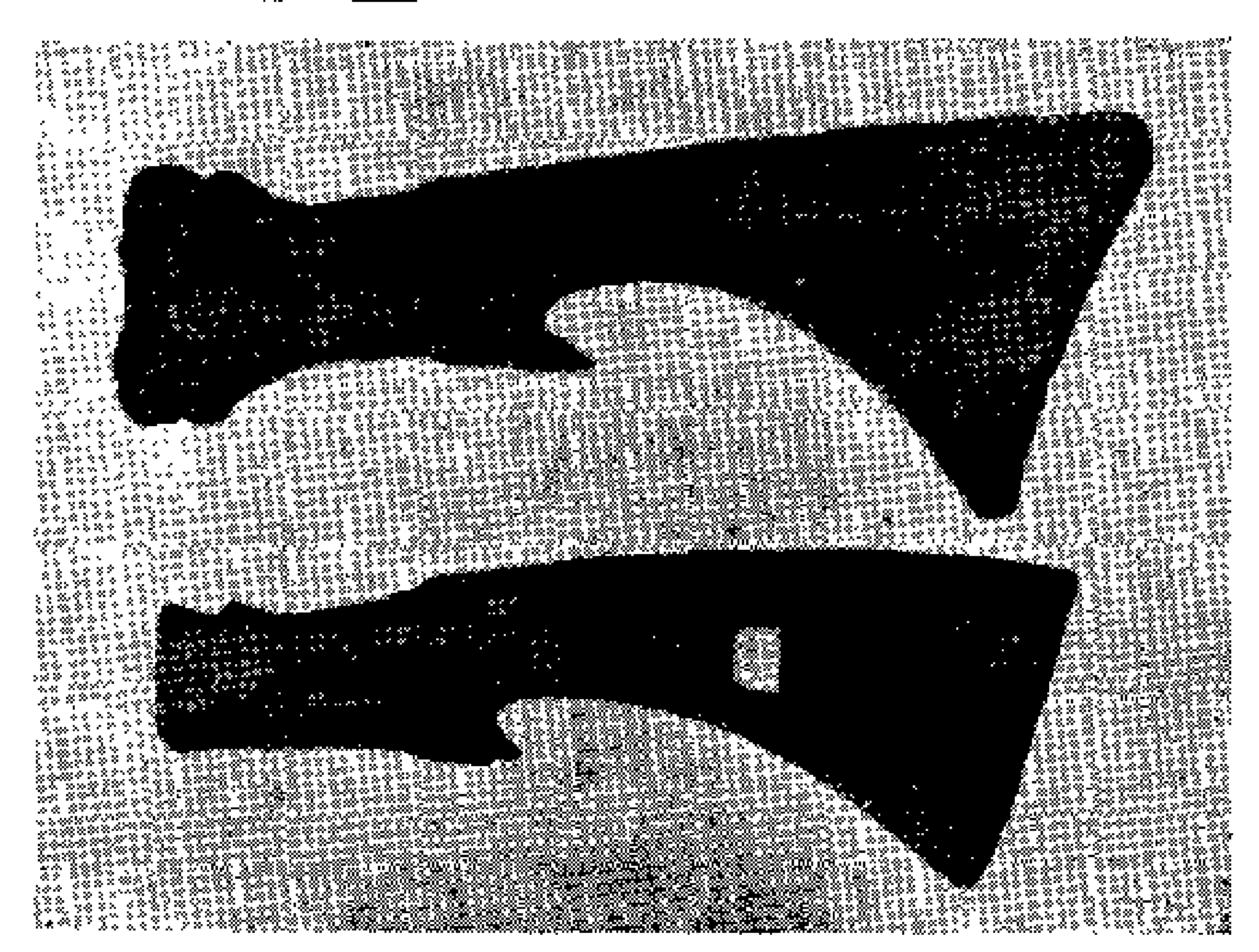
当伊里利亚人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时候，他们带来了青铜文化。稍后，在公元前一千纪初，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上也开始使用铁。后来来到巴尔干的伊里利亚诸部落从自己先前的居住地带来了铁器时代的文化。在奥地利的哈尔什塔特城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从伊里利亚人定居于巴尔干起直到书面文献的出现（大约到公元前七——六世纪）这一时期里的伊里利亚社会，我们是根据在某些居民点的许多住宅以及在同一时期的坟墓中发现的材料才知道的。阿尔巴尼亚考古学家近年来的发掘所提供的材料补充了我们关于当时伊里利亚社会的知识。在伊里利亚人的各个居住地发现的铁鹤嘴锄、手斧、镰刀使人们看到相当高的农业发展水平。他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农作物：谷类作物有小麦、大麦、黍；水果有苹果和葡萄；青菜有大豆、豌豆等等。畜牧业是他们的巨大财源。今天在地拉那考古学博物馆的橱架上展出的铁制的和青铜制的鹤嘴锄、手斧、锤子、弓、盾牌、小刀、镣铐、钉子等等，金的和银的耳环、指环、镯子、徽章以及其他制品，证明了伊里利亚人的手工业比较发



公元前一千纪伊里利亚独具一格的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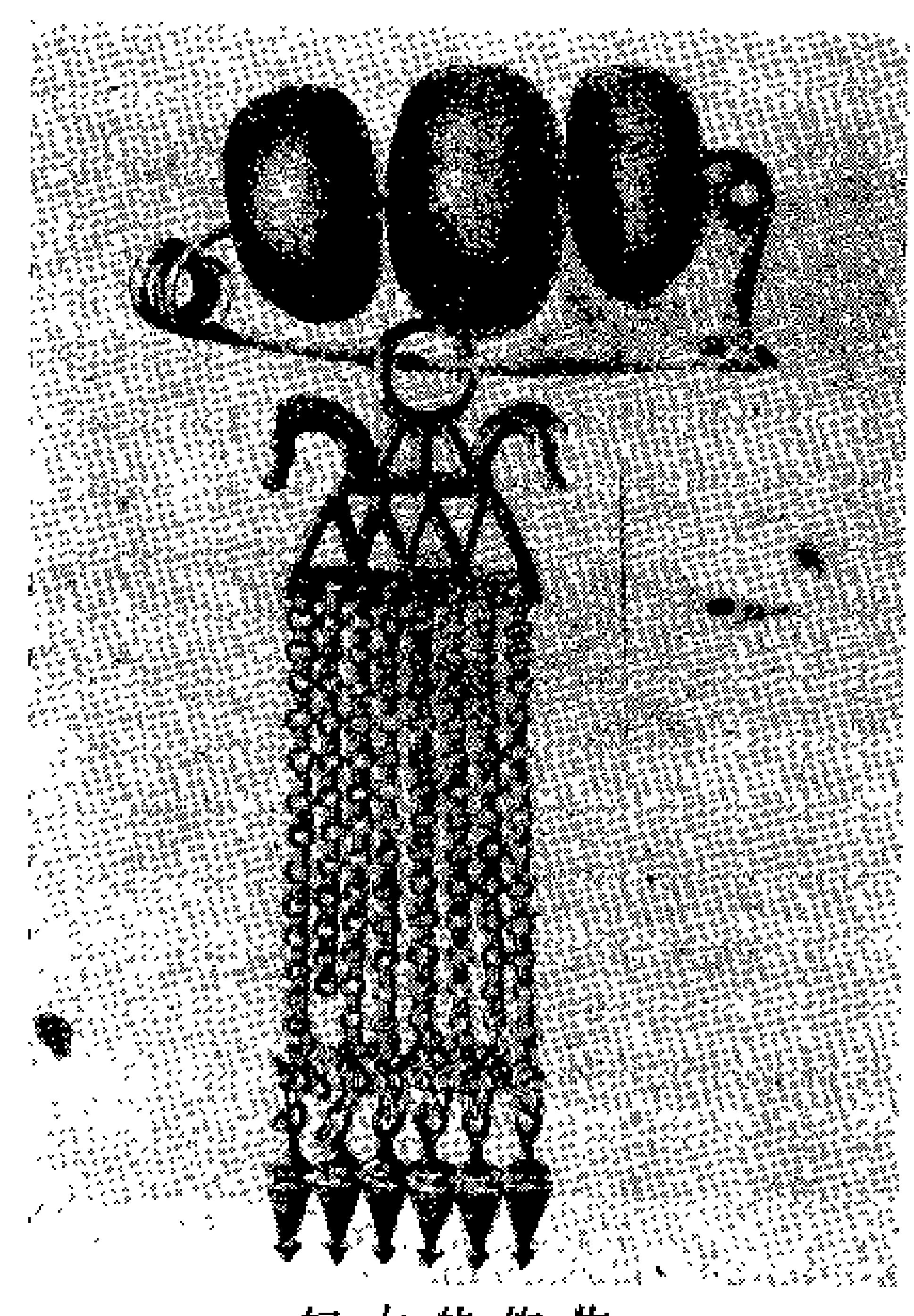
达。在制陶方面，他们使用了可以成批制造器皿的手工生产方法。居住在沿岸地带的伊里利亚人是勇敢的水手。他们对意大利进行的大规模的征讨说明他们很早就有大型的舰船，可以自由地渡过亚得里亚海。里布尔恩人的水手在七世纪从达尔玛齐亚北部到科孚岛的一次航行，使我们有根据提出这样的假定，即伊里利亚人是善于制造轻快的船舶的。伊里利亚人有设防的城市。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近年来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曾发现用大石块修建的这种城市。在这些世纪里，伊



“达尔玛齐亚-阿尔巴尼亚”型的青铜手斧

里利亚人还开始同外国发生贸易关系。已经发现的材料表明，交换是同地中海地区各国，首先是同腓尼基人、罗马人和希腊城市进行的。

由于新的铁制和青铜制的劳动工具的出现而促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原始公社的瓦解。在原始公社内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又引起了社会分化的过程。从在他们的坟墓中发现的物品可以推知社会分化的情况。在某些坟墓里有许多用具和珍贵的饰物，而在另一些坟墓里则几乎一无所有。这一过程发展到最后，原始公社崩



妇 女 的 饰 物

溃了。代之而来的是阶级社会。最早的国家组织在部落内部形成了。为了保卫自己不受最强大的部落的侵犯，并且为了向富有的部落发动进攻，几个伊里利亚的部落就开始相互结成暂时的同盟。久而久之，这些同盟就变成了一个联盟，而参加联盟的较大部落的名字便用来作为这个联盟

的名字。我们所知道的联盟中最古老的是以恩凯莱人和陶兰特人为首的联盟。联盟的领袖开头由全体大会选出，在一定的期限内任职。但后来在某些联盟内，领袖变成了国王。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恩凯莱人和陶兰特人的联盟的领袖便是国王了，有时领导联盟的是妇女（例如里布尔恩人的联盟），或同时有两个国王（如莫洛斯人的联盟）。

关于这些联盟的起源以及关于它们最初的国王，古希腊的作家给我们叙述了许多传说。在某些这样的传说中，比如说，就谈到伊庇鲁斯部落最初的国王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奇遇。

希腊殖民地

在伊里利亚沿岸地带也发生了同地中海和黑海各地类似的某种过程。公元前八世纪，科林斯的希腊诸部落移居科尔启拉（科孚）并且同伊里利亚的商人发生了贸易关系。这种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以致在一百年之后，他们在伊里利亚沿岸建立了自己最早的一批城市——殖民

地。公元前627年科尔启拉—科林斯诸部落建立了都拉奇昂或埃披达姆诺斯（今天的都拉斯），公元前588年，建立了阿波罗尼亚（今天的波扬，在费里附近）；大约在这同时，又建立了布弗罗顿（今天的布特林特）。在欧克里昂（今天的帕什一阿里一曼），稍后又在里索斯（今天的莱希）、法罗斯（今天的格瓦尔）、伊斯（今天的维什）等地建立了另一些希腊殖民地。

起初希腊殖民地居民很少，并且没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们首先是在伊里利亚部落和希腊城市之间的贸易中起中介人的作用。但是手工业在那里渐渐地得到了发展，而且它们的制品也出售给伊里利亚诸部落。这样，它们就变成了重要的和独立的经济中心。都拉奇昂和阿波罗尼亚有了特别巨大的发展，它们在公元前五——四世纪有数万居民。从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开始，他们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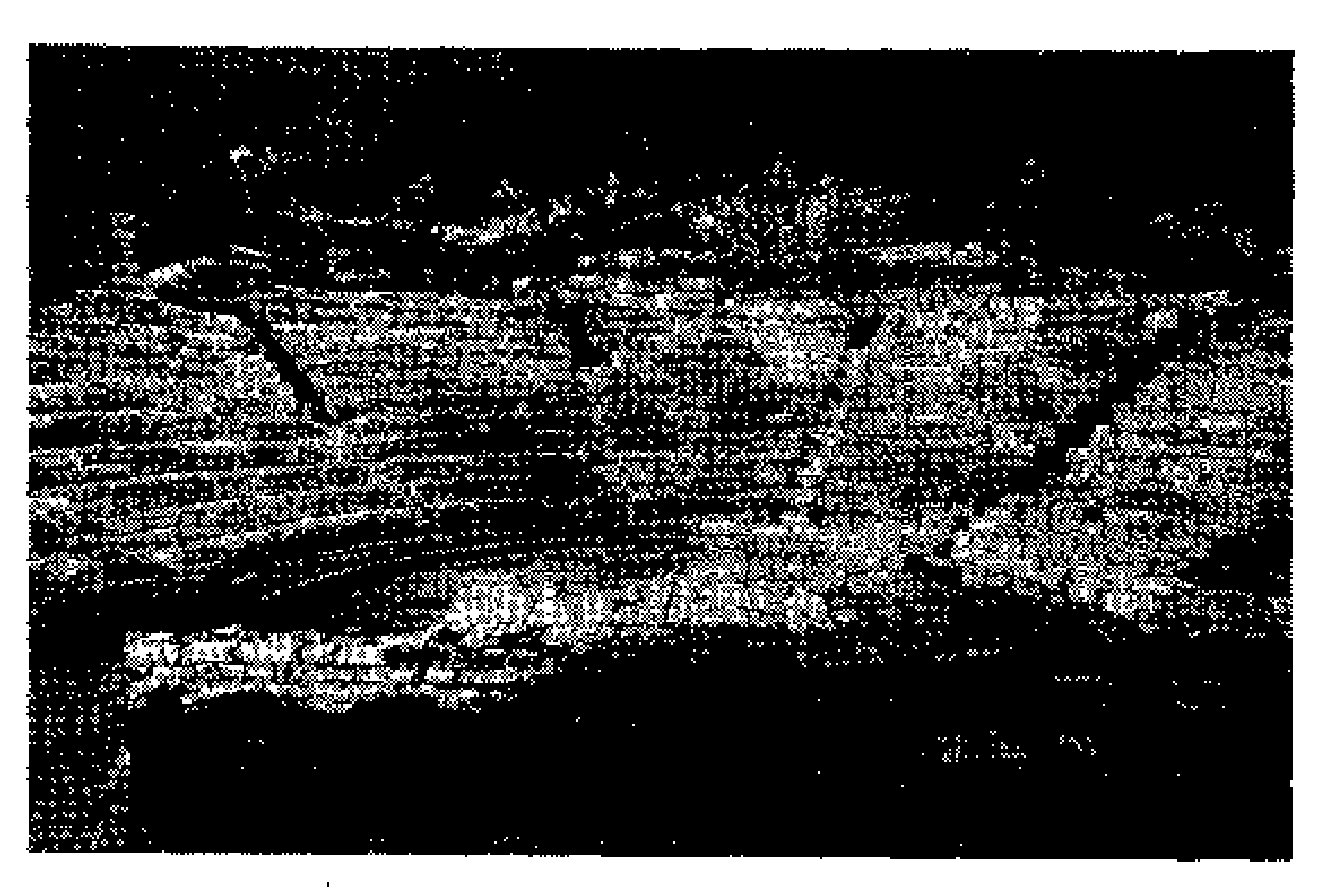
从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观点来看，伊里利亚沿岸的殖民地经历了和希腊城市相同的发展过程。每一个这样的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城邦。各殖民地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那里的习惯和信仰同它



公元前 588 年建立的古城阿波罗尼亚的发掘地现场。
背景是十四世纪拜占廷的教堂

们本国一样。在这些殖民地里，很早便发展起来了奴隶制关系。由于这些关系，在这些殖民地形成了与希腊，特别是与科尔启拉和科林斯相同的制度。

起初，殖民地的最高机构是赫里亚，即市民大会；赫里亚选出有一定任期的长老会议。会议的领袖是阿尔洪和普路坦。会议负责治理城邦。但是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奴隶制关系的发展，殖民地的社会成分改变了。由地主与奴隶主组成的贵族居于领导地位。大部分居民是市民，市民包括



至今仍存的布特林特圆形剧场

手工业者、商人、水手等等，——他们都是自由人，有权参加赫里亚。其中有相当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最后，奴隶则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在希腊人的殖民地上也有伊里利亚的居民。他们不是奴隶，但是没有任何公民权。

随着奴隶主贵族的加强，他们削减了市民大会的传统权利而把几乎全部殖民地的城邦的统治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贵族的寡头政权在这些殖民地引起了市民的一连串的内战。

在这些战争当中，最大的一次是公元前436年都拉奇昂城富裕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战争。他们

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赶跑了城市贵族。

被赶跑的贵族躲到邻居伊里利亚人（陶兰特人）那里去请求他们的帮助，答应在攻克城市后把都拉奇昂城的全部公民权给予陶兰特人的领袖。陶兰特人同意了，他们同贵族一道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城市。

还有几个希腊城市也参加了都拉奇昂的内战。科林斯站在市民的一面，科尔启拉站在贵族的一面。雅典也站在贵族一边参预了这次冲突。战争持续了好几年。公元前433年雅典和科尔启拉的舰队击溃了科林斯的舰队，继而贵族在陶兰特人和科尔启拉人的帮助下包围并占领了都拉奇昂，又在那里建立起了寡头政权。陶兰特人的领袖由于提供了帮助而取得了公民权，并开始住到都拉奇昂来了。大家知道，都拉奇昂的内战是在希腊诸城邦之间爆发的、几乎持续二十五年之久的一次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在这一战争中，都拉奇昂站在雅典一边。

由于各殖民地从剥削奴隶和同伊里利亚人做买卖而取得了利润，它们的文化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从殖民地建立的头几个世纪时起，殖民



在布特林特(布弗罗顿)发现的阿波罗尼亚
或所谓“布特林特女神”

地的居民使用大理石，石块和砖修建了许多美丽的建筑物。在城内修建了有庭院的住宅，奉祀希腊神话中诸神的神庙，上演悲剧和喜剧的圆形剧场，表演歌唱和演奏音乐的音乐厅，可以促进青年的智育和体育发展的体育场和健身房。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建筑的遗迹，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特别是在阿波罗尼亚、布弗罗顿和非伊尼克；城市四面的城墙都是用琢过的石块砌成的。在城市的中心通常是一个市民广场（agora），广场的地面是用大理石板铺成，四周有雕刻的石柱和大理石的雕像作为装饰。在某些殖民地还发现了体育场的遗迹。

住宅、神庙和公共建筑物都有图画、镶嵌细工和雕刻作为装饰。除去雕刻石柱和带有各种各样装饰的柱头之外，纪念性的雕刻在殖民地也获得了特别巨大的发展。迄今所发现的神、女神、领袖、官吏、作家、哲学家和贵族的半身像和雕像说明了这些殖民地居民的高度水平和卓越的艺术欣赏能力。特别名贵的是布特林特女神（阿波罗尼亚）像（现藏罗马博物院）和西列努斯、阿列斯、德谟斯提尼斯的头像，这些头像是在阿波

罗尼亚发现的，目前保存在波扬的考古学博物院里。

伊里利亚人的国家组织

（公元前五——二世纪）

伊里利亚各部落内部发生的社会分化使他们中间产生了奴隶制关系。

在伊里利亚人那里也同在其他各处一样，奴隶制最初带有家长制性质。但是后来在一些部落里面，一种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形式得到了发展。例如，在阿尔迪安人中间便产生了斯巴达类型的奴隶制：阿尔迪安人征服了整个民族，并且把他们变成了“边民”（prospelates），向他们征收他们的部分产品，就和斯巴达人对希洛特的做法一样。达尔丹人在征服了邻国之后，把那里的居民变为奴隶（杜洛斯），并把他们分配给自己的人。达尔丹人的贵族的某些代表每人分到一千个奴隶，有时比这还要多。达尔丹人的奴隶在平时耕种奴隶主的土地，战时则在奴隶主的率领下去作战。在

公元前五——二世纪，在内地还有不存在奴隶制度的伊里利亚的部落。

奴隶制关系的发展对国家的整个经济都产生了影响。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就使得公元前五——二世纪产生了一系列伊里利亚的城市，诸如：斯科德腊（斯库台）、阿曼提亚（发罗那地区的普洛察）、彪利斯（马拉卡斯特地区的赫卡利）、弗伊尼克（德尔维那地区的非尼吉）和其他许多小城市。公元前四世纪初，伊里利亚诸城开始铸造了自己的钱币。

但奴隶制关系产生后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却是从部落同盟向国家组织的过渡。在这些国家组织当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恩凯莱人、陶兰特人、伊庇鲁斯人和阿尔迪安人的王国。

在公元前五世纪，居住在科尔察和德沃利的平原上的恩凯莱人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向东扩展，就成了马其顿王国的邻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曾发生过长时期的战争。恩凯莱人占了六十多年（公元前423—360年）的优势。当公元前四世纪初一位著名的政治领袖和统帅巴杜路斯登上王位时，他们的王国特别强盛。巴杜路

斯占领了马其顿相当多的土地，迫使它的国王纳贡并常常干预马其顿王国的事务。巴杜路斯在对其他邻国作战时也取得了胜利。

但是从公元前360年腓力浦二世登上马其顿王位时起，两个邻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不利于恩凯莱人的变化。腓力浦二世不承认他以前的那些国王所承认的臣属条件。他率领着自己的排成方阵的军队连续几次进攻自己西方的邻国。西方的邻国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对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公元前344年巴杜路斯死了，腓力浦二世便利用这个机会征服了恩凯莱人。

腓力浦二世在公元前335年去世之后，恩凯莱人在巴杜路斯的继承人克利特的领导下摆脱了对马其顿的从属。为了保卫自由，克利特同陶兰特人的国王格劳库斯联合起来了。但是腓力浦二世的儿子马其顿亚历山大在同一年里向伊里利亚的军队发动了进攻。在佩里昂（科尔察附近的瓦尔贡尼峡谷）发生了一场决战，亚历山大的狡计使马其顿最后取得了胜利。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庞大的帝国瓦解了，于是恩凯莱人重新取得了独立。但是他们的王国除了

领土小之外又不断削弱下去，因而不能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公元前五世纪，陶兰特人在今天阿尔巴尼亚的沿海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左右，陶兰特人的王国占领了都拉奇昂，稍后又占领了阿波罗尼亚，但同时它却不得不同力图到达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带的那些马其顿的国王作战。为了保卫自己不受马其顿人的侵犯，陶兰特人的最杰出的国王格劳库斯同克利特结成了同盟。但是，如上所述，伊里利亚两个联盟者的军队在佩里昂为马其顿亚历山大所打败；亚历山大虽取得胜利，但他却不曾继续向沿海地带进攻。

就是在亚历山大死后，同马其顿的争端也未停止。使陶兰特人的格劳库斯与马其顿人的卡桑德尔之间关系尖锐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两个人争夺在伊庇鲁斯的霸权的战争。

公元前五世纪末，伊庇鲁斯诸部落团结在莫洛斯人的周围，建立了一个古代希腊作家称之为“莫洛斯人同盟”的联盟。领导这一同盟的是一个世袭的国王，他的权力受到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的限制。有时是两个国王领导莫洛斯人的同盟。

就是伊庇鲁斯人也不得不同马其顿的国王们作战。但是在公元前 345 年莫洛斯人被击溃了。腓力浦二世先是使自己的内兄亚历山大·莫洛苏斯，后来又使自己的儿子尼奥托勒密二世做伊庇鲁斯的国王，这样就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马其顿亚历山大死后，莫洛斯人赶跑了尼奥托勒密二世，并推选古伊庇鲁斯王朝的艾雅奇德为国王，艾雅奇德推行了独立的政策。但是在公元前 317 年，马其顿的卡桑德尔率军侵入，赶跑了艾雅奇德，并恢复了尼奥托勒密二世的王位。卡桑德尔的劲敌——陶兰特人的格劳库斯把艾雅奇德的两岁的儿子披鲁斯接到自己的宫里来予以保护，甚至在卡桑德尔以战争相威胁时也不把他交出来。相反地，相信自己已有足够力量的格劳库斯在公元前 307 年率军攻入伊庇鲁斯，推翻了亲马其顿派的政权并使自己的同盟者——十二岁的披鲁斯登上了王位。伊庇鲁斯的骚乱就是在后来也没有平息下去。公元前 302 年，反对派赶跑了披鲁斯，重新拥戴尼奥托勒密二世为国王。披鲁斯在几年当中走了几个国家。他到过埃及、西拉库吉和马其顿；在这些地方，他充实了自己的

学识并且学习了战术。公元前296年，二十三岁的披鲁斯再度返回伊庇鲁斯。在某个时期里，他以国王的身分和尼奥托勒密一道进行统治，但后来，在尼奥托勒密死后，他就成了莫洛斯人同盟的独揽大权的统治者。

披鲁斯加强了国王的权力，限制了贵族会议的权利并且把莫洛斯人同盟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他推行的政策既不依赖马其顿人，也不依赖帮助过他的陶兰特人。披鲁斯向东扩大了伊庇鲁斯的边界，深入马其顿直到瓦尔达尔河的地方；向南进入了希腊的领土，直到伯罗奔尼撒湾；向北则进入了陶兰特人的土地——直到希孔比河。

披鲁斯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幻想建立一个象亚历山大的帝国那样的大帝国；他把自己的视线转向意大利。而当塔兰特请求他的援助以抵抗罗马时，这样的机会就到来了。公元前280年，他率领着三万大军和二十头象渡海来到了意大利并于同年在赫拉克列亚取得了胜利；这是对罗马军队取得的一次辉煌的胜利。一年之后，即公元前279年，伊庇鲁斯人在奥斯库路姆重新与罗马军队对阵。这一次罗马的军队有七万人。伊庇鲁

斯人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披鲁斯说："如果我再取得一次这样的胜利，那末我就只能一个人回到伊庇鲁斯去了！"公元前275年披鲁斯第三次同罗马军队交锋时，他失败了并返回了伊庇鲁斯。在这里他又同马其顿进行了一连串的战争，然后又渡海到伯罗奔尼撒去进攻马其顿的联盟者斯巴达。但是公元前272年在阿尔哥斯城的一次巷战中他被杀死了。

披鲁斯不仅在伊里利亚人当中，就是在整个古代，都是最杰出的统帅之一。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统治时期是伊庇鲁斯的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在他死后，不满他的统治的伊庇鲁斯贵族起来反对王政制度。伊庇鲁斯王国由于这些内讧而削弱了。征服的土地相继失掉。公元前230年贵族终于推翻了王政制度而把旧日的同盟恢复起来。同盟的名称是"伊庇鲁斯人同盟"，首都是弗伊尼克。领导同盟的已不是国王，而是选出的任期一年的盟主。但"伊庇鲁斯人同盟"是软弱的。

在公元前三世纪，恩凯莱人、陶兰特人和伊庇鲁斯人的国家削弱并瓦解了。但在这时却有另

一个伊里利亚的国家特别迅速地强大起来。这就是阿尔迪安人的国家；这个国家占居达尔玛齐亚和黑山之间的沿海地带，首都是利宗。

在阿尔迪安人的国王阿格隆的统治时期（公元前250—231年），阿尔迪安人占领了居住在达尔玛齐亚沿海地带的希腊人的殖民地。后来他们又向南推进到斯库台，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新国家的首都。从这里他们继续向南，进攻陶兰特王国的土地，陶兰特王国因此全部瓦解。在阿格隆的统治时期，阿尔迪安王国成了一个海上强国。

阿格隆死于公元前231年，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继承者皮涅斯。阿格隆的第二个妻子提乌塔以摄政的身分代替她那非亲生的儿子皮涅斯治理国家。

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女王继续了阿格隆开始的掠夺政策。

她率领着一支军队和她所准备的一支巨大的舰队从陆海两方面进攻"伊庇鲁斯人同盟"，占领了首都弗伊尼克，使伊庇鲁斯人吃了几次败仗，但是在胜利之前，她却不得不同他们缔结和约，并撤回了军队以便对付从东面进攻的达尔丹人。

提乌塔同马其顿、伊庇鲁斯、阿卡尔纳尼亚缔结了同盟，这样便巩固了自己国家的地位。但是提乌塔的成功并不长久。阿尔迪安王国的加强和它所装备的那支大舰队在海上的大胆行动，使力图保持对整个亚得里亚海的统治的罗马感到不安。为此罗马决定消灭阿尔迪安人在亚得里亚海上的优势。

很快便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几只罗马船舶在大海上遭到伊里利亚船舶的攻击时，罗马元老院便把两名使节派往斯库台，向提乌塔要求赔偿损失并以严厉的恫吓强迫她对伊里利亚的水手采取措施。提乌塔拒绝了这些要求。同时这些使节之中有一个人返回罗马时在途中被杀死了。罗马便以这次杀害为借口，向阿尔迪安王国宣战。公元前229年秋天战争爆发了。伊里利亚人在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伊里利亚舰队的统帅季米特尔·法里叛变了，他未经战斗而把舰队拱手让给了敌人。没有舰队和同盟者的提乌塔在一年后不得不同罗马缔结了条件苛刻的和约。阿尔迪安王国的国土缩小了，因此它不可能保有舰队了。

这次战争之后几年，提乌塔去世了。季米特

尔·法里接替了她的地位。他也是以摄政的身分，代替这时仍十分年轻的皮涅斯进行统治。

季米特尔不能忍受从属于罗马的地位，因而便同罗马断绝了关系，并同马其顿结成了同盟。

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他便组成了一支军队，建造了一支新的舰队，并且恢复了阿尔迪安王国先前的边界。罗马对这些行动，特别是对阿尔迪安人同马其顿结成同盟感到不安，于是在公元前219年再次向伊里利亚人的国家宣战。和第一次一样，军事行动持续了几乎一年。罗马这一次收买了阿尔迪安人的另一个著名统帅司凯尔狄莱德斯。公元前218年，在法尔岛上的一次激战之后，季米特尔吃了败仗并逃到马其顿去了。在他逃走之后，罗马迅速地同司凯尔狄莱德斯缔结了和约，因为它自己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地位由于迦太基的汉尼拔的备战活动而恶化了。公元前218年的和约条款和公元前228年的和约条款相同。

以皮涅斯的名义领导了阿尔迪安人的司凯尔狄莱德斯忠实于同罗马的同盟。他和罗马一道参加了罗马和马其顿之间的长期战争。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展开的反对马其顿的腓力浦五世的战

斗中，他甚至承受了主要的重担。司凯尔狄莱德斯和腓力浦五世在战争中互有胜负，但马其顿最后还是失败了并且不得不接受罗马强加给它的和约条款。

司凯尔狄莱德斯和后来他的儿子普列乌里亚特执行了依靠罗马的政策。但是普列乌里亚特的儿子、公元前181年左右即位的根斯在长时期里力图摆脱这种依赖地位。为此他加强了同各邻国，特别是马其顿的联系。马其顿的领袖佩尔谢乌斯力图击溃罗马的强大力量。

公元前170年，罗马同马其顿间爆发了战争。根斯这时决定站在佩尔谢乌斯的一边参加战争。按照他们之间在美地昂缔结的军事协定，阿尔迪安人基本上应在海上作战，而马其顿人则在陆上作战。“伊庇鲁斯人同盟”也同他们联合起来了。

协定缔结之后，根斯就在海上展开了战斗行动。但是在公元前168年，罗马的大军在伊里利亚登陆，这支军队并没有进攻马其顿，而是迅速地进攻斯库台并把它包围了。同时通过贿买，他们在根斯所征服的伊里利亚诸部落的显贵中间引起了内讧。根斯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因此他没有

把战斗坚持到马其顿的军队到来的时候，便率军出了斯库台要塞，并在大海上向罗马人发动了进攻，结果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根斯和全家投降了敌人，并作为战俘被送往罗马。

在斯库台一役取得胜利之后，罗马军队进攻佩尔谢乌斯，并在皮德纳把他彻底击败。第二年（公元前167年），罗马人经过激烈的战斗又征服了伊庇鲁斯。在伊庇鲁斯的战斗中，罗马人摧毁了七十座城市，把十五万人变为奴隶。

和先前的战争不同，罗马这次彻底地占领了南伊里利亚的土地。这样，在公元前168—167年，伊里利亚的和马其顿的国家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伊里利亚人便进入了漫长的罗马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395年，长达五个半世纪以上。

罗马统治下的伊里利亚

在阿尔迪安人的国家和“伊庇鲁斯人同盟”瓦解之后，罗马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又进行了一系

列的征讨以摧毁伊里利亚的其他部落同盟和国家并夺取它们的土地。它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得以在二世纪里击溃了伊里利亚人的抵抗，而且也只是占领了亚得里亚海的沿岸地带。巴尔干内地的伊里利亚人在长时期里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自由。

在进行这些征讨时，罗马人给他们占领的土地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奴隶制的罗马在被占夺的土地上树立了残暴的统治。先前享有自由人的权利的伊里利亚人变成了无权的居民。整个整个的部落被驱离自己的土地，被卖为奴隶或是被消灭，就和过去，比如说，对阿尔迪安人做过的那样。罗马的士兵和农民占据了伊里利亚农民的最肥沃的土地。

伊里利亚的奴隶主常常起来反抗罗马的压迫和剥削制度。这些起义有几次规模巨大，并且同其他地方的起义，同罗马困难时期爆发的起义汇合起来。公元前134年，阿尔迪安人和其他部落一道为争取自由而拿起了武器。公元前119年达尔玛特人的起义，特别是他们在公元前78年的起义给罗马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罗马为了镇压公元前78年的这次起义不得不连续两年作战。

在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时期，伊里利亚人重新找到了适当的起义机会并且争得了短期的自由。

公元6年，即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爆发了在巴托领导下的最大的一次伊里利亚人的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三年。大约二十万名起义者解放了伊里利亚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准备攻到意大利半岛上去。罗马统治者对起义的规模害怕到宣布总动员的程度。帝国的大部分军队被派出去对付起义者。伊里利亚人英勇地进行了抵抗。伊里利亚的妇女也参加了战斗。但最后罗马人却得以利用对方的叛变削弱了起义，后来又在公元9年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公元一世纪，也就是罗马变成了世界帝国的时候，伊里利亚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它的地理位置促成了这种发展。除了其他道路之外，还有一条连接罗马和帝国东部地区的主要道路通过这里，这条道路叫做“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这时的各个城市是繁荣的。都拉奇昂始终居于各城市之首。罗马的法律推动了奴隶制关系的迅速发展。元老和高级长官来到伊里利亚并建立了大地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大地产上，伊里利亚奴

隶的数字都在不断增加。

但是伊里利亚居民的一部分逃脱了被奴役的命运。这些自由的人民居住于内地的山区，他们大部分组织在牧业公社或是农业公社里。这些公社在很长时期中间保存了部落的性质。罗马公布了特别的法律来镇抚他们。这些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处于享有公民权的罗马人民和毫无权利的大群奴隶之间。公元二世纪的埃及地理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为这些伊里利亚的部落开列了一整张名单。他在其中提到一个叫阿尔巴诺伊人的部落，这个部落住在都拉斯和迪布拉之间的山区；还提到了他们的城市阿尔巴诺波利斯。

罗马力图从根据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的敕令而取得公民权的这大量自由农民当中征募士兵以保卫它的边界，因为各蛮族部落已在那里开始发动了进攻。他们的队伍扩充到这样程度，以致伊里利亚的军事领袖甚至还做了皇帝，从而开始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百多年的时期当中（从247到361年），伊里利亚出身的七个皇帝相继进行统治。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

伊里利亚的狄奥克列地方出身的人物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皇帝。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把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改为郡、区和省。由于这一重新划分，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被分成三个省：以斯库台为中心的普列瓦尔省，属于达奇亚区；以都拉奇昂为中心的新伊庇鲁斯省（从马蒂河到维约萨河）；以尼科波耶为中心的旧伊庇鲁斯省（从维约萨河到普列维札湾）。后两个行省属于马其顿区。达奇亚和马其顿两个区又属于伊里利库姆郡，整个巴尔干都在这个郡的范围之内。

罗马的手工业者、商人、水手、农民、军人、官吏等等也随着大地产所有主一道移居到伊里利亚来了。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不仅带来了语言，也带来了风俗习惯、文化和罗马的信仰。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拉丁语在国内各城市不仅作为官方语言，而且作为社交的语言开始迅速地普及开来。随着拉丁语的普及和罗马习惯的采用，殖民地的希腊人和城市里的伊里利亚人都开始罗马化了。在城市之外，特别是在内地，罗马化的过程却未能普及。大部分伊里利亚人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但仍然有拉丁语的许多词进入了伊

里利亚语。许多这样的词到今天还保存在阿尔巴尼亚语里面。公元一世纪产生的基督教，作为奴隶和贫民反对奴隶制罗马的压迫机器的学说，在伊里利亚也得到了支持。还在二世纪，人们便提到在都拉斯和奥里昂（发罗那）有一些基督徒的秘密团体。这时出现了两个最早的伊里利亚的宣扬新宗教的人，他们是在都拉斯传教的圣阿斯特和在奥里昂传教的圣多纳特。这两个人都被基督教列为圣徒。

基督教久而久之从被剥削群众的思想变成了为奴隶制国家当局的利益而欺骗这些群众的思想。313年，康士坦丁皇帝（也是伊里利亚人）便把这样的宗教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文献中提到的、阿尔巴尼亚的最早主教职位正是四世纪的。在八世纪以前，这些主教职位通过它们本省的大主教而隶属于罗马教会。

当395年皇帝提奥多修斯把帝国分成各自独立的两部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时，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便划入了东部（后来史称拜占廷帝国）的领土。

拜占廷统治的开始

在拜占廷帝国中，奴隶占有制度的危机，其规模并不象在西方那样大。这里依然有大量对增加产品感到兴趣的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拜占廷帝国由于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不仅足以抵御了那些于476年使西罗马帝国彻底垮台的蛮族的入侵，而且有力量继续维持了上千年的时间。于是，摆脱了罗马统治的阿尔巴尼亚又受到强大的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这种统治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阿尔巴尼亚虽然受到拜占廷的统治，但是它的领土无论从社会结构来看，或是从经济结构来看，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奴隶占有制不仅在城市里，而且也在农村中保存下来。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所实行的行政区划也没有变动。拉丁语还长期被用为官方语言。与前不同的只是阿尔巴尼亚在帝国内部所占据的地理上的位置。从前它多少是位于罗马帝国的中心，而这时却处于拜占廷帝

国的靠近国境的领土上。

在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大地产以及奴隶和隶农的数量增加了。同时，在五世纪和以后，仍有许多自由农民，他们都组织了农业公社和牧业公社，而在城市里，除了从事手工业的奴隶以外，还有自由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由于有了自由市民和农民，也就保持了经济上的繁荣。促成这种繁荣的还有贯穿阿尔巴尼亚领土的各条交通线，特别是交通孔道“埃格纳提亚大道”。沿着这条孔道来往的是形形色色的使东西方间的贸易得到发展的商队。由于这种经济的繁荣，某些城市进一步发展了。这时，都拉斯极度繁盛。它成了拜占廷帝国的最重要的港口。地中海各地的船舶都荟集到这里来。因为都拉斯有许多作坊，漂亮的房舍以及各种娱乐场所，而且市面很繁华，使得当时的人都欣羡不置，把它称作“亚得里亚海上的花坛”。根据传说，它的居民约有八万人。正当阿波罗尼亚已经丧失了自己以前的重要地位时，弗伊尼克城却空前地发展起来。根据当时的一种传说，这座城相当大，在这城里光是以玛丽亚为名的妇女就有九千人。沿着交通

孔道“埃格纳提亚大道”，有些从前的商队站都发展成为城市。例如，爱尔巴桑附近的斯卡姆巴，现在的希孔比河还保留着它的名称。还有德阿波里斯，它的准确的位置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德沃利河把它的名称沿袭下来了。还有另外一些。

然而这种繁荣是暂时的。奴隶占有关系越发展，这种制度的内部危机就越严重。奴隶主加在隶农身上的负担十分沉重，使得一些隶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拜占廷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隶农被固定在土地上，他们没有权利离开。在城市里手工业者也必须在公会里登记，这样，他们也失掉了自由。拜占廷政府由于需款，就增加了赋税并加重了劳役。农民和贫苦市民在这些措施的重压下破产，只好扔掉本业和土地，到大地产所有主那里去当佣工，或者到大财东的作坊里当雇工。伊里利亚的经济动摇了，但是使它遭到最大打击的却是蛮族的入侵。

在四世纪末以前，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几乎没有遭到这种入侵。但是在395年，西哥特人的大军在阿拉里克率领下，如入无人之境地侵入了伊里利亚、马其顿、伊庇鲁斯和希腊，到处破坏，

劫掠一空。他们在这些地方一直盘踞到408年。441年，伊里利亚的达尔达尼亚地区（现在的科索沃）遭到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侵袭，受到严重的破坏，而在461年，东哥特人也窜入了阿尔巴尼亚境内，首先侵入了各个城市。被历次入侵和蹂躏吓坏了的当地居民，一听到蛮族又逼近了，就惊惶失措，都从城市和要塞里逃走，有的奔向山里，有的逃到达尔玛齐亚岛上。都拉斯以及斯卡普塔相继被东哥特人占领并被洗劫一空。479年，东哥特人又侵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并在这里盘踞了九年。在五世纪末叶，这块国土遭到多次入侵以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由一些土兰尼克—保加利亚部族组成的大帮蛮族又蜂拥而来。他们摧毁了拜占廷军队的抵抗，从东到西地踏遍了巴尔干全境。

蛮族的入侵在阿尔巴尼亚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大部分国土遭到破坏，居民稀少了，许多农民变得贫穷了，大部分城市，除了设防的以外，都被抢掠一空。

蛮族的入侵也动摇了拜占廷帝国。到处人心惶惶，这样就影响了经济生活。拜占廷帝国开始

采取措施来保卫自己的疆界，并使国内局势正常化。为了这一目的，从492年到565年统治帝国的三个皇帝——阿那斯塔斯、优斯提努斯和优斯提尼亚努斯（都是伊里利亚族系）在巴尔干和伊里利亚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以加强边界和各个城市的防卫。阿那斯塔斯命令在都拉奇昂（都拉斯）改建防御体系，建成三道城墙。但是这项修建工程在优斯提尼亚努斯皇帝统治时期才有了巨大的规模。根据六世纪时的历史家，凯撒列的普洛科匹的记述，仅仅在新伊庇鲁斯省就修建了三十二座新的要塞，并且修复了二十五座原有的要塞，而在旧伊庇鲁斯也新修了要塞并修复了旧的要塞。另外，在达尔达尼亚修筑了八座新的要塞并修复了六十一座原有的要塞。

尽管修建了这些工程，但是拜占廷帝国由于长期战争而疲惫不堪，再没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边疆。540年，又来了大帮的匈奴—保加利亚蛮族，他们占领并摧毁了新伊庇鲁斯和普列瓦尔的三十二座要塞。帝国甚至无力阻止斯拉夫族人的入侵。这些斯拉夫人在六世纪渡过了桑布河并侵入了巴尔干各地区。到了548年，斯拉夫人竟然

出现在都拉奇昂（都拉斯）城下。

斯拉夫人习于农业，因此他们到处寻找肥沃的土地。他们趁帝国势力日益削弱之际，分布到巴尔干各个地区。从六世纪末叶起，斯拉夫人就逐步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定居下来，并占去了最适于耕种的土地。但是移民过程到七世纪才特别加速起来。

由于受到历次入侵的蹂躏，帝国国土荒废了。定居下来的斯拉夫人建立起了自己的村庄。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巴尔干国家的许多村庄、平原、丘陵、河流、山岭都是以斯拉夫语命名的。

斯拉夫人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以后，就彻底地摧毁了大地产所有主，迫使他们要么就进入城市，要么就干脆迁出阿尔巴尼亚。这样一来，就无形中把奴隶占有制度废除了。奴隶和隶农都成了自由的人并且以自由农民的身分在各地安居下来。同时，内地山区一些伊里利亚部落也从奴隶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于是，一方面由于蛮族的入侵，尤其是斯拉夫人的定居，另一方面由于奴隶和隶农的起义，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奴

隶占有制度解体了。

固然，在沿海各地还有奴隶占有制度的某些残余，但是，它们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七世纪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居住的绝大多数人是组织成农业公社和牧业公社的自由山民和农民。从人种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是混合民族：除了占多数的伊里利亚人以外，这时还有强大的斯拉夫移民，而在沿海地区，则是罗马移民或罗马化了的伊里利亚人的移民。

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阿尔巴尼亚

395年罗马统治的垮台以及六到七世纪罗马制度的消灭也结束了伊里利亚的罗马化过程。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来的斯拉夫各民族的定居，又造成了斯拉夫化的危险。因为长期共居，许多伊里利亚族人都斯拉夫化了。在今天的斯洛维尼亚、克罗地亚、达尔玛齐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各边区的伊里利亚居民都逐渐完全被同化了。但是在伊里利亚南部地区，特别是

在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的边区，如科索沃、杜卡吉因、迪布拉等地，伊里利亚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征。

无论如何，这一古老的民族先是在古时吸取了色雷斯人和罗马人的语言和文化中的许多要素，而后又在中世纪吸取了斯拉夫人和拜占廷人的语言和文化中的许多要素，因而他毕竟也是进化了的。这一个在公元最初十个世纪中形成起来的新兴民族在新的名称下载入中世纪史册。这名称就是伊里利亚的部落——阿尔巴诺伊人。他们在古时居住于都拉斯与迪布拉之间。外国人向来都把阿尔巴尼亚人称为阿尔巴诺伊人，阿尔巴南斯人，阿尔班人。阿尔巴尼亚人在中世纪时期称自己为阿尔巴人，或者阿尔布列士人。

在八世纪时住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联合起来，一部分组织成为农业公社，一部分组织成为牧业公社。每一个公社都把一定数目的农户联合在一起，而这些农户有时彼此之间本来就有同族的关系，有时则仅有邻居的关系。在初期，凡是田地，牧场，森林，水源和果园都是共同所有，也就是归公社所有。但是每个农户

也毕竟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用来种庄稼。每个农户几乎都是自己来生产一切必需品——农产品，牧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他们几乎不需要同别人交换什么。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用以物易物的方法互通有无。使用货币的场合是极少的。他们同城市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这样一来，随着奴隶占有制度的解体，阿尔巴尼亚又回复到自然经济中去了。因此，在蛮族入侵时期衰落下来的一些城市，就一直没有能够恢复起来。它们始终是凋敝不堪，毫无发展。除了都拉斯以外，在这些城市里既没有什么手工业者，也没有商人，更没有任何文化机关。这些城市主要具有农业的性质，另外，它们仅仅做为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而具有某些意义。

尔后，到了七世纪和八世纪，公社的部分土地、农田、果园、葡萄园，逐渐成为各农户的私有财产，而公有财产却开始减少。

由于土地私有制盛行，公社社员一遇贫困就开始出卖自己的土地。为了糊口，这些破产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别人的土地，为此付给地主以收成的十分之一（什一地租）。因此，那时就把这些

租种人家土地的农民开始称为什一地租农。自从出现了什一地租农以后，公社就开始解体了。

贫农的土地都集中在神职人员、军事人员和富有的户主手里。这些人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封建土地贵族(即迪那特)。拜占廷皇帝本人就分给了封建土地贵族很多土地。同时，封建土地贵族，特别是教会的，也开始掠夺农民的土地，有时甚至掠夺整整几个公社的土地。

封建土地贵族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愈益强大以后，逐渐对什一地租农树立起了封建权势。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这时就有了封建关系的萌芽。在八世纪到十世纪时期，这种关系是有限制的。直到十一世纪，历史文件中才出现了“巴立克”的名称，这就是最初一批固定在封建主领地上的农民。

拜占廷帝国为恢复军事威力和抗击外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在阿尔巴尼亚实行了。在九世纪，为了保卫阿尔巴尼亚各省，使其不受早已在多瑙河沿岸建立了自己国家的保加利亚人的攻击和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的阿拉伯人的入侵，拜占廷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两个军区。一个军区包括旧日的省

份普列瓦尔和新伊庇鲁斯，并根据它的中心所在地，把它叫做都拉斯军区。另一个军区包括从维约萨河起到科林斯湾止的地区，并以其中心为名，称为尼科波耶军区。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在851年，保加利亚人在国王普列希安率领下夺取了奥赫里德和德沃利。其后，保加利亚人又在国王鲍里斯（852—889）的统率下占领了贝拉特，马拉卡斯特，并进至发罗那迤北的沿海地区。随后又由国王西美昂（893—927）亲领大军占领了尼科波耶军区所辖的全部地区和都拉斯军区的三十座要塞，但是没能占据都拉斯本城。

在国王西美昂死后，保加利亚王国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它对所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土地的统治依然保持下来。在十世纪末叶，在沙姆伊利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以奥赫里德为中心的保加利亚王国。沙姆伊利更扩张了保加利亚王国的版图。到了989年，他把都拉斯军区的中心都拉斯本城也占领了。但是这种占领并没有维持很久。拜占廷皇帝华西里二世采取了许多办法，沉重地打击了沙姆伊利，使他连遭惨

败。他们之间最后的决战是在阿尔巴尼亚境内贝拉特地区进行的，到了1018年，君士坦丁堡帝国获得最后胜利。于是，经过一个半世纪，拜占廷帝国又恢复了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

不过，到了十一世纪，拜占廷帝国遭到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为了恢复军事实力，拜占廷政府增加了捐税，特别是货币捐税。国家捐税的增加，收税人员的滥用职权，以及封建地主贵族的剥削与压迫，在阿尔巴尼亚，也和在其他各处一样，引起了多次的起义。

其中最大的一次起义是1040—1041年的起义。这次起义开始在马其顿各地区斯拉夫民族中间爆发，他们的首领是彼得·德列亚尼。随后，这次起义发展到都拉斯军区，这里领导起义的是一位落魄的军区长官，名字是蒂莫米尔。

在很短的时期内，这两地的起义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运动，由德列亚尼领导。参加起义的约达四万人，他们赢得很大的胜利。他们把都拉斯也解放了。但是，尽管如此，人数众多的拜占廷帝国军队终于把1041年的起义镇压下去了。

都拉斯军区的长官联合当地的势力强大的封

建土地贵族，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来夺取帝国的政权。1043年，都拉斯军区长官乔治·马尼阿克斯提出种种诺言哄骗军区的居民，使他们都来拥护自已，然后举行了起义，自称皇帝并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在途中被帝国军队击溃。根据拜占廷的编年史家米哈伊尔·阿塔里亚的记载，在起义的人员之中也有阿尔布列士人，即阿尔巴尼亚人。后来又爆发了与此类似的两次起义。1077年，爆发了一次，由尼科伏尔·布里埃尼领导。1080年又爆发丁一次，由布里埃尼的继承者、长官华西拉吉奥斯（帕乌拉戈尼亚的）领导。但是这两次起义也都没有成功。

雄心很大的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企图趁拜占廷帝国政治危机严重的机会，提高西方教会在巴尔干地区的声望，以打击东方教会。于是，他在翟齐大公的协助下，于1077年在提瓦尔地方建立了天主教大主教区，从而把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所有主教都联合起来，这样就打开了在这些地方传播天主教的局面。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唆使已在意大利立足的诺曼人进犯拜占廷帝国。

1081年5月，由三万一心想打劫的诺曼人组

成的大军，在罗贝尔特·库伊斯吉尔德率领下，在阿尔巴尼亚的沿海地区登陆了。他们在占领了沿海各地以后，直奔都拉斯并且把它包围起来。拜占廷人的同盟者——威尼斯人的舰队在都拉斯迤北的帕利角附近攻击了诺曼人的舰队并把它们击溃了。10月间，拜占廷皇帝阿列克斯·科姆涅尼率领自己的军队来到阿尔巴尼亚。但是在同库伊斯吉尔德于都拉斯以南卡瓦雅峭壁附近交战中，拜占廷人被打得落花流水。被诺曼人包围的都拉斯依然处于阿尔巴尼亚行政首长的掌握之中，达几个月之久。这位首长按照拜占廷的官职，称为“驻守长官”。1082年2月，由于都拉斯城内威尼斯居民的背叛，诺曼人把这个城市占领了。尔后，诺曼人又把自己的统治推广到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使阿尔巴尼亚全境都遭到了劫掠。但是诺曼人未能长久保持这些地方。意大利南部爆发了起义，罗贝尔特·库伊斯吉尔德被迫于1083年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阿尔巴尼亚。

1096年，有几批第一次十字军经过了阿尔巴尼亚，其中也有诺曼人，他们是由他们的国王波孟特——罗贝尔特·库伊斯吉尔德的儿子——率

领的。这些饥饿的十字军的过境，使阿尔巴尼亚受到很大损失。

1107年，波孟特率领诺曼人又向拜占廷发起了第二次远征。诺曼人大队人马在发罗那登陆，并由此向都拉斯进发。这支远征队虽然配备有大量的武器，但是波孟特未能把都拉斯城攻下来。在阿尔巴尼亚许多地区，诺曼人与拜占廷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108年，诺曼人战败了，波孟特讲和了，随即率军返回意大利。

诺曼人的入侵给阿尔巴尼亚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以后两次诺曼人的入侵中，也使阿尔巴尼亚遭到严重损失。一次是在1149年，当时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另一次是在1185年，这次诺曼人对拜占廷的进军也失败了。

阿尔贝里公国

到了十二世纪，封建关系也传播到了内地山区。在这里出现了阿尔巴尼亚封建公国。公爵们基本上都是阿尔布列士（阿尔巴尼亚）人。这个

公国日益强大，随着就同拜占廷封建主和斯拉夫封建主的势力发生了冲突。它为了给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开辟道路，企图摆脱外国的统治并打算建成自己的国家。建立这种国家的条件到十二世纪末成熟了，因为这时拜占廷帝国又发生了政治危机，帝国国势很快地衰弱下来。阿尔巴尼亚的公爵摆脱了拜占廷的控制，在1190年建成了自己独立的公国。这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封建国家。这个公国的领土包括今天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它的中心是克鲁雅城。

阿尔贝里公国的第一个统治者是执政官普洛哥尼(1190—1198)。关于他的身世毫无所知。继承他进行统治的是他的儿子金尼（1199—1206)。在他统治期间，拜占廷帝国由于第四次十字军的侵扰而完全崩溃了（1204年)。帝国崩溃以后，阿尔贝里公国就不再受拜占廷势力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却受到邻近封建国家的压迫。在南面，是在1204年建立起来的伊庇鲁斯专制国家，在北面，是柴特国，在西面，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建立起来的都拉斯邦。为了抵御想把独立的阿尔贝里

的领土也归并到都拉斯邦里面去的圣玛尔克共和国①，接替自己的哥哥金尼而统治公国的季米特尔（1206—1216），以信奉天主教为条件向教皇求援，同塞尔维亚国的国王拉西建立友好关系，并与拉西国王的女儿科穆涅尼结婚，这个公主是拜占廷皇帝的外甥女。同时他又同伊庇鲁斯专制国家和拉哥萨共和国接近。他同罗马教皇的友好关系并不是巩固的，而且不久之后反而变成了敌对关系。同时，由于季米特尔采取了一些措施，不但使他能够抵御威尼斯共和国，并且也抵御了后者的同盟国——柴特国。另外，他还抗拒了罗马的干涉。

从这个公国的短暂的全部历史中，我们只知道它与拉哥萨共和国之间订立过一个商约。季米特尔和另外十四个阿尔布列士（阿尔巴尼亚）公爵代表公国签了字，他们并且宣誓一定遵照协定办事，协定规定与拉哥萨和平相处，拉哥萨的国民有权自由地在阿尔布列士（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通行，而且不向他们征税，也不损害他们。季

① 即威尼斯共和国。——译者注

米特尔自称“大执政官”。这个官衔有最高封建主的含意。季米特尔的官衔以及其公爵的官衔都说明在阿尔贝里公国中实行封建官职等级制度。

但是阿尔贝里公国保持独立的时间并不久。在季米特尔死后（1216年），一位地方公爵格里哥尔·加蒙那做了阿尔贝里的首脑。他没有能力抵制南面邻国——伊庇鲁斯专制国家的压迫，后者向北面扩展并征服了阿尔贝里公国。

伊庇鲁斯专制国王提奥多尔·安吉罗斯·科米诺斯（1216—1230）征服了阿尔贝里以后，又发起了多次征讨，企图恢复崩溃的拜占廷帝国。但是，他的计划遭到保加利亚国王伊凡·阿辛的反对。他们之间于1230年发生了战争，提奥多尔在这次战争中被打垮了。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都归并于保加利亚。

几年后，提奥多尔的继承者米哈伊尔二世（1230—1266）又恢复了征讨。这一次伊庇鲁斯专制国王同尼西亚皇帝发生了冲突，尼西亚皇帝是从小亚细亚侵入巴尔干的。他们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战争，战争对米哈伊尔二世是不利的。1253年，尼西亚皇帝提出诺言，答应要承认阿尔巴尼亚人

的自决权，于是，他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阿尔巴尼亚。

可是尼西亚皇帝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因此，在1257年，阿尔巴尼亚人举行了起义，把尼西亚的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跑。阿尔巴尼亚人捍卫自己的自由约有一年。到了1258年，尼西亚皇帝派来了大队人马，这次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阿尔布列士人的起义使伊庇鲁斯专制王国的米哈伊尔二世有了重新对尼西亚皇帝作战的机会。同时，他与西西里国王曼夫列德·霍亨斯陶芬订立了同盟，并把自己的女儿海莲娜嫁给了他，把几座城市——科孚、发罗那、卡尼纳、贝拉特等送给他做为女儿的妆奁。虽然曼夫列德协助了他，但是米哈伊尔二世并未得手。1261年，尼西亚皇帝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恢复了拜占廷帝国，没有多久，又征服了伊庇鲁斯专制王国。

曼夫列德·霍亨斯陶芬同自己的德国封建主和阿尔巴尼亚封建主对阿尔巴尼亚所实行的统治仅仅保持了几年。1266年，在同安茹的查理作战中，曼夫列德吃了败仗，而且阵亡了。安茹的查理在做了西西里国王以后，也把曼夫列德对阿尔

巴尼亚的统治掌握到自己的手里。1269年，他相继占领了发罗那、卡尼纳、贝拉特；随后在1272年又夺取了中世纪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都拉斯，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

查理希望地方居民归向自己，遂于1272年2月21日在那不勒斯宣布成立"阿尔布列士（阿尔巴尼亚）王国"，自命为这个国家的国王。分发给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以一些封建领地，并且依照西方封建官职的等级，封他们以世袭的爵位。他对于市民提出诺言，答应承认他们过去所有的权利并且答应豁免他们许多捐税。

但是很快查理就把这一切诺言忘掉了。来到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封建主占据了阿尔巴尼亚王国政府内的一切职位，并且夺去了国内最大的领地，这样就引起了阿尔巴尼亚公爵们的不满。法国封建主所实行的残酷剥削同样惹起了农民和市民的愤恨。为了粉碎当地封建主的反抗，查理逮捕了其中的许多人并且把他们当作人质监禁在意大利的牢狱里。在拜占廷与安茹人的战争爆发以后，阿尔巴尼亚居民都起来反对安茹人。拜占廷人由于阿尔巴尼亚居民的支持而

赢得了胜利，终于在1286年迫使安茹人撤出了阿尔巴尼亚。

1304年，安茹人在塔兰特公爵腓力浦领导下又进入了阿尔巴尼亚。腓力浦一反他祖父安茹国王查理的做法，尽力认真地依靠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为的是不仅有一起对付拜占廷的同盟者，而且也有一起对付塞尔维亚人的同盟者，因为塞尔维亚人也想在阿尔巴尼亚立足。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也由于担心塞尔维亚王国日益强大，很愿意在安茹人的协助下，来制止这一王国的兴起，何况这时候的拜占廷帝国已大为削弱了。由于互相利用彼此都有好处，所以迫使腓力浦在阿尔巴尼亚把一部分政权分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其中一位胡里耶里姆·布林尼斯特担任了驻在阿尔巴尼亚的安茹人军队的元帅，塔努斯·托皮亚得到长官职位，并被承认统治马蒂河与希孔比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安德烈·穆札卡得到阿尔贝里邦主的职位，并得到希孔比河与赛曼河之间的广阔的土地。

可是，安茹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结成同盟，并未能阻止塞尔维亚王国侵占阿尔巴尼亚的领土。

在斯捷潘·杜沙尼（1331—1355）统治时期，由于强取横夺，这一王国变成了巴尔干的一个帝国。1343—1347年，皇帝斯捷潘·杜沙尼也侵占了阿尔巴尼亚领土，只有都拉斯一地仍处于安茹人统治之下。

不过，塞尔维亚帝国存在并不久。斯捷潘·杜沙尼刚刚去世（1355年），封建主彼此之间就发生了纷争，使得这个帝国四分五裂。被压迫民族的封建主一个跟着一个地退出了这个日趋衰弱的帝国，各自建立了独立的公国。在阿尔巴尼亚也建成了这样的公国。

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关系

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耕地面积增多了。开始使用更加改善的生产工具。除了种植谷物之外，园艺业、橄榄栽培业、葡萄种植业以及养蚕业都得到了发展。这时候阿尔巴尼亚已经是一个畜牧业很发达的地方，到处是大群的牲畜。由于农产品和畜产品增

多，还出口了一部分。

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在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上面。许多古老的城市，象都拉斯（都拉奇昂）、斯库台、发罗那(奥里昂)、贝拉特(安其帕特列阿)都复兴了，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城市，象克鲁雅、卡尼纳、特里希蒂（特里瓦斯特）、戴哈（达格诺）、舒尔达荷（萨尔达）等等。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十四世纪是阿尔巴尼亚城市最发达的时期。在这些城市中，占居首位的依然是有居民二万五千人的都拉斯。

城市经济的基础是手工业生产，结果也就形成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全国各个不同城市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与国外的贸易关系。手工业者用各种金属制造产品。他们用铁、铜、青铜、锡等制作农具、武器、家具，而用金银制作装饰品。许多手工业者从事衣履的生产，做毡斗篷、织麻布和丝绸，做皮鞋、树皮鞋等等。在城市里有裁缝、制皮匠、铁匠、做手工活的妇女、面包师、肉商、木匠、油漆匠、瓦匠、造船工、石匠，以及善于雕刻木材并用木材装饰礼拜堂、公共设施和富人宅邸的工匠。



阿波罗尼亚(现在的波扬)的建于十四世纪的
大寺院中的拜占廷式圣玛丽亚教堂

阿尔巴尼亚各地封建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在沿海地区和内陆盆地地区这种关系才是占统治地位的。十四世纪时阿尔巴尼亚封建主的领地最常见的种类有三种:“布洛尼亚”、“巴什金那”、“麦托荷”。“布洛尼亚”是专分给最高级长官的土地。这种土地的所有者有服军役的义务，这种土地不能世袭，也不许可出卖。“巴什金那”则正相反，不但可以世袭，而且可以出卖。“麦托荷”则是教会机构的土地。

住在“布洛尼亚”、“巴什金那”或是“麦托荷”的从事耕种的农民都是固定在这种土地上的，并

受封建主的支配。他们必须向地主交付封建地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离开封建主。他们就是农奴。阿尔巴尼亚的农民分为以下三种："巴立克"、"希尔夫"和"麦洛布"。

在某些封建主的领地中，农民对封建主提供的义务大部分是劳役。在这种场合下，封建主往往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留下，一部分分给农民。每个农奴必须每周为封建主劳动几天，耕地，下种，收割，打场，并且把收获的粮食运进封建主的仓库。除了劳役以外，农奴还必须以实物和货币缴纳其他一些租税。

在另外一些封建主的领地中，农民付给封建主的地租大部分是实物。在这些领地里，农奴的土地比较多，他们必须把土地收成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但是即使这样，农奴还要以货币缴纳租税，并且要服劳役，为封建主干活。

封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许多阿尔巴尼亚封建主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时是在阿尔巴尼亚的外国统治者的同意下，有时是在违反后者的愿望的情况下，不仅扩大了自己的领地，而且也逐渐地把邻近的封建主置于自

己支配之下。这一个大封建主阶层也就构成了阿尔巴尼亚封建贵族，而且他们统治所及的地区都变成了自治的或半自治的封建领地。塔努斯·托皮亚的封建领地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包括了马蒂河与希孔比河之间的地区。而在那些年代里，安德烈·穆札卡的领地也包括了希孔比河与赛曼河之间的地区。在某些封建领地中，例如，在杜卡吉因，除了面积不大的封建领地以外，还有整整几个村子，有时甚至是整整一些区，那里的农民是完全自由的。大公爵都是住在自己要塞的塔楼里面。例如，托皮亚家族住在克鲁雅，穆札卡家族住在贝拉特，杜卡吉因家族住在莱希。势力最大的公爵们还有自己的宫廷和宫廷人员。某些公爵，象巴尔什、戈洛皮都自己铸造硬币，上面铸有自己的纹章。他们还有自己的旗帜：托皮亚家族的旗上是一头带王冠的狮子，穆札卡家族的是一只双头鹰，中间有一颗星，杜卡吉因家族的是一只白色独头鹰，而十五世纪的卡斯特里奥特家族，则是红地上面一只黑色的双头鹰，后来成为阿尔巴尼亚的国旗。

在十四世纪的阿尔巴尼亚山区里，主要部分

的居民是自由农民和小有产者，他们大都从事牧畜业，从事农业的比较少。在他们那里依然保持着旧时的公社关系。尽管如此，这些完全自由的山民，在一定的季节里，当他们不得不转入冬季牧场的时候，他们就要同那些作为牧场所有者的当地封建主订约，用实物和货币付给封建主牧场租费和其他租税。有时，有些有势力的公爵也占有了一部分山区。但是山民与封建主的关系只限于偿付所租用的土地的租税。

住在高山地区的山民不给任何人交付租税：既不给国家，也不给公爵，更不给自己的长官。虽然这些山民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自己的山区里由于人口增多，往往都很穷。为了糊口，这些贫穷的山民不得不下到比较低平的土地上来。这些饥饿山民的下山往往带有侵袭城市和封建主领地的性质。当拜占廷驻在贝拉特地区的行政长官尼古拉·汉札企图阻止他们下山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山民发动了起义。1330年，山民包围了驻在贝拉特的拜占廷行政长官，但因为没有武器，只好又退下来。1336年，爆发了规模更大的起义，这次起义扩展到了阿尔巴尼亚南部。这一

次拜占廷皇帝安德洛奈卡三世亲率拜占廷大军来到阿尔巴尼亚，并和土耳其雇佣兵一起跟踪追击阿尔巴尼亚人，直到高山地区，极残酷地对待他们。抓到的男人都杀死了，妇孺都卖为奴隶。拜占廷军队抢掠了他们的成群的牛羊马匹。根据目击这次战争的拜占廷历史家伊·康塔库金的记述，帝国军队抢掠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羊有一百二十万头，而牛马则有几十万头。但是阿尔巴尼亚山民的侵袭性的迁徙并没有停止下来。成群结队的阿尔巴尼亚人，赶着自己的畜群，继续向北迁徙，一直到拉哥萨和多瑙河，向南一直到伊庇鲁斯和帖萨利。在塞尔维亚帝国侵占阿尔巴尼亚的时期，正进行着大规模的迁徙。在塞尔维亚统治者的压迫下，几乎阿尔巴尼亚全境各地区的农民和山民都向南迁徙，向帖萨利、阿提克、伯罗奔尼撒，以及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如埃乌贝岛、哈德鲁岛、斯佩兹岛、帕洛斯岛——迁徙。其中大部分在希腊封建主和法国封建主的已经荒废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而另一部分则被雇到他们的军队里去当兵。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人在荒废了的希腊土地上住下来了，他们建立起了许多阿

尔巴尼亚人的村庄，并且由于致力于农业，从而帮助把已经衰落了的中世纪希腊的经济振兴起来。他们那些能够避免长期希腊化过程的后裔，直到现在还住在希腊这些地方。

这里也和其他各地一样，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行会和手工业团体的建立。交换的增加也引起了专门从事商业的市民阶层的形成。阿尔巴尼亚沿海各地区与亚得里亚海上各繁华的中心城市之间，首先是与威尼斯和拉哥萨之间的贸易发展得特别快。这些关系发展的结果，除了使原有的港口(都拉斯、乌尔钦、发罗那、莱希)兴盛起来以外，在沿海地区又发展起来许多新的商港，例如，维约萨河岸的斯皮那里萨，赛曼河岸的比鲁，希孔比河岸的巴什托瓦，德林河岸的麦多，布纳河岸的申津等等。贸易的兴盛导致了集市的形成。由于有了集市，在各个城市里也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封建制度的新制度。根据过去拜占廷皇帝所赋予的并被其他外国统治者所承认的特权，市民并不是农奴，甚至还享受某些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特别是有权参加市民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依照传统从古时就延续下来的。每一个城市的居

民组成城市公社，这种公社有自治权。这样，每个城市都建立有地方自治性质的城市公社。

为了管理全市生活，市民会议选出一个由八至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和一个法官委员会。市民委员会是市长的辅助机构，市长由阿尔巴尼亚最高执政者委派。

城市中还有不少其他公职人员，其中有警察长，要塞长官，舰队长官，财政管理官等等。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居民的社会分化也加深了。在城市里有三个阶层：由富裕市民构成的贵族阶层；中等市民阶层，由有少数财产的手工业者、商人、航海家的基本群众组成；平民阶层，由城市贫民组成（学徒，工人，搬运夫，以及所有没有任何产业的人）。高级贵族阶层势力强大，因而把城市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缩小了市民会议的作用。这样一来，城市公社就变成了贵族公社。

十四世纪时的
阿尔巴尼亚封建公国

由于封建关系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公爵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大大加强，于是他们企图成为自己封建领地中的独立主宰。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利条件在十四世纪下半期形成了，因为在斯捷潘·杜沙尼死后(1355年)，侵占阿尔巴尼亚的塞尔维亚帝国衰落了并且很快地四分五裂了。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利用这种条件，把一部分塞尔维亚的统治者赶走，使另一部分归顺了自己，从而恢复了自己的封建领地并成为独立的主宰。各个城市也利用了这种情况。许多重要城市，如都拉斯、斯库台、乌尔钦、特里希蒂等都取得了独立管理权，因而变成了自治公社。

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在恢复了自己的领地以后，为了扩张领地，彼此之间发生了内战，他们并且向城市进军，想征服这些重要的中心城市。这样一来，在十四世纪后半期阿尔巴尼亚的封建

主始终是你争我夺，陷于混乱状态。这样进行多次战争的结果，最强大的公爵胜利了，制服了比较弱小的公爵，把自己的权势扩展到各个城市，进而建立了庞大的封建主领地，其中有三处变成了公国。

其中一个公国建立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在塞尔维亚帝国崩溃以后，塔努斯·托皮亚的儿子查理·托皮亚于1358年开始成为这一带地方的独立统治者。初期，他只统治着贝特列雷和它附近的地区，后来，他征服了邻近的封建主，扩张了自己统治地区的疆界。1362年，他从陆地上包围了都拉斯这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很重要的城市。但是他没有能够占领它，因为他没有舰队。查理迫使该城居民答应每年向他纳贡以后，就解了围，并在海岸建立了一所造船厂，以便修造他所需要的舰只。

在亚得里亚海岸开办造船厂，使得查理·托皮亚同威尼斯共和国发生了争执，因为后者认为阿尔巴尼亚舰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妨碍自己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活动。查理向都拉斯进军，又引起了他同安茹人原来就有过的争端，

因为安茹人也企图重新征服“阿尔贝里王国”。1364年，当威尼斯舰队开始在海上行动的时候，圣玛尔克共和国的同盟者乔治·巴尔沙率领自己的军队从北面向查理·托皮亚发起进攻。但是查理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在马蒂河一带击溃了乔治·巴尔沙的军队，并俘获了乔治·巴尔沙本人。1368年，查理利用他修造的舰队占领了都拉斯。1372年，他又赢得了一次胜利，即击溃了安茹人所发动的一次远征；安茹人这次曾经从海上登陆并短时期地占领了都拉斯。

这样，查理·托皮亚通过长期的战争，使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封建主都归顺了自己，击退了外来的干涉，从而把自己统治地区的疆界伸张到北面的马蒂河，南到希孔比河。他以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的身分，在自己的属地上建成了一个单独的公国。公国的中心是都拉斯。有些外国承认他为阿尔巴尼亚公爵。

在塞尔维亚帝国崩溃以后，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各地发生了多次封建主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是一个新兴的封建家族赢得胜利。这就是斯库台湖以东巴列兹村的巴尔沙家族。老巴尔沙曾在斯捷

潘·杜沙尼手下作官。斯捷潘·杜沙尼死后，他就使阿尔巴尼亚北部和黑山的阿尔巴尼亚封建主和塞尔维亚封建主都一个跟着一个地归顺了自己，从而开拓了以斯库台为中心的广阔的领地。老巴尔沙死后（1362年），他的三个儿子——斯特拉吉米尔（1361—1372），乔治（1372—1378）和巴尔沙二世（1378—1385）——又把自己统治的地区向北推广到黑山，向东扩展到普里兹伦，向南延伸到马蒂河，由马蒂河再向南就是都拉斯公国的领地了。

在巴尔沙二世统治时期，斯库台公国的威力最为强大。巴尔沙二世同发罗那城执政长的唯一的女儿科密达结了婚，而发罗那城执政长死后没有留下继承者，于是巴尔沙二世得到了发罗那、卡尼纳和贝拉特做为嫁妆。从这些地方他又把他的统治扩展到封建主穆札卡和玛塔兰哥的领地，直到希孔比河。这样一来，就同南面的都拉斯公国相邻了。巴尔沙二世幻想占有全部阿尔巴尼亚国土并成为阿尔巴尼亚国王。他认为都拉斯公国是他达到这个目的的障碍。另外，查理·托皮亚的敌人——威尼斯共和国和罗马教皇都煽动斯库

台的统治者去打击都拉斯的统治者，因为罗马教皇很想使自己的教会在这些地区占统治地位，从而希望已在1369年改宗天主教的巴尔沙来统治阿尔巴尼亚，而不愿意正教徒查理来统治阿尔巴尼亚。

这两个公国之间的战争于1382年开始了。巴尔沙二世占领了查理·托皮亚的统治地区并在同年攻占了都拉斯。查理由于没有其他的同盟者，就向于1385年进至马其顿的土耳其军队求援。查理在土耳其军队的援助下，战胜了巴尔沙，后者在发生于鲁什尼以南的萨伏尔战役中阵亡了。查理收复了失掉的领土，包括都拉斯在内。土耳其人把这个国土劫掠一空以后也离开了阿尔巴尼亚。

土耳其人的来临，尽管是暂时的，却使威尼斯和罗马教皇深深感到必须结束与查理·托皮亚的争执，而后者也从土耳其人的贪婪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但是这些事件发生以后，查理·托皮亚没有再活多久。他死于1388年，葬于爱尔巴桑附近他本人原来建造起来的圣乔治·乌拉吉米尔大寺院中。在这座大寺院的墙壁上直到今日还保

留着用拉丁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写的铭文，其中称查理·托皮亚为阿尔巴尼亚公爵。

塞尔维亚帝国的崩溃鼓舞了伊庇鲁斯的希腊的、阿尔巴尼亚的和瓦拉希亚的封建主，因为他们也都企图建立独立公国。

首先发难起来反对塞尔维亚统治者、斯捷潘·杜沙尼的弟弟斯捷潘·奥罗什的是一些希腊的执政官。希腊的封建主想要恢复以前伊庇鲁斯专制王国并把在塞尔维亚统治时期所失去的领地收复回来。这种企图使定居在其中某些土地上的阿尔巴尼亚农民特别感到不安。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由于得到农民方面的支持，就起来反对希腊的执政官并把他们击溃于阿希鲁斯河滨的一次战役中（1358年）。

在消除了来自希腊的执政官方面的危险以后，在吉英·布埃·什帕塔(1360--1400)所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封建主与塞尔维亚统治者斯捷潘·奥罗什所领导的、而后来又为其女婿托马·普列留比维察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封建主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冲突。吉英·布埃·什帕塔一面击退不时向土耳其人求援的塞尔维亚封建主的进攻，一面扩

展自己属地的边界并建立了一个以阿尔塔为中心并以阿尔塔专制国家而知名的独立公国。这一专制国家的疆界，北至纪诺卡斯特，南至科林斯湾。

本来应该导致所有公国和面积较小的封建领地联合并导致一个统一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建立的各封建主之间的混战兼并局面，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占阿尔巴尼亚面停顿下来，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六世纪前半期利用拜占廷帝国崩溃的机会，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军事封建国家。1354年，他们绕过君士坦丁堡，渡过海峡，并由于当时巴尔于各个国家中封建主之间互相攻击，呈现一片混乱状态，他们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并且有时还得到当地公爵的支援，因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占领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土耳其人也向阿尔巴尼亚发起了进军。土耳其人作为查理·托皮亚的同盟者于1358年发起

了第一次进军以后，又在1388年出现于阿尔巴尼亚。1389年，许多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的、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以及匈牙利的封建主在塞尔维亚国王拉札尔领导下联合起来，反抗土耳其掠夺者。阿尔巴尼亚公爵中加入到这个同盟的有斯库台的乔治·巴尔沙二世和贝拉特的狄奥多理·科洛那·穆札卡。但是在同年发生于科索沃平原的一次流血激战中巴尔干同盟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绰号"闪电"的苏丹巴耶济德继承阵亡于科索沃战役中的苏丹穆拉德一世而登上皇位以后，土耳其侵略军势如潮涌，不可遏止。

威尼斯共和国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利用了由于奥斯曼人入侵而给阿尔巴尼亚公爵们造成的困难局面。它企图在阿尔巴尼亚落于土耳其人之手以前把阿尔巴尼亚的一些繁华而发达的城市夺取过来。威尼斯"大议会"尽力劝说公爵们把这些城市让给威尼斯，答应给他们报酬和援助。在大议会看到这样做毫无效果的时候，就采取了其他的压制方法，它组织对封建主暗杀，挑拨他们内讧，有时甚至唆使土耳其人来进攻这些封建

主，答应以大量财物酬劳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在双重压迫——一面是土耳其，一面是威尼斯——之下，开始屈服了。都拉斯公国的新统治者查理的儿子乔治·托皮亚——他是在1388年查理死后继承父位的——年幼多病，无能统治，就在威尼斯的压迫下屈服了。1392年，乔治签署了一项声明，根据这一声明，在他死后，都拉斯由威尼斯接管。在签署这项声明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就突然死去了。这样一来，都拉斯就归属于圣玛尔克共和国，而公国其余的地方也都分成了小的封建领地。斯库台公国也发生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巴尔沙二世死后，寡妇科密达离开了巴尔沙家，南部的领地也从斯库台分离出来。巴尔沙二世的侄子乔治·巴尔沙二世（1385—1403）成为北部领地的统治者。但是他甚至不能保住原有的领地。他不得不与从1388年起开始侵入阿尔巴尼亚领土的土耳其人作战。上面已经讲过，1389年，乔治二世作为同盟者加入了巴尔干同盟军这一方面，并参与了激烈的科索沃战役，结果获胜的是土耳其人。他的一些附庸公爵如杜卡吉因、札哈林、约尼木、斯潘等趁他衰弱的机

会，都相继脱离了公国而自己建立起了独立的领地。在其后几年中，土耳其人又一时占据了这个公国的沿海地区。乔治二世，也和乔治·托皮亚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威尼斯人的压迫而屈服了，并且把手里剩下来的主要城市——斯库台、特里希蒂、达尼亚、沙希等于1396年拱手让出。由于土耳其人的压迫和封建主之间的内部倾轧，阿尔塔专制国家也四分五裂。在吉英·布埃·什帕塔死后（1400年），这个专制国家分裂成两部分。北部成为独立的领地，中心是纪诺卡斯特，由吉英·布埃·什帕塔的女婿吉英·杰贝尼什特统治；南部以阿尔塔为中心，由吉英·布埃·什帕塔的弟弟马乌里克·布埃继承。几年以后，这两部分又分裂成为一些面积更小的领地。于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年间，圣玛尔克共和国就把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一个跟着一个地都夺过去了。同时，许多阿尔巴尼亚公爵都成了威尼斯的附庸。

威尼斯共和国在夺来的城市中都设置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实行了自己的法律，并派威尼斯人担任机关的官吏。耕地都交出来做为威尼斯人的私产。这些措施一经实行，就破坏了城市公

社的自治制度。在这些城市里征收很高的捐税，市民要服劳役。在各城市定居下来的威尼斯商人垄断了商业并且大肆投机居奇，使市民和农民受到损失。1399年，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以反抗这种剥削。起义者解放了斯库台和特里希蒂。但是威尼斯共和国派来军队，因而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许多封建主宁愿与土耳其人达成协议。协议是可能的，因为苏丹巴耶济德也感到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他所占领的一切地方建立土耳其军事封建管理机关。在阿尔巴尼亚，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土耳其人让当地的公爵仍旧管理自己的领地，不过把他们置于附庸的地位，强迫他们承认苏丹为最高统治者，每年向他纳贡，而且每当这位最高统治者征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必须率领自己的军队加入土耳其人这一方面去作战。

土耳其人于1402年在安卡拉遭到了失败，而且巴耶济德三个儿子之间为了争夺皇位而展开了斗争，这便使阿尔巴尼亚公爵们有可能摆脱附庸的地位。阿尔巴尼亚公爵们得到了重新开始进攻的机会，以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封建领地。不仅是

他们彼此之间互相进攻，而且也向威尼斯共和国进攻，以便夺回被它占领的城市。乔治二世的儿子巴尔沙三世（1403—1421）企图恢复斯库台公国。他对威尼斯共和国进行的战争时间特别久而且特别残酷。

但是威尼斯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挑起公爵之间的不和，因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处境。

由于这些战争，阿尔巴尼亚境内又是一片封建割据的状态。全境分割成为更多的封建领地，它们的范围每年都在改变，有一部分甚至每个月都在改变。

1413年，土耳其人几乎克服了政治危机。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割据状态，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在1415—1419年间，没有特别费事就恢复了土耳其人以前的权势。这一次土耳其人只是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把阿尔巴尼亚的公爵留下做为附庸，而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则赶走了当地的势力雄厚的公爵，夺取了他们的领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封建制度——“提马尔”和“札美特”制度。1421年即位的苏丹穆拉特二世还把这种制度保持了一段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封建领地的边界根本改变了。十四世纪的三个最大的公国都完全四分五裂了。封建战争结束以后，建立起来三个新兴的大领地。其中一个是杜卡吉因公爵们的领地，它位于今天的莱希、米尔吉塔、杜卡吉因和普卡地区。另一个是阿里安尼特公爵们的领地，它占据的地方是什帕塔、柴尔麦尼卡和摩克拉。在它们之间更有一个大的领地，是卡斯特里奥特家族领地。卡斯特里奥特家族在尔后的一些年代里在全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卡斯特里奥特家族并不是门阀古老的公爵。他们是特罗波亚山区哈斯地方的一个名叫卡斯特拉特的村子里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十四世纪下半期，波尔·卡斯特里奥特是一个小封建主。他不住在哈斯，而住在迪布拉地区，他只领有两个村子。在土耳其人侵入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波尔的儿子——吉昂·卡斯特里奥特才开始自己的活动。初期，他是苏丹的附庸，但是在安卡拉战役以后，他摆脱了附庸的地位。他一再征战，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迪布拉地区，随后又进至马蒂地区，并推进到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地。为了抗击土

耳其人的压迫，吉昂同威尼斯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当吉昂看出威尼斯人并不打算同土耳其人作战的时候，他在1410年又承认自己是苏丹的附庸，并为了表示忠诚，派他的一个儿子，大概是长子斯塔尼沙到苏丹那里去作人质，可是斯塔尼沙并没有在苏丹那里住很久。吉昂·卡斯特里奥特所实行的是独立政策，目的是扩大和加强自己的权势。1420年，卡斯特里奥特家族的土地向西发展到沿海，向东发展到普里兹伦。看样子，卡斯特里奥特的独立政策引起了土耳其人的怀疑，因为在1423年苏丹穆拉特二世迫令马蒂和迪布拉封建主吉昂把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儿子都送往土耳其京城——埃地尔内——做为保证忠诚的人质，这三个儿子是斯塔尼沙、康士坦丁和乔治（第四个儿子莱诺什做了僧侣）。

在土耳其同威尼斯为了争夺萨洛尼卡而发生了战争的时候（1428—1430），吉昂·卡斯特里奥特大概是由于与圣玛尔克共和国有约，就抛掉了苏丹附庸的名位而对土耳其宣战。可是这次起义未能成功。1430年，圣玛尔克共和国丧失萨洛尼卡以后，就同苏丹讲和，而置自己的同盟者于不

顾。同年，胜利了的苏丹派出土耳其军队去进击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各地区的起义者。吉昂·卡斯特里奥特被击溃了。他的要塞一部分被破坏了，成为废墟，一部分由土耳其驻军占据了。卡斯特里奥特的公国破碎了。大部分都落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并且主要是在山区仍然留归战败的吉昂掌管。

土耳其人在扑灭了吉昂·卡斯特里奥特的起义以后，就开始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实行自己的一套"提马尔"制度。

这种制度的建立是从建立全国封建行政组织开始的。以前的封建主领地都取消了。1431年，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南部各地区，北迄马蒂河，南至察梅里亚都被划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桑札克①，称为阿尔巴尼亚桑札克（阿尔瓦尼特桑札克），其中心是纪诺卡斯特，由桑札克别依②管辖，而桑札克别依又受鲁米利亚省③省长管辖。

① "桑札克"是土耳其的封建军事行政单位。——译者注

② 即总管。——译者注

③ "鲁米利亚省"指当时土耳其在欧洲兼并的地区，包括巴尔干各桑札克。——译者注

阿尔巴尼亚桑札克又分为更小的行政单位——分为十个维拉耶特[1]，或者称为卡札（纪诺卡斯特维拉耶特、卡尼纳维拉耶特、贝拉特维拉耶特、克鲁雅维拉耶特等等），管辖它们的是苏巴什。苏巴什执行军事的和封建的职权，并受桑札克别依的统辖。在每一个卡札里，除了斯帕希，还有卡吉，他是民政、宗教、司法的长官，直接归苏丹管辖。

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不在桑札克管辖范围之内，这里还保持了原来的局面。

在阿尔巴尼亚，也和在巴尔干其他各地一样，土耳其人宣布桑札克以内所有耕种的和未耕种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只有一小部分土地被承认是私人的和教堂的财产。

在同年，即1431年，土耳其当局开始登记农民和市民的家庭状况以及他们的土地、果园、葡萄园、橄榄园、牲畜、蜜蜂和他们所有的其他财产，为的是来计算每家农民和市民经营产业所得的收入。根据这些收入来规定并登记每一家农民

① "维拉耶特"在这里可译为"区"。——译者注

和市民必须提供的义务和缴纳的税款。1432年6—7月间，这项登记工作结束了。

苏丹把阿尔巴尼亚桑札克的土地划分为三百三十五处领地（采邑）——提马尔，札美特和哈斯，并把它们分给了三百三十五个封建主。每一处领地包括一个、两个或者更多一些，而有时是几十个彼此毗邻或相隔很远的村子。每一位封建主有权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城市或乡村中征收规定的租税。根据封建主所得到的已登记的收入总额，把这些领地分成提马尔（每年不到两万阿克切），札美特（每年由两万阿克切到十万阿克切）和哈斯（每年超过十万阿克切）。

领地的大部分是提马尔。各区的苏巴什以及其他一些有权势的封建主所领到的是札美特。桑札克别依所分到的则是哈斯。

为此，封建主必须在每次苏丹征召作战的时候，立即以武装骑士（即斯帕希，有一定数量的兵士做为随从，人数多少依照他们所得的收入而定）的身分应征。如果斯帕希不听从苏丹的征召去参加战争，那么就剥夺他的提马尔、札美特或是哈斯，把它们另行分给其他的斯帕希。提马尔

的所有主同自己的兵士在本区苏巴什领导下，打着桑札克别依的旗帜去作战。

提马尔所有主，苏巴什和桑札克别依构成武职封建主阶层。但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封建主，他们的名称是卡吉、伊马木、埃民等等，他们也分领提马尔，但是他们没有参战义务，而必须担任桑札克行政方面的职责。他们构成文职封建主阶层。阿尔巴尼亚桑札克封建主的基本部分（约90%）是武职封建主。其中既有土耳其人，也有阿尔巴尼亚人，既有伊斯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和正教徒。

提马尔、札美特和哈斯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它们的最高所有主是以苏丹为代表的土耳其国家。土耳其国家在分给斯帕希以封建领地的时候，并没有赋予他们以完全占有权，而只是封建领地利用权。这样一来，斯帕希既没有权利出卖提马尔、札美特或哈斯的土地，也没有权利把它们赠予任何人。他享有的权利只不过是向自己领地内的农民征收一些规定的租税。农民对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仅仅有权使用，也就是有权在向封建主缴纳一定租税的条件下耕种和经营土地。

提马尔、札美特或哈斯以内的农民称为拉亚。他们必须向斯帕希所尽的义务是很多的。拉亚只有在他向斯帕希——封建主——缴纳地租的情况下才有权使用土地。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把自己所有农产品和牲畜产品的十分之一交给封建主，还要缴付"伊斯片术"和"尼亚贝特"：这是一些罚金，只要他们犯了错和给封建主造成损失，就要缴纳。

拉亚除了应对斯帕希尽义务以外，他们对苏丹和土耳其国家也有义务。其中最苛重的就是人头税"吉札"，凡是年满十四岁的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必须缴纳。

土地的登记，义务的繁重，不仅从前的农奴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自由农民之变成拉亚，贪婪的斯帕希在乡村的跋扈，他们日常对农民生活的干涉，都更增加了阿尔巴尼亚人对土耳其人的憎恨。这种憎恨在建立提马尔制度之初就种下根了。许多乡村都起来反抗登记。在某些场合中，农民打死过土耳其的埃民，不让斯帕希到自己的村子里来。

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也是愤愤不平的，他们

在登记土地时都丧失了自己的领地，有的是丧失了一部分土地，象阿里安尼特和卡斯特里奥特，另一些则是丧失了全部土地，象托皮亚、穆札卡、斯特列斯、巴尔什等。这些公爵很盼望能够收复自己的领地。他们看到农民群众情绪激昂，一触即发，于是起来领导在土地登记刚刚完毕就爆发起来的起义。

这些起义之中规模最大的是1432年夏天在阿里安尼特领地上爆发起来的一次起义。农民在乔治·阿里安尼特领导下，拿起武器，杀死并赶走了斯帕希，而且在短时期内收复了自己的土地。同年，土耳其人派出军队来镇压他们，却被乔治·阿里安尼特击溃了。几个月以后，正在隆冬，苏丹穆拉特二世又派出军队来攻击阿里安尼特。但是，就在这一次，阿尔巴尼亚人也在希孔比河谷的一次流血激战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1433年，乔治·阿里安尼特又在腊贝里亚第三次战胜了新派来的土耳其军队。

这几次胜利的消息立时传遍各地。欧洲许多王国的宫廷都祝贺并鼓励阿里安尼特。由于起义一再赢得胜利，所以起义也推进到了全国其他地

区。纪诺卡斯特地区在戴培·杰奈比什领导下所掀起的起义其规模特别大。苏丹担心起义到处蔓延，于1434年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人数很多的军队。这支军队在镇压了纪诺卡斯特地区的起义以后，就前去进攻乔治·阿里安尼特。战斗持续了一年多。经过多次战斗，起义于1435年被镇压下去，而阿里安尼特也被迫撤入山区。1437年，在贝拉特地区又爆发了起义，它是由狄奥多里·科洛那·穆札卡领导的。但是这次起义也被极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虽然有居民的积极参加，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起义，由于领导者都是各自为政的公爵，他们势力分散而且没有组织，所以都被镇压下去了。如果为了解放阿尔巴尼亚，而把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集中起来，置于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那么，对兵力占优势而且很有组织的土耳其军队作战才能得到成功。这一点经过几年以后，才在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的领导下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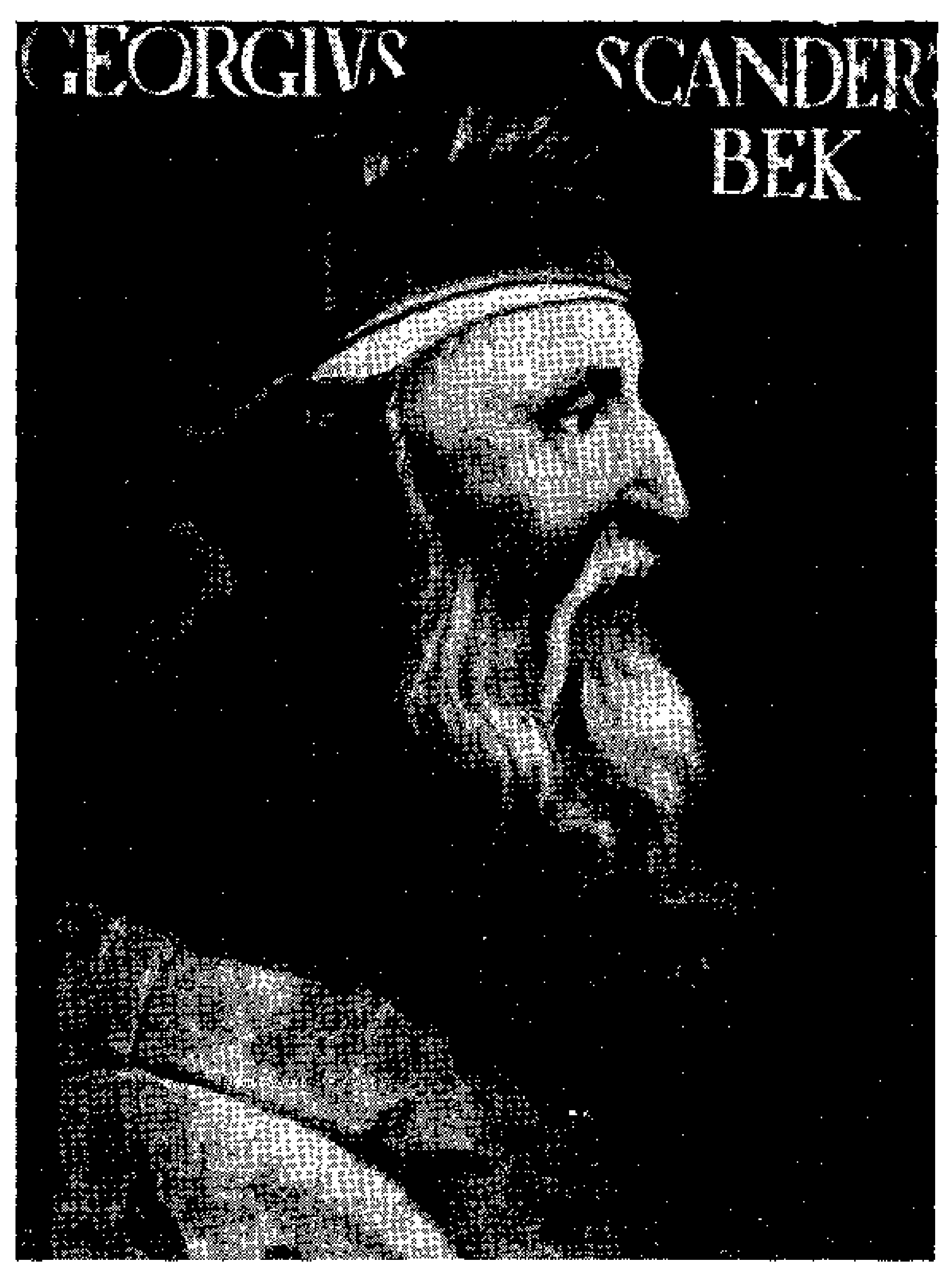
1443年的总起义

据推测，吉昂·卡斯特里奥特的小儿子乔治·卡斯特里奥特大约生于1405年。他的童年是同他的父母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同他哥哥一起被送到土耳其人那里去做人质。斯库台的一位人文主义者马林·巴尔列茨在他用拉丁文所写的并于1508—1510年问世的关于斯坎德培的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中写道：乔治被送到苏丹穆拉特二世那里去做人质的时候才九岁。在十五世纪一些其他文献中也确认他在被送到穆拉特二世那里去做人质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但穆拉特二世是在1421年登上皇位的。据推测，送出人质是在1423年，因为这时土耳其苏丹已经征服了所有阿尔巴尼亚公爵。这时乔治·卡斯特里奥特大约是十八岁，而不是巴尔列茨所记载的九岁。

据土耳其编年史家们的描述，他身躯魁梧，灵活机警，又漂亮，又聪明，在埃地尔内宫廷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丹把自己藩臣的儿子乔治送进宫廷所设的近卫军事学校。按照这里的规矩，乔治成了伊斯兰教徒并接受了斯坎德的名字。据传记作者们的记载，他成绩优良地在军事学校毕了业。1426 年，乔治又回到阿尔巴尼亚，但是以后许多年在文件里就不再提到他。这一时期，他大概是在苏丹宫廷里做人质。乔治既然是军人，而且又是藩臣之子，就不得不以斯坎德之名参加土耳其人常常举行的远征。在这些远征中，他战绩辉煌，得到当时的军衔"培"。于是人家都把他叫做斯坎德培。他在参加远征中，同时也取得了苏丹的信任。1438 年，穆拉特二世任命斯坎德培为克鲁雅维拉耶特的苏巴什，这个维拉耶特是阿尔巴尼亚桑札克里面的最重要的维拉耶特之一。

尽管斯坎德培在土耳其军队里服务多年，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奥斯曼铁蹄下呻吟的祖国。他依然热爱祖国的自由和同胞的自由。当他还在克鲁雅充任苏巴什的时候，他就秘密地准备起义了。斯坎德培也很关心获得国际上的支援。通过他的年老的父亲，他与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拉哥萨进行了谈判，它们都表示愿意和他友好。



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
（十六世纪绘画）

1440 年，斯坎德培离开了克鲁雅。他显然是又作了迪布拉桑札克的桑札克别依。他到了这里，继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那不勒斯及匈牙利建立了联系。尽管群众已经作好了起义的准备，尽管与他友好的国家对他备加鼓励，而斯坎德培却把开始起义的时间推迟到 1443 年秋季，因为这时国际方面的条件更为有利。

还在 1442 年，匈牙利人在雅诺什·胡尼亚迪天才统帅的领导下，就由以前一直在进行的防御战争转入顽强的进攻，以便把侵略者——奥斯曼人从巴尔干半岛更远地赶走并尽可能地完全驱逐掉。

在获得初步胜利以后，胡尼亚迪决定在翌年组织更为强有力的进攻。为了这个目的，他尽力同巴尔干各国人民联系，要他们在土耳其人的后方活动。匈牙利的同盟者——罗马教皇不断地对巴尔干的和阿尔巴尼亚的公爵们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匈牙利人向南推进时立时拿起武器去反抗土耳其人。也向斯坎德培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斯坎德培没有理会这种要求，依旧服从苏丹的命令并

随同自己桑札克的军队一起进至多瑙河流域。

1443年11月3日，匈牙利军队表现出很大的英勇精神，渡过了多瑙河并开始进攻尼什城，使土耳其军队惊慌失措。这时，斯坎德培认为已经到了适当的时机。在撤退所引起的一片慌乱之中，他同他的侄儿哈姆查·卡斯特里奥特带领三百名阿尔巴尼亚骑兵离开了前线，几天以后，来到了迪布拉，受到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

斯坎德培在迪布拉采取了紧急措施，以便把全国从土耳其驻守阿尔巴尼亚的驻军下解放出来。在这些驻军系统中，克鲁雅要塞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要塞在位置上具有战略意义，若以战斗攻取是很困难的。于是，斯坎德培利用一纸伪造的命令，假说他又被派为克鲁雅的苏巴什，才进了要塞。到了夜间，他把潜伏在附近森林里的自己的士兵放进要塞里来，并在效忠于他的市民的协助下进攻了守卫要塞的土耳其驻军并把它们消灭了。

从这一次进攻就开始了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人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总起义。在以后几天，斯坎德培自己就把起

义推进到卡斯特里奥特领地内的其他地区，到处赶走了斯帕希和土耳其驻军。1443 年 11 月 28 日，他宣布自由的阿尔巴尼亚公国光复了，在克鲁雅白色的城堡上升起了卡斯特里奥特家族的旗帜——红地上一只黑色的双头鹰。

斯坎德培的起义也促使其他阿尔巴尼亚公爵们起来收复自己的封建领地。1443 年 12 月，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完全被肃清了。

在这些地方的起义完成以后，斯坎德培和阿尔巴尼亚的其他领导者面临一项任务，就是要把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联合起来，不只是为了抵御土耳其人的进攻（因为苏丹在击退匈牙利人的进攻以后势必要派出军队来），而且也是为了收复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为了解决这项任务，在斯坎德培发起下于 1444 年 3 月 2 日在列沙举行了大会，几乎所有的阿尔巴尼亚公爵们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也有从前各次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的领导者，例如乔治·阿里安尼特，安德烈·托皮亚，尼古拉·杜卡吉因，狄奥多理·穆札卡等人。阿尔巴尼亚自由的山民部落首领也参加了大会。

阿尔巴尼亚公爵们，虽然彼此之间仍有意见

分歧，但是都在追求保护自己封建领地的利益，所以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土耳其人作战。这样就成立了以斯坎德培为首的大同盟，即尽人皆知的“阿尔巴尼亚联盟”。为了同样目的，大会决定组织阿尔巴尼亚军队，由各盟员派出来的部队组成。任命斯坎德培为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为了开支军费，大会决定成立公库。公库基金由盟员交纳。在大会上每一个公爵都提出他可以向“阿尔巴尼亚联盟”提供的军队和款项。斯坎德培答应提供最大数量的部队。

“阿尔巴尼亚联盟”只是阿尔巴尼亚公爵抗击土耳其人的一种政治和军事同盟。每一个公爵继续保有自己的领地，以及在这些领地范围内的自治政权。斯坎德培也保有自己的领地。斯坎德培固然是“阿尔巴尼亚联盟”的盟长，但同时却也只是居一律平等的盟员中的首位而已。他无权干涉其他公爵的内政。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阿尔巴尼亚联盟”的成立毕竟标志着前进了一步，因为借此总算建立起了一条对土耳其人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

莱希会议闭幕以后，斯坎德培立即加速组织

阿尔巴尼亚军队，并采取了一系列其他的防御措施。由于他详知土耳其军队的长处和短处，所以他努力不去建立公爵们原有的那种军队，——由雇佣的土匪和没有组织的农民成立起来的军队，——而建立一种有纪律的、受过训练的和决心与敌人无情作战的军队。

在短时期内，斯坎德培建立起一支人数约八千人的军队。其中一部分，约三千士兵，编成“近卫军”。这一支军队经常跟随斯坎德培，其中有步兵，也有轻骑兵（重骑兵在同土耳其斯帕希和雅内察尔作战中，表现出是战斗力薄弱的）。另外一部分，也大约为三千人，由摩西·加列米率领，用来保卫东部边境，因为土耳其军队可能由这里进犯。这都是由卡斯特里奥特领地的农民编成的常备军。另一部分军队由各加盟公爵派出的部队编成。除此之外，斯坎德培还建立了农民义勇军，他们在战争发生时，一经征召，就来支援正规军。在这种组织之下，如有必要，斯坎德培就能动员一支为数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的军队。

斯坎德培的最初几次胜利

很快就有了同土耳其人会战的机会。在胡尼亚迪于春季刚刚退回匈牙利以后，苏丹就决定镇压阿尔巴尼亚人的胜利的起义。1444年6月，从奥赫里德湖方面有一支由阿里-巴夏率领的两万五千人的军队侵入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军队出动去迎击这支军队。双方相遇于多摩斯多瓦田野上。1444年11月29日，阿里-巴夏首先发起冲击。斯坎德培装出即将应战的样子，但却很巧妙地作了机动，假作被击败了的姿态，撤退下来，把土耳其军队引诱到为丛山和森林所环抱的、狭窄的托尔维奥拉盆地。土耳其人以为阿尔巴尼亚人已是囊中之物，但是自己反而突然被斯坎德培埋伏下来的军队包围，这些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敌军攻击，战斗一直进行到全歼敌军为止。

苏丹又于1445年和1446年派出了两支远征军来进攻阿尔巴尼亚人。但是他们也被阿尔巴尼亚军队击溃了。

1447年，土耳其人没有来进犯阿尔巴尼亚。但是，在这一年却开始了同威尼斯共和国的争执。威尼斯共和国很担心阿尔巴尼亚封建领地、特别是斯坎德培的自由公国由于战胜土耳其人而强大起来。圣玛尔克共和国害怕它们在更加强大了以后，就会企图把掌握在共和国手中的繁华的沿海城市夺去，于是就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在“阿尔巴尼亚联盟”中制造不和，特别尽力破坏斯坎德培的独立政权，因为，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斯坎德培是它的“眼中钉”。

这种敌对政策掀起了于1447年秋季爆发的“阿尔巴尼亚联盟”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达尼雅城成了这次战争的导火线。达尼雅领主和“阿尔巴尼亚联盟”盟员列克·札卡里亚死后没有留下继承者。该城和达尼雅要塞应该归于联盟。但是在阿尔巴尼亚军队未来之前，威尼斯就狡猾地占领了这座要塞。这时，斯坎德培就以联盟的名义进攻了达尼雅和威尼斯的其他沿海要塞。但是因为没有大炮，所以没有能够把它们攻下来。战斗继续到翌年。威尼斯居心挑起联盟盟员间不和的企图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共和国悬重赏要

杀害阿尔巴尼亚的领袖，但是这一着也未得逞。

1448年春季，正当继续与威尼斯作战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的处境突然恶化了。6月间，苏丹穆拉特二世亲自率领的土耳其大军从东面逼近了边境要塞斯菲蒂格勒（现在迪布拉附近的库加其克）的城下，并且包围了它，以便尔后继续向克鲁雅进军。

土耳其人的进攻使阿尔巴尼亚人陷入两面受敌的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斯坎德培在斯库台地区对威尼斯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当地起义农民的协助下，他于1448年7月23日在德林河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击溃了威尼斯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然后，为了监视敌军，在这里留下了一小部分军队，由他的侄儿哈姆查·卡斯特里奥特率领，他自己则带着其余的军队向被土耳其人包围的斯菲蒂格勒进发。

在斯菲蒂格勒，苏丹遭到了顽强的抵抗。陷于土耳其人包围中的阿尔巴尼亚驻军英勇地保卫了要塞。为了解救被包围者，斯坎德培刚刚到达斯菲蒂格勒，就从外面向土耳其人猛攻。斯菲蒂格勒一直抵抗到秋天。最后，土耳其人发现了供

给要塞用水的水道，于是驻军由于没有饮水而投降了。苏丹虽然占领了斯菲蒂格勒，却没有继续向克鲁雅进军。穆拉特二世得到胡尼亚迪准备采取新的攻势的消息，被迫返回埃地尔内，以备迎击匈牙利人。这些消息也迫使斯坎德培赶快结束与威尼斯人的战争，以便腾出手来根据同胡尼亚迪所订的条约率领自己部队参加匈牙利的出征。但是和谈迁延了时间，在斯坎德培同意放弃达尼雅以后，于1448年10月4日才签订了和约。威尼斯共和国必须每年交付斯坎德培赔偿金一千四百金杜卡特①。然后，他就出发到科索沃去，这是因为胡尼亚迪必须由此经过。但是斯坎德培还在途中的时候，1448年10月18日匈牙利人就同土耳其人进入战斗而被打得落花流水。

1450年，苏丹穆拉特二世决定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抵抗以坚决的打击。他集齐了土耳其所有的军队十万人，亲自率领他们于1450年5月初开向阿尔巴尼亚，想在这一次夺取克鲁雅。

为了抵御这个大军，斯坎德培号召总动员。

① 杜卡特——威尼斯古时金币。——译者注

几天的工夫就集中了约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斯坎德培把这支军队分成三部分。约有一千五百人由长官乌兰指挥。乌兰是位英勇的久经考验的军人，他留在克鲁雅要塞之内。斯坎德培本人率领八千人守在要塞之外，驻在克鲁雅以北的吐门尼斯蒂山上。其余一部分编成一些不大的机动队。

土耳其军队刚刚进入阿尔巴尼亚，就被迫在整个希孔比河流域同阿尔巴尼亚农民队伍作战。在这次战争中，他们损失惨重，因为他们必须深入内地追击一些不大的机动队，而往往遭到伏击。

遭到严重损失以后，苏丹于1450年5月14日带领自己主力部队逼近了克鲁雅城下并把它包围了。苏丹企图不经过战斗，而用威胁和收买的方法夺取要塞，但是未能得手，于是土耳其人就开始用大炮轰击，发射重四百磅的圆形炮弹。这种炮弹是首次在阿尔巴尼亚使用的。一阵大炮轰击之后，土耳其人就开始了全面冲击。但是，土耳其人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守军很英勇地保卫了要塞。斯坎德培从外面攻击土耳其军队，有时从这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使得敌军慌乱不堪，遭受很大损失。同时，农民机动部队攻击了从马

其顿和威尼斯为土耳其军队运送食粮的商队。

夏天，土耳其人又有几次企图用冲锋的方法一举而占领克鲁雅，但由于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总体战，使得他们的企图又失败了。经过四个半月，屡次冲锋均遭失败之后，在冬季即将来临时，苏丹穆拉特二世息兵拔营，于1450年10月26日带着溃不成军的部队返回埃地尔内，在阿尔巴尼亚土地上留下了阵亡的士兵约两万人。

成功地保卫了克鲁雅，是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斯坎德培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在欧洲各国宫廷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和信札来祝贺斯坎德培的辉煌胜利。

阿尔巴尼亚独立国家的建立。反对封建主背叛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胜利引起了与对土作战有利害关系的欧洲各国的重视。它们开始把阿尔巴尼亚人看成是把巴尔干从土耳其人铁蹄下解放出

来的一支巨大的力量。斯坎德培也理解到，有象威尼斯这样不可靠的邻邦，要想对强大的苏丹作战，没有其他国家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支援，是不能赢得胜利的。利益的一致性使得他同许多国家——匈牙利、拉哥萨、罗马、那不勒斯等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克鲁雅陷入包围之后，斯坎德培越发地需要同盟国，以便对付奥斯曼人。经过六年的战争，特别是经过1450年的几次进军，国土被破坏了。土耳其人焚毁了大量的农民住房和田里的庄稼。1450年冬天，全国受到饥馑的威胁。急需粮食以供应居民和军队，更需要装备和器材以恢复被破坏了的一些要塞。为了应付这些需要，斯坎德培就向一些执行反土耳其政策的国家求援。但是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只有一个那不勒斯王国。幻想在地中海上建立强大帝国的阿尔丰斯五世与现在被称为阿尔巴尼亚国王的斯坎德培于1451年3月26日在加埃塔（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前者有义务以军用器材和款项支援阿尔巴尼亚国王，以便继续对土作战。至于斯坎德培，由于急需外援，并且希望借此把那不勒斯

国王拖入对土战争，就不得不充当阿尔丰斯的藩臣。

但是阿尔丰斯提供的援助微不足道。派到阿尔巴尼亚来的士兵只有几百人，而且是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因此，斯坎德培就没有作出充当藩臣的誓言。

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人势必在尔后依然孤军作战，以抵御土耳其人的猛烈的攻击。率领土耳其军队的是穆罕默德二世·法提赫，他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更为迅猛地继续向欧洲腹地挺进，以扩展土耳其的疆界。

于1444年在莱希成立的、各公爵依然保有自己领地自治权的阿尔巴尼亚联盟，到后来就再不能适应由于解放战争扩大和深入而形成的情况了。各公爵的分裂政策阻碍了全国一切人力和物力的动员，而这种动员在对奥斯曼人优势兵力作战中是极端必要的。此外，他们采取的动摇态度，特别在战事紧急关头，对斯坎德培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就利用了封建主的动摇态度，挑唆他们起来反对斯坎德培。

由于进行的是防御战，所以迫使斯坎德培对

各公爵的分立主义进行斗争。斯坎德培依靠着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政治上和他联结在一起的军队，在战争利益需要的时候，就再也不顾各公爵的自治权。在战争进程中，他破坏了各加盟公爵们的领地界线，在他们的要塞中派驻了忠于他的卫戍部队，并采取了许多触犯他们权力的其他措施。后来，在他自己力量更加强大以后，他对动摇的公爵们也采用了一些强制手段，把无能的和不可靠的贵族军官从军队里开除出去，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分给在战争中有功绩的军人，不问是贵族还是普通农民。这样一来，随着斯坎德培政权的不断加强和巩固，封建领地的从前的界线开始消失，而各公国逐渐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过程导致了以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为首的统一的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建立。这一国家的建立是从封建割据局面向前推进了一步。

可是，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力图保持自己的分立政权的公爵们的不满。大的封建主由于无力阻止为斯坎德培强有力的手所领导的这一过程的实现，就开始退出联盟。1450年，两个最大的封建

家族——阿里安尼特家族和杜卡吉因家族退出了联盟。他们的退出影响了全国的利益，因为正当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发起激烈的进攻的时候，这一行动削弱了军事战线。斯坎德培尽力同他们接近，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杜卡金那家族不但不同他接近，而且，相反地，同苏丹讲和了并对斯坎德培组织阴谋活动。起初好象斯坎德培要和乔治·阿里安尼特接近的企图可以成功。为了加强友好，他于1451年4月与阿里安尼特的女儿多妮凯结了婚。但是，过了一些时候，阿里安尼特又同他决裂了。

稍后，当斯坎德培的威望更增高了的时候，某些公爵，其中也有他原来的亲密战友，背叛了他，公开去为土耳其人效劳而反对自己的祖国。封建主的背叛在1455—1457年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

1455年，斯坎德培决定夺取在克鲁雅被围期间重新落于土耳其人之手的贝拉特要塞，以便打开一条解放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道路。在这次出征中，除了阿尔巴尼亚军队以外，阿尔丰斯终于派到阿尔巴尼亚来的两千那不勒斯步兵也参加了。

初期，军事行动是很顺利的。要塞被包围起来，处境困难的土耳其守军请求展期十五天投降。但是在限期届满以前，土耳其四万大军在事先已有密约的阿尔巴尼亚边防军统帅摩西·加列米的协助下，秘密地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并进攻了阿尔巴尼亚的和那不勒斯的军队，使这些军队蒙受重大伤亡。在这以后，摩西·加列米就公开投向了土耳其人。

1456年，一万五千名土耳其骑兵在叛徒摩西·加列米伴同下侵入阿尔巴尼亚。但是在迪布拉地区的一次激战中土耳其人被击溃了，摩西也表示忏悔而投降了。斯坎德培宽恕了他，重新把他收留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里。没有多久，另一个军事长官乔治·斯特列斯·巴尔沙也叛变了，并把边境要塞木特里察献给土耳其人。几个星期以后，斯坎德培的侄子和最亲密的战友哈姆查·卡斯特里奥特，由于觊觎叔父一部分产业也叛变了，并投向土耳其人。

1457年春末，在阿尔巴尼亚人几乎已经绝望的情况下，大约有八万土耳其大军在久经考验的伊沙克·别依·叶弗列诺札将军指挥下，由已被

苏丹任命为克鲁雅地方长官的哈姆查·卡斯特里奥特领路，向阿尔巴尼亚进军。

阿尔巴尼亚人即使在这一次也没有惊惶失措。他们依然忠于斯坎德培。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斯坎德培从5月末到9月初一直在消耗敌军，没有一次应战。相反地，他隐藏起来，销声匿迹，直到使土耳其军队统帅和自己的侄子确信他的军队已被“击溃”，他的士兵和军官都“离开了他”，而他本人已向山里逃命为止。但是，在1457年9月7日，正当确信已经获胜的土耳其人无忧无虑地在克鲁雅附近的阿尔蒲莱纳平原上庆祝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结束时，斯坎德培率领自己的军队突然地攻击了他们并把他们击溃了。在上千人的俘虏中也有叛徒哈姆查·卡斯特里奥特。

在阿尔蒲莱纳平原上，阿尔巴尼亚人在斯坎德培领导下，不仅对人数大大占优势的土耳其人取得了辉煌的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同时也对动摇的封建主和叛徒取得了重要的政治上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对于斯坎德培继续执掌政权一事所抱有的一切怀疑都云消雾散了。最后，这是对加盟公

爵分立主义企图的胜利，而且巩固了集中在斯坎德培手中的政权。

阿尔巴尼亚人在阿尔蒲莱纳平原上所赢得的胜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提高了他们的领导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欧洲各国宫廷都纷纷在自己的信札和贺辞中向斯坎德培祝贺他所获得的胜利。罗马教皇科利斯特三世一面祝贺他，赠他以荣誉称号，一面约他参加教皇力图组织的一次进攻土耳其人的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

继承科利斯特的罗马教皇庇护二世更积极地准备十字军东征。他希望在斯坎德培的参加下获得成功，因为后者在胡尼亚迪于1456年死后已成为欧洲反对土耳其人的解放斗争中声望最高的人物。1459年在曼托夫举行的讨论十字军远征问题的大会上，许多与会者在提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卓越领袖的大名时，都是肃然起敬的。在当时制订的作战计划中，赋予斯坎德培一项艰巨任务：在中央战线攻击土耳其人。

但是十字军远征的准备由于各参加远征者即封建主之间有矛盾而拖延下来了。这时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军。为了等

待十字军远征，而这次远征看情况还要长期地拖延下去，并为了使全国有喘息的机会，以恢复由于长期不断的战争而破坏了的经济，斯坎德培于1460年接受了苏丹的建议并同他签订了停战三年的和约。

斯坎德培利用这次临时停战的机会去援助自己的同盟者——那不勒斯国王。阿尔丰斯五世于1458年逝世，其王位由他的儿子斐迪南继承了。当地居民愿意安茹人来登上王位，因此起来反对年轻的国王。斯坎德培希望自己旧日的同盟者在内战中获胜，以便在他的援助下去反抗奥斯曼人，因此他接受了斐迪南的邀请。一位起义的公爵即塔兰特公爵约加涅斯·安东尼乌斯·德·伊列尼斯，于1460年10月10日写信给斯坎德培，极力劝他不要向意大利进军，警告他说，轻武装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不能挽救斐迪南必不可免的倒台，而斯坎德培由于意大利重骑兵的打击，会遭到可耻失败。斯坎德培于1460年10月31日给塔兰特公爵所写的回信中说自己是一个“做好事的朋友，不计较个人命运”，说不能置自己的正在难中的同盟者于不顾。斯坎德培提醒这位起义的

公爵说，没有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胜利的战争，不仅阿尔巴尼亚，而且意大利也会被土耳其人占领。因此，最好是援助那个支持对苏丹的斗争的阿拉冈王朝，而不该援助在反抗敌人土耳其当中袖手旁观的安茹王朝。

1461年，斯坎德培率领自己一部分轻骑兵向意大利进发。在他到达的时候，斐迪南正处于危急之中。斯坎德培在意大利赢得了两次胜利，一次在巴尔累塔，一次在特拉尼。由于他的这两次胜利，就帮助斐迪南把叛乱镇压下去并巩固了他那摇摇欲坠的政权。

阿尔巴尼亚人对苏丹法提赫赢得的辉煌胜利

1462年，阿尔巴尼亚的处境又恶化了。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担心阿尔巴尼亚人与自己的竞争者那不勒斯国王的同盟日益加强，就又来进行挑拨离间，教唆分立主义的封建主反对斯坎德培。另一方面，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希望斯坎德培的地

位动摇，并尽力使阿尔巴尼亚人不能参加十字军远征，于是就破坏了停战协定而对阿尔巴尼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斯坎德培在预先得到消息之后，就赶快从那不勒斯回到克鲁雅，并采取了措施，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在一个月之中，他把土耳其人的三次进攻都击溃了。

三次进攻失败之后，苏丹法提赫于1463年春天向斯坎德培提出停战十年的建议。停战协定是在1463年4月于什库普签字的。

以教皇庇护二世为首的十字军远征的组织者对这次停战深感不安，开始对斯坎德培施加压力，使他重新恢复反抗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起初，斯坎德培表示反对。但是后来从各种迹象来看，十字军远征似乎就要开始。到了夏天，威尼斯对土耳其作战了。已经需要阿尔巴尼亚人协助的共和国放弃了从前的敌对政策，甚至与斯坎德培订立了对土作战的同盟条约。分立主义的公爵们，其中也有杜卡吉因，都同斯坎德培接近起来并听从他的调遣。11月间，庇护二世宣布十字军远征开始。这些事件也使斯坎德培变了主意，而在

1463年年末他就恢复了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

但是十字军队伍因为内部矛盾而没有出动。随着1464年8月间庇护二世的逝世，十字军远征就完全垮台了，而阿尔巴尼亚人陷入了对凶残的苏丹孤军作战的局面。

阿尔巴尼亚人民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来反抗苏丹法提赫的疯狂进攻。二十年的战争破坏了国土和它的经济。居民由于被屠杀和逃亡异域而减少了，田地荒废了。能作战的男子减少了。求得外援的希望十分渺茫。欧洲一些国家不关心巴尔干，尽管这里的事件正在决定它们的命运。那不勒斯的斐迪南无力援助自己的同盟国。罗马新教皇十分吝啬，他经常诉苦，说梵蒂冈的国库空虚，因而对他也不能抱任何希望。对于新的同盟者——威尼斯人也不能指望，因为他们正竭力想同苏丹讲和。此外，他们也十分吝啬，不肯大力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苏丹一次又一次地对阿尔巴尼亚发动了五次进攻，都由巴拉班-巴夏统率，目的是彻底摧毁这个国家，消耗斯坎德培的军队，使阿尔巴尼亚居民丧失斗志，以便尔后对阿尔巴

尼亚多年的抵抗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和从前一样，这一回的五次进攻也都被击溃了。

土耳其人的进攻是正在收割期间发动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损失很重，以至阿尔巴尼亚受到饥饿的威胁。阿尔巴尼亚好不容易地才熬过了1466年的冬天。但是，到了6月，正在收割前夕，而谷仓又完全空了的时候，苏丹法提赫偕同巴拉班-巴夏率领所有帝国军队十五万人又向阿尔巴尼亚进攻。

这支大军全部侵入了阿尔巴尼亚，沿途到处烧杀。1450年的事件又重演了。农民把自己家属从不设防的地区撤出来，在法提赫军队所经之路，到处设伏。据土耳其编年史作者说，土耳其军队不得不在沿途展开激烈的战斗。他们向内地追击阿尔巴尼亚军队，而后者在这些地方立下了许多空前的战绩。最后，苏丹法提赫率领自己的主力部队进抵克鲁雅并包围了这一要塞。

这一次斯坎德培又把一小部分守军留在要塞之内，由塔努斯·托皮亚率领，而本人则率领其余部队守在要塞附近地区。正如十六年前一样，被围的克鲁雅英勇地抵御住了土耳其人的进攻。

经过两个月，在各种企图都失败之后，苏丹带了部分军队离开了克鲁雅，留下巴拉班-巴夏继续围困，指望以饥饿迫使守军投降。

为了保障土军后方，苏丹法提赫在希孔比河流域的古城斯卡姆巴废墟上建立了一座强大的要塞，称为伊姆巴斯(现名爱尔巴桑)。这是阿拉伯语的名称，意思是"形胜之地"。1466年秋天，苏丹离开了阿尔巴尼亚。

巴拉班-巴夏继续围困克鲁雅。阿尔巴尼亚守军的处境极端恶化了。缺少弹药和粮秣使他们惊恐。威尼斯答应支援，但是条件苛酷，不能接受。斯坎德培对土军进行了几次攻击，但不能解围。因此，他不得不在1466年12月前往罗马，又在1467年1月前往那不勒斯，力说罗马教皇和斐迪南立即援救。在罗马，人民群众把斯坎德培作为光荣的统帅来欢迎。他在罗马高僧会上发表的演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保罗二世也好，斐迪南也好，对斯坎德培提供的援助都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斯坎德培领导下，并未屈服。斯坎德培返回祖国以后，阿尔巴

尼亚人赢得了辉煌胜利。4月间，他们击溃了围困克鲁雅的土耳其军队并收复了自己的都城。巴拉班-巴夏也在战斗中被击毙了。

但是，1467年7月，土耳其全军在苏丹穆罕默德率领下又侵入了阿尔巴尼亚。在爱尔巴桑附近布祖谢克发生了血战。在赢得这次战斗以后，苏丹法提赫以为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就此结束了。但是，在克鲁雅，他却遭到难以想象的抵抗。被包围的克鲁雅又第二次使君士坦丁堡占领者法提赫丢人献丑。三个星期以后，苏丹离此而去，斯坎德培又收复了光荣的都城。

斯坎德培为了取得新的人力和物力以进行战争，决定再一次向全国呼吁，特别是向置身事外的一些公爵呼吁。为了这一目的，他想恢复1444年成立的阿尔巴尼亚联盟，因而邀请各公爵于1468年1月在莱希聚会，举行全体大会。在大会上，斯坎德培请求各公爵提供军事援助并提供经费，以便继续对敌作战。

当年仲冬，土军又从斯库台方面攻向阿尔巴尼亚。斯坎德培也和往常一样，准备亲率军队出战。但是他正在患疟疾，因而未能动身。过了几

天，正当阿尔巴尼亚人在斯库台附近又赢得辉煌胜利的时候，永世光荣的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竟于1468年1月17日在莱希与世长辞了。

斯坎德培的突然逝世，引起全国的震悼。阿尔巴尼亚所失去的是一位天才的起义组织者，由于他，全国才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位天才的统帅，他在二十五年内，在同兵力强大许多倍的敌人作战中，赢得多次空前的胜利；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他创建了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

阿尔巴尼亚抵抗的再接再厉

斯坎德培逝世以后，大家才明白阿尔巴尼亚再没有一个人能够领导阿尔巴尼亚来抵抗土耳其人了。斯坎德培的儿子吉安·卡斯特里奥特当时还很年轻。他大约才有十四岁，他不能代替他的父亲。何况他同他母亲已经离开本国，到那不勒斯王国去了。许多封建显贵对胜利失掉了希望，

都相继出国而去，或者投向敌人。许多农民和市民为了逃避土耳其人的蹂躏，都跑到国外去了。

尽管有这一切情况，留下来的一部分居民依然反抗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却力图在扑灭阿尔巴尼亚抵抗以后去夺取威尼斯所占有的阿尔巴尼亚沿海都市，以便随后实现久已抱定的幻想——攻占意大利。为了这一目的，1474年，土耳其大军包围了斯库台要塞，对它轰击了一个月，但是被围的要塞并未投降。1476年，人数很多的土军第四次包围了克鲁雅，想要用饿困的方法，迫使它的保卫者投降。一直围困到1478年。1478年春天，苏丹法提赫本人也亲率帝国所有军队侵入了阿尔巴尼亚。克鲁雅保卫者，由于缺乏粮食和武器，被迫于1478年6月16日交出要塞。然后，土军又在苏丹率领下包围了斯库台。土军一直不停地以几个星期的时间用重炮轰击并多次冲击掩护城市的要塞罗查发，但是没有能够把它攻下来。9月，苏丹离开了这里，但是仍继续围困要塞。斯库台抵抗到1479年1月25日，这时签订了土耳其—威尼斯和约。根据这项和约，斯库台、莱希和特里希蒂归属土耳其，而都拉斯、乌

尔钦和提瓦尔则仍属于威尼斯。

在摧毁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并同威尼斯订立和约以后，约一万土耳其军队从发罗那出发并在意大利登陆，夺取了位于那不勒斯王国领土上的要塞奥特朗托。

那不勒斯加入对土作战激起了阿尔巴尼亚人解放本国的希望。在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反抗土耳其人的武装起义。1481年，斯坎德培的儿子吉安·卡斯特里奥特应起义领导者的邀请，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在他回来以后，起义发展到十分巨大的规模，竟使土耳其人不得不把原来应该用在进攻意大利方面的一部分军队留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的军事行动减轻了意大利基督教军队的负担，后者于1481年9月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奥特朗托。

土耳其人从意大利撤退出来以后，对阿尔巴尼亚人发动了广泛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一直不停地延续了几年，直到把起义镇压下去为止。在这以后，吉安·卡斯特里奥特只好从阿尔巴尼亚逃走了。

但是对土耳其军事封建制度的反抗并未停

止。起义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地区之一就是希玛拉。希玛拉人不让任何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斯帕希或长官进来。他们攻打土耳其人，特别是在1492年夏天，当苏丹巴耶济德二世率领自己的军队来到阿尔巴尼亚，以便渡海侵入意大利的时候。在意大利的登陆没有得手，但是，巴耶济德二世决定在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前，先把希玛拉人镇压下去。7月间，土耳其人深入山区，背信弃义地俘获了大批希玛拉人，把其中一部分杀掉，另一部分变为奴隶。但是，反抗行动并没有被扑灭。时届秋季，苏丹决定离去，因此与希玛拉人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希玛拉照旧依据传统法律保持自治(威诺米)。希玛拉人有权自由地携带武器。他们也保证不再发动反抗，并且向帝国纳贡以表示听命。希玛拉人在土耳其人整个统治时期，尽力地维护了自己的法律。

即使在尔后的一些年代里，阿尔巴尼亚人也是竭尽全力地要把土耳其人从祖国驱逐出去。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利用一切方便的时机。只要有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同土耳其人作战，阿尔巴尼亚人就认为自由的日子到了，也就拿起武器去打击

土耳其人。

1494 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军队来到意大利，以便经过阿尔巴尼亚国境继续向伊斯坦布尔进军。1499 年也是这种情况，当时是威尼斯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阿尔巴尼亚人也拿起了武器。但是这些起义都没有成功。1501 年 8 月，土耳其人攻占了威尼斯占领下的都拉斯。共和国为了保全乌尔钦和提瓦尔，于 1502 年与土耳其讲和。阿尔巴尼亚人又成为孤立的了。起义一直不停地延续了几年。到 1506 年才被镇压下去。于是，继续了六十年之久的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土耳其战争也就结束了。

土耳其提马尔制度
在阿尔巴尼亚的巩固

阿尔巴尼亚人民多年来对土耳其侵略者进行的战争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全国丧失了自由并落于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封建帝国的宰割之下。它的经济完全被破坏了。各个城市都被破坏

和劫掠一空。某些古老城市，例如，特里希蒂、达尼雅、希尔吉都没有能够再恢复起来。当初曾经是很大的而且很繁华的城市都拉斯、斯库台、贝拉特、克鲁雅等等都变成了乡村。城市里几乎再没有手工业者了，商业完全停顿了。阿尔巴尼亚沿海城市与亚得里亚海沿岸其他城市的旧有的联系断绝了。外国商人的商队不再沿着重要的交通孔道“埃格纳提亚大道”来往了。农业也被破坏了。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有几百个乡村都被劫一空了。农民都逃往国外或迁往国内山区。广大的田地都荒废了。居民稀少了，这不只是因为经常被屠杀，而且也是因为大量人口流亡国外。几十万人都离开了祖国。其中大部分迁移到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领域之内，特别是到西西里和加拉布里亚。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近百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村庄。这些人的后裔，凡是避免了同化的，直到现在还讲阿尔巴尼亚语。

因为缺乏城市手工业生产，阿尔巴尼亚平原和山区各地的乡村的自然经济巩固下来了，而它们是与外界隔离的。土耳其的占领把阿尔巴尼亚向后推迟了有几个世纪。

阿尔巴尼亚遭到长期落后的命运。其原因是全国各地盛行提马尔制度而且根深蒂固。这种制度对于全国经济发展毫无刺激作用，反而使被控制的地区受到惨重盘剥，因为斯帕希利用参加出征来获取主要收入，他们在这些出征中可以发财和升官。

在阿尔巴尼亚沦陷以后，土耳其统治者于1506年进行了土地登记。登记了的土地被分为提马尔、札美特、哈斯。根据1520年的登记，阿尔巴尼亚的提马尔、札美特和哈斯，其数量大约比1432年多两倍。

除了提马尔数量增多以外，十六世纪时斯帕希对农民（拉亚）的权势也加强了。在十五世纪，斯帕希只是土地的主人，而到十六世纪，却成为拉亚的主人。这时没有斯帕希的准许，拉亚就不能离开提马尔或札美特。在十五到十七世纪期间，斯帕希从拉亚所得到的必须的供应也增多了。

根据奥斯曼帝国在十六世纪所改变的行政区划，阿尔巴尼亚被分为七个桑札克：德尔维那、发罗那、爱尔巴桑、奥赫拉、斯库台、普里兹伦、杜卡吉因。在桑札克范围内所居住的，除了阿尔

巴尼亚人以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黑山人——在斯库台桑札克，塞尔维亚人——在普里兹伦桑札克，马其顿人——在奥赫拉桑札克，希腊人——在德尔维那桑札克。所有七个桑札克都属于鲁米利亚维拉耶特。

不管土耳其人如何费尽心力，他们也没有能够在阿尔巴尼亚全部国土上建立起军事封建制度。在大部分山区，提马尔制度要么是根本没有建立，要么就是一种形式而已。例如，在希玛拉、杜卡吉因、斯库台、迪布拉等山区就是这样。在这些山区，山民并没有变成拉亚，而依然是自由农民。

土耳其统治者由于无力使山区屈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威诺米，也就是根据当地旧日的法律所保有的自治权，就如同1462年对希玛拉人所做的那样。这种特权使他们不再缴纳拉亚所必须缴纳的一切租税。他们只交纳一定的贡赋。

在这些地区居住的山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还保持着氏族公社关系。他们不受国家管辖，与国家生活是脱离的。对土耳其人的斗争迫使他们彼此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公社或者照山民所说的干脆就是氏族还保持了很久。

虽然土耳其人承认传统的威诺米，然而他们依然随时企图征服这些地区。但是桑札克别依和斯帕希的一切企图都遭到山民的反抗。

另一方面，当土耳其同其他欧洲国家作战时，山民就抱有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希望，因此，他们每次拿起武器时，都非常英勇地同土耳其军队战斗。这样一来，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期间，全国半自由的山区就成了阿尔巴尼亚人抵抗土耳其侵略者的策源地。

1537年，当苏丹苏列曼·爱尔-加努尼带领陆海军来到发岁那和希玛拉沿海地区打算在意大利登陆时，希玛拉人又拿起了武器。这一次土耳其向意大利的出征也没有完成，因为把军队用来对付希玛拉人了。但是，希玛拉人英勇地抵御了敌军的冲击。战斗继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土耳其人毫无所获。

1571年，正当奥斯曼帝国与有威尼斯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作战时，阿尔巴尼亚人举行了起义并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但是到了8月，起义者的处境恶化了。土耳其人从陆地和海上包围了处于威尼斯统治下的乌尔钦，并迫使守军投降了。几

天以后，土耳其人又占领了提瓦尔。在失去了这两座城池以后，威尼斯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运动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了。

10月间，同盟国的舰队在列班多击溃了土耳其的舰队。但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利用列班多的胜利，它们的内部矛盾使同盟瓦解了。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起义军又开始对土耳其人孤军作战了。

1593年，阿尔巴尼亚人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因为这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付土耳其人的欧洲各国同盟，而在1594年，希望就更大了，因为同盟参加者之一的罗马教皇与山民领袖建立了联系。阿尔巴尼亚人赶快地制定武装起义计划。为了这一目的，于1594年6月间在马蒂城的圣玛丽亚寺院里召开了有阿尔巴尼亚许多地区和城市首脑参加的大会。大会决定向罗马教皇求援。不过，这时害怕欧洲同盟更甚于害怕土耳其的威尼斯共和国却不愿意阿尔巴尼亚起义，因此，它就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一起义准备工作的进行。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人依然开始了起义，而对梵蒂冈和西班牙的诺言抱着很大希望。几乎

有一万用弓和剑武装起来的人攻击了土耳其军队。只有西班牙提供了为数有限的援助，而且这种援助受到威尼斯的阻挠。1596年，这时已经使用了火器的土耳其人把起义镇压下去了。

1601年，又在马蒂地区杜卡吉因镇上召开了另一次全体大会。这种大会在1602年也继续召开过。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十四个地区的代表。大会决定再派代表团出去向各大国请求提供武器。但是，即使在这一次，阿尔巴尼亚人的请求也未得到反应。

阿尔巴尼亚人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依然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收不到效果的企图。土耳其人为阿尔巴尼亚人的这些努力弄得寝食不安，于是就对阿尔巴尼亚的山民组织了许多次征讨。1610年的一次出征多少还得到一点成功，可是在1612—1613年组织的几次出征都完全失败了。

土耳其人的战败不仅鼓舞了阿尔巴尼亚人，而且也激励了巴尔干其他各国的人民。为了组织广泛的起义，于1614年在大山区的库查召开了非常大会。阿尔巴尼亚、黑山、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首脑都参加了。后来又召开了全巴尔干大

会。但是在这些大会上制定出来的起义计划，由于没有武器，都未能实现。

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人民武装斗争的继续高涨，为了切断他们与欧洲国家的联系，伊斯坦布尔统治者在十六世纪末叶不断地采取了使阿尔巴尼亚人伊斯兰教化的运动。他们希望这会在阿尔巴尼亚造成大量的在思想上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相联系的穆斯林居民。

为了强迫人民群众接受伊斯兰教，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国家租税制度方面实行了极苛刻的宗教歧视政策。只有基督教徒才缴纳的一种捐税——伊尼吉亚税（人头税）提到很高的程度，简直使人无力缴纳。从十六世纪的每年四十五阿克切增加到十七世纪初期的三百零五阿克切，而到十七世纪中叶，某些居民每年所应缴纳的达到七百八十阿克切。为了避免受歧视，部分当地居民只得接受了伊斯兰教。

但是，尽管有大多数居民信奉了伊斯兰教，然而阿尔巴尼亚起义的规模并未缩小。阿尔巴尼亚主教和作家彼得·布第于1621年向红衣主教郭莎金诺所做的报告中说，在阿尔巴尼亚有几万



涅奥卡斯特尔的奥努弗里——“先知大卫”。
什帕塔附近色堪地方圣尼古拉教堂壁画
（十六世纪）

男子，不仅是基督教徒，而且也有伊斯兰教徒，只要一有援助，就都准备拿起武器。但是，在十七世纪，也和十六世纪一样，在阿尔巴尼亚所爆发的多次起义，其主要动力是阿尔巴尼亚的山民，他们的坚决斗争，使他们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和自己的威诺米。

十七世纪的阿尔巴尼亚

十七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强盛已到顶点。1683 年在维也纳城下的失败是帝国衰落的前奏。众所周知，造成衰落的原因一方面是国际舞台上发生了变化（在它的北部边界上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帝国内部形势起了变化（作为提马尔制度的基础的自然经济解体了，也就是说，这一制度本身崩溃了）。斯帕希现在所关心的更多的是从提马尔和经营商业所得到的收入，而不是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发生在离他们的领地很远的地方，因而对他们来说已毫无兴趣，而且这些战争并不总是对土耳其有利的。斯帕希

不再听从苏丹的调遣，不再去作战，因而更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它的胜利的机会就更少了。在战争中获胜的场合愈益减少使土耳其经常发生财政危机。国家也好，斯帕希也好，都是用加紧剥削农民——拉亚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亏空。结果，农民群众都破产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从而变成了雇农，亦即所谓的“吉弗吉”。

农民出卖的土地都落到封建主的手里。新兴贵族从军事封建贵族的行列中产生出来并日益加强。地主贵族之所以得到加强是由于吉弗吉都定居在地主的土地上。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收成，即“由修里”交给斯帕希，另一部分与地主平分，如果种子和农具都是地主所有的话；或者把三分之一的收成交给地主，如果他们自己有种子和农具的话。

自然经济的崩溃也表现在十五世纪被破坏的一些城市的恢复上。这些城市在十七世纪特别迅速地扩大和发展起来并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中最大的是发罗那桑札克的主要中心城市贝拉特。其次是爱尔巴桑、斯库

台、纪诺卡斯特。这些城市大约每处都有约两千户人家。十七世纪时，珠宝首饰制造业很快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斯库台、普里兹伦和爱尔巴桑的珠宝首饰匠都很出名。他们制造妇女用的金银首饰。他们能装饰武器并能用各种装饰美化家庭用品和教堂的家具与器皿。

由于交换的发展，在城市里兴起了一个专门从事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的新阶层。在十八世纪，大商人不仅在国内各大城市，而且也在国外，特别是在威尼斯和的里亚斯特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商人向国外出售农产品、畜产品和手工业品，并从欧洲运进工业品。由于贸易发展，阿尔巴尼亚的商船队也发展起来了。有最大商船队的城市是乌尔钦，它的居民都是英勇的海员。

有些城市，例如斯库台、贝拉特、爱尔巴桑、普里兹伦、耶亚等等在十八世纪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意义，还表现在它们不仅成了附近村镇的贸易中心，而且也成了许多相邻地区的贸易中心。

手工业随着自己的扩充和发展而恢复了中世纪时期原有的组织——行会，但这时却称为“爱斯纳夫”或者“鲁菲特”了。“爱斯纳夫”的首脑是

“柴海伊”（会长），他手下是“缪特威里”（行政事务主任）。他们都是定期由“爱斯纳夫”会员选举。

因为它们的会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得很好，所以这些“爱斯纳夫”也开始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由这些行会，即“爱斯纳夫”又建立起了行会联合会，或称“塔拉夫”。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各有不同。在某些城市里，例如斯库台，成立了两个大的行会联合会。

主要城市成了文化运动的中心。但是这种运动在全国各地发展得不平衡。在这一运动中，不仅有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割据所留下来的痕迹，而且居民信奉三种宗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阿尔巴尼亚的学生——穆斯林、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以根据自己信奉的宗教在土耳其、希腊或意大利学校里读书。这些学校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用阿尔巴尼亚语写作的作家，也依照信奉的宗教而使用土耳其、希腊或拉丁的字母。

十七到十八世纪期间，在阿尔巴尼亚开办了一些中等学校——“麦德莱赛”——专门培养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伏

斯科波亚由正教徒开办的称为“新学院”的中等学校。

由于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伏斯科波亚的文化在十八世纪兴盛起来了。在该城的许多教堂中都有艺术价值很高的壁画和圣像。1740年，伏斯科波亚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在这里印刷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当地作家写的。1744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这城里开办了一所“新学院”。院长是十八世纪有名的思想家戴多·塔发雷。大多数教师都是欧洲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一学院的许多学生，毕业后还继续到国外求学，在教育、文化、科学领域中成为知名的学者。

阿尔巴尼亚巴夏区的形成

封建主利用自己所担任的国家职位，扩展了自己的领地，而这些领地在他们退职以后，仍然由他们把持着。他们自己或者伙同他们的管家来负责征收许多国家的捐税，大部分都饱入私囊。同时他们还干预商人的生意，用迫害来进行威

胁，要求商人把赚来的绝大部分利润孝敬他们。于是，许多阿尔巴尼亚封建主在短时期内就巩固了自己经济和政治地位。

大封建主感到自己实力雄厚，就不再理睬那逐渐削弱的中央政府。他们越来越不再听从苏丹的圣旨，而且把属于帝国国库的一切收入都侵吞了。苏丹尽可能地对这些不服从的封建主采取一些办法，例如没收他们的土地或者把他们调到别处去，但是，当他受战事牵制无暇他顾时，也不敢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弄得尖锐起来，以免他们造反。这样一来，在十八世纪时期，在阿尔巴尼亚大封建主与奥斯曼中央政府之间就发生了矛盾，而且尖锐化了。

随着进一步的强大，封建主开始在桑札克内部作为“缪特萨里夫”（长官）而占统治地位，或者在卡札内部做为“缪特谢里木”（头目）而占统治地位，他们主要是倚靠本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不是奥斯曼中央政权。他们逐渐不再是伊斯坦布尔的公职人员，而变成桑札克界内，或卡札界内，或完全不合土耳其行政区划的一些地区界内的半自治统治者。这些封建领地开始被

称为巴夏区。

巴夏区的领主在形式上依然是代表苏丹行使政权，并使用“缪特萨里夫”或者“缪特谢里木”的官名。只有在他们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或者上面的命令没有触动他们本身狭隘利益时，他们才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如果上面的命令影响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就以各种借口拒不执行。大封建主的家族都世袭自己的权位。

封建主为了增加收入和巩固权势，尽量扩展自己巴夏区的范围，兼并处于其他封建主权力下的邻近地区。他们特别努力控制国内繁华城市，因为它们是取之不竭的财源。

由于他们的这些野心，就引起了封建主之间的战争。参加这种战争的也有各“塔拉夫”、“爱斯纳夫”和农民群众，农民群众通常都支持那些残暴程度较小的封建主。许多小封建主，特别是失掉自己提马尔和札美特的斯帕希，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封建主内战所造成的局面。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已失掉的封建采邑，建立自己的领地进而由这些领地再建立独立的巴夏区，其中有些封建主和斯帕希就组织了武装匪帮，抢劫村

镇和城市，造成到处慌乱不安的局面。

土耳其的长官没有力量约束这些土匪。相反地，他们由于无力制服这些土匪，反面尽力利用他们来对付强大的封建主，同时也煽动那些对政府不能形成威胁的小封建主去反对大封建主。

封建主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全国陷入严重的封建割据局面。战争遍及全国。在斯库台地区，封建家族白戈拉伊，查乌什拉伊和布沙特利之间的战争为时最久而且激烈。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地拉那、卡瓦雅、克鲁雅和爱尔巴桑各地的封建主之间的冲突也同样激烈。在南部，在发罗那、贝拉特、德尔维那、察梅里亚等地的强大的封建主之间也发生了长期的斗争。

封建主之间的战争使全国受到严重的损失。许多农民在威胁和强制之下失掉了土地，变成农奴。封建主在城市里也进行抢劫。经过1769年、1772年及1789年三次抢掠，伏斯科波亚完全被破坏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新学院”也和城市一起被破坏了。由于封建主匪帮抢劫商队和集市，全国经济生活一蹶不振。

大封建主在兼并了小封建主并建立了广大的

巴夏区之后，就开始了几乎是独立的统治。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量的小巴夏区，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并成了两个大巴夏区：一个在阿尔巴尼亚北部，以斯库台为中心，领主是布沙特利。另一个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以亚尼纳为中心，领主是阿里-巴夏·台佩莱纳。在大巴夏区建立起来之后，阿尔巴尼亚封建阶级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不同于土耳其封建阶级政权的政权。这种特殊的封建政权是国内之国。这样就产生了阿尔巴尼亚封建阶级与奥斯曼中央政权之间的尖锐矛盾。为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封建国家准备了前提的冲突，是十八世纪席卷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割据局面的最重要的后果。

斯库台大巴夏区。
布沙特利封建王朝

十八世纪上半叶内，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最重要的桑札克之一斯库台桑札克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完全垮台了。莱希、波德哥里察、乌尔钦

的统治者相继摆脱了"缪特萨里夫"政权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的巴夏区，这些巴夏区只是在形式上属斯库台管。

伊斯坦布尔政权的削弱在斯库台城本身也促成了封建主内讧的激化。两个大的封建主家族——查乌什拉伊和白戈拉伊在特列兹和塔巴克的"塔拉夫"（"裁缝公会"和"皮匠公会"）以及山民的参加下互相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斗争，时而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的代表，时而推翻另一个封建王朝的代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只得时而册封查乌什拉伊的代表为斯库台的"缪特萨里夫"，时而册封白戈拉伊的代表为斯库台的"缪特萨里夫"。

这种内战把斯库台弄得疲惫不堪。另一个封建王朝——布沙特利利用了这一情况。穆罕默德-别依·布沙特利在得到了斯库台许多封建主的支持而成了塔巴克的势力强大的"塔拉夫"的领袖以后，击溃了并且从斯库台驱逐了白戈拉伊家族和查乌什拉伊家族，并于1757年做了斯库台的统治者。苏丹除了册封他为"缪特萨里夫"以外，还赐他以巴夏的称号。

穆罕默德-巴夏·布沙特利（有时人们还称他

为老穆罕默德-巴夏）统治了十六年。他所采取的措施为这个城市建立了和平和秩序，这一点使他得到了市民的好感。他得到山民的支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出征，并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斯库台桑札克的全部领土。

这些军事行动没有越出他的职权范围以外，因此伊斯坦布尔也同意了。但是当老穆罕默德-巴夏开始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他的桑札克以外，当他不向伊斯坦布尔上缴国家收入的时候，他同苏丹的关系就恶化了。布沙特利不怕苏丹的威胁，他以半自治的统治者的身分治理自己的巴夏区。为了摆脱这个强大的统治者，土耳其政府于1775年毒死了老布沙特利，并且委任穆罕默德-巴夏·丘斯腾底尔代替他作斯库台城的“缪特萨里夫”。

这个新的“缪特萨里夫”未能在斯库台维持多久。老穆罕默德-巴夏的长子穆斯塔法·布沙特利在斯库台人和山民的支持下用武力夺取了政权。软弱无力的苏丹当时任命穆斯塔法的兄弟、以卡拉·穆罕默德-巴夏之名著称的穆罕默德-巴夏·布沙特利为斯库台的“缪特萨里夫”，他指望这样会造成老布沙特利的两个儿子之间的兄弟相

残的战争。但是兄弟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同年，穆斯塔法-巴夏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卡拉·穆罕默德。

1779年，苏丹企图推翻布沙特利家族。就在这一年，当穆斯塔法-巴夏在莫里亚时，伊斯坦布尔的代理人毒死了他，同时还挑拨了一些反对布沙特利家族的封建主举行暴动。但是卡拉·穆罕默德把暴动镇压下去并且保持了政权。

胜利以后，卡拉·穆罕默德根本不理会土耳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出征，向阿尔巴尼亚中部扩大了自己的巴夏区。但是当1785年他向阿尔巴尼亚南部推进的时候，因布沙特利的强大和独立行动而感到不安的苏丹，撤消了他的“缪特萨里夫”的职位，并且命令巴尔干半岛上的两个同盟者——鲁米利亚和波斯尼亚出兵攻打斯库台。卡拉·穆罕默德由于行军迅速，在鲁米利亚的军队同波斯尼亚的军队会合之前就同鲁米利亚的军队对阵，并且在科索沃平原的会战中击溃了他们。鲁米利亚军队的败北迫使波斯尼亚的瓦利未同布沙特利交战就自动退军了。

科索沃的胜利在国际舞台上也提高了布沙特

利的威望。准备对土耳其作战的奥地利和俄国同他进行了联系，鼓励他进行反对伊斯坦布尔的战争。维也纳答应承认他是自治的统治者。卡拉·穆罕默德利用了这种利害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787 年夏天俄土战争刚一爆发，他就向科索沃推进，并且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苏丹对布沙特利的行动十分不安，他从前线撤下了很大一部分土耳其军队，大约有三万人，由穆罕默德-巴夏·艾多斯指挥，向斯库台进攻。卡拉·穆罕默德又在科索沃平原上迎击敌人，但是这一次土耳其总司令的进攻非常迅猛，结果布沙特利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军队，返回斯库台，但在那里他又被敌军包围了。这迫使他带着两百人困守在罗查发要塞里。

他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都没有成功。罗查发在土耳其炮兵的轰击下被围了八十天。但是 1787 年 11 月 25 日，在卡拉·穆罕默德的率领下，军队开始了攻击，同时爆发了市民的起义。处在两面夹攻之中的土耳其军队被击溃了，并且离开了斯库台。

斯库台的胜利，以及后来 1788 年奥地利之参

加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使布沙特利加强了成为独立统治者的希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他日益加强了同奥地利的联系。但是同苏丹—哈利发的破裂以及同维也纳的接近，使斯库台的封建主和狂热的穆斯林集团感到不安。这种情况看来曾经迫使卡拉·穆罕默德恶化了同奥地利的关系而同苏丹实行和解。

同苏丹的正常关系继续了三年，直到奥土战争结束。1791年8月14日西斯托沃和约刚一签订，卡拉·穆罕默德就再次回到以前的独立的政治方针上来，并且进一步扩大了巴夏区的版图。这些行动使得土耳其第三次对他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远征。

巴夏区内反对从土耳其分离出去的反动集团这一次发动了反对布沙特利家族的叛乱。他们的首领是卡拉·穆罕默德的弟弟——伊布拉希姆-巴夏·布沙特利（他在土耳其这次远征的前夕就跑到伊斯坦布尔去了）。

1793年夏天，土耳其大军在艾布别基尔-巴夏的指挥下向阿尔巴尼亚推进。随同他一起的还有被任命为斯库台“缪特萨里夫”的伊布拉希姆-

巴夏·布沙特利。卡拉·穆罕默德未能阻止敌人的推进。象六年前一样，他又困守在罗查发要塞里。敌人的军队从1793年8月20日一直把斯库台围困到11月28日。这一次又重演了1787年的故事。卡拉·穆罕默德组织了总攻击，粉碎了土耳其的军队，并且解除了对斯库台的围困。

苏丹在第三次失败以后力图同布沙特利接近，以便利用他来反对其他的封建主。卡拉·穆罕默德采取了亲善的政策，同自己那个重新回到斯库台的弟弟和解了，但是没有停止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巴夏区的行动。1795年他占领了普里兹伦和迪布拉；1796年出军黑山。但是在黑山他象以前一样也遇到了黑山人的英勇抵抗，因为他们进行的是保卫已经取得的自由的斗争。1796年9月22日，就在这次长达一百天左右的徒劳的战争中，他阵亡了。

在他死后，斯库台巴夏区的自治也结束了。苏丹立即命令早已表明自己反对卡拉·穆罕默德的政策的伊布拉希姆-巴夏·布沙特利继任斯库台的“缪特萨里夫”。新的统治者奉行了完全听命于伊斯坦布尔的政策。他根据苏丹的命令率领自己

的军队参加了土耳其在阿尔巴尼亚境内和境外所进行的全部军事远征。直到1810年临死前，他都是作为苏丹的“缪特萨里夫”而不是作为巴夏区的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在他当政时期，斯库台失去了卡拉·穆罕默德·布沙特利所争得的种种政治上的胜利。

亚尼纳大巴夏区。阿里-巴夏·台佩莱纳

几乎同时，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建立了另一个以亚尼纳城为中心的大巴夏区，这个区的历史是同阿里-巴夏·台佩莱纳的名字相联系的。

阿里是台佩莱纳的统治者威利·别依的儿子。1753年，他的父亲被自己的竞争者杀死。这个对手并且吞并了台佩莱纳。父亲死后，九岁的阿里便成了孤儿。他的母亲、一个有虚荣心的、勇敢的和严峻的女人把他教养成人。阿里长大以后，领导了一帮强盗，在阿尔巴尼亚和帖撒利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抢劫活动。阿里巧妙地干预了封建

主的纠纷，在这些纠纷中他支持了苏丹，直到引起了伊斯坦布尔的注意。1785年，当他四十一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巴夏的称号，同时获得了德尔维那的缪特萨里夫的职位。一年以后，1786年，苏丹任命他为台尔哈拉这一重要的桑札克的缪特萨里夫，并且委任他在帖撒利地区建立被强盗们所破坏的安宁和秩序。他非常熟悉强盗们的巢穴，因此能够迅速地建立秩序，从而取得巨大的胜利。第二年，即1787年，苏丹为了奖励，任命他担任托斯凯里亚和伊庇鲁斯的德尔维那巴夏的职位。

阿里-巴夏得到这些职位以后，就开始窥视亚尼纳这个当时是土耳其在巴尔干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亚尼纳由于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不仅成了伊庇鲁斯的主要经济中心，而且成了托斯凯里亚的主要经济中心。在亚尼纳聚集了许多阿尔巴尼亚封建主，他们分裂成一些塔拉夫并且为争夺在城市中的权力而互相斗争。

阿里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争执，并且在1788年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这个城市。通过送礼和行贿，他得到了苏丹的同意。后来他又用同样的办法从

苏丹那里得了另一道圣旨，即任命他的次子威利-巴夏为台尔哈拉的缪特萨里夫。

阿里短期内就在亚尼纳建立了秩序。但同时，他又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便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邻近的地区去。他利用了土耳其忙于对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也巧妙地利用了德尔维那巴夏的职权，在建立秩序的借口下于1789—1791年接连不断地进军托斯凯里亚和伊庇鲁斯，结果托斯凯里亚许多地区（科尼察、佩尔梅特、克耳胥腊、里波霍瓦和台佩莱纳）被征服，而在伊庇鲁斯，他占领了阿尔塔，从而获得了通向伊奥尼亚海的道路。

1792年，苏丹苏里曼三世摆脱了同奥地利和俄国的战争以后，竭尽全力来稳定帝国的内部的局势。为了避免伊斯坦布尔采取惩罚措施，阿里-巴夏·台佩莱纳停止了进军，并且力求同苏丹保持正常的关系。为此，他在1793年甚至正式参加了土耳其反对斯库台的进军。

可是到十八世纪末，当土耳其的处境由于拿破仑·波拿巴的进军而恶化的时候，阿里-巴夏又开始了自己的进军以扩大亚尼纳巴夏区。1797

年，法国侵占了伊奥尼亚群岛(科孚等等)，并且成了亚尼纳巴夏区的邻居。拿破仑打算从土耳其手中夺取埃及，于是力求在巴尔干给伊斯坦布尔制造新的麻烦，因此鼓励阿里发动反对苏丹的起义。阿里-巴夏利用了机会，从法国得到了武器、弹药和军事教官，但是他没有破坏同苏丹的关系。相反，当1798年土耳其同英国和俄国一起向法国宣战时，阿里开始了反对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并且夺取了伊奥尼亚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普列维札、古门尼察等等)。

1799年初，伊奥尼亚群岛转到俄国的手里。尽管阿里尽了一切努力，他仍然未能同俄国人建立友谊。俄国在对待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上只依靠巴尔干的基督教民族而不信任伊斯兰教的巴夏们。同新邻居关系不正常使阿里遇到了许多麻烦，因为俄国人唆使亚尼纳统治者的一切敌人来反对他，这些人中间有：贝拉特、德尔维那、察梅里亚的别依们，特别是信仰基督教的苏累特人，这是阿尔巴尼亚自由山民中的一个战斗性强的部落，他们很早就从希玛拉山区迁到了伊庇鲁斯南部的苏立山区。

然而阿里-巴夏·台佩莱纳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不仅表现了巨大的军事才能，而且也表现了外交上的灵活性。为了在忙于同俄国教唆来反对自己的人作战时保障自己的后方，他同伊斯坦布尔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他在自己新的敌人们中间制造了纠纷以后，于1799年春发动了反对苏累特人的军事远征。

阿里以前也曾企图使苏累特人屈服，但是没有成功。因此这一次他包围了苏立，把它紧紧地围困起来，企图以饥饿来迫使苏累特人投降。但是苏累特人在自己的将领佛托·札韦拉的领导下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自由达四年之久。直到1803年，当阿里把包围圈缩小了，并且切断了所有的粮道，苏累特人才不得不在答应他们可以离开故乡的条件下投降了。阿里在受降以后没有让苏累特人到科孚的俄国人那里去。当时他们之间重新爆发了战争。可是佛托·札韦拉和一部分苏累特人顺利地逃往科尔富，另一部分人中途被截。一群妇女为了不落入阿里之手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跳进了山涧。

苏累特人被征服以后，阿里力求在国际舞台

上为自己找到同盟者，以便帮助他实现成为独立的统治者的美梦。为此，1803 年他和英国结成联盟，1806 年又和法国结成联盟，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任何帮助，因此为了不使同苏丹的关系恶化，阿里停止了军事远征。他利用同英国和法国的联盟而从它们那里获得现代的武器来加强自己的军队。

1808—1812 年，当土耳其对俄作战时，阿里为了扩大自己的巴夏区而再度开始远征，并且取得许多巨大的胜利。1809 年他征服了贝拉特和察梅里亚。他叫自己的长子米夫塔尔-巴夏掌管贝拉特的政权；并且逮捕和囚禁了察梅里亚的统治者。1810 年，他不顾拿破仑的威胁，攻占了发罗那，逮捕和驱逐了同法国人有联系的城市统治者。1811 年，他对德尔维那和纪诺卡斯特发动攻击，经过激烈的炮击占领了这两个地方。1812 年，阿里推进到同他竞争的封建主们正在集会的卡迪奇要塞，并且迫使他们投降。由于征服了这些地方，整个托斯凯里亚、帖撒利和伊庇鲁斯（伊庇鲁斯沿岸的帕尔加除外）都处在他的权力之下，并且被划进他的巴夏区。至此，亚尼纳巴夏区达到了

自己权力的顶峰。

就象所有在阿尔巴尼亚或奥斯曼帝国其他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巴夏区一样，亚尼纳巴夏区也具有封建的性质。但是地主财产由于剥夺军事封建主的财产而增长的过程，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具有更大的规模。提马尔和札美特在这里完全被消灭了。阿里-巴夏本人晚年从一个继承了父亲两块小领地的主人变成了遍及托斯凯里亚、伊庇鲁斯、帖撒利和其他地方的九百三十四个村庄的所有者。阿里-巴夏早就梦想成为独立的统治者，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得到支持。因此他不得不满足于在不脱离奥斯曼帝国条件下的最广泛的自治，并且他还保持了对苏丹的臣属关系。特别是在土耳其忙于战事的时期，亚尼纳巴夏区无论在对内政策或者在对外政策上都获得了自治国家的特点。

亚尼纳巴夏区的疆域内住有阿尔巴尼亚居民和希腊居民。统治阶级和武装力量完全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

阿里-巴夏的强大引起了伊斯坦布尔方面的不安。因此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812年刚刚同俄

国缔结了和约，就撤消了他的职位，并且命令他回到台佩莱纳去。阿里形式上服从了，但是过了几月又重新回到了亚尼纳，并且加强了同英国人的联系，而不再考虑苏丹的权威。

伊斯坦布尔没有能力采取军事措施，因为过了一些时候以后，塞尔维亚爆发了起义。为了不使同亚尼纳的关系恶化，苏丹让了步，并且给阿里发去了一道圣旨，承认他以前所拥有的全部职位和称号。这样，从1812年开始，阿里几乎是独立地统治着亚尼纳巴夏区。

伊布拉希姆-巴夏·布沙特利死后(1810年)，斯库台重新爆发了封建主的争端。阿里-巴夏·台佩莱纳参与了这次战争，但是没有成功。1811年，封建主的内战以穆斯塔法-巴夏·布沙特利的胜利结束。穆斯塔法-巴夏·布沙特利短期内就恢复了斯库台巴夏区。1812年阿尔巴尼亚的全部领土都处在两个大封建主的权力下。

在这两个封建主中间，亚尼纳巴夏更强大，他开始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北方。在这方面他取得了许多胜利。以前依赖斯库台的中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们，现在都同亚尼纳建立了联系。1812

年阿里组织反对穆斯塔法-巴夏的密谋，但是失败了。这些行动迫使穆斯塔法-巴夏同伊斯坦布尔接近起来。反过来，苏丹也竭力支持斯库台的统治者，以便在必要的场合利用他来反对阿里-巴夏。但是两个阿尔巴尼亚封建主避免互相冲突。

大巴夏区被镇压和
提马尔制度在阿尔巴尼亚的结束

1814—1815年发生了改变欧洲力量对比的重要国际事件。在拿破仑·波拿巴垮台以后，维也纳会议强迫法国接受了和约条款，并且确定了新的欧洲各国的边界。1815年建立的神圣同盟给自己提出了不支持任何革命运动和不允许在欧洲政治地图上作任何改变的任务。这种情况暂时使土耳其避免了外来的威胁。在苏丹面前有了镇压内部的革命运动和分立运动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阿里-巴夏·台佩莱纳不得不或者无条件地服从苏丹，或者完全不做必然会导致同伊斯坦布尔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事情。

阿里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认为，俄国即使作为神圣同盟的参加国也不会放弃自己反土耳其的传统政策。作为这种想法的有说服力的因素是俄国沙皇对希腊革命爱国者的支持，这些爱国者在自己的组织“友人协会”的领导下准备举行争取解放的起义。因此阿里采取了许多同俄国接近的步骤。为了得到俄国的支持，他答应同它友好。同时他同希腊的爱国者进行了接触，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以便在反对伊斯坦布尔的斗争中使他们站在自己方面来。

但是阿里-巴夏在估计国际形势上犯了错误。1820 年这个错误造成的后果就表现了出来。当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镇压亚尼纳巴夏区，而阿里-巴夏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俄国并不打算破坏神圣同盟的原则。阿里也曾向英国求援，但是英国劝他同苏丹和解。只有希腊的爱国者答应一旦阿里开始反对伊斯坦布尔的战争他们就开始武装起义。但是这些爱国者企图用这种诺言使土耳其人打击的矛头指向阿尔巴尼亚，以便促成希腊起义的胜利。但是阿里-巴夏仍然指望，如果希腊爆发起义，苏丹就会搁下亚尼纳的统治者，而率领自

己的部队去进攻起义者。

1820年初，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发出了撤消阿里-巴夏·台佩莱纳的职务的圣旨，并且命令他在四十天之内前去伊斯坦布尔报告。阿里不但置之不理，甚至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防御措施。于是5月间苏丹发出了第二道圣旨，判处阿里死刑。一个月以后，即6月间，被任命接替阿里职位的伊斯玛依尔-巴夏·别依所领导的一支土耳其大军向亚尼纳巴夏区进逼。同时土耳其的海军也开赴亚尼纳巴夏区。穆斯塔法-巴夏·布沙特利也得到了参加这次进军的命令。

起初，土耳其人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保卫巴夏区各城市的阿尔巴尼亚边防军没有作重大的抵抗就退却了，随后便同自己的指挥官一起投降了，在这些指挥官中间有阿里的几个儿子和侄子。他们对抵抗的意义显然认识不清。1820年8月，土耳其军队包围了阿里-巴夏和他的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所在的亚尼纳。

阿里-巴夏没有投降，并且力图通过谈判把抵抗拖延到希腊起义爆发的时候。但是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当1821年3月爆发希腊争取解放的

革命时，苏丹不但没有从亚尼纳撤回自己的军队，反而派来了新的援军。在代替无能的伊斯玛依尔-巴夏·别依的胡尔席特-巴夏的指挥下，土耳其军队加强了对亚尼纳的压力。但是阿里-巴夏抵抗到底。直到1822年1月25日，即围攻的十七个月以后，当阿里被胡尔席特-巴夏背信弃义地杀死以后，亚尼纳的抵抗才停止。阿里的首级被当作珍贵的战利品运往伊斯坦布尔。

尽管阿里-巴夏·台佩莱纳的抵抗受到镇压，他的巴夏区的存在无论在阿尔巴尼亚或者在国际舞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他消灭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军事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阿里关于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公国的思想以及他反对伊斯坦布尔的斗争对后来的事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阿里-巴夏给予希腊起义者的帮助和亚尼纳的长期抵抗，对促成希腊的解放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土耳其政府在镇压了亚尼纳巴夏区以后，就派遣自己的全部军队（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封建主的武装力量）来反对希腊的革命。在参加镇压希腊起义的阿尔巴尼亚封建主中间有穆斯塔法-

巴夏·布沙特利。

到这时为止，布沙特利和苏丹互相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多久。在镇压了亚尼纳巴夏区以后，苏丹已经没有兴趣帮助布沙特利来加强自己的力量。穆斯塔法-巴夏开始对土耳其统治者削弱分立的封建主的权力来加强帝国权力感到不安。

1824年，当布沙特利不经苏丹许可而从希腊回到斯库台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此就恶化了。但是土耳其政府当时忙于希腊问题、雅内察尔问题、波斯尼亚的地位问题，后来又忙于1828年开始的俄土战争，所以延搁了对斯库台的干涉。穆斯塔法-巴夏·布沙特利利用了这个情况，同俄国人结成了秘密同盟。俄国人答应如果他不参加反对俄国人的战争就承认他是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统治者。的确，当苏丹命令他随同自己的大军开赴前线时，布沙特利迟迟才起程，而且行军十分缓慢，以致等他到达指定的地点，土耳其的军队已经被粉碎了。但是俄国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穆斯塔法-巴夏回到斯库台时同苏丹和俄国人的关系都破裂了，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支持者。

俄土战争结束以后，苏丹决定彻底征服阿尔巴尼亚。这个任务落在土耳其总司令鲁米利亚·穆罕默德·列希特-巴夏的肩上。1830年，他率领大军进逼托斯凯里亚，因为那里的封建主再一次变成了独立的统治者。当他到达马纳斯蒂尔时，他邀请托斯凯里亚所有的封建主到那里去，好象是为了赦免和犒赏他们，然而1830年8月26日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杀死了他们中间五百多人。随后又烧杀了阿尔巴尼亚的整个南方。

1831年穆罕默德·列希特-巴夏进逼盖盖里亚。穆斯塔法-巴夏出兵迎击，但在巴布纳（马其顿）被击溃了。这迫使布沙特利向斯库台退却，并且闭守于被土耳其军队围困的罗查发要塞。经过六个月的围攻，在苏丹保证保全他的生命以后，穆斯塔法-巴夏投降了。斯库台巴夏区也就这样结束了。

土耳其政府摧毁了分立的封建主政权以后，没有再恢复以前的提马尔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在阿尔巴尼亚，而且在整个奥斯曼帝国都完全垮台了。一年后（1832年），苏丹通过立法的道路废除了这个制度。四百年前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的军事

封建制度也就这样结束了。

伊斯坦布尔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建立通常的国家机关来代替军事封建主的行政机构。没有受到穆罕默德·列希特-巴夏讨伐性远征打击的阿尔巴尼亚封建主们，看到这就是自己独立统治的终结，于是起来反对新的机关。另一方面，在新机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官员为了进行投机活动，滥用自己的职权。这种情况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在新的土耳其国家机关建立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就爆发了一系列由封建主（如久柳夫塔尔·波迪、塔菲尔·布吉、捷涅尔·吉耶列卡等人）领导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由爱斯纳夫的领导人（如哈姆查·卡查集、哈治·伊德里兹等人）率领的市民的起义。所有这些起义都受到了镇压。

民族运动的初期。
反对坦吉马特的起义

土耳其统治者们在二十——三十年代采取的措施的结果，为实现坦吉马特的改革准备了条件。

他们力图利用这些改革来巩固由于各地方封建主的分立运动、农民运动和不时在帝国各个角落爆发的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而摇摇欲堕的中央集权。

苏丹阿勃杜尔·麦吉特在1838年11月的一项名为"哈特·舍利夫·纠尔汉涅"的法令中公布的这些改革的一般原则，规定按照欧洲国家的样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管理机关来代替分立的封建政权；建立国家财政机关和用以代替腐朽的伊尔提查姆制度的新的税收制度；废除过去的封建武装力量并在普遍的义务兵役的基础上组织正规的国家军队。然而无论纠尔汉涅的原则或者补充的法律都没有触动奥斯曼封建帝国腐败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土耳其政府的国务活动家们之所以实现这些改革，是为了更多地进行损害人民的投机。

在阿尔巴尼亚，只有地主才欢迎坦吉马特改革，因为在废除军事封建所有制以后，他们甚至可以在政府的保障下自由地扩大自己的领地。为此，他们支持土耳其政府实现这些改革。

与此相反，一些旧的封建主看到伊斯坦布尔不断沿着中央集权道路前进而对纠尔汉涅法令表示了抗议。山区族长以及心怀不满的爱斯纳夫的

领导人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是他们这些人虽然准备用武力阻止这些改革的实现，却没有提出建立新国家政治制度的任何建议。他们主张保存旧制度，主张旧封建主重新获得自己已经失去的巴夏区和提马尔。山区族长要求保存自己传统的自治，而爱斯纳夫的领导人则主张将来保存由于建立新的国家机关而被废除的旧特权。

国内的农民群众对坦吉马特改革也抱有敌视的态度。新建的国家机关由于官员贪污成风而没有改善农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农民特别痛恨的是税收制度（首先是牲口税）和实行长达七到十年之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山民之所以坚决反对改革，是因为他们认为实现国家集权措施就是他们传统自治（威诺米）的终结。

土耳其政府预料到实现新的改革会引起阿尔巴尼亚人的武装反抗，而为了避免普遍的起义，这些改革并不是在全阿尔巴尼亚同时实行的，而是分阶段实行：1843 年在科索沃地区，1844 年在盖盖里亚地区，1845 年在托斯凯里亚地区。

农民和山民到处都用武装起义来反对改革。土耳其政府派遣了人数众多的军队去镇压他们。

在一些地方，它依靠武力才得以征收赋税和为军队募集到新的力量。在各山区，土耳其的新政策遭到了破产。伊斯坦布尔不得不暂时延缓实行改革。

但是无论农民的起义或者山民的起义，它们的动力只是一些狭隘的要求——他们反对新的改革，具体说来就是反对赋税和兵役。他们的斗争并不是为了建立比较进步的制度。带有这种狭隘性质的起义归根到底是为封建主和山区族长的利益服务的。

在大规模的反对坦吉马特的武装起义的时期，有一些人士认为，阿尔巴尼亚人通过在阿尔巴尼亚恢复旧局面的办法是不能使自己得救的，因此应当走新的道路，即按照欧洲先进国家的样子走文明和启蒙的道路。他们认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在人民群众中间推广教育和文化。起初只有少数人懂得这种历史的必要性。纳乌姆·韦奇尔哈尔吉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必要性。

纳乌姆·韦奇尔哈尔吉 1797 年生于维思库基。当他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他就到罗马尼亚去了，在那里，1821 年他同几百个同胞一起参



纳乌姆·韦奇尔哈尔吉，十九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加了解放罗马尼亚、反对土耳其征服者的革命。尽管他身居异邦，但他始终都想到自己不幸的祖国由于落后和土耳其的压迫而遭受苦难。他很快就得出了结论：阿尔巴尼亚只有在人民群众都受到教育的情况下才能摆脱落后和奴役。如果教育不是象当时阿尔巴尼亚那样用外国语言（土耳其语和希腊语）来推广，而是用阿尔巴尼亚语来推广，这就可以很快得到实现。纳乌姆认为，用外国语言进行教育对人民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会阻碍阿尔巴尼亚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反过来，用本国语言进行教育，可以比较容易接受，而且还可以用热爱

祖国的精神来教育同胞。

从“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是奴隶的民族”和“教育只能通过本国语言来掌握”这一点出发，纳乌姆·韦奇尔哈尔吉开始用他自己编定的一套特殊的字母来写阿尔巴尼亚语的教科书。坦吉马特改革公布以后，他在给信仰基督教的同胞写的一封信中说：“奋发起来，更加清醒地思考，以世界上先进民族为榜样勇敢地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时代已经来到了。”1844年他在罗马尼亚用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了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名为《埃韦塔尔》，这本书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的南方广为流传。《埃韦塔尔》的出版在阿尔巴尼亚的先进人士中间掀起了用阿尔巴尼亚语言推广教育的广泛运动。科尔察城的贵族募集经费开办印刷所，准备用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书籍。一年以后，纳乌姆又出版了《埃韦塔尔》的修订本。

拥护阿尔巴尼亚语言和阿尔巴尼亚学校的运动，目的在于争取国家的解放和进步，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这本身就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新世纪的开始。这个运动被称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运动，或者简称为“阿尔巴

尼亚的复兴”。

农民和山民反对伊斯坦布尔的起义在以后的年代里仍然在继续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47年的起义。

起义是1847年7月在腊贝利亚开始的，当时税吏刚好来到库尔维列施。以捷涅尔·吉邦列卡（过去的斯帕希）为首的近五百名的腊贝利亚居民夺取了武器，驱逐了税吏，冲出腊贝利亚山区，并且解放了德尔维那，尔后又向桑札克的重要中心纪诺卡斯特逼进，并且把它包围了。

起义从腊贝利亚扩展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其他地方。当它发展到贝拉特区时其规模已经很大。这个桑札克的缪特萨里夫是大地主胡森-巴夏·符里奥尼。那里的农民因为他的胡作非为而不得安宁。因此起义主要是打击符里奥尼家族的封建主。起义者在勇敢的农民腊波·赫卡利的领导下解放了马拉卡斯特和缪泽克尤以后，在格烈席察村击溃了进攻他们的土耳其军队，俘虏并处死了领导政府军的胡森·符里奥尼两兄弟，然后进逼桑札克的中心贝拉特。

各地区起义者取得这些胜利以后，互相进行

接触，并且建立了联合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反对改革的地主。

起义者不断获得新的胜利。他们解放了贝拉特，使土耳其驻防军困守在要塞里不得出来。就在这时起义的腊贝利亚人击溃了前来援助被围困的纪诺卡斯特的土耳其军队。腊贝利亚和察梅里亚的起义者继续围困纪诺卡斯特，但分出部分力量向维拉耶特的中心亚尼纳进逼，并于 1847 年 8 月 28 日在离亚尼纳不远的多兰涅村歼灭了向纪诺卡斯特前进的五千名土耳其军队。

但是起义没有长期继续下去。土耳其政府派大军去阿尔巴尼亚，攻击贝拉特，在他们击溃腊波·赫卡利的兵力，并对当地居民采取了恐怖手段以后，又继续向纪诺卡斯特前进。在靠近德尔维那的帕利亚夫里村的会战中，以吉耶列卡为首的起义者（他们已经停止向亚尼纳的进军）被击溃了。在其他几次讨伐性的战役之后，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1847 年的起义虽然遭到了镇压，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提出了比以前历次起义更大的要求。农民群众不仅进行了反对国家税收制度和征

兵制度的斗争，而且进行了反对大地主的斗争，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马拉卡斯特和缪泽克尤农民进行的斗争中。其次，在这次起义中也提出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虽然是很不明确的）基本要求。因此1847年起义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对整个阿尔巴尼亚具有重大的影响。

伊斯坦布尔残酷地镇压了阿尔巴尼亚巴夏区和反坦吉马特的起义。这种残酷行为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阿尔巴尼亚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土耳其是可恨的敌人。他们只是在宪兵的威胁下才缴纳赋税。用武力征集起来的士兵经常开小差。他们根本不管苏丹的权威。1853—1856年，当土耳其同俄国作战时，苏丹只在阿尔巴尼亚招集到很少量的士兵。克里木战争以后，土耳其政府再次企图在阿尔巴尼亚山区建立自己的权威。但是这一次它遇到了伊斯兰教居民和基督教居民的武装反抗。

这一切就使阿尔巴尼亚人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涉及土耳其的命运和巴尔干事件时各大国都必须考虑到这支力量。无论

是各大国或者是巴尔干诸国都开始注意阿尔巴尼亚形势的发展了。

但是他们的利益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和期望是背道而驰的。无论是在克里木战争以前还是以后，各大国都不愿意奥斯曼帝国垮台，因为英国和法国企图利用它作为一个壁垒，不让俄国有通往海峡的出路，奥地利正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身上，不愿意背上多余的麻烦，而俄国则由于克里木的失败大大削弱了。

只有三个年轻的巴尔干国家（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愿意奥斯曼帝国垮台，并且积极地进行了斗争，因为它们只有在这以后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民族统一。但是雅典、贝尔格莱德和策丁耶的政府当时在充满沙文主义野心的资产阶级集团手里。它们希望把阿尔巴尼亚国家的一部分并入自己的版图。在1861年塞尔维亚和希腊的代表举行密谈时，两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土耳其被从巴尔干赶出去以后，阿尔巴尼亚将由它们分别占领。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巴尼亚人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邻国。不但如此，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沙文主义宣传家们反伊斯兰的、泛斯拉夫的或泛

希腊的号召，也使占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伊斯兰教居民感到不安。

因此，贝尔格莱德和雅典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沙文主义政策，妨碍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同邻国人民在反对土耳其的斗争中的合作关系。

伊斯坦布尔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中所实行的政策也在阿尔巴尼亚造成了困难的局面。土耳其政府在坦吉马特改革文件中虽然也宣称，将承认帝国各民族有权自由地使用本族语言，但是它继续把民族和宗教等同起来，因此它认为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教居民是奥斯曼民族，阿尔巴尼亚的东正教居民是希腊民族，阿尔巴尼亚的天主教居民是拉丁民族。根据这个原则，分为三种不同宗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就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民族，从而禁止他们自由地使用本族的语言。这种情况具有严重的后果。它是阿尔巴尼亚人民争取统一的斗争的障碍。因为在土耳其政府控制的土耳其学校中，全部力量都是用来向阿尔巴尼亚学生灌输伊斯兰奥斯曼的民族感情，并使其根深蒂固；在受到伊斯坦布尔总主教的监督和思想指导的希腊学校中，人们力图在信仰基督教的学生中间灌输

泛希腊的感情，这是符合雅典统治集团沙文主义的意图的；为天主教居民开办的学校则控制在梵蒂冈或奥地利手中，在这里教学是用意大利语进行的。

坦吉马特改革以后外国学校数量的增长和隐藏在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意图，造成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裂和被同化的危险。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为了反对这种危险，提出了民族高于宗教的论点。根据这一点，他们把宗教信仰问题放在第二位，而集中全部力量，通过教育和发展阿尔巴尼亚文艺，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间传播民族意识。

1864年，经过土耳其政府的允许，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建立阿尔巴尼亚文化协会的尝试。这是由在英国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年轻爱国者康士坦丁·克利斯托佛利迪倡议的。文化协会的目的是开办阿尔巴尼亚学校和出版用比韦奇尔哈尔吉的字母更实用的字母拼写的教科书。但是这些尝试由于不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是独立民族的土耳其政府持否定态度而没有成功。

在1867、1870、1871年，在伊斯坦布尔又

进行了建立文化协会的若干次新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也没有结果。这一次土耳其政府和伊斯坦布尔总主教都迫使委员会的成员放弃建立这种团体的计划。



康士坦丁·克利斯托佛利迪(1830—1895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有才能的阿尔巴尼亚语言学家

这些困难妨碍了民族运动的迅速发展。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人数是很少的。他们既没有文化组织，也没有政治组织。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中间，对土耳其政府采取敌视态度的封建头目们还有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巴尔干危机年代阿尔巴尼亚的形势。

1878 年普里兹伦同盟

187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爆发的解放运动以及 1876 年保加利亚爆发的解放运动，是巴尔干危机的开始。俄国支持了起义者的自治要求。1876 年，在它的怂恿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土耳其宣布了战争。伊斯坦布尔残酷镇压了起义，迫使塞尔维亚请求停战，并且拒绝了俄国关于让巴尔干各民族自治的要求。当时俄国加紧准备反对土耳其的战争。由于英国的倡议（英国力求解救奥斯曼帝国免于战争浩劫），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建议，1877 年各大国在伦敦签署一项议定书。按照议定书，土耳其被迫承认了波斯尼亚省和黑塞哥维纳省以及保加利亚两个维拉耶特的自治。

无论伊斯坦布尔会议还是伦敦议定书都无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存在，否定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自治权利。此外，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某些地区还被划入保加利亚一个维拉耶特境内。这就促

使阿尔巴尼亚人断然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为此许多著名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其中就有阿勃杜尔·弗拉舍里）在亚尼纳举行了会议，并且起草了一份致土耳其政府的备忘录，其中提出了把所有并入各省的阿尔巴尼亚的地区联合为统一的阿尔巴尼亚维拉耶特的建议：在阿尔巴尼亚维拉耶特内建立由阿尔巴尼亚人任职的行政机关；在学校中和法庭上使用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各地的新兵只在维拉耶特内服役；大部分预算的收入用于维拉耶特内的开支。备忘录第一次提出了全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要求。

然而伦敦议定书没有实现，同样，亚尼纳备忘录也没有受到注意，因为1877年4月24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布了战争。塞尔维亚和黑山也同俄国一起开始了反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腐败的土耳其遭到了失败，并于1878年3月3日签署了俄国强迫它接受的圣斯忒法诺和约。圣斯忒法诺和约完全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问题。阿尔巴尼亚仍然和以前一样处在土耳其的压迫下，没有任何权利。尤其是它的相当大一部分领土仍为外国所吞并。黑山得到乌尔钦、霍特、格

鲁达、普拉瓦、古西涅等等。塞尔维亚兼并普里什提纳桑札克。划入保加利亚的有科尔察、波格拉迪茨、迪布拉、果斯提伐尔、特托瓦等等地区。

关于圣斯忒法诺和约的消息使阿尔巴尼亚人十分不安。全国都开展了人民运动反对外国沙文主义者的意图。许多地区还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反对新威胁的自卫委员会。

各大国在列强会议上（会议于1878年6月在柏林举行）重新审查圣斯忒法诺和约条款的决定推动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土耳其政府赞成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愤慨情绪，并且力求利用大批的抗议使圣斯忒法诺和约的条件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为此伊斯坦布尔允许建立自卫委员会。但同时它又要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徒在抗议书中称自己是土耳其人，并且出面反对脱离土耳其和苏丹。

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们明白，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支持的困难条件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应该把自己祖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1878年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的秘密委员会担负了建立全阿尔巴尼亚运动统一阵线的任务。这个委员会由阿勃杜

尔·弗拉舍里领导，参加的人有帕施科·瓦萨、萨米·弗拉舍里、雅尼·弗烈托、吉亚·普里什提纳等。

伊斯坦布尔委员会在柏林会议开幕前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向各大国提出了阿尔巴尼亚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们同自卫委员会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谈判的结果，决定于1878年5月底在普里兹伦召开非常会议。阿尔巴尼亚各地区的代表都应邀参加这次会议。

非常会议于1878年6月10日，即柏林会议开幕的前三天在普里兹伦开幕。大部分地区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期限短促和旅途困难，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代表都未能出席。

会议开幕时阿勃杜尔·弗拉舍里发表了激昂的演说。他号召代表们结成统一阵线来反对国家被瓜分的威胁。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有统一领导中心的总的组织，所有的地方组织都要服从这个领导中心。领导中心建立以后，所有的自卫委员会都变成了它的分部。建立的这个组织被称为“同盟”，史称“普里兹伦同盟”。会议决定建立同盟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可能被列强吞并的领土。会议

抗议柏林会议瓜分阿尔巴尼亚上地。接着会议在几天之内起草了同盟的章程。

在起草章程时出现了两个完全对立的派别。多数地主和反动僧侣的代表们（他们是土耳其政府的傀儡）力图使同盟具有伊斯兰教组织的性质，并要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全体穆斯林居民参加这个组织。为此他们还邀请了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居民的代表出席会议。土耳其政府的目的是：一方面压制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运动，另一方面驱使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保卫奥匈蓄谋侵占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而斗争。以阿勃杜尔·弗拉舍里为首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代表了另一派。他们希望使同盟具有阿尔巴尼亚组织的性质，让全体阿尔巴尼亚人参加，而不问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仅力求指导同盟为拯救国家不受瓜分而斗争，而且力求指导同盟为争取阿尔巴尼亚的自治而斗争。

亲土耳其分子在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878年6月18日通过了被称为“卡腊尔纳梅”的章程。章程表示忠于土耳其，从而使同盟具有巴尔干穆斯林组织的性质。可是反

动的这一派只能在会议上保证多数地位。在同盟的许多分部中爱国者的纲领取得了胜利。因此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虽然不同"卡腊尔纳梅"精神妥协，但是没有退出会议，而是力求使会议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会议结束以后，阿勃杜尔·弗拉舍里出发到阿尔巴尼亚南方去，以便在那些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地区里扩大同盟的组织网。他在弗拉舍里同这些地区的代表们举行了特别会议。在阿尔巴尼亚南方，反动的封建主的影响是很小的。因此爱国者的纲领在弗拉舍里的会议上取得了胜利。在这里，通过了一项使同盟各分部具有明显的阿尔巴尼亚性质的决议。

在1878年6月13日举行的柏林会议上，通过了遏止和限制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的决议，并且牺牲土耳其利益而重新划定了领土。然而这一次也没有考虑民族原则。在圣斯忒法诺确定的保加利亚的疆界缩小了许多。塞尔维亚失去了普里什提纳桑札克，但是得到了彼罗特、特伦尼和符兰涅。黑山分得了提瓦尔、波德哥里察、普拉瓦、古西涅；乌尔钦则仍然留给土耳其。希腊虽然没

有参加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但是得到了帖撒利和伊庇鲁斯，条件是疆界将由希腊土耳其委员会共同确定。

会议没有注意阿尔巴尼亚人的抗议。没有一个大国为卫护他们的要求讲过话。会议认为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是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的东正教徒是希腊人。领导会议的德国宰相俾斯麦公爵甚至宣称，不存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这样，阿尔巴尼亚注定还要长期地在土耳其压迫下忍受没有任何权利的痛苦。不但如此，它的一部分领土还被外国瓜分了。

会议的决议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间激起了反对拒绝他们的要求的各大国和没有能力捍卫本国领土的土耳其政府的浪潮。在全国，而首先是在边境地区，进行了武装反抗占领者的紧急准备工作。各城市和村镇都开始登记自愿参军的人员。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为了建立和供养军队，他们献出了金钱、谷物和牲口。几个星期之内普里兹伦同盟就建立了一支几万人的阿尔巴尼亚军队。

土耳其政府正式宣称，它将实现柏林决议。

但是另一方面它力图利用志愿军的武装力量来抵抗奥匈帝国侵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这些武装力量大部分是普里兹伦同盟的军队。尽管土耳其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在奥地利军队8月间侵占波斯尼亚以后，普里兹伦同盟在阿尔巴尼亚爱国者进行的大量解释工作的影响下站到一边去了，它没有卷入反对奥匈的战争冒险，而是为阿尔巴尼亚的利益进行了斗争，这样伊斯坦布尔的主要计划就失败了。从此以后土耳其政府就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同盟了。

几天以后，各大国又强迫土耳其政府把柏林决议规定属于策丁耶的地区交给黑山。苏丹担心这些地区的移交会引起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武装反抗，于是派遣了自己过去出席柏林会议的代表、土耳其元帅穆罕默德·阿里-巴夏到阿尔巴尼亚去。在普里兹伦，土耳其元帅只能把在同盟中影响大大削弱的一些反动的巴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拒绝服从苏丹。

在去黑山边境的途中，穆罕默德·阿里-巴夏于9月1日抵达贾科瓦。贾科瓦的同盟委员会是控制在象苏列曼·沃克希和阿赫梅特·科龙尼察

这样的爱国者的手中。除了主席阿勃杜尔-巴夏·德伦尼以外，这些爱国者都是普里兹伦同盟最先进的积极分子。委员会建议土耳其元帅趁早回到伊斯坦布尔去。穆罕默德·阿里-巴夏在六营土耳其军队保护下拒绝回去。于是委员会集合了志愿军部队，并且包围了土耳其元帅歇宿的房子。9月4日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战斗延续到9月6日。结果土耳其部队投降，穆罕默德·阿里-巴夏和阿勃杜尔-巴夏·德伦尼被杀。

土耳其元帅的被杀意味着普里兹伦同盟向前迈进了。同伊斯坦布尔的关系恶化了。同盟甚至以为土耳其政府会采取惩罚性的措施。这些事件逐日加强了爱国分子的影响，并且消除了反动的一翼在同盟中的影响。这样便创造了以新纲领代替“卡腊尔纳梅”这个旧纲领的有利条件。新纲领表现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主要要求——即让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要求。

改变纲领的倡议者又是伊斯坦布尔委员会，它起草了纲领草案，并且在1878年9月27日在土耳其的报纸《东方评论家》上公布了这个草案。这个报纸是在萨米·弗拉舍里的领导下在伊斯坦

布尔出版的。新纲领草案在全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后，普里兹伦同盟大会于11月通过了这个新纲领。纲领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的各部分联合为统一的维拉耶特、建立地方议会作为维拉耶特的最高机关；维拉耶特的公职人员应该掌握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各学校一律用阿尔巴尼亚语教学；维拉耶特的一部分预算用来维持阿尔巴尼亚的学校和用于社会建设。会议委托七人代表团向伊斯坦布尔政府递交了纲领的要求。

由于有了这个纲领，普里兹伦同盟变成了爱国主义的组织——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组织。

备忘录是1879年1月底递交给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政府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答复，以便拖延时间，等到希腊和黑山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它只是答应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备忘录。

几个月以后，事情明白了：土耳其政府故意拖延作出答复。于是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反对土耳其行政当局的人民运动。起义在科索沃具有广大的规模。在群众大会上市民和农民起初提出了废除国家法庭而代之以阿尔巴尼亚法庭的要求。后

来人民群众又起来反对征兵和纳税。这个运动促使山民也恢复了反对坦吉马特改革和保存传统特权的起义。运动的规模很大，以致苏丹不得不暂时停止征税征兵，并且允许境内的一些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地区建立阿尔巴尼亚法庭。

但是尽管争取自治的行政机关的人民运动规模巨大，但是它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在普里兹伦同盟面前尖锐地提出了希腊和黑山吞并阿尔巴尼亚土地的危险的问题。于是自治的问题便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普里兹伦同盟反对瓜分阿尔巴尼亚的斗争

1878年2月，土耳其希腊边界勘定委员会在普列维札开始工作。希腊力求把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土地也划入自己的版图。阿尔巴尼亚人民并不指望土耳其会捍卫帝国的领土。因此，一等土耳其和希腊开始谈判，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几百名爱国者——普里兹伦同盟的参加者——就在普列维

札集会，并且宣布，他们将进行反对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交给希腊控制的武装斗争，而如果土耳其同意这些领土被吞并，那么他们也把武器对准土耳其。

土耳其担心阿尔巴尼亚出麻烦，便借口拖延谈判，接着就中断了谈判。于是希腊报刊开始了轰动一时的反对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运动。这时阿勃杜尔·弗拉舍里在穆罕默德·阿里-巴夏·符里奥尼的陪同下在若干西欧国家里作了一次旅行，以便向国际舆论和列强说明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性质，并且向各大国的内阁递交了备忘录，提出反对政治上瓜分阿尔巴尼亚并且赋予阿尔巴尼亚自治权的要求。

1879 年 2 月，土耳其在列强的压力下被迫把柏林会议所确定的土地交给黑山。因此它从这些地区撤出了自己的军队。黑山军队侵占了波德哥里察、施普札、贾比阿克，但是当他们开到普拉瓦和古西涅时，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抢先占领了这些土地的阿尔巴尼亚普里兹伦同盟的军队。

黑山向列强呼吁，要求它们迫使土耳其从普拉瓦和古西涅驱逐阿尔巴尼亚的军队，并且把这

些地区交给策丁耶。尽管列强施加了压力，土耳其还是不敢使用武力反对愤怒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于是黑山公爵尼古拉决定用武力夺取这两个被阿里-巴夏·古西涅指挥的普里兹伦同盟的军队所占领的地区。黑山军队在 11 月和 12 月的两次尝试失败后，在马尔克·米兰的指挥下于 1880 年 1 月初向普拉瓦和古西涅发起了总攻。阿尔巴尼亚人英勇地进行了自卫。黑山军队在韦利克和佩尼奇接连两次惨败。

黑山政府不能用武力夺取普拉瓦和古西涅，于是再次向列强呼吁，要求实现柏林条约。然而列强懂得，把这些地区交给黑山将成为新战争的导火线，这会更加恶化土耳其的局势。因此，在长时期的谈判以后，1880 年 4 月 2 日他们决定把另外两个阿尔巴尼亚的地区交给黑山，以代替普拉瓦和古西涅。伊斯坦布尔也同意这个决定。这两个新地区必须在二十天内移交完毕。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愤怒。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列强表示抗议，并且同时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国家。霍特和格鲁达到处是新成立的志愿军部队。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愤怒也是针对土耳其政府的，因为它同意了列强的决定。人民的愤怒变成了反对土耳其驻防军的武装行动，迫使驻防军躲在城堡里进行自卫。在这种形势下，争取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斯库台举行的一次非常会议向苏丹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强烈要求把所有的阿尔巴尼亚领土联合为统一的公国，由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选举的公爵领导，属苏丹管辖。1880 年 4 月 17 日在人民群众大会上公布了备忘录的全文。宣读备忘录的是会议主席霍德·索科利——土耳其军队的上校。他同一百五十名阿尔巴尼亚军官一起表示，他们断绝了同苏丹的一切关系，并且当众撕下了自己的肩章和土耳其的勋章。

土耳其政府为了不使关系更加恶化，没有采取反对阿尔巴尼亚的措施。但是另一方面，它执行了列强的决定，从霍德和格鲁达撤回了自己的军队。普里兹伦同盟立即占领了这两个地区。黑山军队又企图用武力夺取它们，但是在沙尼察桥的一场血战中，黑山人被击溃了，他们不得不退却，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身上。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不通过战斗阿尔巴尼亚人是不会交出霍德和格鲁达的。于是列强在1880年6月谈判后，决定强迫土耳其把乌尔钦城以及只有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一块地方交给黑山，以代替这两个地区。

几天以后，1880年6月30日普里兹伦同盟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用武力捍卫乌尔钦。为响应同盟的号召，一支阿尔巴尼亚志愿军在几天之内就组织了起来。

列强威胁土耳其说：如果它不把乌尔钦交给黑山，它们就要占领小亚细亚的伊斯密尔港。土耳其政府想尽方法不要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抵抗。但是它未能如愿。9月17日土耳其军队刚刚撤出乌尔钦，阿尔巴尼亚志愿武装就占领了这个城市，并且宣布他们将把它保卫到底。

1880年9月20日，一支由十七艘军舰组成的国际舰队出现在乌尔钦的海面上。舰队指挥官向阿尔巴尼亚志愿军提出最后通牒，限该城在三昼夜之内投降。但是乌尔钦的保卫者们没有动摇。当时列强决定继续从海上对该城进行封锁，同时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镇压阿尔巴尼亚

的抵抗。

1880年9月25日，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镇压乌尔钦的抵抗和消灭普里兹伦同盟。两个月内，土耳其政府在斯库台和周围地区进行逮捕，迫害爱国者，同时还颁发了勋章和奖品。在增援部队到达以后，土耳其元帅德尔维施-巴夏率领了二十营兵力于1880年11月20日从斯库台向乌尔钦前进。当时这个城市由三万阿尔巴尼亚志愿军保卫着，它已从海上和陆地都被包围起来。由于兵力和军事上的优势，德尔维施-巴夏终于在1880年11月23日击破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并在三天以后，即1880年11月26日，当着国际舰队的面把乌尔钦交给了黑山。

乌尔钦保卫战不仅在阿尔巴尼亚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揭露了列强外交的性质：它们为了自己的世界霸权可以顽固到底地牺牲弱小民族的切身权利。

普里兹伦同盟反对土耳其政府，争取阿尔巴尼亚的自治的斗争

土耳其政府把答复普里兹伦同盟的要求拖延了一年半以后，于1880年6月公开对日益发展的自治运动进行了镇压。但是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们决定用更大的力量再一次提出阿尔巴尼亚自治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根据他们的倡议，1880年7月23日在纪诺卡斯特举行了有普里兹伦同盟所有分部的先进分子参加的同盟非常会议。

阿勃杜尔·弗拉舍里在会议上作了详细的报告。他论证了建立阿尔巴尼亚自治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拯救阿尔巴尼亚民族不受四面八方威胁的唯一道路。他还提出了未来的阿尔巴尼亚自治国家的内部组织的规章草案。

关于建立阿尔巴尼亚自治国家的必要性问题得到所有与会者的赞同。然而在争取自治的时间和方式问题上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时乌尔钦的危机已经尖锐化，因此会议决定暂时搁下

争取自治的问题。

土耳其政府决定无论如何要摧毁乌尔钦的防御。但是当1880年10月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政府的怒潮达到顶点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爱国者认为实现纪诺卡斯特会议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希望把国内的一部分封建主吸引到争取自治的运动中来，于是提出召开普里兹伦同盟全体大会的要求。

大会在普里兹伦同盟主席伊利阿兹-巴夏·迪布拉的主持下于1880年10月20日在迪布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三百名代表，其中有许多巴夏、别依和山区族长，他们都有自己个人的部队随从。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在会上提出了纪诺卡斯特通过的纲领，并且要求用一切手段保卫乌尔钦和击退土耳其军队。但是先进派的纲领遇到了反动的和亲土耳其的封建主和僧侣的抵抗。这些人即使现在，当土耳其政府决定交出乌尔钦，驱散普里兹伦同盟，不给阿尔巴尼亚任何自治的时候，也不愿意断绝同苏丹的关系。意见分歧尖锐到引起了武装冲突。由于这些分歧，会议通过了两个相反的决议，并且由两个独立的代表团递交给伊

斯坦布尔政府。

这一次土耳其政府仍然没有考虑让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要求。它也没有考虑封建主请求苏丹实现某些行政改革的决议。相反，土耳其政府却采取了种种措施来镇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抗和消灭普里兹伦同盟。

然而伊斯坦布尔采取的这些措施更加增加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愤怒。阿尔巴尼亚对土耳其的普遍不满，为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不等待苏丹同意就实现自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爱国分子领导了自发地反对土耳其当局的人民运动，解放了科索沃的许多地区，并且改组了普里兹伦同盟。他们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从领导机关中驱逐了所有的巴夏和反动的僧侣代表。舍赫·尤梅尔·普里兹伦成了同盟的新主席，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有争取自治运动最坚决的分子：阿勃杜尔·弗拉舍里、苏列曼·沃克希、沙乌依普·斯帕希等人。

普里兹伦同盟宣布自己是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在普里兹伦和贾科瓦，它毫无困难地用阿尔巴尼亚行政机构代替了土耳其的行政机构。短期

内同盟组织了一支由苏列曼·沃克希指挥的新军队，这支军队在1881年1月通过对封建主最残酷的斗争把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展到整个科索沃，甚至什库普、特托瓦、果斯提伐尔、迪布拉等地。这样，普里兹伦同盟通过革命的道路开始实现了阿尔巴尼亚的自治，甚至象萨米·弗拉舍里在这些日子所写的那样，实现了阿尔巴尼亚完全的独立。

土耳其政府拖延了反对同盟的军事干涉，因为这时在边界划定问题上同希腊的意见分歧不断地尖锐起来。土耳其政府不希望在自己的后方不能保证不受希腊攻击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它却力图利用阿尔巴尼亚封建主来削弱同盟的权力。1881年2月和3月，在伊斯坦布尔的挑拨下内部的反动势力活跃起来了。封建主开始公开攻击同盟。在迪布拉，他们组织了对阿勃杜尔·弗拉舍里的谋杀。阿勃杜尔没有遇祸，然而他的两名随从受了伤。但是同盟战胜了反动势力。许多封建主被捕了，另一些封建主或者隐匿起来了，或者跑到伊斯坦布尔去了。3月，普里兹伦同盟打算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盖盖

里亚和托斯凯里亚。但是这个打算由于土耳其和希腊签订了边界协议而中断了。土耳其政府向阿尔巴尼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参加这次远征的有德尔维施-巴夏指挥下的二十四个营的兵力。

1881年3月24日，土耳其军先头部队直逼什库普城下，并且在巴夏们的帮助下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该城，俘虏了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把他们带上脚镣手铐投进了监狱。土耳其军队在什库普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抢劫和恐怖活动。在土耳其全部军队一万二千人都到达以后，德尔维施-巴夏又开始向普里兹伦进军了。

土耳其的进军开始后，普里兹伦同盟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列强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列强进行干预，以便停止土耳其的进军和让阿尔巴尼亚自治。然而在阿尔巴尼亚的命运十分危急的时刻，一直忠于同盟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封建主退出了同盟。他们的退出和封建反动势力对同盟的全面进攻削弱了同盟的战斗力。中央委员会能够集合起来的只有少量的军队。军队的大部分——将近六千人——被中央委员会留在普里兹伦以便保卫同

盟，其中两千人在苏列曼·沃克希的指挥下驻扎在斯利沃威，另一部分——四千人——在米茨·索科利的指挥下据守施蒂米里卡的阵地。这是土耳其军队进攻普里兹伦的两条必经道路。土耳其军队同阿尔巴尼亚志愿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在1881年4月17日。阿尔巴尼亚人经过四昼夜的时间打退了土耳其人的进攻。可是4月20日，在炮兵猛烈轰击之后，土耳其主力向斯利沃威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阿尔巴尼亚军队英勇地抵抗了几小时，然而由于对方炮火猛烈终于不得不退到施蒂米里卡。在这里，双方又展开了第二次激烈的决定性的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小时，双方损失都很大；阿尔巴尼亚人有八百人阵亡，土耳其人有一千八百人阵亡。阿尔巴尼亚人不得不从这里退却。1881年4月22日，以德尔维施-巴夏和七名将军为首的土耳其军队在击溃了阿尔巴尼亚人的两次伏击之后，才开入普里兹伦。市内宣布戒严，并且开始大规模地逮捕。

同盟的领导人在普里兹伦陷落以后都转移到了贾科瓦。他们在这里组织了新的力量，继续对土耳其的军队进行了几天的抵抗。但是在5月，

德尔维施-巴夏又占领了贾科瓦，并继续前进，直到完全占领了科索沃。土耳其的行政管理又重新恢复起来。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又镇压了阿尔巴尼亚南部争取自治的运动。

武装反抗结束后，土耳其人仍继续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到处都成立战地法庭，无情地惩罚自治运动的拥护者。大约有七千人在这些法庭受审，其中四千人被判处不同的徒刑。许多人被关进监狱，另一些人被流放到阿纳多列和爱琴海的岛屿上。

德尔维施-巴夏想尽一切办法来逮捕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这些人中间，舍赫·尤梅尔·普里兹伦逃到国外去了。尽管苏丹宽恕了他，并且要给他奖赏和很高的职位，但是他不同意回来。苏列曼·沃克希长期留在贾科瓦山区。沙乌依普·斯帕希被捕，受到战地法庭的审判，并被关进监狱，以后不久就死了。阿勃杜尔·弗拉舍里藏匿了一些时候。德尔维施-巴夏悬重赏捉拿他。在几个星期里他躲过了土耳其人的追缉，但在他企图渡过希孔比河到南方去时被逮捕并被解到普

里兹伦。战地法庭判处自治运动的这个主要领导人以死刑。后来土耳其政府又把死刑改为终身监禁。1885 年大赦时，他被释出狱。然而极度的贫困破坏了他的健康。阿勃杜尔在疾病和孤苦中活到 1892 年。

在武装抵抗运动受到镇压以后，普里兹伦同盟由于受到迫害、流放和监禁而瓦解了。但是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它的疆域以外，同盟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巨大的影响。

为阿尔巴尼亚的学校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而斗争

由于东方危机的缓和以及对阿尔巴尼亚武装斗争的胜利，国际形势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于是土耳其政府在镇压了普里兹伦同盟以后就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起警察恐怖制度，以便用这种办法来根除已经散布在整个阿尔巴尼亚的自治思想。这个制度同苏丹阿勃杜尔·哈米德二世的名字密切地联系着，它一直维持了几十年之久；对于阿尔

巴尼亚说来，这是土耳其反动派进行最残酷统治的时期之一。

在这些年中，阿尔巴尼亚进行武装解放运动的条件无论是在阿尔巴尼亚或是在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变得困难和不利了。其所以困难，是因为经过德尔维施-巴夏的军事行动，经过大批地逮捕爱国的积极分子以后，还由于奥斯曼警察当局的经常镇压，阿尔巴尼亚再也没有一个普里兹伦同盟的地方组织了。其所以不利，是因为尽管列强彼此间有意见分歧，但它们在这个时期仍然坚持东南欧在政治上保持“原状”，这就是说，它们无意支持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要求；相反，它们准备帮助土耳其镇压任何可能改变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地图的武装运动。

在这些条件下，在镇压普里兹伦同盟以后在阿尔巴尼亚爆发的武装起义，无论从政治要求的观点看，或者就规模说，都具有自发性和局限性。

在土耳其和国际反动的年代里，为了等待争取解放的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广大阶层的人民进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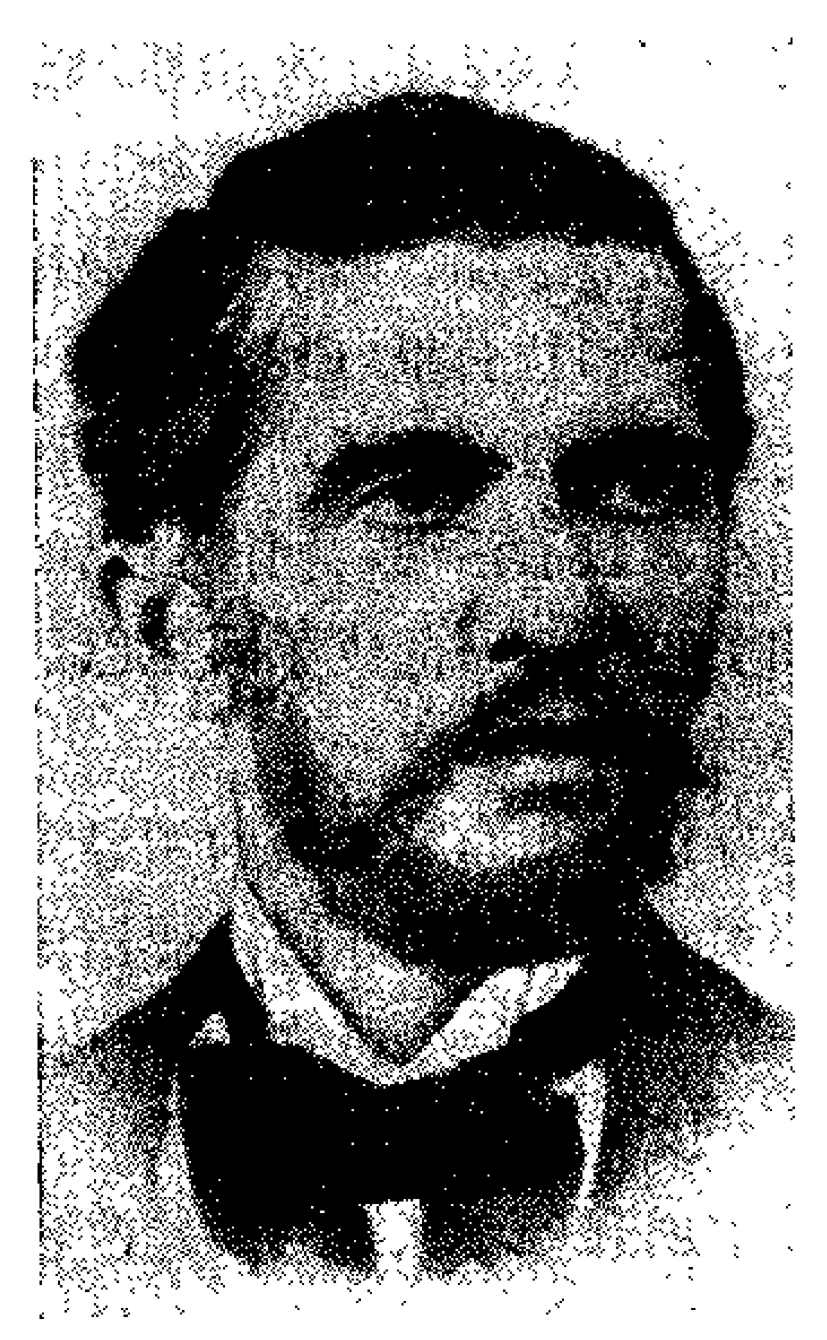
治教育和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上。复兴派继续认为阿尔巴尼亚的学校和作品是传播自己思想的最好工具。土耳其政府及其同盟者——希腊总主教——以十分残酷的手段反对任何形式的阿尔巴尼亚的文化，其中也包括在穆斯林居民和东正教居民中间出现的阿尔巴尼亚的文字。争取和宗教分离的民族学校、争取所有阿尔巴尼亚人不问宗教信仰而有共同的学校的斗争，以及争取具有政治性质和启蒙性质的阿尔巴尼亚文化的斗争，仍是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主要内容。

1879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是普里兹伦同盟年代建立起来的唯一的政治组织，它因为及时转入地下而避免了土耳其反动势力的打击。由于自己领导人的英明和孜孜不倦的活动，这个协会在政治反动的年代成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中心。阿尔巴尼亚境内或境外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都从这里得到各种指示。它的主席是萨米·弗拉舍里(1850—1904年)。萨米·弗拉舍里在他的兄弟阿勃杜尔被关进监狱以后成了阿尔巴尼亚爱国运

动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①。1882 年，在伊斯坦布尔同萨米·弗拉舍里、雅尼·弗烈托和潘德里·索提利一起作为理事会成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的还有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 年)。纳伊姆·弗拉舍里由于自己在反动年代里所进行的广泛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而同自己的兄弟——阿勃杜尔和萨米——一起成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

经过长期的努力，伊斯坦布尔协会的领导人终于从土耳其政府那里得到了用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一种专谈文化问题的定期机关刊物的许可。1884 年 8 月，这个月刊以《德利塔》（《光明》）为名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了创刊号，从第三期起改名为《底图里亚》（《知识》）出版，上而刊登了该协会领导人的许多文章。第一个阿尔巴尼亚语杂志的出版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胜利。杂志的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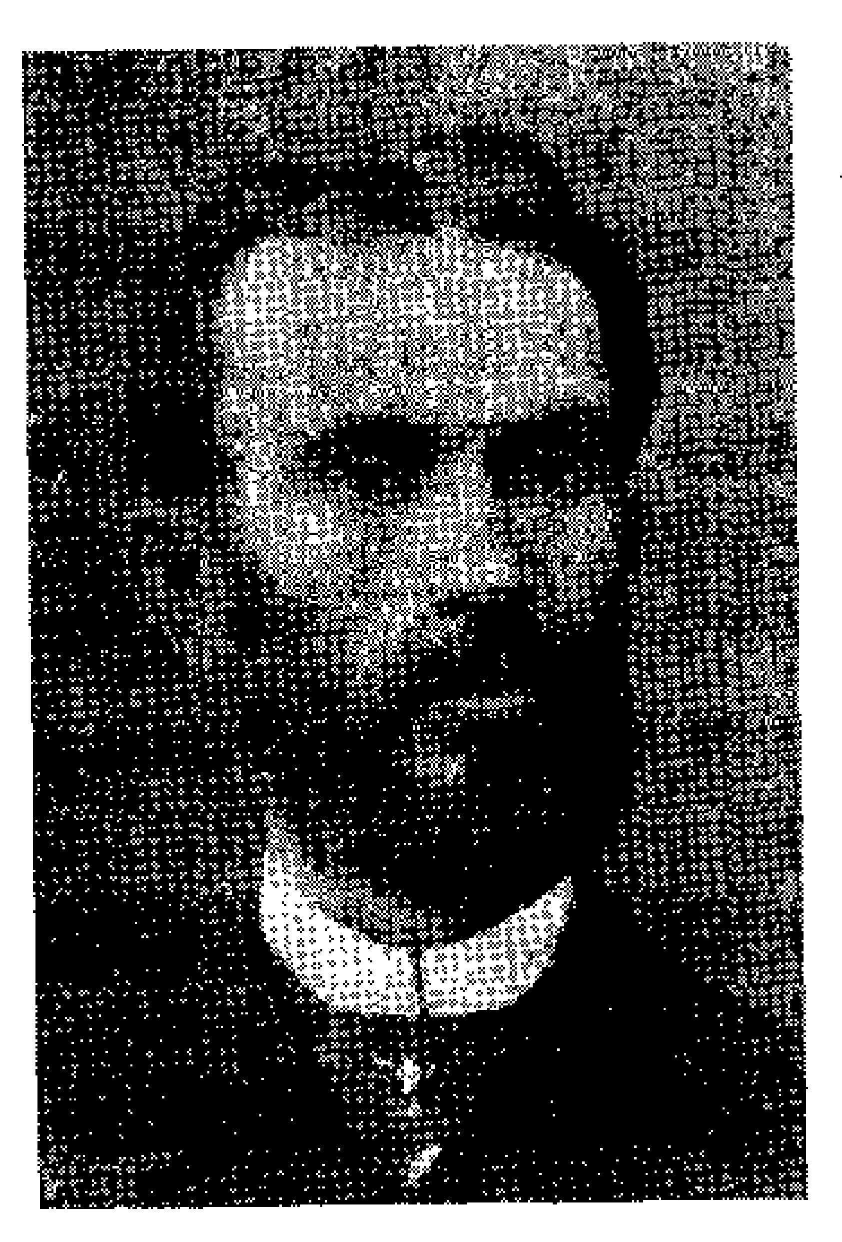
① 他除了以笔名舍姆塞丁·萨米用土耳其语已经出版或继续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政论著作以外，同时他还以先进的土耳其文化的先驱者而著名。由于自己一些用土耳其语写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如六卷本的《卡穆苏-阿拉姆》（《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卡穆苏-提尔基》（《土耳其语辞典》)、标准语源学辞典和其他许多学术著作，他在奥斯曼帝国以外尤其著名。



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年)
——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民族解放
斗争时期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诗人

容虽然主要是教学性的，但是它却有意识地在为复兴派的政治目的服务，因为它用为解放祖国而斗争的精神教育了读者。可是这个杂志的寿命并不长。

1885年，当人们在布加勒斯特（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阿尔巴尼亚人侨民区）借助于伊斯坦布尔协会建立了名叫“德利塔”（“光明”）的爱国文化协会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特别是科索沃地区，爆发了反对政治制度和沉重的赋税负担的武装起义。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掌握了这些自发起义的领导权。在他们的影响下，起义者不仅要求减低赋



萨米·弗拉舍里（1850—1904年）——反对奥斯曼占领者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之一

税，而且要求释放在镇压普里兹伦同盟时被关进监狱或流放的无数同胞。土耳其政府对起义的迅速扩大感到不安，于是便在1885年秋天被迫作出了让步：释放所有被囚禁和拘留的阿尔巴尼亚人，停止在山区实行集中化的改革，并且答应在阿尔巴尼亚学校中使用阿尔巴尼亚语。

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消息说，如果当地居民提出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允许把教授阿尔巴尼亚语列入学校的教学大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几个星期以后，即1885年底，在约万·齐措·科斯图

利、阿尔汗·柴尔奇斯·波雅尼和提米·马尔科的领导下，在科尔察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民族委员会，以便领导争取建立阿尔巴尼亚学校的运动。伊斯坦布尔和布加勒斯特的两个爱国侨民团体的领导人承担了下面的义务：第一，编写阿尔巴尼亚语的教科书，第二，印刷这些教科书（印刷所是用在爱国者中间募集的经费购买的，设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几个月以后，科尔察的市民们向当地政府呈交了一份由数百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在当地学校使用阿尔巴尼亚语言。同时布加勒斯特“德利塔”协会的印刷所出版了由伊斯坦布尔协会的领导者——萨米·弗拉舍里、纳伊姆·弗拉舍里和雅尼·弗烈托编写的第一批阿尔巴尼亚语教科书。但是土耳其政府没有答复阿尔巴尼亚人的要求。直到1886年底它才表示，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基督教徒（不是穆斯林）才有权读阿尔巴尼亚语的书。爱国者想在希腊学校中使用本族语言的努力遭到在基督教居民中间有影响的希腊教会的激烈反对。在这些努力失败以后，伊斯坦布尔协会的领导人终于在1887年初从土耳其政府那里争得了以潘德里·索提利的名义在科尔察城开

办阿尔巴尼亚私立学校的许可。尽管有总主教的威胁和当地的亲希腊分子的诽谤和恫吓，1887年3月7日科尔察仍然开办了第一所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学校，招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学生。

这所阿尔巴尼亚学校的开办是民族运动的胜利。其他地区的爱国者都按照它的榜样开始在自己的城市和村镇里开办阿尔巴尼亚学校。爱国者在进一步发展这个表面上具有教育性质而实际上是政治性的运动的同时，又开始了争取文化权利的斗争。秘密的民族委员会在约万·齐措·科斯图利的领导下极力设法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以科尔察为中心的民族团体来领导这个运动。但是由于土耳其行政当局和希腊教会的干涉和迫害，这个民族团体未能成立，而且阿尔巴尼亚的学校，除了科尔察的学校以外都相继被封闭了。结果，在以后的几年内，民族运动的指导中心始终是国外一些地方的爱国团体；在那些地方，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侨民区是比较有力量的，侨民们可以利用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来发展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运动。罗马尼亚的“德利塔”协会1887年改组后成立新的协会，定名为“底图里亚”（“知识”），

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几百名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1892年，在保加利亚的阿尔巴尼亚侨民成立了爱国主义者的协会“德施腊”（“希望”）；1894年，在埃及的阿尔巴尼亚侨民也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定名为“阿尔巴尼亚人公会”。只有伊斯坦布尔协会（这个协会在十九世纪末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委员会”），在同一个萨米·弗拉舍里的领导下继续在地下工作的条件下进行自己的活动。所有这些阿尔巴尼亚的侨民协会相互间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它们的多少相似的章程充满了民主主义的精神。这些协会极力通过时常返回祖国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唤起人民群众热爱阿尔巴尼亚文化，唤起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解放受奴役的祖国而斗争的意识。这些协会的领导者以著名的思想家——萨米和纳伊姆兄弟——的学说为指导，极力使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运动只依靠国家内部力量，而不允许任何外部的干涉。

尽管条件不好，在这些年中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运动经历了前所未见的高涨。用爱国者的钱出版了著名的复兴派写的许多教科书和文学作品。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纳伊姆·弗拉舍里这位阿尔

巴尼亚爱国主义文化运动的有才能的战士的作品。除了教科书以外，他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新的思想，并且是用比较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来的，例如：浪漫主义的长诗《耕地和畜群》、抒情诗集《夏天的花》、叙



安东·查科·恰尤皮（1866—1930年）——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诗人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

事诗《斯坎德培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在阿尔巴尼亚已经家喻户晓。纳伊姆在自己的优秀作品中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了祖国，歌颂了祖国美丽的大自然、农民和牧人的生活和劳动，他同时也歌颂了祖国光荣的过去，阿尔巴尼亚人反对奥斯曼压迫者的伟大斗争，斯坎德培永垂不朽的勇敢精神，

他一再强调自己相信阿尔巴尼亚很快就会得到解放，相信自己祖国的光辉未来。纳伊姆赞美了祖国的语言和学校，赞美了知识和进步，他总是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互相友爱。他特别关心从阿尔巴尼亚文学语言中清除掉不必要的外国词，并且从人民语言的宝库中吸取词汇和语句来丰富阿尔巴尼亚的文学语言。还在纳伊姆在世时，他就被公认是阿尔巴尼亚复兴的民族诗人。

阿尔巴尼亚人的再次武装发动

阿尔巴尼亚人武装发动没有沉寂多久。所谓“马其顿问题”，即关于在毗邻的马其顿实行自治改革的问题（列强和巴尔干各国为了达到它们的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目的对马其顿进行了干涉）推动了阿尔巴尼亚的人民群众。起初阿尔巴尼亚展开运动反对把阿尔巴尼亚土地划入预定要实行保加利亚马其顿改革的区域中去，因为把这些地区划入马其顿境内就意味着使它们脱离祖国的土地。但是不久以后，在全阿尔巴尼亚就掀起

了一个运动，要求土耳其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实行特别的改革，即实行普里兹伦同盟所规定的把整个阿尔巴尼亚的土地统一为一个自治的维拉耶特的改革。这样，争取阿尔巴尼亚行政自治的运动就再一次提上了日程。

阿尔巴尼亚各个政治集团在自治问题上没有共同的纲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土耳其有联系的一些极端反动的集团极力使运动只反对把阿尔巴尼亚地区划入马其顿境内，而根本不愿意提出在阿尔巴尼亚实行改革的问题。反之，一些认为实行行政改革对自己有利的有影响的封建主，1896 年 10 月在马纳斯蒂尔起草一份备忘录，要求：把五个维拉耶特（斯库台、科索沃、马纳斯蒂尔、亚尼纳和萨洛尼卡）统一为一个维拉耶特；实现不重要的行政改革；在各维拉耶特的学校里除了应该继续作为官方语言的土耳其语以外，还研究阿尔巴尼亚语。阿尔巴尼亚民主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集团，不同意这些肤浅的、充满沙文主义精神的倾向（这些倾向从要求把萨洛尼卡维拉耶特划入上述统一的维拉耶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在 1897 年 2 月在布加勒斯特起草的备

忘录中正式表示了自己的要求。备忘录不是要求把五个维拉耶特，而是要求把四个维拉耶特联合为统一的维拉耶特，不是要求承认土耳其语、而是要求承认阿尔巴尼亚语为官方语言。

土耳其政府对备忘录默不作答以及马其顿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推动了阿尔巴尼亚的起义运动。在国内许多地区，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反对土耳其驻防军的武装行动，这些驻防军在许多场合都被迫处于防御的地位。1897 年，伊斯坦布尔企图镇压武装发动和整个阿尔巴尼亚的运动，没有成功。在争取自治的自发性的运动中，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企图建立一个普里兹伦同盟式的新组织，以便把各阶层的居民联合起来为阿尔巴尼亚的自治进行斗争。为此，1897 年 11 月在佩雅城举行了有将近五百人参加的预备会议。会议在讨论阿尔巴尼亚运动的纲领问题时，立即出现了两个政治派别——即以佩雅的哈治·穆拉·泽卡为首的爱国者一派和以贾科瓦势力强大的封建主里札·别依·克卢埃齐乌为首的封建主一派，后一派主张表面的改革，并且极力反对以武力来对付伊斯坦布尔。由于封建主们的立场不坚定和土耳

其政府的干涉，佩雅会议没有产生所希望的结果。然而1899年1月，当巴尔干的紧张局势由于马其顿问题而更为加剧时，佩雅又召开了阿尔巴尼亚人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从科索沃维拉耶特各地区来的四百五十名代表。

两个主要派别之间进行了几天激烈斗争以后，建立了一个当时称为"柏萨-柏斯"（"誓词"）的同盟。哈治·穆拉·泽卡——普里兹伦同盟著名的领导人之一被选为这个同盟的主席。在纲领问题上爱国者仍然是少数派。

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极力使同盟走上为阿尔巴尼亚自治而斗争的道路。为此，萨米·弗拉舍里当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写出并发表了一篇政治论文：《阿尔巴尼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章在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后提出和研究了民族运动中的一些问题：阿尔巴尼亚人不能通过反对完全屈从土耳其当局的沙文主义邻居的斗争来挽救自己的国家免于瓜分，而只能首先要求土耳其政府让阿尔巴尼亚自治；土耳其政府决不会自愿地让阿尔巴尼亚自治，必须通过暴力用武器夺取自治；国际形势中存在着夺取广泛的自治的有利条

件，因为列强害怕阿尔巴尼亚的起义可能破坏巴尔干的原状，所以会进行干预，而迫使土耳其通过在阿尔巴尼亚实行特殊的改革来安慰阿尔巴尼亚人；在夺取自治之后，对阿尔巴尼亚说来最适宜的制度是民主共和制等等。

但是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未能改变同盟内部的力量对比；封建主的影响仍然很强。国际形势也不利于爱国者，列强不仅没有强迫土耳其实行答应过的改革，而且帮助它镇压解放运动。在反动的封建主的支持下，1900 年春天土耳其政府解散了佩雅同盟。由于这些行动，争取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运动就暂时中断了。在这种环境下，爱国分子的领导人认为武装起义是暂时不必要的措施，因为它会引起列强的干涉，这对阿尔巴尼亚的运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佩雅同盟解散后的几个星期，即在 1900 年 4 月的最后几天，一位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伊斯玛依尔·捷马利从土耳其逃走了；在这以前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在奥斯曼的行政机关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而且整个帝国都知道他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和宪法的拥护者。在国外侨居期间，他在外国报刊

上向国际舆论发表了一篇声明，而在阿尔巴尼亚的报刊上则发表了他对全体同胞的号召书，他在声明和号召书里叙述了自己对民族运动的纲领的看法。大多数阿尔巴尼亚的爱国组织都接受了他的这些看法。

伊斯玛依尔·捷马利非常熟悉国际形势，他深信，坚持维护原状的政策的列强不会同意瓜分土耳其帝国，即使是暂时的瓜分，而会进行不利于阿尔巴尼亚的运动的干涉活动。其次，如果发生起义，巴尔干各国就会借口反对奥斯曼帝国而夺取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另一方面，他又深信，列强准备在最近的将来破坏原状和瓜分土耳其，特别是对阿尔巴尼亚抱有抢劫目的的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前者想把阿尔巴尼亚据为己有；后者则想把它分给自己在巴尔干的盟友——塞尔维亚和黑山。所以，对于没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家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强大的同盟者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保持巴尔干的原状是有利的，除非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可以战胜外国的一切威胁。必须保持原状，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阿尔巴尼亚人

要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内的领土自治，这种自治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本身包括有自决的权利，使阿尔巴尼亚能够改善自己可悲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和文化状况，而且在邻国侵犯它的时候能够进行自卫。其次，伊斯玛依尔·捷马利认为，如果不同时解放受土耳其帝国压迫的其他民族，如果不使土耳其人民本身从土耳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阿尔巴尼亚人就不能摆脱这种枷锁而获得解放。按照他的意见，这些积极的力量可以联合起来，而且不需要列强提供危险的帮助，也不会引起它们对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制度（这个制度的根据是帝国分权制的原则，这种原则便于按民族特征实行地方自治）的斗争的干涉。

从十九世纪末起，阿尔巴尼亚问题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复杂的外交问题之一。奥斯曼政权依然坚决不同意阿尔巴尼亚人享有最起码的民族权利，甚至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1902年，当土耳其当局封闭科尔察学校（唯一的阿尔巴尼亚学校），逮捕了许多爱国者（其中有一些是阿尔巴尼亚的教员），而不经审问就在佩雅的街上处死了哈

治·穆拉·泽卡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这种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毗邻的巴尔干国家的政府继续狂热地实现自己的沙文主义计划，以便在阿尔巴尼亚摆脱土耳其的枷锁后立即就瓜分它。在帝国主义加速发展的年代里，列强把阿尔巴尼亚看成是可以为了其他地方的利益而牺牲的走卒。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这两个对巴尔干抱有野心的强国，在1897年的协议中约定：巴尔干东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西部则是奥地利的势力范围。同时，俄国和它的盟国法国原则上约定：不让奥地利的势力伸向萨洛尼卡；一旦现状被打破，则把希孔比河以北，至少是直到都拉斯的所有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都并入塞尔维亚；这样都拉斯就成了塞尔维亚的港口，而把当时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城市斯库台划为黑山国的首都。对巴尔干抱有野心的第三个强国是意大利，意大利在它的扩张主义的殖民政策在阿杜瓦失败以后，就同自己的同盟者奥匈帝国进行竞争来保障和巩固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尽管土耳其政府采取顽固的立场，巴尔干各

邻国进行破坏活动，列强广泛利用领事裁判权不断进行干涉，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还是一直不断地在发展，获得了新的革命方式，并且有了公开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1903年8月马其顿爆发了伊林登起义以后，俄国和奥地利在1903年10月在缪雷施特加签订的一个协议中（后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议，协议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企图扑灭起义的火焰，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干涉腐败的土耳其的内部事务），向伊斯坦布尔提出了一个在它们的监督下在马其顿实行的改革草案，并且还要求在马其顿实行新的行政区划，按照这种区划，每一个行政单位（公社）的居民都属于一个民族。这些干涉激怒了巴尔干的沙文主义者。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民族主义者的部队对当地居民采取了恐怖手段，迫使这些居民放弃他们所属的民族和接受他们的沙文主义观点。阿尔巴尼亚居民也深受这种恐怖手段之苦。1905年2月，希腊沙文主义者的部队杀死了爱国主义作家巴巴·克利斯托·涅哥万尼以及他的一些同乡。

阿尔巴尼亚人又开始活动起来了。但是现在，

爱国者的影响扩大了，反动的大封建主的影响则下降了。这些年来侨居国外的阿尔巴尼亚人建立了许多新的爱国主义团体，出版了许多定期的阿尔巴尼亚语机关刊物。尽管在苏丹阿勃杜尔·哈米德的警察制度下进行政治活动的条件很困难，阿尔巴尼亚还是产生了一代具有爱国意识和革命情感的新人。这些爱国者在考虑了过去运动的痛苦经验以后，给自己提出了不要封建反动势力参加、通过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来统一国家的任务。为了这个目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一批年轻的爱国者，1905 年 11 月在马纳斯蒂尔建立了一个名叫“阿尔巴尼亚解放委员会”的地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按照巴尔干其他革命委员会的范例组织起来的。在很短的时期内，马纳斯蒂尔委员会就在阿尔巴尼亚大多数城市里建立了秘密的委员会。

马纳斯蒂尔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同阿尔巴尼亚侨民的一些先进的爱国团体如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的爱国团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开展了广泛的地下鼓动工作，宣传以革命斗争来解放祖国的思想。为了着手进行公开的爱国

主义活动，马纳斯蒂尔委员会的首脑拜奥·托普利1906年1月亲自到了山地，并且在科尔察城地区建立了委员会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几个月以后，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又建立了几支这样的部队。这些队伍在进行自己的宣传活动时曾几次同土耳其军队交过战。为了制止希腊沙文主义者们的恐怖活动，阿尔巴尼亚部队于1906年9月杀死了科尔察城的希腊总主教福提。这个人是阿尔巴尼亚的希腊沙文主义者的头目之一，也是杀害涅哥万尼的罪魁之一。

尽管奥斯曼的宪兵采取了种种迫害措施，但是爱国者部队的战士们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下，在1907年更加努力地进行了革命活动。为了回答土耳其当局实行的大规模逮捕行动，1908年3月初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部队在大尉柴尔奇斯·托波利和作家米哈尔·格拉梅诺的领导下在纪诺卡斯特城杀死了城防警备司令。若干天以后，即1908年3月18日，土耳其军队在靠近纪诺卡斯特的马施库洛列包围了柴尔奇斯和米哈尔的部队。爱国部队进行了英勇的自卫，在和人数众多的敌人进行了几小时激战以后，他们突破了包围。



柴尔奇斯·托波利(1880—1915 年)(左)——爱国者部队的指挥官，在 1906—1908 年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中卓著功勋

这次战斗乃是一次号召，号召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普遍的争取解放的起义。

阿尔巴尼亚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同“团结和

进步”(Ittihad ve Terakii)委员会所领导的青年土耳其派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联系的。青年土耳其派要求推翻苏丹阿勃杜尔·哈米德二世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号召，以及他们关于给各个被压迫民族以民主自由和承认他们有地方自治权的诺言，早就吸引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注意。虽然早在十九世纪末，萨米·弗拉舍里曾经警告过，而后来在二十世纪初，伊斯玛依尔·捷马利也警告过：青年土耳其派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宪法以奥斯曼的独裁统治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而他们关于自由和自治的诺言不过是欺骗，“团结和进步”委员会由于自己的组织活动还是获得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的同情，特别是那些痛恨封建专制制度的军官的同情。致力于反对共同敌人——苏丹专制压迫——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和青年土耳其派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走上了同一条道路。1908年7月，这两个运动都获得了很大规模的发展。然而更加灵活的和更有组织的青年土耳其派利用了阿尔巴尼亚人对他们的宪法纲领的同情，得以把集合在费利卓维奇的两万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并

且以他们的名义向苏丹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宣布宪法。大家知道，由阿尔巴尼亚军官尼阿齐·列马领导的在马纳斯蒂尔维拉耶特开始的起义有变成总起义的危险，迫使苏丹阿勃杜尔·哈米德二世于 1908 年 7 月 23 日宣布了宪法 (Hüriet)。于是，在阿尔巴尼亚人积极参加下，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

1910 年和 1911 年的大起义

阿尔巴尼亚人欢迎宪法的颁布，认为这是一个标志着苏丹的长期专制统治的终结和自由、平等、文明的时代的开始的历史性胜利。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举行了声援革命的自发的示威。爱国部队的战士们从山里出来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城市建立起了爱国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的倡导下，第一次开始自由地出版阿尔巴尼亚语的报纸和开办研究阿尔巴尼亚语的讲习班。全国都对革命抱欢迎态度，希望青年土耳其派履行自己的诺言，首先是把阿尔巴尼亚语

列入学校的教学大纲并且给予统一的阿尔巴尼亚以区域自治。

但是，青年土耳其派，作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以后立即采取种种措施，先是阻挠阿尔巴尼亚的自治运动，后来则对之进行镇压，认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土耳其的臣民，因而必须遵守土耳其帝国的法律。

这样，没有几个星期，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和青年土耳其派的中央政权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的预言十分明显地实现了。他在流放八年之后返回发罗那这一件事，变成了一个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行动。他在群众大会上对发罗那居民发表了讲话，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他强调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争得自己的权利，必须进行更加积极的斗争。

大多数爱国俱乐部立刻起来反对青年土耳其派的中央政权。哈利德·别尔塞什塔所领导的俱乐部“马纳斯蒂尔联盟”（它代替了“争取阿尔巴尼亚自由秘密联盟”）成了这些俱乐部的领导中心。另外一小部分俱乐部则掌握在那些完全处于“团结和进步”委员会的蛊惑性纲领影响下的活动家

手中，他们由于害怕反政府运动的壮大可能导致反动势力的抬头和宪法的废除而满足于有限的自由，并且同青年土耳其派的中央政权实行了妥协。

爱国俱乐部宣布它们将只从事文化活动而不从事政治活动。但它们利用有限的自由紧急地召开了代表大会来确定阿尔巴尼亚语的字母，因为阿尔巴尼亚语当时是用各种字母来书写的。代表大会于 1908 年 11 月 14—21 日在马纳斯蒂尔城召开，有来自阿尔巴尼亚各俱乐部和活动于阿尔巴尼亚国内外的各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确定了阿尔巴尼亚人目前所使用的字母。

马纳斯蒂尔的集会使得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有可能在秘密会议上讨论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所面临的任务。通过这次集会，拟定了要求给予阿尔巴尼亚以行政自治和文化自治的纲领。按照过去的想法而要求给予阿尔巴尼亚以完全独立，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在阿尔巴尼亚和整个奥斯曼帝国都在继续进行着土耳其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许多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提出了自己的议员候选人。青年土耳其派的行政当局利用恐怖、

收买、欺骗和蛊惑宣传力图使自己的候选人在阿尔巴尼亚当选为议员。尽管青年土耳其派在整个帝国获得了多数的议员席位，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二十六名当选议员中却只占少数。在阿尔巴尼亚人议员（青年土耳其派的反对派）中，只有包括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哈桑·普里什提纳、沙欣·科洛尼亚、涅治普·德拉加等人的那一部分，以单独的阿尔巴尼亚民族集团的身分出现于议会。在奥斯曼议会中，许多阿尔巴尼亚议员对青年土耳其派的政策进行了公开的、多方面的斗争。贝拉特的代表伊斯玛依尔·捷马利为了想建立青年土耳其派的反对派的统一战线而创立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充满矛盾的纲领的“阿赫拉尔”党。在纲领中，除了其他要求以外，还提出了行政管理分权化和按民族原则给予帝国各省以自治的要求。由于纲领的这一条，各个不同民族——土耳其人、阿尔明尼亚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等等——的议员参加了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的党。

但是反对派、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议员的声音没有受到重视。青年土耳其派在取得了议会中

的多数以后，就采取种种措施（特别是在阿尔巴尼亚）来巩固中央集权，压制争取民族权利的要求。同时，青年土耳其派对国内的普遍贫困漠不关心，增加赋税，破坏长期来建立的秩序，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甚至征召山区青年入伍服役。这些措施使得这些地区在 1909 年春天重新爆发了武装起义。

这时，阿尔巴尼亚爱国派的领导者曾反对武装起义，因为青年土耳其派还很强大，而阿尔巴尼亚人还未组织起来；其次，因为武装起义可能引起奥匈的干涉（奥匈在几个月前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而并没有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他们也没有同帝国的那些在 1909 年 4 月把青年土耳其派赶下台去并恢复了旧政权的一小撮反动头目实行联合。相反地，他们由于关心维护宪法而帮助了两星期后重新上台的青年土耳其派。

青年土耳其派在四月事变以后仍然继续推行否认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权利的政策。土耳其军队在解除反革命势力武装的口实下，在札维特-巴夏将军的指挥下对阿尔巴尼亚山民发动了许多次

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引起了新的起义，但起义都在残酷战斗后被镇压下去了。与军事行动同时，青年土耳其派于1909年7月在迪布拉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青年土耳其派的代表们要求阿尔巴尼亚人自称为奥斯曼人，以便采用阿拉伯字母，同时宣誓要对帝国和哈利发政府的敌人进行斗争。参加大会工作的少数爱国者公开抗议这种挑衅。但是迪布拉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实现。两个月后，即1909年9月，根据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号召在爱尔巴桑召开了讨论教育和文化问题（这是奥斯曼行政当局所唯一允许讨论的问题）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了马纳斯蒂尔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统一字母。这意味着阿尔巴尼亚人在字母方面也同土耳其奥斯曼人一刀两断了。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要用爱国俱乐部的资金在爱尔巴桑开办中等师范学校。1909年12月1日，第一所阿尔巴尼亚中学开办起来，校长是路易·古拉库奇。

1910年春，青年土耳其派的政府对科索沃维拉耶特的居民课以新的赋税，使得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满情绪更形增长。武装起义首先在普里什提



参加1910年反土解放起义的科索沃山民和他们的领袖伊德里兹·塞菲里（居中者）

纳爆发，随后波及佩雅和整个维拉耶特。镇压起义的最初尝试失败以后，伊斯坦布尔命令普鲁士学派的将军谢夫凯特·屠尔古特-巴夏率领鲁米利亚的特别军团采取广泛的军事行动来镇压武装起义，解除居民的武装并强制征兵。1910年4月末在卡恰尼克山口，伊德里兹·塞菲里所领导的几千阿尔巴尼亚起义者与土耳其师团进行浴血战斗，结果人少势寡、装备恶劣的武装阿尔巴尼亚人被迫退却。但是起义却日益蓬勃发展，以致土耳其陆军大臣穆罕默德·谢夫凯特-巴夏元帅不得不亲自指挥新的兵力前来增援谢夫凯特·屠尔古特-巴夏。只是经过了三个月的残酷战斗之后，没有总的领导人并且缺乏武器和弹药的阿尔巴尼

亚起义者才遭到了失败。

1910 年 7 月，鲁米利亚军团转到斯库台维拉耶特去，想在那里解除居民的武装并征兵。一部分山民准备好进行抵抗，另一部分山民越过国境进入黑山境内。这给欧洲舆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土耳其当局预见到在斯库台维拉耶特山区会重新发生在科索沃所发生过的事件，所以暂时停止了在这些不屈服的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且开往中部阿尔巴尼亚，主要是非武装的城市。土耳其军团所过之处都宣布了戒严并建立了军事法庭。民族俱乐部、私立学校和阿尔巴尼亚报纸都被封闭了。几百个爱国者被逮捕，并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被公开殴打侮辱。军事法庭判处他们以长期的剥夺自由和流放。在实行了这种大规模的恐怖之后，特别军团就离开了阿尔巴尼亚。

爱国者们看到青年土耳其派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地力图把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运动镇压下去，于是决定不失时机地立即由防御转入进攻，用武装斗争来达到民族运动的最主要目的——阿尔巴尼亚的自治。1911 年春天被确定为发动武装解放运动的时间。

1910年冬天进行了准备工作——用爱国俱乐部所筹集的资金购买武器和弹药，并确定国内外联系的据点。策丁耶的国王尼古拉由于希望武装起义尽速爆发而出人意料地迫使逃亡黑山的不幸的阿尔巴尼亚山民回国。山民回到了阿尔巴尼亚，但没有向土耳其当局投降，而是在戴德·卓·卢利的号召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卢利于1911年4月6日在德契奇山峰上树起了阿尔巴尼亚的旗帜。几天后起义席卷了整个大山区，起义者的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起义的提前爆发打破了筹备起义的各委员会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国者的领导人们极力采取措施来加速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的起义。但是在这些措施（购置武器，预防塞尔维亚、特别是希腊的干涉）还没有实行的时候，土耳其的特别军团就在谢夫凯特·屠尔古特的指挥下于4月中旬来到了斯库台并立刻对山民发动了军事行动。土耳其军队和阿尔巴尼亚山民在整个大山区进行了长期的流血战斗。山民的英雄气概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爱国热潮，并引起了欧洲舆论的重视。在全国各个地区建立了许多部队，开始了武装行动；义勇军从阿尔巴尼亚人的

侨居地涌向大山区。

青年土耳其派的统治者在军事行动遭到失败之后并在列强、特别是奥匈和俄国的压力下（它们希望保持巴尔干的现状），力图通过和平途径结束阿尔巴尼亚人的武装起义。为此穆罕默德·列沙德五世于1911年6月亲自来到科索沃，想安抚科索沃的居民，要他们不去参加武装起义。6月16日他对前一年被宣布有罪的全体起义者实行了大赦。6月17日，谢夫凯特·屠尔古特-巴夏在斯库台宣布对所有于十天内投降的起义者实行大赦，并答应用国库的资金修复所有被战火破坏的房屋。

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用一份备忘录回答了土耳其政府。这份备忘录是1911年6月23日在路易·古拉库奇和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倡议下在格尔采（黑山）召开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会议上批准的。在提交给土耳其和列强的备忘录中，作为停止起义的条件，要求在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实行地区行政管理自治。在备忘录中还说，如果土耳其同意履行这些要求，那末这些要求应该在列强的保证下付诸实现。

奥斯曼政府表示准备仅仅在斯库台维拉耶特实行备忘录中的一部分要求。为了回答土耳其帝国政府的这种手法，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起义部队于 1911 年 7 月 21 日在采波（纪诺卡斯特）的修道院里召开了武装的群众大会，会上决定坚决要求把伊斯坦布尔对阿尔巴尼亚北部所做的让步推广适用到阿尔巴尼亚南部。

尽管如此，起义的山民由于长期的战争而在经济上陷于困难，同时又受到黑山的压力（黑山当局把他们的家属从黑山赶了出来），因而接受了伊斯坦布尔的建议，在下述条件下返回家乡：土耳其政府宣布全面大赦，降低捐税，任用阿尔巴尼亚人为地方行政官吏，准许携带武器，等等。协定于 1911 年 8 月初在波德哥里察签字。土耳其政府对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也做了大体类似的让步。

1912 年的总起义和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独立

土耳其政府的让步虽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

伊斯坦布尔被迫同阿尔巴尼亚人谈判并且做出有损帝国和中央政权威信的让步一事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土耳其长期以来的顽固态度开始露出破绽。有远见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前途抱着乐观主义的看法。其中之一的希尔·摩西（他曾携带武器参加了起义）在波德哥里察协定签订之后几个星期写道：

“如果说在这一年我们的收获不多，

那末任何人都不要以为阿尔巴尼亚已经灭亡了；

春天还要到来，我们还要到山里去。”

解放斗争的中心策略问题，是把主动权保持在由统一的中心指挥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手里。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最杰出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1911年秋天，巴尔干的政治形势变得极其复杂。9月末意大利为了夺取土耳其的特里波利而向土耳其宣战。战争明显地暴露出土耳其军队的虚弱。巴尔干各王国都准备在土耳其帝国一旦战败时靠牺牲阿尔巴尼亚来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

1911年12月，阿尔巴尼亚议员团在伊斯玛

依尔·捷马利领导下在土耳其议会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力求迫使伊斯坦布尔给予阿尔巴尼亚人以民族权利，首先是在文化和行政管理方面。这些要求的目的就在于随着自治的获得而同时把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疆界确定下来。向土耳其政府提交了有关这一要求的备忘录。1912 年 1 月 11 日，在议会会议讨论有关改变奥斯曼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政府草案时，阿尔巴尼亚议员哈桑·普里什提纳警告说，青年土耳其派将以自己的反动政策在阿尔巴尼亚引起新的革命。

青年土耳其派在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以后，于 1912 年 1 月 18 日解散了议会，以便在定于同年 4 月举行的新选举中保证自己获得多数席位，从议会中赶走自己的政敌，公开建立自己的奥斯曼专政。以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和哈桑·普里什提纳为首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极其认真地估计了历史时机，决定组织并于翌年春天发动全面的解放起义。

竞选运动使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有机会在为爱国派候选人进行宣传的同时为武装起义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青年土耳其派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



伊斯玛依尔·捷马利（1844—1919年）——宣布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的发罗那国民大会主席和独立阿尔巴尼亚的第一届政府的首脑

的警察暴行和所表现出来的反阿尔巴尼亚的狂热，以及宪兵在选举日对那些投票支持爱国派候选人、特别是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和哈桑·普里什提纳（他们二人在阿尔巴尼亚都享有极大的声望）的人所进行的更加直接的干涉，都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材料。伪造选举结果一事加速了武装起义的爆发。1912年4月末，起义席卷了贾科瓦地区。5月，起义波及到整个科索沃，而在6月波及到南部、中部和北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的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土耳其部队中开小差。

6月，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起义更加扩展，因为青年土耳其派的其他反对者——“伊提拉夫”党的党员和军队中的反对派军官也都起来反对中央政权。青年土耳其派的这些反对者都想利用阿尔巴尼亚的运动把青年土耳其派赶下台去。一心扩大起义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同新的友方进行了合作。7月，起义具有了全面的性质，阿尔巴尼亚人转入了进攻，解放了几个地区。伊萨·布列提尼在乌契特恩，巴伊拉姆·楚里在普鲁施山口，都对土耳其军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土耳其军队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起义者开始解放城

市。科尔察的塞米斯托克利·格尔美尼，科洛尼亚的萨里·布特卡，发罗那的爱尔玛斯·札费利，爱尔巴桑的阿奇夫·比恰克丘，地拉那的阿布迪·托普塔尼和斯库台的戴德·卓·卢利等人的部队都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热爱。到7月中旬，整个阿尔巴尼亚都奋起拿起了武器。土耳其国家行政机关完全停止了活动。

在起义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阿尔巴尼亚军队向普里什提纳发动进攻的1912年7月17日，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派政府辞职了。1912年7月22日，当阿尔巴尼亚起义者胜利进入普里什提纳的时候，青年土耳其派的反对者，其中包括“伊提拉夫”党人，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以阿赫梅特·穆夫塔尔-巴夏为首的新政府。

新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结束阿尔巴尼亚的起义。因此它要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停止战斗并且立即同土耳其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代表团在几天以后就到普里什提纳来了。它所以要求仅仅同科索沃的起义领导人进行谈判是有着两个目的的：一方面，它想通过同科索沃维拉耶特进行单独谈判来分化阿尔巴尼亚人

的力量；另一方面，它想利用科索沃的“伊提拉夫”党人参加反青年土耳其派的起义，来减轻科索沃爱国者领袖的要求的急进性质。

北部和南部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在新的形势下决定采取统一的立场：要求土耳其同意 1911 年 6 月在格尔察所拟定的备忘录中的一项条款，即给予阿尔巴尼亚以行政自治。这实际上也是哈桑·普里什提纳在 1912 年 8 月 3 日阿土谈判刚一开始时向土耳其政府代表团提出的那些要求的内容。但是反动派的首脑人物不同意这些要求，认为青年土耳其派的政权被推翻以后，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提出了解散土耳其议会和举行新的选举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加深分裂，伊斯坦布尔政府于 1912 年 8 月 5 日宣布解散土耳其议会。反动派的首脑们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认为起义已经完成了。

但是在这些对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说来是生死关头的日子里，大多数科索沃起义者都支持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领导人——哈桑·普里什提纳，巴伊拉姆·楚里，巴伊拉姆·德克拉尼等人。这些领导人中断了在普里什提纳进行的谈判并且重

新恢复了军事行动，向斯科普里亚城发动了进攻。斯科普里亚这个鲁米利亚的最大城市之一，于1912年8月12日落到起义者手中。过了几天，其他地区的起义者解放了佩希克皮亚、费里、佩尔梅特等地。

斯科普里亚的陷落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是1912年阿尔巴尼亚起义的顶峰，它表明了土耳其无力镇压这次解放运动。具有了广泛规模的解放运动迫使土耳其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的自治。阿尔巴尼亚的成功使巴尔干各国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政府不安起来。承认阿尔巴尼亚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阴谋瓜分阿尔巴尼亚的希望的破产。因此，巴尔干各国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加速准备对已经由于同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解放运动发生了将近一年的冲突而削弱了的土耳其宣布战争。列强则由于看到巴尔干战争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而宣称它们将不承认巴尔干政治地图的任何改变（因为它们那时自知对世界大战还未做好准备）。这就是说，它们不仅不承认巴尔干各国瓜分土耳其，而且也不承认阿尔巴尼亚退出奥斯曼帝国，即

使是在自治的名义下。当1912年8月18日伊斯坦布尔通知它在加以某些修改的条件下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要求以避免问题复杂化时，起义的领导人鉴于来自邻国的危险而同意签定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阿尔巴尼亚人取得了许多经济的、政治的、行政的和文化的权利，虽然阿尔巴尼亚没有正式得到自治。

尽管有列强的反对，巴尔干各国还是在1912年10月向土耳其宣战，为的是瓜分土耳其仍在巴尔干各国保有的领土，而阿尔巴尼亚在其中是占着主要地位的。根据巴尔干联盟各国所达成的协议，在从巴尔干赶走土耳其人之后，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将由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瓜分。在它们的计划中没有规定要建立阿尔巴尼亚国家。

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爆发和土耳其军队的迅速战败给阿尔巴尼亚人造成了极端危急的形势：因为过去虽然被奴役，但领土一直保持完整的阿尔巴尼亚，不但将仍然被奴役，而且领土将被无可挽回地瓜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很快就清楚地看到，阿尔巴尼亚人参加巴尔干各国反对土耳其帝国，正象与土耳其联合反对巴尔干各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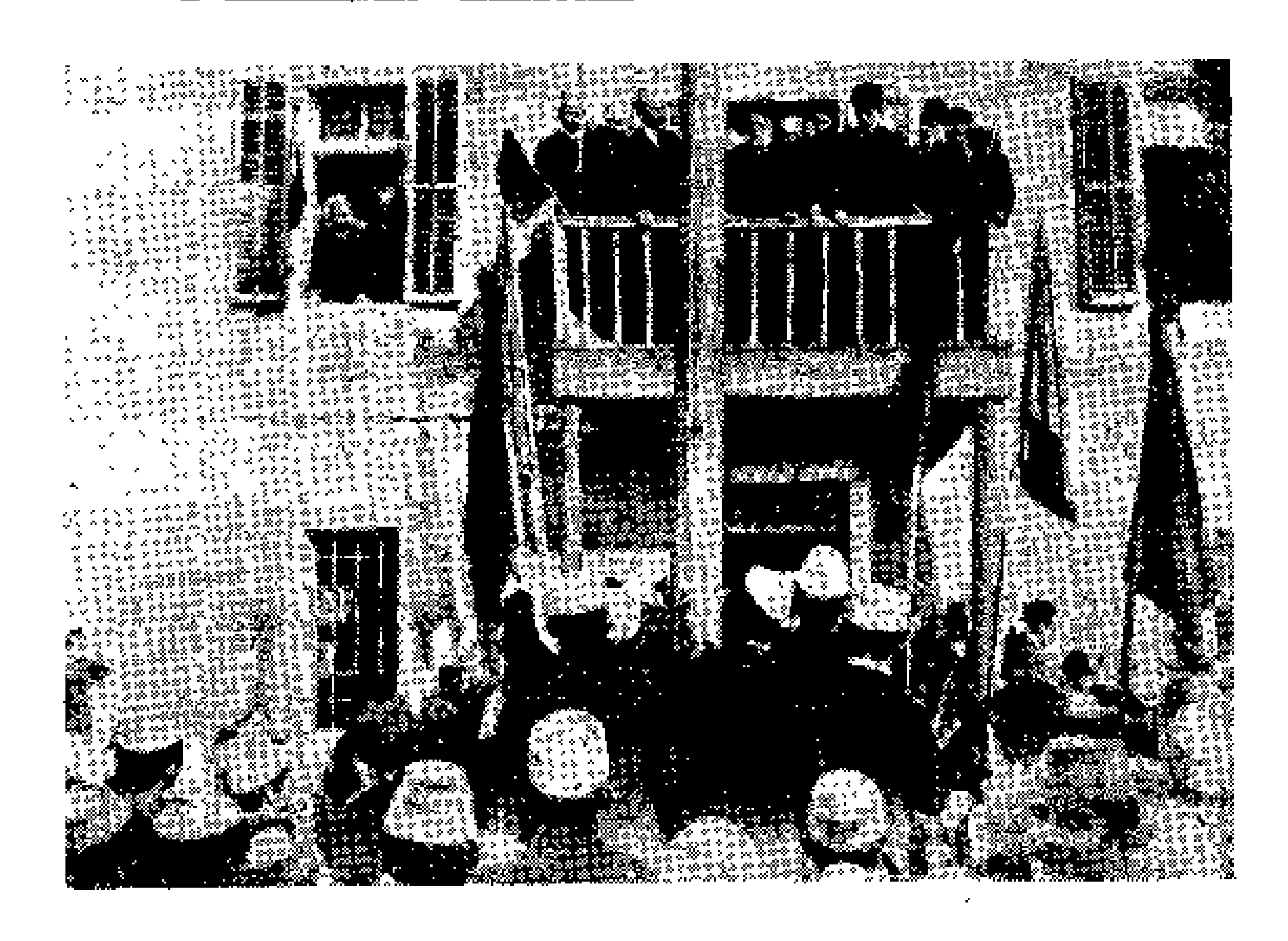
样，是自杀的行为。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帮助巴尔干各国，而自己并无把握相信巴尔干各国会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要同外国侵略者同流合污，结果会使自己的命运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连结起来。无论是居住国内或居住国外的英明的爱国者们，都决定宣布巴尔干战争为敌视阿尔巴尼亚的战争，并决定召开有阿尔巴尼亚各地区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以便确定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种新的复杂形势下所应采取的有利于祖国的立场。

10月末，当巴尔干各国的军队追击战败的土耳其军队而进入阿尔巴尼亚领土时，老爱国者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由伊斯坦布尔去中立的罗马尼亚，并且于1912年11月5日在布加勒斯特得到一个最老和最大的爱国团体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同意之后，在路易·古拉库奇和潘德里·察利等活动家陪同下出发去维也纳，以便在奥地利的首都了解列强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态度。

在会见奥匈帝国外务大臣和一些大国的大使以后，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的外交家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知道：在巴尔干战争爆发几个月以后国际

政治形势已经改变；巴尔干的旧的政治地图已经不能保持；列强在制定巴尔干半岛的新政治地图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使得阿尔巴尼亚人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长期以来的梦想——不是获得自治，而是获得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当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的军队正在被打垮的土耳其军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国土上推进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各城市都在沦入巴尔干军队手中以前宣布了民族独立并且立即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代表们马上出发去参加国民大会。为了便于与外界联系，国民大会预定在某个沿海城市——都拉斯或发罗那召开。但是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准备同他的朋友们一同前往的都拉斯还处于土耳其行政当局手中，后者甚至企图逮捕杰出的领导人。于是决定已为阿尔巴尼亚爱国者解放的发罗那为举行国民大会的地点。大部分代表都在巴尔干军队跟踪尾随之下于1912年11月26日和27日来到发罗那。翌日，即1912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在非常的条件下由伊斯玛依尔·捷马利主持开幕。当塞尔维亚军队进入地拉那并准备进入都拉斯和爱尔巴桑的时候，当黑山军队



1912年11月28日在发罗那宣布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的时候。在露台上的是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和国民大会代表们

压缩对斯库台城的包围圈，而希腊军队从希玛拉向发罗那推进的时候，国民大会在听取了英明领导人的庄严的演说之后，一致宣布阿尔巴尼亚为自由的、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同时，国民大会授权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建立第一个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做出这个历史性的决定之后，高尚的老人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在举行会议的房屋的露台上，在集合在那里的欢腾的发罗那市民面前亲手升起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旗帜——乔治·卡斯

特里奥特-斯坎德培的旗帜。

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初年

宣布民族独立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它结束了给阿尔巴尼亚造成了无数灾难的五个世纪来的外国统治；使国家陷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奥斯曼封建奴役制告终了。祖国重新得到了失去的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基础奠定了。阿尔巴尼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民族政府。在国家面前开辟了进步和文明的道路。

但是，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在自由飘扬的斯坎德培的旗帜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并没有保持多久。欢腾鼓舞的气象马上为平淡无味所代替。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特别是民族政府所面临的许多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只有在新的国家存在下去的条件下才能解决。首先是下面这样一些政治问题：一直未为所有大国所承认的阿尔巴尼亚独立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的问题；确定阿尔巴尼亚国家疆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同那些在国际舞台

上受到有力支持的巴尔干各邻国的顽强领土野心有联系的；制止巴尔干各国军队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活动并把他们撤到阿尔巴尼亚境外的问题，因为他们妨碍新政府把自己的国家权力推广到全国。其次是国家结构问题：建立阿尔巴尼亚行政机构，建立国民军，保证财政经费——总之，保证这样一种国家生活，使它可以证明发罗那大会决议是不打折扣的，并且有助于提高刚刚诞生的新国家的威信。再就是为国家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阿尔巴尼亚几乎完全是个农业国：农民用原始的犁耕地；生产率极低；阿尔巴尼亚沿海的肥沃土地尽是沼泽；在缺乏耕地的山区，山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贫困中；将近一半的耕地为符里奥尼家族、托普塔尼家族、维尔拉威家族、发罗那家族这样一些地主家族所有，这些家族各拥有一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城市中没有发达的工业；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是小手工业者，在他们的作坊中还大都采用手工劳动；在城市中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从事农业原料加工的小型私人企业，但它们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道路极其恶劣；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马和牛；文化状况

更加悲惨：有 90% 的居民是全文盲；从奥斯曼侵略者手中继承下来的几乎所有学校都是外国人的；卫生保健事业也非常可怜，只有很少的医疗卫生机关。

新阿尔巴尼亚政府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国际国内政治条件下来解决这些重大而复杂的任务。

1912 年 11 月 28 日，在宣布独立后几个小时，政府首脑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就把发罗那大会的历史性决议通电告知六大国当局以及巴尔干各国的外交部，并且要求它们承认阿尔巴尼亚不介入巴尔干冲突的中立立场。但是列强在几个星期中间没有答复这些要求。巴尔干联盟的军队继续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推进。塞尔维亚军队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继续向阿尔巴尼亚南部推进，占领了希孔比河迤北的土地，贝尔格莱德想把这些土地并入塞尔维亚。希腊军队在包围了亚尼纳以后在阿尔巴尼亚土地上发动攻势，甚至威胁着发罗那，想以此与塞尔维亚军队在希孔比河岸会师（按照该两国的协议，希孔比河应成为希腊和塞尔维亚的边界）。黑山也压缩了对斯库台城的包围。在 1912 年 12 月 4 日奥斯曼帝国同巴

尔干各国缔结了停战协定以后形势也并没有改善。此外，被打垮后集中于贝拉特和费里的土耳其军队还在等待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可能在任何时候向发罗那进军，以便解散国民大会和敢于宣布阿尔巴尼亚退出奥斯曼帝国的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

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英雄气概是他们在这危急的日子里的唯一武器。眼光远大的政府领导人也估计到列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方面存在着矛盾。

按照预谋，六大国着手制定巴尔干的新地图。为此目的，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莱爵士主持下于1912年6月17日在伦敦召开了大使会议。因为阿尔巴尼亚问题是在制定巴尔干新地图方面的最重要问题，所以大使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通过通常外交途径而举行的预备谈判中所达成的协议，大使会议决定不宣布阿尔巴尼亚为独立国家，而与发罗那大会的决议相反，宣布阿尔巴尼亚为在六大国保证和监督下的、处于苏丹主权之下的自治国家。大使会议在原则上决定，阿尔巴尼亚

应与黑山、塞尔维亚和希腊划定疆界，而疆界的划定应随后由大国代表间的谈判来解决。

使阿尔巴尼亚处于苏丹的主权和列强的监督之下的决定，显然违反了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愿望，因为他们希望象在发罗那大会上所决定的那样看到自己的祖国是个独立国家。在确定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政治疆界时，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权利受到了更加明目张胆的损害。

在确定阿尔巴尼亚疆界时，列强完全没有考虑民族的原则和人民的愿望。它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俄国、奥匈和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疆界表现了特别的兴趣。俄国支持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的要求；这些国家在它们不能阻止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建立之后要求建立一个尽可能小的阿尔巴尼亚。相反地，奥匈则不希望塞尔维亚扩大，因为塞尔维亚是俄国的附庸，并曾阻碍它侵入巴尔干。因此奥匈支持阿尔巴尼亚人的要求。意大利则站在奥匈一边，特别是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疆界问题上，因为它希望尽可能使希腊离开发罗那和科孚海峡远些。

经过长期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列强于

1913年确定了阿尔巴尼亚的疆界。这个疆界仅仅包括阿尔巴尼亚领土的一半，人口约有八十万人。一半以上的阿尔巴尼亚居民留在阿尔巴尼亚的疆界之外，主要处于塞尔维亚的桎梏下，一小部分处于希腊和黑山的桎梏下。居民长期来为祖国的自由而斗争的、富庶的科索沃，没有划入阿尔巴尼亚的版图；阿尔巴尼亚的一些重要的城市，如普里兹伦、贾科瓦、佩雅、普里什提纳、迪布拉、果斯提伐尔等也被划在阿尔巴尼亚的疆界之外。

黑山军队违反1912年12月初所签定的停战协定，仍然进攻被包围的斯库台，以为攻陷它就可以把它并入黑山。土耳其将军哈桑·里札-巴夏指挥下的驻防军没有投降，而是连续抵抗了几个月，这种抵抗也受到发罗那政府的支持。在保卫斯库台的过程中，由阿尔巴尼亚后备人员组成的师团以及该城的居民都起了很大作用。阿尔巴尼亚人师团还是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之初由伊斯坦布尔派往阿尔巴尼亚中部的，而该城居民则认为与其投降黑山军队还不如忍受包围的恐怖。斯库台的抵抗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1913年1月

末，阿尔巴尼亚后备队司令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哈桑·里札-巴夏，在青年土耳其派军官帮助下夺取了驻防军的指挥权，并且仍然在土耳其旗帜下继续进行抵抗。

1913年3月20日，当列强决定把斯库台城留在阿尔巴尼亚疆域之内时，黑山国王尼古拉特别加劲地想不惜任何代价来取得这个城市。他不是用武器的力量，而是借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的帮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艾沙特-巴夏大概以为，斯库台的命运不取决于它的驻军的抵抗，而取决于列强的决定，因此他在黑山保证撤走驻军及其装备并由黑山及其盟国——塞尔维亚、特别是俄国——帮助他掌握阿尔巴尼亚政权之后，就交出了这个城市。这样，在经过七个月的围城和英勇抵抗之后，斯库台在1913年4月22日转到了黑山军手中。

斯库台在黑山手里保持了不过三个星期。在列强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奥匈的压力下，黑山军队于1913年5月14日从该城撤退。但是斯库台没有移交给发罗那政府，而是落到国际军事占领之下。列强军队在英国海军将官率领下在该城建

立了国际行政管理组织。

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在签定了让出斯库台的条约之后，率领两个师团（一个是由土耳其士兵组成的师团，另一个是由阿尔巴尼亚后备人员组成的师团）到了阿尔巴尼亚中部塞尔维亚占领下的都拉斯和地拉那，并且完全不管发罗那政府而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此外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利欲熏心的巴夏可能开始以苏丹（按1912年12月17日的决定，他被列强承认为自治国家的主权者）的名义指挥土耳其军队，同时也可能根据同黑山和塞尔维亚的秘密条约而推翻发罗那政府。为他的行动弄得不安的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向大使会议提出了承认阿尔巴尼亚完全独立和尽速从阿尔巴尼亚撤出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土耳其军队的问题。中欧同盟国——奥匈和意大利——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因为它们希望废除苏丹对阿尔巴尼亚的主权，以便为自己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支配阿尔巴尼亚开辟道路。中欧同盟国向苏丹施加压力，迫使他在1913年5月30日宣布由列强随意处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事务。1913年6月，土耳其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都撤离

了阿尔巴尼亚；只有希腊政府在一段时间里利用种种口实拖延从阿尔巴尼亚南部撤退。

在要求废除苏丹对阿尔巴尼亚的主权的奥匈同主张1912年12月17日的决议依然有效的俄国之间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之后，大使会议终于在1913年7月29日拟定了组织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方案。根据这个决议，阿尔巴尼亚被承认为独立国家，但要处于六大国的保证和监督之下。阿尔巴尼亚被宣布为中立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应由列强选定的公爵来领导。列强的监督为期十年，由包括七个成员（六大国代表六人和阿尔巴尼亚代表一人）的国际委员会来行使。国际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整个民事行政和全部国家预算。列强还决定委托瑞典军官组织宪兵队。由于瑞典没有同意，于是改由荷兰军官负责组织。

按照1913年7月29日的决议，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也只是形式上得到承认。同苏丹的关系彻底断绝了。但是列强的监督仍然限制着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列强通过国际监督委员会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部事务，并且给阿尔巴尼亚制造困难。

列强损害阿尔巴尼亚的阴谋。维德公爵的统治

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的民族政府在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疆界问题之后开始注意国内问题。在这方面，它致力于把国家政权扩及于全国各区，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学校网，制定新的法律来代替过去施行的土耳其法律。

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仿照西欧各国的榜样，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从土耳其那里接受下来的封建地主制度。这些措施引起了地主方面的不满。在1913年9月和10月，反动地主相继退出了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的政府而投靠了艾沙特·托普塔尼。在这些反动派的支持下，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于10月在都拉斯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想推翻所有的民主派爱国者仍然对之表示忠诚的发罗那政府。

封建主们所造成的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

干涉和沙文主义邻国的阴谋而进一步增加了。

奥匈和意大利顽固地力求使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追随它们的政策，并且给予它们重要的经济权益和政治特权。

俄国和法国仍然对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抱敌视的态度：由于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继续抗议在确定疆界问题上对阿尔巴尼亚的不公正，于是俄法两国就秘密地帮助艾沙特·托普塔尼，因为后者曾表示完全听命于协约国的政策。

在巴尔干各国中只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尊重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并采取了同它建立友好关系的步骤。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虽然表面上也承认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建立，却秘密地进行反对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阴谋活动。塞尔维亚广泛地支持艾沙特·托普塔尼推翻发罗那政府，希望借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攫取中津港。同时，阿尔巴尼亚南部，或如希腊政府所称的“北伊庇鲁斯”的希腊占领地区的希腊政府，开始组织所谓志愿部队，这些部队基本上是由希腊运来的雇佣兵组成的，准备在希腊正规军撤出阿尔巴尼亚南部以后阻挠发罗那政府建立政权。

伊斯坦布尔政府开始时不承认阿尔巴尼亚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去，后来看到无力改变亚得里亚海岸业已形成的局势而开始实行同阿尔巴尼亚接近的政策。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在巴尔干半岛上所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条件下，土耳其愿意有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以便阻止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进一步加强。为此，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特别是青年土耳其派的“进步联盟”党委员会打算任命一个土耳其的（信伊斯兰教的）公爵来领导阿尔巴尼亚国家，建议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前土耳其陆军大臣伊泽特-巴夏担任这个职位。为了提高伊泽特-巴夏的声望，借以对抗列强根据1913年7月29日决议所选定的德国公爵威廉·维德，由土耳其向阿尔巴尼亚派来了一批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土耳其传教士（都是“进步联盟”党党员）。

1913年秋天，当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决心对希腊和塞尔维亚发动复仇战争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对阿尔巴尼亚表现了特别大的兴趣。伊斯坦布尔所表现的兴趣受到阿尔巴尼亚居民的欢迎。甚至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主席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和流

亡在阿尔巴尼亚的科索沃人，也指望这个联盟会导致所有阿尔巴尼亚领土的统一，或者哪怕会有助于对来自希腊和塞尔维亚的不断的压力给以抵抗。因此，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同意跟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进行秘密谈判。由于列强迫使阿尔巴尼亚保持中立，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人要求发罗那政府准许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建立的部队通过阿尔巴尼亚领土进入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后方，并且同意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施加影响，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塞尔维亚政府。作为报偿，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答应阿尔巴尼亚政府首脑在战争结束以后帮助收回科索沃。伊斯玛依尔·捷马利同意了这个秘密条约。

这个条约的秘密没有保持多久。载着由贝基尔·格莱贝涅少校率领的、穿着阿尔巴尼亚服装的土耳其士兵的船只刚一到达发罗那海岸，秘密就暴露了。这些士兵被送到马其顿去。贝基尔·格莱贝涅为国际监督委员会逮捕，根据从他身上查获的文件发现了他同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的联系。但是无论贝基尔·格莱贝涅还是伊斯玛依尔·捷马利都没有在侦讯中暴露协议的秘密。这

使得伊斯玛依尔·捷马利的敌人乘机发动了一个诽谤运动。他们诬蔑这位老爱国者招来土耳其军队是为了在它的帮助下发动一个政变，以便把阿尔巴尼亚重新并入奥斯曼帝国。国际监督委员会利用贝基尔·格莱贝涅事件并借口维德公爵已经来到阿尔巴尼亚，于1914年6月22日强迫伊斯玛依尔·捷马利政府辞职。发罗那政府和民族委员会都不再存在了。国家管理权转到国际监督委员会手中。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根据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也于1914年2月12日同意辞职，但他被授权领导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负责把阿尔巴尼亚的政权移交给维德。

希腊也不得不执行列强的命令——在维德公爵到达之前把军队撤出阿尔巴尼亚南部。但是按照早就拟定好的计划，2月末希腊正规军刚一从阿尔巴尼亚撤出，所谓的“伊庇鲁斯”匪帮就用对当地居民的恐怖手段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1914年3月2日，希腊的代理人在纪诺卡斯特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宣布“北伊庇鲁斯自治”，并且建立了以约尔治·佐格拉菲为首的“临时政府”。“北伊庇鲁斯”政府把政权推广到整个纪诺

卡斯特地区。希腊代理人想把科尔察也掌握到手里，但是遭到了失败。科尔察及其周围地区毫不费力地转到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手中。

1914 年 3 月 7 日，威廉·维德公爵来到已被宣布为阿尔巴尼亚首都的都拉斯。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欢迎了公爵的到来，因为他们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实现整个阿尔巴尼亚国土的解放和统一，结束不幸的人民的无尽的苦难，恢复因外国的挑衅而遭到破坏的平静，使阿尔巴尼亚走上文明和幸福的大道。

但是维德辜负了民主派爱国者的期望。他认为他是对那些任命他统治阿尔巴尼亚的大国负责的。他认真考虑了列强的建议，建立了一个由封建主组成的政府，任命奥斯曼帝国的前部长杜尔汉-巴夏·佩尔梅特为总理。新政府中的最重要的职位——内务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位为地拉那的最大的封建主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所占据。维德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监督委员会身上，而国际监督委员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机关。委员们都为委员会所代表的各大国的利益服务，而损害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公爵本人的权力。维

德公爵也是个毫无作为的人，他由于依靠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而变成了它们的工具。

维德政府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阿尔巴尼亚军队和从希腊匪帮手中解放阿尔巴尼亚南部各地区。但是，在这个对他负责管理的国家和对他本人的宝座都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公爵表现出是个碌碌无能的人。跟塞尔维亚和希腊实行秘密勾结的陆军部长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就在他鼻子底下对组织军队的工作实行怠工。他拒绝采取民主派爱国者所建议的任何有力措施来对付非法的"北伊庇鲁斯政府"。相反地，在列强的压力下维德公爵不得不同约·佐格拉菲进行谈判，以便"和平"解决"北伊庇鲁斯自治"问题。谈判在希腊的科孚岛上进行，这也是对阿尔巴尼亚人的侮辱。

阿尔巴尼亚方面因同意谈判这件事本身而暴露了自己的软弱。这鼓励了希腊代理人，他们甚至进行挑衅和威胁，企图迫使维德的代表——荷兰上校汤姆逊——承认"北伊庇鲁斯自治"。维德公爵摇摆不定，只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压力和抗议，他才没有接受"北伊庇鲁斯政府"的建

议，而科孚岛上的谈判也中断了。但是后来在列强的压力下，维德公爵授权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阿尔巴尼亚"方面进行谈判。经过长达一周的谈判之后，1914年5月17日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代表和"北伊庇鲁斯政府"的代表在科孚签订了议定书。根据科孚议定书，阿尔巴尼亚南部各地区应该享受半自治权，并且有自己的政府和地方宪兵；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小学头三年级必须使用阿尔巴尼亚语）。高级官吏也和所有的官吏一样必须由当地人担任，并且必须在国际监督委员会预先批准之后由阿尔巴尼亚政府任命。

科孚议定书直接损害了为列强1913年7月29日决议所承认的阿尔巴尼亚主权。这个议定书的另外一个丑恶的方面是，它规定原来仅仅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南方各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居民，必须在小学（头三年级除外）和中学中只使用希腊语。因此，处于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强大压力之下的都拉斯政府拖延批准科孚议定书，等待形势的有利改变。

但是维德政府的政治地位日益恶化。由于维

德处处依靠参加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各大国和大封建主、特别是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因此，人民群众把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吸血鬼的所有仇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当民主派爱国者在城市中领导起反帝和反封建运动的时候，鼓吹邀请伊斯兰教公爵到阿尔巴尼亚来的分子以及使反封建运动具有宗教性质的青年土耳其派分子也在乡村地区更加活跃起来。青年土耳其派批评维德是地主的保护者，是力图压迫伊斯兰教居民的基督教列强的帮凶，因此他们能够说服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大部分农民群众拿起武器来推翻维德政权，而代之以与土耳其苏丹（他作为哈利发，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首脑和保护者）有联系的伊斯兰教公爵。

这样，在1914年5月中旬，在希亚克区和地拉那区爆发了反对维德公爵及其反动政府的武装起义。广大农民群众出于社会的和宗教的动机参加了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些希望用一个与土耳其有联系的公爵来代替维德的人领导的。亲土耳其的宗教狂者（最典型的代表是地拉那城的主教穆萨·察吉米）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

首都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因不了解这次起义的真正性质而为起义的宗教性质感到不安。5月18日，当起义者出现在都拉斯附近时，他们的不安更加增长了。爱国派以为消灭了艾沙特·托普塔尼，起义就可以停止下去，因而于1914年5月19日黎明在首都宪兵队帮助下包围了艾沙特-巴夏在都拉斯的住宅并把他逮捕，但是维德公爵在意大利驻都拉斯公使阿里奥蒂男爵的压力下给了他逃往意大利的机会。

尽管艾沙特-巴夏逃亡国外，起义还是进一步扩大了。在包围都拉斯的几个星期中间，起义者把自己的政权几乎推广到整个阿尔巴尼亚中部。在解放了的地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一政权归1914年6月3日在希亚克召开的起义者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领导。穆斯塔法·恩德罗契当选为总委员会主席，察米尔·哈治·费札当选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列强利用武装起义给都拉斯造成的危险局势，迫使维德政府批准科孚议定书。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阿尔巴尼亚政府终于在1914年6月23日批准了科孚议定书，指望批准议定书以后“北

伊庇鲁斯人”会不再从南方发动进攻。

但是，当7月间起义者压缩了对都拉斯的包围并且向贝拉特和波格拉迪茨进攻时，“北伊庇鲁斯人”不但没有按照议定书的规定停止战斗，反而对科洛尼亚、科尔察和贝拉特等仍处于都拉斯政府控制下的地区进攻。在两面夹攻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军队被迫退却了。这使得希腊匪帮有可能毫不费力地占领南方各区并同起义者划定了从波格拉迪茨到贝拉特的边界。

在占领南方各区时，因当地居民不愿参与“北伊庇鲁斯人”运动而怀恨在心的希腊匪帮对当地居民采取了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和春天撤退时一样，希腊匪帮在这次重新占领这些地区时放火焚烧了许多村庄（一百六十多个村庄），逮捕了成百上千的爱国者，并且不经审问就屠杀了成百上千的无罪农民，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了逃避迫害，有上万的人抛弃自己的家园，逃到发罗那附近的橄榄林里露宿，而发罗那这时是除都拉斯外唯一处于维德政府统治下的城市。这个包括六万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人群由于两手空空、孤立无援而饱受饥寒疫病之苦。

“北伊庇鲁斯人”的首领的这次进攻违反了科孚议定书，因为议定书规定他们不得对阿尔巴尼亚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科孚议定书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

1914年8月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现在，当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和沙文主义邻国都认为已经是靠牺牲阿尔巴尼亚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时候了。此外，战争也使国家陷于悲惨的处境。

维德政府的政权只及于都拉斯和发罗那。阿尔巴尼亚中部处于起义者的控制之下。阿尔巴尼亚南部在希腊匪帮的铁蹄下呻吟。在东部，迪布拉区在塞尔维亚的占领下，而山区则处于族长的统治之下。

反维德势力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形势仍然顽强

地攻击都拉斯政府。随着1914年9月1日发罗那转入他们手中，维德的处境极端恶化了。由于过去支持过他的奥匈现在也抛弃了他，维德公爵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于1914年9月3日随同他的政府一起离开了阿尔巴尼亚。这样，维德政权就在六个月的统治之后垮台了。1914年9月4日起义部队开进了都拉斯。

奥匈把维德当作一个无用的人抛弃之后极力拉拢反维德运动的领导人，企图利用他们的武力来反对自己的敌人——塞尔维亚。通过混入起义者部队并且从土耳其（它是奥匈的同盟者）接受指示的青年土耳其派分子，奥匈顺利地同起义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是奥匈在地方领导人那里、特别是在一直为反对维德而战斗的农民群众那里，并没有得到成功。1914年10月，阿尔巴尼亚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在维德出国以后，艾沙特·托普塔尼在保加利亚政府出钱组织的武装部队的帮助下从逃亡地回到都拉斯。1914年10月2日他宣布自己是临时政府主席和军队的总司令。他的返国只是使反封建起义的怒火重新燃烧起来。除了农民以外（这一次他们也是起义的主

力)，青年土耳其派分子也参加了起义，这些人特别是在10月，当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时，企图使武装起义不仅反对站在协约国一边的艾沙特·托普塔尼，而且反对塞尔维亚。但是这一次农民群众也没有听从青年土耳其派领导人的号召。

另外两个一直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大国也利用了阿尔巴尼亚的无政府状态：意大利在1914年10月末在列强的同意下侵占了发罗那和萨扎尼岛，而希腊的正规军则在同一天占领了"北伊庇鲁斯"匪帮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南部各区。无论是罗马还是雅典都以为靠这些军事行动可以得到在战后吞并这些地区的权利。

在反对艾沙特·托普塔尼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中部的起义农民队伍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几个星期中间，阿尔巴尼亚中部的所有地区就都落到起义者手中，而艾沙特-巴夏的政权则只局限于都拉斯。

青年土耳其派分子想使起义部队反对塞尔维亚的努力在后来也没有成功。在1915年1月，以及后来又在2月和3月送给列强的照会中，起义

农民的领导人宣布了自己在世界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并且强调了起义的反艾沙特性质。1月，反对艾沙特·托普塔尼及其地主帮凶的起义具有了公开的反封建性质。在出身于地拉那区沙勒乡、曾被起义者选为总司令的哈治·察米尔的领导下，武装农民焚烧了土豪劣绅的家宅，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帮助穷人、孤儿和残废者，同时对困守都拉斯的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加紧了进攻。还没有完全摆脱青年土耳其派的长期思想影响的起义农民(虽然不是全部)，仍然在土耳其的旗帜下作战。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错误的看法，仿佛阿尔巴尼亚的旗帜是地主老爷和无神论者的旗帜。哈治·察米尔及其战友没有按照土耳其和奥匈的指示进攻塞尔维亚一事表明，他们虽然在土耳其的旗帜下作战，但是在政治上却不依赖于土耳其政府。

这时，意大利决定不再保持它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所宣布的中立，而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了反对自己旧盟国——中欧同盟国——的战争，因为它看到协约国有更大的胜利希望，想从协约国得到比它的旧盟国答应给它的领土利益更大得多

的利益。为此，1915 年 4 月 26 日意大利同三个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

秘密的伦敦条约是列强对小小的阿尔巴尼亚采取的可耻政策的顶峰。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这些在两年前(即 1913 年 7 月 29 日)承认了阿尔巴尼亚在它们的监督和保证下独立的六大国中的四国，用这个条约破坏了以前的决议，确定了阿尔巴尼亚的从属地位，而更坏的是确定了对这个多难的国家的瓜分。该条约第六条承认意大利有权吞并发罗那城及其整个郊区和萨扎尼岛；第五条规定申津港归黑山所有，而第七条则预见了塞尔维亚和希腊吞并阿尔巴尼亚北部和南部各区的可能性。阿尔巴尼亚的另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中部——按照第七条则应该成立一个小小的、自治的中立国家，首都设在都拉斯，由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代表这个国家。

伦敦条约在意大利于 1915 年 5 月参战以后仍然保持着秘密。但是已经知道了条约内容的塞尔维亚对于这些强大的同盟国家没有承认它对都拉斯城的权利仍然感到不满。塞尔维亚政府硬说

起义农民是受奥匈指使和组织的，于是在保障后方免于起义农民攻击的虚伪借口下，匆忙地在阿尔巴尼亚国境上集结军队，企图通过阿尔巴尼亚中部夺取它的盟友艾沙特·托普塔尼被围困在里面的都拉斯。贝尔格莱德想用这一行动使吞并都拉斯成为既成事实。起义领袖几次照会塞尔维亚军司令部，企图说服它放弃军事进攻。但是，1915 年 6 月 2 日，当塞尔维亚军队越过国境的时候，武装农民在哈治·察米尔领导下前去迎战，并且在楚克斯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装备恶劣而又组织涣散的农民在人多势众的塞尔维亚军队面前遭到了失败，而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那些不愿意使意大利感到不安的盟国的压力下，塞尔维亚军队没有进入都拉斯。但是同时，占领者却同突围的艾沙特部队一起残酷地屠杀农民。哈治·察米尔和四十个农民被吊死。直到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的地位稳固以后，塞尔维亚军队才撤离阿尔巴尼亚。这样，他们在阿尔巴尼亚总共停留了几个星期。

黑山为了吞并斯库台，于 1915 年 6 月侵占了斯库台。无论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还是黑山

人，都逮捕并放逐了许多当地的爱国者。黑山人在斯库台不经审判就杀害了两位著名的爱国者——柴尔奇斯·托波利和穆斯塔法·楚里。

几个月后，将近二十万人的塞尔维亚军队被奥匈军队打垮和追击，退入了阿尔巴尼亚领土。1916年1月，塞尔维亚军队偕同他们的盟友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及其"政府"从海路逃出了阿尔巴尼亚。他们最初驻扎在法国，后来则并入在萨洛尼卡登陆的英法东方军团。

1916年1月，奥匈军队从北部进入阿尔巴尼亚。几个星期光景他们就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和中部的整个地区。同年秋天，意大利军队占领了整个阿尔巴尼亚的南部，而来自萨洛尼卡的法军则占领了科尔察区，并且在科洛尼亚同意大利军建立了分界线。

在科尔察，法国军事当局把城市管理权交给了自己的同盟者——希腊的文尼泽洛斯分子，这时的文尼泽洛斯已经在萨洛尼卡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且已向中欧同盟国宣战。

这个区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对法国把科尔察交给希腊的这种行动表示了抗议。武装部队在塞



塞米斯托克利·格尔美尼
(1867—1917年)

米斯托克利·格尔美尼和萨里·布特卡领导下对希腊代理人开始了军事行动，并且宣称如果法国军队不把希腊人赶出科尔察并且把该城移交给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就将对法军作战。

法国军事当局看到希腊人在科尔察区没有得到支持并且无力保证必要的安定，于是赶走了文尼泽洛斯分子，并且在1916年12月10日，在同塞米斯托克利·格尔美尼及其他爱国者进行谈判之后签订了一个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科尔察、比利希提和科洛尼亚各区实行“自治”，而政权则移交给阿尔巴尼亚人。

根据1916年12月10日议定书，由十四人组

成的行政委员会领导"科尔察自治区"；在行政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宪兵队；所有行政管理机关的职位都由阿尔巴尼亚官吏担任；阿尔巴尼亚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开办阿尔巴尼亚学校代替希腊学校；带有法国三色旗的阿尔巴尼亚国旗成了"自治区"的旗帜。按照这个议定书，"科尔察自治区"的行政机关受法国军事当局的保护。塞米斯托克利·格尔美尼成了自治区（或如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科尔察共和国"）最著名的活动家。

获得"自治"一事是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条件下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迫使法国人拒绝了自己的希腊盟友对科尔察的野心。此外，外国军事行政机关为当地的民政机关代替，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该区居民的生活。"科尔察自治区"成为其他区的爱国者在争取同样权利的斗争中的榜样。在爱国分子的压力下，奥匈军事当局在 1917 年 1 月，意大利军事当局在同年 6 月也先后被迫作出让步，答应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即承认阿尔巴尼亚的"自治"和领土完整。

"科尔察自治区的建立"及其移交给阿尔巴尼亚支配，受到希腊沙文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在

这些分子和希腊总理文尼泽洛斯本人的压力下，以及根据1917年6月希腊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时来自巴黎的命令，法国军事当局开始破坏1916年12月10日议定书。六个月后，科尔察政权开始失去自治。在科尔察重新开设了希腊学校。法国当局逮捕了阿尔巴尼亚爱国者领导人塞米斯托克利·格尔美尼，萨洛尼卡法国军事法庭根据伪造的供词将他判处死刑，并于1917年11月9日枪决。几个月后法国人废除了1916年12月10日议定书。由于害怕阿尔巴尼亚人的武装反抗，他们仍然没有把城市管理权移交给希腊当局。城市管理权直接转给法国军事当局。

奥匈、意大利和法国的军队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一直继续到大战结束。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各交战国作战的战场。奥匈军和法军在费里区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战斗。占领和战争使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巴尼亚约有七万人死于疫病、饥馑和战争。本来已经很落后的经济变得更加衰落了。

鲁什涅代表大会和发罗那战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但没有消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灾难和爱国民主主义者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反而使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状况更加恶化了。

西方强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前三国是1915年4月签订的伦敦条约的参加者，并且原则上赞成实行那些规定瓜分阿尔巴尼亚的条款。年轻的同盟国中两个和阿尔巴尼亚毗邻的国家——塞尔维亚和希腊——极力要享受战胜国的权利，兼并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即企图得到它们在1913年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在伦敦条约参加者中间只有一个国家——俄国——反对执行这个可耻的条约。这是因为俄国在头一年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俄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农民的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

天，列宁宣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交战国双方建议缔结不割地的公平的民主的和约。这些行动在阿尔巴尼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革命胜利后几个星期，俄国布尔什维克公布了列强间原先缔结的秘密条约，其中包括秘密的伦敦条约。

阿尔巴尼亚政治领导人知道了这个条约的内容以后，深刻认识到了世界大乱后形成的局势对阿尔巴尼亚命运的意义。因此，战争一结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多年在国外，被关在集中营里，或是在地下活动）便为建立代表大会所选举的国民政府进行积极的活动，以使由这个政府掌握国家的管理权，捍卫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措施应该在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以前付诸实施，因为列强将在这次和会上要求执行伦敦条约。但是要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是很困难的，因为整个阿尔巴尼亚都处于外国军队、主要是意大利军队的占领之下，以前奥匈军队侵占的地区以及驻扎在斯库台和科尔察的法国军队侵占的地区也由意大利军队占领了。

意大利政府允许在都拉斯召开代表大会，其条件是不在代表大会上建立国民政府，而是建立

"国民议会"，后者只代表不包括发罗那省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不拥有政府权力，而只有在和会上表达"阿尔巴尼亚人的愿望"的权利（当然必须按照意大利的利益行事）；罗马政府依仗它在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政权的压力，希望把它的信徒和走狗派到国民代表大会上去。

都拉斯代表大会在1918年12月28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五十多个代表。为了不给驻扎在都拉斯的意大利军队以解散大会的借口，爱国派的代表们在发言中没有公开批评罗马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但是都拉斯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意大利政府政策相矛盾的决议。代表大会选出的不是"议会"，而是以曾任维德政府总理的杜尔汉-巴夏为首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将行使行政权，而立法权授予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国民议会。此外，代表大会还给予它所选出的以总理为首的委员会以在和会上保卫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任务。代表大会不仅以这一决议打击了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野心，而且还以预定的伦敦条约打击了意大利的野心。

虽然意大利军事当局对都拉斯代表大会不满

意，但是它毕竟没有触动国民政府，因为它害怕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引起阿尔巴尼亚人的愤怒。但是另一方面，它长期不允许都拉斯政府执行行政权，不允许国民议会开会和行使立法权。意大利的代表企图说服都拉斯政府在和会上不再要求罗马帮助阿尔巴尼亚抵制塞尔维亚和希腊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而是要求将整个阿尔巴尼亚置于意大利的委任统治或保护之下。

1919年1月18日和会在凡尔赛开幕后，象所预料的，阿尔巴尼亚的邻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向阿尔巴尼亚提出了领土要求，虽然阿尔巴尼亚并不是战败国。意大利要求吞并发罗那区和萨扎尼岛，这两地是伦敦条约答应给它的；此外，意大利还要求不把阿尔巴尼亚的其余领土分给塞尔维亚和希腊，而使之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地。希腊又坦白说出了它的沙文主义意图，要求吞并纪诺卡斯特区和科尔察区。塞尔维亚不愿让意大利人住在发罗那，要求给予阿尔巴尼亚“独立”并保持其“领土完整”，或者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几个区分给它。黑山又要求吞并斯库台。

为了对出卖阿尔巴尼亚表示抗议，国外的所

有阿尔巴尼亚侨民区（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埃及、土耳其和美国的侨民区）的代表，同都拉斯政府代表团一起来到了巴黎。但是列强不让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参加决定阿尔巴尼亚的命运的和会，把阿尔巴尼亚看成是无主的土地。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在国外的所有阿尔巴尼亚侨民区的代表团的支持下，对邻国的各种要求提出了抗议，对伦敦条约提出了抗议，要求给予阿尔巴尼亚独立，承认它的领土完整，并要求把仍然不公正地处于阿尔巴尼亚国境之外的阿尔巴尼亚土地科索沃和察梅里亚归还它。

政府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团长杜尔汉-巴夏，鉴于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的困难，开始动摇起来，在意大利代表的压力下要求确定意大利对整个阿尔巴尼亚的委任统治权，其条件是保持1913年确定的边界。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反对这种动摇。在他们干涉以后，杜尔汉-巴夏于1919年6月被撤销了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任命路易·布姆奇代替他的职务。

1919年夏，阿尔巴尼亚问题更加复杂起来。意大利鉴于列强反对确定它对整个阿尔巴尼亚领

土的委任统治权，就同希腊谈妥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互相支持。1919年7月29日罗马和雅典签订了秘密条约(蒂顿—文尼泽洛斯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意大利承认希腊吞并科尔察和纪诺卡斯特的权利，而希腊承认意大利吞并发罗那和确定对阿尔巴尼亚其余领土行使委任统治的权利。在签订关于瓜分阿尔巴尼亚的密约以后，罗马在1919年8月20日允许都拉斯政府在意大利民政当局(已经不是军事当局)的监督下行使行政权。

过了几个月，即1919年10月间，当大家都知道了蒂顿—文尼泽洛斯条约的内容，在阿尔巴尼亚就爆发了一个抗议运动。但并不是所有阿尔巴尼亚的国务活动家对当前形势的估计都是一样的。都拉斯政府的大多数部长过高估计瓜分祖国的危险，便向罗马投降了。他们要求宣布阿尔巴尼亚由意大利保护，或者任命意大利王族的亲王为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这些要求败坏了都拉斯政府的声誉。这个政府现在完全落到意大利的走狗如缪费特·里波霍瓦、穆斯塔法·克鲁雅和费兹·阿里佐提等人手里。都拉斯政府在他们的操纵下走上了背叛的道路。

在进行了十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以后，领导和会工作的三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达成了协议，依据意大利、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要求，于1919年12月9日对阿尔巴尼亚提出了备忘录。根据这个备忘录，意大利有权吞并发罗那区以及萨扎尼岛，对瓜分后的阿尔巴尼亚实行委任统治。希腊得到了纪诺卡斯特，而科尔察的命运留待以后解决。阿尔巴尼亚北部边境没有改变，但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维尼亚王国（现在称为南斯拉夫），有权将铁路线通过阿尔巴尼亚北部，以便通到亚得里亚海。

使阿尔巴尼亚遭到瓜分并沦为意大利殖民地的1919年12月9日备忘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已经不相信都拉斯政府会采取什么拯救祖国的措施。虽然国家被意大利军队占领着，但以阿奇夫·比恰克丘为首的爱国者于1920年年初，勇敢地号召人民选举新的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便在代表大会上决定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祖国。他们还决定于1920年1月21日在鲁什涅召开代表大会。

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能够在1月21日到达

鲁什涅，代表大会推迟了一个星期才于1月28日开幕。大会进行了四天，在1920年1月31日闭幕。参加代表大会的共五十个代表。

鲁什涅代表大会通过了对祖国命运极为重要的决定。虽然代表们处于意大利的刺刀威胁之下，但他们坚决地抗议列强损害阿尔巴尼亚的一切计划和出卖勾当。代表大会通知和会：阿尔巴尼亚人为了争得民族独立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坚决同任何强国进行斗争。

随后代表大会审查了都拉斯政府的活动。在确定都拉斯政府已走上背叛道路以后，大会宣布这个政府被推翻，另组织了以苏列曼·德尔维那为首的新的国民政府。代表大会还选出了由米哈里·杜尔杜利、路易·布姆奇和穆罕默德·科尼茨组成的出席和会的代表团。

鲁什涅代表大会审查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制定和批准临时宪法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国家在不受外国军队控制的自由阿尔巴尼亚召开制宪会议以前，将按照临时宪法进行活动。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决定，在制宪会议召开以前，既不宣布阿尔巴尼亚为君主国（象1913年大使会议所决定

的），也不宣布它为共和国（象大多数代表所希望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暂由四人组成的最高会议领导。代表大会选出阿奇夫·比恰克丘、米哈里·杜尔杜利、路易·布姆奇和阿布迪·托普塔尼为最高会议的成员。在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中还规定：除了行使行政权的国民政府以外，还建立行使立法权的国民议会，即国会（由37个代表组成）。在章程中还包括关于新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各种行政机关组织的其他细则，以及它们的权利和义务。

鲁什涅代表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出卖勾当，推翻了投降分子的都拉斯政府，从而改变了事件的发展进程，使它有利于阿尔巴尼亚、而不是损害阿尔巴尼亚。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章程，废除了1913年大使会议批准的章程，按照后一章程，阿尔巴尼亚将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和操纵。鲁什涅代表大会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命运应该由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通过制宪会议决定。

都拉斯政府企图驱散鲁什涅代表大会，但没有成功；这个政府由于得不到支持，几天后便解散了。

相反地，苏列曼·德尔维那政府在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在其成立的最初几个星期便取得了显著成就。1920年2月11日，最高国家机关——最高会议、部长会议和国民议会——离开了小城鲁什涅，来到当时拥有一万五千居民的地拉那。地拉那暂时决定为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的新政府要求意大利和法国的军事当局离开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和法国的军事当局鉴于新政府在当地居民中的威望，为避免同人民群众冲突，开始将军队逐渐撤出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政权在解放区建立了起来，并且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拥护。

但是罗马政府没有把驻在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军队撤回意大利，而是集中在发罗那区，这就表明它不仅不想放弃该区，而且准备以武力保住它。同时罗马政府为使地拉那政府不能有所作为，便唆使艾沙特分子在地拉那附近进行骚动。当1920年3月27日国民议会（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国会）开幕时，地拉那政府必须解决两个对祖国命运极为重要的问题：解放发罗那区和镇压艾沙特分子的骚动。苏列曼·德尔维那政府希望用和平方法

解决这两个问题，想争取时间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作些准备，所以在国民议会批准后，便开始同罗马政府以及进行骚动的艾沙特分子的头目谈判。阿尔巴尼亚爱国者领导人明白，阿尔巴尼亚问题的危急状况，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把意大利军队从发罗那赶出去才能解决。他们相信，在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和抗议运动（世界各地都支持这个小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冲击下，意大利最终将不得不把它的军队从发罗那区撤出去。阿尔巴尼亚爱国者领导人还相信：希腊和南斯拉夫都不希望意大利军队驻扎在发罗那；在意大利人被逐出发罗那以后，不论是贝尔格莱德或雅典都不能够并吞它们所想望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基于这种理由，当和会继续讨论1919年12月9日的备忘录时，也就是说，当还没有对阿尔巴尼亚的命运作出最后决定时，爱国者们便决定组织反对意大利侵略军的解放起义。

争取解放起义的组织工作由“民族保卫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在发罗那处于地下状态，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的各区的爱国者组成。“民族保卫委员会”在同地拉那政府秘密协商之下，于

1920 年 5 月 20 日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了这个号召。1920 年 6 月 3 日委员会从斯莫克芬那附近的柏温山向意大利占领军司令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回答这一问题：它是否同意将发罗那、台佩莱纳和希玛拉的管理权交给地拉那政府。因为意大利司令部没有回答，1920 年 6 月 5 日所有被意大利人占领的区都爆发了解放起义。

被占领区的成千农民组成武装部队，于午夜同时向发罗那外围的所有意军哨所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农民经过英勇战斗，在几小时内便攻破了科特、吉奥尔米、洛高拉伊和德拉索维察卫戍部队的防御工事，俘获了几百个俘虏，解放了整个被占领的地区。约三千勇敢的农民于 6 月 11 日晚向两师敌军驻防的发罗那进攻。当时发罗那不但筑有一切必要的工事，而且拥有若干军舰。至清晨，农民占领了城郊，但是奉司令部的命令没有继续进攻，撤退到了发罗那丘地，以便不给意军杀害城市居民的借口。

同时地拉那政府军队在司令巴伊拉姆·楚里

的指挥下，向叛乱的艾沙特分子展开了广泛的进攻。几天后，进攻胜利地结束了。1920年6月13日，阿尔巴尼亚革命大学生阿弗尼·卢斯德米在巴黎杀死了叛徒艾沙特-巴夏·托普塔尼。由于他的被杀，艾沙特分子的叛乱也就完全被制止下来。

占领军司令部利用匆忙地从意大利开来的军队，向起义者进行了两次讨伐，但都失败了。几星期后阿尔巴尼亚起义者就把发罗那包围了起来。

发罗那战役在整个阿尔巴尼亚掀起了一个爱国热潮。志愿军从全国各地来到发罗那，许多地方收集金钱和粮食支援英勇的战士。同时发罗那战役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这些对阿尔巴尼亚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意大利无产阶级起来援助阿尔巴尼亚人民，他们抗议并组织示威以反对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在阿尔巴尼亚的掠夺战争。

正象爱国者所预料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坚决斗争、国际舆论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行动，迫使罗马政府开始同地拉那政府谈判，以便结束军事行动。

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进行长期谈判后，加上意军在发罗那遭到许多挫折，罗马政府最后接受了阿尔巴尼亚人提出的条件。1920年8月2日签订了地拉那议定书。议定书规定，意大利必须在1920年9月2日前将它在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军队撤出（萨扎尼岛除外）；放弃吞并发罗那的要求，必须尊重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920年9月3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战士雄纠纠地开进了解放了的、重新回到独立祖国怀抱的发罗那。

1920—1923年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生活

阿尔巴尼亚人在发罗那的胜利，对阿尔巴尼亚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胜利本身就解决了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在和会上争吵了一年多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意大利由于签订地拉那议定书，由于把军队撤出阿尔巴尼亚，从而象议定书第二条所说的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

整”。这就是说，意大利放弃了在和会上提出的吞并发罗那和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委任统治的要求。由于在发罗那的可耻失败，意大利不能再要求伦敦条约给予它对阿尔巴尼亚的“权利”了。和会在头年3月就已停止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审理，以便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讨论了它们在亚得里亚海的矛盾以后再来研究。可是甚至在罗马和贝尔格莱德谈判以后，和会也没有再来审理这个问题。由于实现伦敦条约答应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诺言同意大利应该得到的利益有关，所以这些诺言没有实现。因此，地拉那政府不必再为了保卫迄今为列强所否认的阿尔巴尼亚的主权而向和会呼吁了。相反，几个星期以后，地拉那政府向国联和国联大会要求接受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为国联成员。1920年12月17日大会接受阿尔巴尼亚为国联成员。接受阿尔巴尼亚进入国联，意味着国际上承认阿尔巴尼亚是独立国，意味着鲁什涅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的胜利，并正式埋葬了使阿尔巴尼亚人遭到极大不幸的可耻的伦敦条约。

现在，当奴役和瓜分祖国的危险过去以后，

阿尔巴尼亚政治活动家开始注意国内问题。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组织问题，即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阿尔巴尼亚首先需要有正式章程以代替鲁什涅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不完全的临时章程；需要制定新的适合年轻主权国家的法律，以代替还发生效力的过去奥斯曼帝国的法律。经济问题也非常严重。阿尔巴尼亚是农业国，几乎没有工业，因此需要在落后的农业方面采取紧急的根本措施。大家知道，谷物和其他日用品的输入，比阿尔巴尼亚商品的输出多五倍，这样几年后就会把国家的货币储备消耗光。阿尔巴尼亚首先应该编制自己的有盈余的预算，把自己的资金用来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

在鲁什涅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以对抗敌人的阿尔巴尼亚各政治力量，在解决这些迫切问题时分裂了。苏列曼·德尔维那政府认为鲁什涅代表大会委托他们行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它又正面临着迄今一直是它的支柱的政治力量的分裂，于是便在1920年11月14日辞职了。在鲁什涅成立的国民议会（国会）也宣布解散。这样，对阿尔巴尼亚说来，内部政治斗争的新时期开始

了。在这个时期里，一方面地主保守分子企图保持他们的庄园和原有的特权，另一方面新的进步力量则为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民主化而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是在外国同时严加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阿尔巴尼亚的两个邻国——南斯拉夫和希腊——没有放弃原来的野心。当然，它们在国联所造成的“稳定局面”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南斯拉夫继承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原来的沙文主义野心。而其统治者一直野心不死的希腊，同南斯拉夫一起不再要求“兼并”阿尔巴尼亚的土地，而要求确切规定阿尔巴尼亚的边界，借此将阿尔巴尼亚的边界作一次有利于它们的“修正”。当时贝尔格莱德企图利用武装的匪帮来破坏阿尔巴尼亚的国家机器，以期在地拉那成立亲南斯拉夫的政府，于是雅典又开始掀起“北伊庇鲁斯人”的破坏运动，虽然采取的形式比较隐蔽。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列强，开始威吓和压制阿尔巴尼亚政府，从它那里得到了许多租借权和经济特权，特别是在阿尔巴尼亚开发矿藏和对外贸易方面。

1920年11月19日成立的由伊利阿兹·符里奥尼担任主席的新政府，只是力求在外表上保

持阿尔巴尼亚政治力量的统一。新总理是鲁什涅政纲的拥护者，但是另一方面，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这就不能不对他的政治活动发生强烈的影响。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召开国会。1920年12月5日颁布了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对地主及其拥护者有利，他们很容易当选。

在选举运动时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它们在1921年4月5日选举后变为两个党，或者说变为两个国会政治集团：进步党和人民党。进步党代表地主、保守的资产阶级和僧侣这些“社会传统”的拥护者；人民党包括民主主义者和一些自由派地主，他们要求按照西欧资产阶级各国宪法的榜样来制定民主的宪法。

但是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政治生活又被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挑衅破坏了。已经取得新国会信任的伊利阿兹·符里奥尼政府，于1921年5月坚决要求国联要南斯拉夫和希腊撤回在阿尔巴尼亚土地上的军队，并尊重国联本身在1913年确定的阿尔巴尼亚的边界。国联根据支持南斯拉夫政策的法国的建议，把阿尔巴尼亚边界问题交给在巴

黎召开的大使会议审查。英、法、意、日是这个会议的参加国。国联的这项决定鼓励了阿尔巴尼亚的邻国。当雅典政府未能再度在南方掀起"北伊庇鲁斯人"的破坏运动时，反动的山区族长乔昂·马尔卡·乔尼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财政和军事的支持下在北方发动了公开的叛乱，在6月宣布建立所谓"米尔吉塔共和国"。

这些骚动继续了整个夏天。伊利阿兹·符里奥尼政府采取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就：它在南方很容易就恢复了威望，在北方用武力镇压了乔昂·马尔卡·乔尼的叛乱。但是在秋初，情况非常不好，因为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的正规部队和新的雇佣匪帮一起派到了阿尔巴尼亚。这样就变成了公开的武装干涉。伊利阿兹·符里奥尼政府在严重困难面前开始摇摆不定，没有决心采取有力措施。为了消除危险，人民党的党员同进步党的一些成员一起建立了临时联合组织，名为"神圣同盟"。这个同盟在1921年10月11日把伊利阿兹·符里奥尼政府解散了，于1921年10月16日建立了以潘德里·爱方捷利为首的新政府。

几个星期后，1921年11月9日，大使会议

在国联授权下作出了决定。希腊对南部的要求没有被受理，会议承认1913年规定的边界为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边界。雅典不得不把它的军队从1920年5月被他们占领的阿尔巴尼亚比利希提区的农村里撤出。相反地，大使会议改变北部边界时损害了阿尔巴尼亚，把有几万人口的大山区、留姆区的一部分和高洛包尔达的一些村庄给了南斯拉夫。大使会议在同一天通过的另一项决定里，承认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地位，使意大利获得了损害阿尔巴尼亚国家主权的权利。根据这个决定，其他国家对阿尔巴尼亚边界及其政治、经济独立的威胁，被认为是对意大利战略安全的威胁，因此三个大国——英、法、日——遇有这种情况时有权向国联建议委托意大利恢复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经济上的独立。

国联批准了大使会议的决定。阿尔巴尼亚政府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地拉那给边防军指挥官发出了停止作战的指示。但是贝尔格莱德不仅不停止军事行动，而且挑衅更加频繁。当时潘德里·爱方捷利政府下令指示阿尔巴尼亚军队在巴伊拉姆·楚里上校的指挥下，向集结在普卡区的南斯

拉夫匪帮发动总攻击；在阿赫梅特·索古上校的指挥下平复米尔吉塔骚动，因为这一骚动尚未被彻底镇压。在当地人民支援下，这些战役都胜利地结束了。几个星期后为最后确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边界而来的国际委员会，发现地拉那政府在阿尔巴尼亚边陲地区的人民中享有威信。

阿尔巴尼亚边境情况的相对稳定，为在国会内外展开前所未有的政治斗争创造了条件。为防止外部威胁而建立的“神圣同盟”瓦解了。于是，潘德里·爱方捷利政府失去了国会内的支柱。为了避免政府危机，根据总理的提议，阿尔巴尼亚国家最高会议发布了在1922年1月以前解散国会的法令，从而使政府享有一种特权，可以在这个期间不向任何人报告工作。这种做法使国内的民主力量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开始感到潘德里·爱方捷利总理的背后有一个具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的人作靠山（用当时的习惯说法），国内各政治集团已开始指出，这个人想要建立个人独裁政权。

这个人就是阿赫梅特·别依·索高勒，他自称阿赫梅特·索古。他生于马蒂区，是山区族长

哲里亚尔-巴夏·索高勒的孙子；这个族长当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妄想靠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的帮助成为阿尔巴尼亚（相当于现在阿尔巴尼亚的四分之一)的公爵。阿赫梅特·索古天性狡黠，他有无限的虚荣心，是一个阴谋家。他还在年青的时候就混入了政界。由于他“对祖国忠诚”、“注意”新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在马蒂继承下来的雇佣军队的巨大威力，引起了当时活动家的注意。他二十四岁左右就作为马蒂区的代表，由几百雇佣军护送着隆重地去参加鲁什涅代表大会。这个聪明狡猾的山区族长利用召开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微妙时刻，为自己在苏列曼·德尔维那政府中找到一个内务部长的职位。后来，阿赫梅特·索古把自己的雇佣军编入政府宪兵队，从而保证自己在部长会议里的特权地位，毫无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同僚。在德尔维那政府解散后，政治力量集团化了，阿赫梅特·索古没有再被任命为部长，他加入了人民党，同时和地主党的领导人物保持秘密联系。潘德里·爱方捷利总理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匈政权授予索古的上校军衔，并且任命他为派赴米尔吉塔镇压叛乱

的政府军队的指挥官（他同时是马蒂区的代表）。索古利用镇压叛乱分子的机会来加强他个人的军权。

爱方捷利总理同有实力的和虚荣心重的索古的密切合作，他们想使阿尔巴尼亚改而采取接近南斯拉夫的政策的倾向，以及他们在没有国会时企图使索古的拥护者参加政府的阴谋，使民主派感到不安。在民主派的强大压力下，最高会议于1921 年 12 月 6 日颁布了关于解散爱方捷利政府和成立反索古政府的法令，任命恰最姆·科楚里为新政府的总理。但是在新政府成立后几小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政权的最重要职位都在索古的手里，因此新政府经不住索古拥护者的攻击，在其被任命二十小时后便辞职了。以哈桑·普里什提纳为首的新的反索古政府（于 1921 年 12 月 7 日成立），过了四天也不得不辞职，以免引起索古用来威胁国家的内战。1921 年 12 月 10 日起到召开国会止的政府的职能，由伊·科斯屠里领导的"办事内阁"来执行。索古机灵地利用了政府的危机。他在 1921 年 12 月 14 日率领自己的军队来到了地拉那，宣布非常状态，马上召开国

会，迫使最高会议和科斯居里内阁辞职。在他的干预下选出的新的最高议会，于1921年12月24日委托索古的顺从工具札费尔·于皮成立新政府。索古本人充任内务部长。于是索古集团取得了政权。

内务部长索古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强个人权力。索古在稳定社会的借口下，开始解除人民的武装，把自己宝剑的锋芒对准反对自己的人，迫害包括反对索古的部长和议员的反对派代表。国会内外反对索古的强大的反对派形成了，他们想防止阿赫梅特·索古的"波拿巴"倾向的实现，要求立即召开制宪会议。许多索古的反对者，如巴伊拉姆·楚里、爱利耶兹·尤素夫、阿奇夫·比恰克丘、吉亚·迪布拉等人，知道范·诺里、斯达弗罗·维尼亚乌和路易·古拉库奇所进行的议会斗争，了解用自己的辩论技能不能取得所期望的结果，便决定用强力推翻索古集团。在1922年3月，这些索古的反对者（中间也有一些同外国有秘密联系的名利之徒），开始在"为召开制宪会议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武装起义。一部分起义者在3月22日甚至进入了首都。但是由于组织

得不好，起义失败了。起义者中的动摇不定的分子屈服于英国公使奥列斯的压力，放弃了首都。三月起义起先静息下去，随后又遭到了镇压。



巴伊拉姆·楚里（1862—1925 年）是 1911—1912 年反对土耳其占领者的解放起义和 1924 年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继镇压起义而来的是对反政府力量实行残酷恐怖手段。反索古的人从行政机关和军队中被驱逐出去了。几百人被关进了监狱。索古甚至强迫支援三月起义的希亚克周围的农民做非常沉重的工作。接着，他停止召开 1922 年秋季前的国会常会。为了欺骗舆论，5 月间政府允诺即行召开制宪会议，这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要求。9 月，政府将临时章程提



阿弗尼·卢斯德米（1897—1924年）

交国会审查，这个章程比鲁什涅代表大会所制定的章程要完备些。这个章程形式上宣布了民主自由。采取这些措施以后，1922年12月2日成立了新政府，阿赫梅特·索古任总理和内务部长。

但是，索古甚至采取许多警察措施也未能消除反对派的反抗。国会外反对索古的人数不断增加，因为在索古拒绝人民党的原则后，他同地主的秘密联系和他给予封建地主的帮助便日益明显了。反对索古独裁趋势的政治斗争，日益同反对传统的落后的封建势力的社会斗争溶合起来了。由于这种原因，反对派的力量重新改组了。由范·诺里、斯达弗罗·维尼亚乌、路易·古拉库奇和苏列曼·德尔

维那领导的人民党的最有觉悟的成员，在国会内建立了新的反对派阵线，它不仅反对索古本人，而且要推翻一般的封建政权，要摧毁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义余孽，建立民主政权。1922年10月，在国会外成立了以阿弗尼·卢斯德米为首的政治组织"同盟"社。这个组织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在国内进步青年中得到拥护。大量报纸和杂志的出版，反封建的团体和文化俱乐部的增多，特别是反对索古政府的政策的许多抗议、群众大会和罢工，都标志着反对派势力的扩大。

1924年六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索古政府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在1923年8月将制宪会议的选举法案提交国会。规定采用专用卡片和名册的两级选举制的选举法案，遭到国内反对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反对派为根本修改选举法案而在国会里进行了斗争；他们要求实行直接选举，而不是两级选举；要求注意大量的文盲，选举采用小圆球投票法而

不采用特制的表格，要求选民可以分别投每个候选人的票，而不是按照候选人名单选举；要求妇女有投票权；在选举日军队和宪兵不要走出营房。他们还要求对1922年三月运动的参加者，首先是跑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去的巴伊拉姆·楚里，宣布政治大赦。经过长时间热烈争论后，支持政府的国会的多数派没有理睬反对派的建议，于1923年9月28日批准了选举法，随后解散国会。全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气氛中开始了竞选运动。

在竞选运动中，全国分裂为两个大的政治阵营：其中之一是一切亲政府的组织，它们领取地主和索古本人的津贴，而索古则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领取为此所需的经费；另一个是组织涣散的反对派的许多组织，它公开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的阿尔巴尼亚的反封建、反帝、反独裁的纲领。过去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没有这样积极和这样大规模地参加过政治生活。人民的觉醒很快就成了对索古地主集团的威胁。为了抑制人民的觉醒，政府机关采取了恫吓和恐怖手段。它们甚至杀害准备勇敢地投反对派代表人物的票的选民。在政府的恐怖运动中，宪兵的公开干涉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3年12月27日选举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结束了。尽管伪造选票、恫吓和直接干涉，政府集团在国会中只取得了九十五个制宪会议席位中的四十个席位。以范·诺里为首的反对派占三十五个席位。在反对派的代表中有“同盟”社的主席阿弗尼·卢斯德米，他是巴伊拉姆·楚里的拥护者选出的。其余二十个席位由所谓“独立派”占有，他们在选举后加入了政府集团。

选举的结果激起了全国的极大愤怒。因此，反封建和反索古的运动不仅没有平静，而且更加高涨。全国各个角落给政府寄来很多信件，激烈地抗议伪造选票和采取恫吓与压制手段。在1924年2月2日制宪会议开幕后，国内的政治紧张程度加剧了，当时总理索古不顾民主准则，不辞职。

2月23日索古在国会门口被谋杀未成后才不得不辞职。谋刺他的是一个激情的大学生。政府把谋杀的责任硬加到反对派身上。在国会进行激烈斗争后，政府危机解决了，但是有利于封建集团。谢夫切特·维尔拉威、索古的岳父、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封建主之一，做了1924年3月3日所组成的新政府的总理。为了安慰反对派和不引

起独立派的不满，索古没有参加新政府，但是却在幕后准备用暴力夺取政权。4月初索古的代理人在马木腊西附近暗杀了两个从地拉那到斯库台去的美国旅行者。索古利用这件引起国内外愤怒的可耻的谋杀，经政府准许宣布非常状态，派军队包围了首都。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开始相信，靠宪法不能防止索古的独裁和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民主制度。人们日益开始认识到：只有采取强力行动才能战胜索古和地主的恶毒的阴险伎俩。1924年4月20日索古的代理人在地拉那暗杀了阿弗尼·卢斯德米。卢斯德米身受重伤，两天后便死了。这件事使人实难忍受。

阿弗尼·卢斯德米是一位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闻名的、卓越的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1920年6月13日他在巴黎杀死了叛徒艾沙特·托普塔尼，为祖国立下了功勋。他的被害，激起了全国的极大愤怒。国内各地区都举行了抗议大会。阿尔巴尼亚国内的进步团体把他的被刺看成恐怖迫害的序曲，索古地主集团想用这种迫害来反对反封建民主运动。反对派决定实行进攻。阿弗尼·

卢斯德米于1924年5月1日在发罗那安葬。约有一万农民和市民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送葬。在阿弗尼·卢斯德米安葬以后，制宪会议中反对派的代表们从发罗那向地拉那的最高会议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查出和惩处杀害阿尔巴尼亚公民和外国客人的凶手，同时他们直接点明了阿赫梅特·索古。因为政府没有答复这个最后通牒，在发罗那集会的四十三个代表在各民主阶层和各区军队司令官的支持下，决定宣布开始武装起义。为了领导起义，建立了由范·诺里领导的革命行政委员会。

巴伊拉姆·楚里在1924年5月25日发出了开始武装起义的第一个信号，几天之内他便在库克斯和迪布拉两地区取得了巨大胜利。1924年5月27日维尔拉威政府辞职，当日成立了以伊利阿兹·符里奥尼为总理的政府，这完全没有反映出事件的进程。5月31日斯库台和佩尔梅特的卫戍部队转到起义者方面来了，大量农民也参加了起义部队。6月2日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和城市被起义者所占领。开来进攻起义者的政府军和索古的雇佣军遭到了失败。6月10日起义部

队进入首都，而地主反动派的头子跑到国外去了：阿赫梅特·索古、泽诺·克律埃兹乌逃到南斯拉夫，缪费特·里波霍瓦、科乔·科塔逃往希腊，谢夫切特·维尔拉戚、伊利阿兹·符里奥尼等人逃往意大利。

在阿尔巴尼亚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个政权按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按动机来说是革命的，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它的民主的、反封建的、反帝的纲领，而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1924年6月16日民主政府成立了，范·诺里被任命为总理，内阁成员有苏列曼·德尔维那、路易·古拉库奇、斯达弗罗·维尼亚乌、卡塞姆·恰费节茨、列捷普·沙利亚、恰最姆·科楚里等人。过了三天，总理发表了施政纲领，其中扼要地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度要求：根除封建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彻底建立民主制度，使人民摆脱封建主的奴役；从经济上解放农民，建立“法律管一切人”的原则，法院真正独立；彻底修改过时的法律；清除国家官僚制度；改革赋税制度，调整预算，改组行政管理和教育制度，等等。

政府宣布 1923 年 12 月 27 日的选举无效，约许一俟国内建立了秩序和安定起来，即以秘密和直接投票方式进行制宪会议的新的选举。

诺里政府开始进行活动时就采取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措施。它从一开始就宣布民主自由，保证全体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法院根据政府的起诉，判处在国外的最著名的反动头子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农业部开始研究实行土地改革问题以便为无地农民解决土地。政府设法同邻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开始审查索古政府签订的不利于阿尔巴尼亚的商约等等。

但是诺里政府，在其成立的最初日子，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就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国内参加革命的力量，在 6 月 10 日后开始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赞成社会和政治改革；一个反对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分子也参加了六月革命，他们只想推翻阿赫梅特·索古个人的独裁政权。军事集团在保守分子的支持下及某些政府成员的默认和公开同意下，开始对政府及其总理施加压力，以使他们停止或延缓实行激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在 1925

年，国际条件对革命运动不利：列强不支持不给予外国资本租让权和特权的政府，因为这特别损害了法西斯意大利及其对手——反动的南斯拉夫的利益。它们为了进行反阿尔巴尼亚的宣传，热中于利用诺里政府所提出的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倡议，以及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发出的为保卫阿尔巴尼亚的反封建解放革命而斗争的号召。没有一个大国"正式"承认诺里政府。这无疑是诺里政府的一大弱点，它鼓舞了国内外的不满分子。

在这种条件下，革命的领导者延缓实行6月所宣布的纲领，以期不"引起"国内反动派的武装的敌对行为，不使同列强本来就很冷淡的关系更加尖锐化。关于"布尔什维克"倾向的挑拨性的指责，迫使政府成员延缓解决最主要的一个革命问题——实行土改问题，并且要求前来地拉那呈递国书的苏联全权公使，于24小时内离开阿尔巴尼亚。政府大多数成员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革命力量。

地主-索古反动派利用了这个弱点。但反动力量如果没有外国的直接支持和干涉仍然不能改

变现状。阿赫梅特·索古同南斯拉夫政府进行谈判以便组织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干涉。贝尔格莱德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给予索古以有效的援助。索古在南斯拉夫境内招募军队，并且用贝尔格莱德交给他的俄国白卫军来加强这支部队。于是他有了一支装备有枪枝和大炮的十万人左右的军队。索古的同伙——缪费特·里波霍瓦和科乔·科塔——也在希腊进行同样的勾当，他们也招募了士兵。

在反革命加紧进行准备的条件下，诺里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当政府致力于制宪会议选举前的竞选运动时，武装干涉军于1924年12月10日在阿赫梅特·索古的指挥下开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边境，企图在选举前推翻6月成立的革命政权。12月14日缪费特·里波霍瓦和科乔·科塔的雇佣军也开到了希腊、阿尔巴尼亚边境。阿赫梅特·索古的干涉军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便深入到阿尔巴尼亚境内。经过两星期的战斗，反革命军队由于人数上的优势，并趁政府机关的张皇失措，于1924年12月24日进入了地拉那。范·诺里和其他政府成员同几百名民主和革

命分子跑到国外去了。

首都陷落几天后，地主-索古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在整个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反人民的政权。

索古共和国时期

随着外国干涉军于1924年12月24日进入地拉那，大地主伊利阿兹·符里奥尼政府正式掌握了政权（这个政府原是同年6月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的）。实际上全部政权操在阿赫梅特·索古手中，他是反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形式上他只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独裁者想用这种策略来表明对宪法准则的尊重。几天之后符里奥尼政府辞职。1925年1月6日以阿赫梅特·索古为首的新政府组成（索古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外交部长）。还有两个部长——反革命的其他两个领导者：缪费特·里波霍瓦（管三个部）和科乔·科塔（独裁者的工具、没有人格的人），也参加了索古政府。

索古差不多把全部政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以后，便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以便在国内完全消灭民主精神，显示自己独裁权威的力量。他把阿尔巴尼亚划分为若干军区，任命不熟悉城市生活的准则和原则的山区族长为军区司令。他们的雇佣匪帮到处宣布非常状态。借口解除支援革命的那部分人民的武装，非常状态又保持了很长时期。讨伐战役一直继续了好几个月。许多人被关进监牢或者被流放。军事法庭判处许多参加六月革命的农民以死刑。在乡村和城市，雇佣匪帮在没有参加最近事件的居民家里进行搜查。特别是雇佣军的指挥官借收税和受贿任意掠夺人民。

索古不仅取消了六月革命所获得的自由，而且取消了原有的自由。政治团体，以及文化俱乐部都被解散了。禁止成立新的政治团体。规定不仅对阿尔巴尼亚的书报和外国出版物进行检查，而且对个人通信也进行检查。

索古在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政体和当时已经中断的制宪工作上。当时，索古为了不引起异议，宁愿实行共和国制度。奉索古之命，在1923年选出的制宪会议

的现有代表被召集到地拉那来。这个残缺不全的制宪会议于1925年1月21日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过了十天，即1月31日，宣布阿赫梅特·索古为共和国总统。1925年3月2日最后批准宪法。

充满民主词句的宪法宣布阿尔巴尼亚是依据人民意志建立的国会制共和国。但是蛊惑的词句掩盖着索古的独裁政体和地主、反动山区族长、保守资产阶级的政权。根据宪法，共和国总统，即索古，同时是总理和军队总司令。立法权由两院——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国会行使。宪法给予共和国总统以无限职权。他有权无需任何提议而任命或免除部长、高级官吏、军官等等。如果国会修改索古作为总理所提出的草案，则索古作为共和国总统有权否决国会批准的法令。

在共和国总统索古进行任命后，政府的职位（政府在1925年2月1日进行了改组）集中到了反动分子头子——缪费特·里波霍瓦、泽诺·克律埃兹乌、科乔·科塔手里。索古还加强了宪兵队，他在1925年9月委托以西特·约库凌·柏尔西将军为首的英国军官团组织宪兵队。同时他极

力拉拢尽量多的反动的山区族长，在他本人于6月组织的“会议”上答应给予他们以政治特权，并根据他所给予的官级保证他们月薪。在反对民主人士的恐怖政策背景下，他的间谍于1925年3月2日在巴里（意大利）的一条街上刺杀了阿尔巴尼亚民族和民主运动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路易·古拉库奇。过了四个星期，即1925年3月29日，索古的宪兵队在德腊果比亚的武装冲突中杀死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著名的解放运动领导者之一巴伊拉姆·楚里。在索古一生所进行的所有恐怖勾当中，对于阿尔巴尼亚政治生活中这两位光荣的活动家的杀害，产生了特别恶劣的印象。

索古在国内执行顽固的反民主的政策，而对列强则执行投降的政策。这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欠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曾帮助他完成了1924年12月的反革命。他对它们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这种政策，1925—1928年是阿尔巴尼亚史上国际帝国主义资本向这个落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阵地冲击和掠夺的时期。

开矿是个吸引人的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主义

公司要求给予开矿的租让权。两个最大的英国资本主义公司通过租让取得了二十二万公顷土地以便进行矿产勘探，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之一（纽约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租让取得了八万公顷土地，以便进行石油和各种矿产，如铁、水银、铜、硫磺等等的勘探。意大利资本主义公司阿伊帕、西姆撒、西格马工厂，也获得了勘探、开采石油、沥青、煤炭等等的权利。南斯拉夫的一个公司通过租让取得了开采普卡区铜矿的权利。外国资本主义公司通过同阿尔巴尼亚索古政府签订的合同，租借了阿尔巴尼亚23%的土地。而阿尔巴尼亚资本家共取得了阿尔巴尼亚0.03%的土地，即仅等于外国资本主义公司所取得的土地的七百四十五分之一。

外国资本主义公司除取得开采矿产的租让权以外，还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取得了租让权。租让附有有利于外国公司的许多特权。阿尔巴尼亚国家对于这些公司的经济和行政活动差不多不进行监督。

索古由于在他进行反革命时南斯拉夫曾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酬谢贝尔

格莱德，这就破坏了阿尔巴尼亚爱国者通过斗争所确定的阿尔巴尼亚政治边界。象上面已经指出的，大使会议受国联的委托，规定了不利于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最后边界。这时贝尔格莱德抗议对这个问题的决定，要求把已经给予阿尔巴尼亚的佛尔蒙什和圣那乌木给予南斯拉夫。大使会议不顾南斯拉夫的顽强要求，根据专门委员会在当地进行研究后所作出的报告，用1923年9月的决定确认原先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贝尔格莱德的再次顽强要求后，大使会议于1924年5月决定不能满足南斯拉夫对于佛尔蒙什（已承认是阿尔巴尼亚的）的要求，关于圣那乌木问题等以后再研究。同年9月又审查了这个问题。范·诺里总理认为使边界不受侵犯是公民的最高职责，他同巴伊拉姆·楚里和路易·古拉库奇一起去日内瓦，在那里通过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光辉辩护帮助对这个问题做出有利于阿尔巴尼亚的积极决定——使圣那乌木仍留在阿尔巴尼亚境内。

阿赫梅特·索古一执政，便把圣那乌木给了南斯拉夫。这种做法在阿尔巴尼亚引起了普遍愤

怒。社会舆论指责他是祖国的叛徒。

索古同贝尔格莱德的密切联系，使阿尔巴尼亚陷于从属于南斯拉夫的地位，这引起了在地中海区域奉行强硬政策的法西斯意大利的不安。法国支持南斯拉夫，墨索里尼认为法国是当时帝国主义意大利最强大的对手。法西斯独裁者不能允许法国在他眼前向阿尔巴尼亚扩大势力。英国乘机在东南欧实行使势力均衡的政策，唆使意大利向阿尔巴尼亚扩大有损于南斯拉夫、亦即有损于法国的势力。英国有巨大的可能在这方面活动，因为索古把它的劝告看得重于其他列强的劝告。还在1925年1月30日索古就企图安慰墨索里尼，通知他说，他认为建立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可能的。不进一步发展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关系对索古是有利的，因为他已被揭露为南斯拉夫政府手中的工具，而南斯拉夫政府由于残酷地压迫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百万左右的居民，并继续提出有损于阿尔巴尼亚的沙文主义要求，在阿尔巴尼亚公众中是不得人心的。相反地，意大利答应给予索古刽子手比南斯拉夫更多的政治和财政上的援助。墨索里尼答应只要索

古断绝同贝尔格莱德的来往，就停止罗马给予阿尔巴尼亚政治流亡者(索古的不可调和的对手)的支援。

这种来往在1925年春无形中断绝了。英国是意大利同阿尔巴尼亚接近的牵线人。接近的第一步是给予意大利以建立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Banca Nazionale d'Albania)的租让权。

阿尔巴尼亚从来还没有过本国货币、统一的币制、正式的信用机构。从1912年起，特别是从1920年起，阿尔巴尼亚的一些财主和外国的金融机构，就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了关于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发行和信用银行的许多建议。由于建议中所提出的条件做不到，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相反地，索古委托财政部长缪费特·里波霍瓦于1925年3月25日同代表意大利最大银行的一些意大利金融资本家签订了协定，依照协定，金融集团取得了建立阿尔巴尼亚发行和信用国民银行的租让权，其条件比以前建议中提出的更为苛刻。按照协定，阿尔巴尼亚人有权购买不超过49%的银行股票，而外国人则有权购买不少于51%的银行股票。此外，根据财政部长缪费特·里波霍瓦

同意大利财团代表马略·阿尔别尔提所签订的协定，给予阿尔巴尼亚人购买股票的期限非常短，而且没有宣布这个期限。期满之后意大利人可以购买这些股票。到期时原来只有三个地主购买了25%的股票，而且几年后又由意大利的最大银行买去了。只有一小部分股票落到瑞士、比利时和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手中。

建立银行的协定的签订及其实现的方式在阿尔巴尼亚成了政治上的一件丑事。政府被指责为贪污和新的背叛。索古为了不使这件丑事损害自己的名誉，没有找到别的出路，只好把全部责任推到财政部长缪费特·里波霍瓦身上。国会所责成的调查财政部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活动的特别委员会，在发现贪污的线路一直通到总统府以后，立即停止了侦查。缪费特·里波霍瓦被弄得信誉扫地，不得不离开政府和政治生活。在这件事情上，索古虽然未能稳定激昂的舆论，但仍然取得了另一个成就：使最亲近的但是野心很大的一个同僚离开，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他，而且也不想同他共享共同取得的政权。至于协定，则它并没有改动，反而由国会批准了。随后，在1925年9

月2日，罗马方面批准了所谓“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

同时，索古政府同意大利的另一个金融“团体”签订了关于给予它七千零五十万金法郎借款的合同。这笔借款规定四十年还清，年息7.5%。

预定用来发展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这笔借款，根据协定交意大利财团为此目的专门成立的意大利公司即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公司（Società per lo Sviluppo Economico dell'Albania）经管。正象合同中所规定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为取得借款，将每年为数八百五十万金法郎的关税收入和阿尔巴尼亚国家专卖事业收入，交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公司作为保证金，并规定在四十年内如不事先同外国公司商议，不能对关税率作任何修改。

这两项协定意味着意大利资本任意渗入阿尔巴尼亚的开端，并很快地使阿尔巴尼亚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从属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当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轻易地垄断了阿尔巴尼亚的货币流通时，斯瓦公司给阿尔巴尼亚国家造成了极烦恼的事情。规定用来发展阿尔巴尼亚经济的借款，被用于非生产投资——建筑监狱和政府大楼（包括

索古的大楼)，用于建筑预定为意大利战略目的服务的道路。合同规定用三千一百二十万金法郎来提高落后的农业，可是实际上只用了二百五十万金法郎。此外，在签订合同后不到两年，墨索里尼利用阿尔巴尼亚国家在第一次还债时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干涉，并把阿尔巴尼亚欠意大利财团的债务改为阿尔巴尼亚欠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债务。

从属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就象从属沙文主义南斯拉夫的政策一样，也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愤怒。但是索古在反革命时期已摧毁了一切民主团体，而警察制度是这样强大，以致公开表示抗议如果说并非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侨居外国的阿尔巴尼亚爱国民主人士发出了抗议，但在整个欧洲政治稳定和革命低潮的条件下，这种声音就象在荒凉的沙漠里一样没有引起反响。尽管如此，不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国外，都采取了组织积极反抗的步骤。这些步骤在阿尔巴尼亚没有获得成功。反之，在侨民中间却取得了一些成就。当1924年12月墨索里尼不让侨居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再住下去时，他们就移往

奥地利。他们在维也纳召开了代表会议，会议于1925年3月25日成立了以范·诺里为首的全国革命委员会，它将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反对索古政权，争取阿尔巴尼亚从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确立共和制度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斗争。全国革命委员会公开指责了把圣那乌木给与南斯拉夫的背叛行为和有利于意大利的奴役性的三月协定。没有过多少时候，右派分子恰·科楚里、阿·克尔楚拉、列·米特罗维察等人，不同意全国革命委员会强调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因为他们想把委员会的活动限于只是推翻索古，他们退出了委员会，成立了独立组织“国民同盟”。与继续保持政治独立性和革命精神的全国革命委员会不同，“国民同盟”开始倾向于同索古的关系日益恶化的南斯拉夫和破坏了自己同意大利的关系的法国。

1926年索古进一步采取了同意大利接近的步骤。当同年6月南斯拉夫国会没有批准涅杜诺(Неттуно)协定时（这一协定保障了斯拉夫人在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在南斯拉夫的文化权利），墨索里尼采取了反措施，要求索古签订意大利和阿尔

巴尼亚之间的军事政治条约。在罗马和地拉那谈判的进程中，贝尔格莱德企图用内部的武装起义推翻阿尔巴尼亚总统。由于逃到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政治流亡者利用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不满而进行活动(1924年索古也曾这样做过)，1926年11月20日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杜卡吉因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索古镇压了起义。但是起义使得索古如此不安，以致不再多加考虑就于1926年11月27日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意阿友好安全条约》，或者象索古另外称呼的，“第一个地拉那条约”。根据条约，意大利承担了保护阿尔巴尼亚在政治、法律和领土上维持原状的责任。

显然，地拉那条约是反对贝尔格莱德的，因为它向南斯拉夫暗示，南斯拉夫想改变阿尔巴尼亚政局的任何行动，都会遭到意大利的反击。这个条约是墨索里尼的胜利，因为它堵塞了南斯拉夫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的道路，把索古拴在罗马，就象把犯人拴在绞索上一样。这样，“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就成了意大利的保护国。民族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民主人士提出的任务，不仅是为人民政权而斗争，而且是为了

祖国从外国保护下获得民族解放而斗争。这个纲领是全国革命委员会在1927年春天通过的，该委员会因此改名为“民族解放委员会”，总部设在日内瓦。

地拉那条约意味着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政策的破产，因此它在1926年12月8日引起了贝尔格莱德的政府危机。上台执政的新政府继续奉行积极反对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政策及接近法国的政策。由于阿南关系的恶化，1927年6月阿南的外交关系中断了一个月。外交关系破裂的导因是，地拉那的警察逮捕了在南斯拉夫代表机关服务的阿尔巴尼亚人并以间谍定罪。索古为了回答贝尔格莱德在阿尔巴尼亚组织破坏行动的企图，在1927年12月在布拉格杀死了自己的内兄、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阿尔巴尼亚全权公使泽诺·克律埃兹乌，他是同南斯拉夫政府有秘密联系的反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这时意南关系和意法关系极为恶化。为了反击墨索里尼的威胁，法国和南斯拉夫在1927年11月11日签订了锋芒指向罗马的友好条约。墨索里尼和索古在1927年11月22日签订了名为《同盟防御条约》的第二个

地拉那条约，有效期为20年，作为回答。按照这项条约，双方在遇到威胁或外国攻击时必须以彼此提供他们拥有的一切资财的办法互相支援。

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命脉由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公司掌握，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武器和装备由罗马政府出钱购买，阿尔巴尼亚军队由意大利法西斯军官领导，意大利军舰可以自由出入重要的海港发罗那。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地拉那条约不过是使索古派的阿尔巴尼亚在政治上更加从属于法西斯意大利罢了。

阿尔巴尼亚——索古君主国

同意大利密切接近以及给予墨索里尼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使阿赫梅特·索古有可能实现他的一个居然能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朝夕思慕的希望——做皇帝的希望。

索古力图做皇帝，为的是使自己的专制权力永世长存，使自己的同僚和人民群众打消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后可以由新总统来代替他的幻想，同

时使他可以不再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墨索里尼立即支持他实现这个离奇的愿望，因为他认为这是畅行无阻地行使他已经得到而且将来按照他那凯撒式的野心仍然可望得到的租让权和特权的保证。

英国（索古总是同它商议）支持这个徒骛虚名、幻想同欧洲和世界的“纯血统的”皇帝攀亲戚的山区族长的思想。

索古考虑到他可能遇到的障碍，竭力为他坐上国王宝座扫清道路。这种障碍不仅可能来自怀有共和思想的人民，而且可能来自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这些同僚迄今还和他共享政治权力，虽然他料定他们一定要反对他做皇帝。索古利用国会调查把强大的封建主缪费特·里波霍瓦逐出了政治生活（他通过自己的私人医生把后者毒死了），又杀死了同样强大的封建主泽诺·克律侯兹乌，以后索古在地拉那组织谋杀他过去的岳父、更强大的封建主谢夫切特·维尔拉戚。谋杀虽然失败了，但使谢夫切特·维尔拉戚离开了阿尔巴尼亚，提前脱离了政治生活。索古强迫国会议长艾什烈夫·弗拉舍里辞职，并且对他的所谓舞弊

行为组织了调查，从而破坏了他的威信，迫使他离开了政治生活。

1928年6月，索古以总统身分批准了国会关于对宪法进行总的重新审查的决定，宣布解散上下两院和召开制宪会议。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是于1928年8月17日在宪兵队的公开监督下进行的。选举一结束，舆论就间接地提出了改变政体的消息。于是，1928年9月1日，在制宪会议开幕后几天，就宣布阿尔巴尼亚为君主国，阿赫梅特·索古为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阿尔巴尼亚）的皇帝，号称索古一世。1928年9月5日，君主制的阿尔巴尼亚的第一届政府成立，总理为科乔·科塔。

索古在实现了自己朝夕思慕的梦想以后，不能不考虑到人民群众对他所实行的有利于个人专制、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的痛恨。他不能不考虑到，他所保卫的地主所有制是农民群众灾难的根源，他的有利于外国资本的经济政策窒杀了年轻的阿尔巴尼亚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不满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不满结合在一起，乃是对他的皇

位的巨大威胁。索古事先同他的国内外朋友进行了磋商，1928年12月5日他在致王朝第一届国会的咨文里宣布了新的内政方针，即所谓新“改革”方针。他答应按照欧洲各文明国家的榜样给国家制定新的法律，并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改革。

这是一种十分诱人的蛊惑宣传，目的是要在心怀不满的各个居民阶层中间制造幻想。宫廷里的人把索古称为“改革”皇帝。但是过了很久才成立了负责起草改革方案的委员会。事情终于做出了一些。1929年4月1日以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为基础的民法典生效了，代替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法典。1930年刑法典生效。1931年根据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商法典的精神制定的商法典生效。考虑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对金融立法和关税率作了一些修改。这样，索古政权就走上了资产阶级的道路。但是改革没有进一步进行。起草土地改革方案的委员会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为此请了一位意大利专家来就地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政府制定的法律草案为国会批准了。1930年5月3日索古终于发布了土地改革法。政府报刊大肆宣

扬，说这项法律是索古政权最激进的步骤之一，它将一劳永逸地消灭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义残余。实际上它不仅徒有其表，缺点很多，而且没有触及地主的利益。土地改革法一年一年地延搁下去不予实行，后来终于被人遗忘了。土地改革仅包括四千六百九十八公顷国有土地和三千四百一十一公顷地主土地。如果考虑到国家拥有四万零六百四十公顷土地，私有者拥有十万零三千公顷以上的土地，那末这些土地是为数极少的。很快就明白了，索古搞这种蛊惑宣传的把戏，是为了用土地改革来对付那些反对自己的地主。

索古在对外国资本的门户开放政策方面没有做任何重大改变。"新东西"只是宣布君主政体后索古政府把全部租让权都转给意大利帝国主义资本家了。

关于所谓改革的叫嚷，没有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长期幻想的基础。因为大地主照旧自由地实行自己的残酷统治，农民群众不能不对保护封建主的横行霸道的政府提出抗议。果里察农民和贪婪的地主马里奇·弗拉舍里之间的公开冲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地主在土地改革法公布后

几个月，在地方政权的帮助下，擅自从农民那里夺回了土地。工人也指责索古政权，说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公司剥削他们，工资太少，外国厂主在他们家里——在阿尔巴尼亚——歧视他们。阿尔巴尼亚从来没有过象在索古王朝初期这样多次数的工人罢工。“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对于法西斯意大利的从属是这样明显，以致爱国民主人士不能不预见到索古这个独裁者将使他们的祖国遭到的惨祸。

这些年来由于劳动人民对当局的社会仇恨和政治仇恨，人们采取了一些最初的步骤来组织积极反抗索古政权的活动。正是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建立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基层组织。1930 年在科尔察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遵循了共产国际的纲领(虽然不够十分彻底)，力图渗入工会组织，而且并非没有成效。还不到一年，在其他城市——地拉那、发罗那、爱尔巴桑等等——也建立了共产主义革命小组。1931 年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在墙上张贴了“打倒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的传单，从而表明它已在从事秘密活动。

反索古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想组织起来，以便推翻索古政权。但1930年他们在发罗那建立的组织基本上是密谋性质的。它的那些同流亡的组织“国民同盟”有联系的领导者，不相信国内的革命力量，而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部的援助，特别是南斯拉夫方面的帮助。1931年“国民同盟”在维也纳组织谋杀前来治病的索古，但是没有成功。之后，发罗那组织的领导者要求南斯拉夫给予有效的援助，以便组织武装起义。但起义没有搞成，因为1932年夏索古搜捕了发罗那组织的人员，并且完全摧毁了它。

以后几年，阿尔巴尼亚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了。从1929年起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总危机也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农业国家。危机在这里甚至比在其他小国还留下了更多的痕迹。1934年危机在阿尔巴尼亚达到了顶点，而不是象其他国家那样在1932年达到顶点。和各处一样，这里的危机也使购买力大大降低，从而也引起了物价的暴跌。同1928年比较，1930年食品价格为80%，1932年为69%，1934年则为38%。价格的降低引起商品出口额的降低。与1928年比较，商品出

口额在1930年降到83%，1932年降到30%，1934年则降到29%。不论过去和现在，商品出口额总是比商品进口额低得多；1928年商品出口额为商品进口额的46.4%，1930年为37.2%，1932年为19.7%，1934年为35%。国际贸易的入超也影响到国际收支。从1920年到1934年商品进口总值为二亿五千五百九十万金法郎，而同期商品出口总值为一万零四百三十万金法郎，这就是说，贸易赤字为一亿五千一百六十万金法郎。阿尔巴尼亚侨民寄回祖国的金银，只能略微弥补阿尔巴尼亚被迫用来弥补贸易赤字而输出的金银。这种赤字必然使阿尔巴尼亚的货币资金匮乏和降低居民的购买力。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初几年，阿尔巴尼亚从意大利得到的借款，把国际收支赤字弥补到了一定程度。

在同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公司（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公司在几年内在建筑业方面建立了一支有几千粗工的工人大军）签订借款后，1931年索古同罗马签订了总数为一亿金法郎的借款协定，阿尔巴尼亚将每年从这笔借款中得到一千万金法郎。但是当索古希望哪怕在十年内用大量借款使

自已摆脱国家预算和国际收支上经常出现的赤字所造成的种种麻烦时，借款在墨索里尼手中就变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国家、特别是对索古本人施加压力和进行恫吓的工具。一年后，即1932年，墨索里尼利用索古又无力偿还欠斯瓦的第一笔债务的机会，提出了建立阿意关税同盟作为延期还债的先决条件。

这样，索古就突然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关税同盟将使意大利工业品畅行无阻地进入阿尔巴尼亚。其结果将是，被经济危机震撼了的阿尔巴尼亚的小生产者破产，国家经济的贫困化，阿尔巴尼亚经济同意大利经济彻底一体化。另一方面，关税同盟意味着意阿进出口关税的全部收入将从阿尔巴尼亚国家预算中消失，而这将使索古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也就是说，索古政府将完全依赖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财政贷款。拒绝墨索里尼的要求将造成麻烦的局势，引起这个法西斯独裁者的反对（这时这个独裁者已用经济和政治的绳索把阿尔巴尼亚皇帝绑起来了），也将使阿尔巴尼亚发生足以摇撼王权的困难。

索古试图反抗，他向墨索里尼暗示，如果罗

马企图把刀子更深地刺进阿尔巴尼亚的身体，他将被迫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外政策。作为警告，他在秋天把罗马在阿尔巴尼亚开设的四所职业学校收归国有。墨索里尼则在1933年4月1日，即阿尔巴尼亚财政年度开始时，停付一亿贷款，作为回答。索古试图进一步反抗。他开放了所有私人的学校，这个措施打击了拿罗马的津贴由阿尔巴尼亚天主教神甫管理的学校。索古拒绝重新同意大利签订协定，让法西斯将军阿里贝托·帕里阿尼率领的人数不少的意大利军事顾问继续留在阿尔巴尼亚军队中。

索古所采取的措施——把外国学校收归国有和把意大利军事代表团赶走——很受阿尔巴尼亚舆论欢迎，因为这些措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象他迄今为止的投降政策有所转变。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自从索古1925年实行对墨索里尼投降的政策以后，他就没有进行任何反抗的手段了。贷款的中断使地拉那政府的财政状况异常困难。建设停顿了。此后，失业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库极其空虚，以致政府无力支付行政机关职员的薪金。各地区的公务人员和教员七到十个月没

有得到薪金，首都的公务人员和教员四个月没有得到薪金。为使阿尔巴尼亚的状况更加恶化，意大利领导者所控制的国民银行减少了货币流通量，从而人为地造成了通货紧缩的状况，虽然他们拥有黄金储备，而其他国家为了减轻危机，已转入通货膨胀状况。结果，阿尔巴尼亚发生了空前匮乏的现象。流通中的货币的缺乏使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经济破产。

人民群众耐心地度过了这个极端困乏的时期。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而且也不愿意恶化、更不愿意断绝同意大利的关系的索古，又采取步骤同罗马恢复了原来的关系。站在更加巩固的地位上的墨索里尼胃口更大了。他在以强硬口气写成的通牒里向索古提出了许多新的、更加苛刻的要求，例如要求阿尔巴尼亚废止同外国签订的一切贸易协定；要求他同其他强国签订每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时都要取得罗马的同意；要求从阿尔巴尼亚驱逐出所有作为监督员在阿尔巴尼亚宪兵队中服务的英国军官，而用意大利的军官代替他们；要求意大利语成为阿尔巴尼亚学校中的必修语；要求

国家行政机关中增加在意大利受过教育的专家；等等。

索古没有接受这些条件。他想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于是采取了同意大利的对手法国接近的步骤，要求同它缔结友好协定，首先是关于给阿尔巴尼亚以国家贷款的协定，以便克服困难的财政状况。1934 年 5 月，巴黎在回答阿尔巴尼亚的要求时提出了和罗马一样的奴役性的条件。在索古进行了这些活动以后，墨索里尼使自己的舰队动作起来。1934 年 6 月 22 日，二十二艘意大利军舰预先不作通知就开进了都拉斯港，没有请求允许就抛了锚。索古在公开威胁面前，依照英国政府的劝告而投降了。为了精神上的安慰，他同意只有在意大利军舰离开阿尔巴尼亚海岸后才进行谈判。墨索里尼考虑到索古在阿尔巴尼亚的舆论下所处的尴尬地位，放弃了某些太过分的要求，例如要求建立关税同盟和废除阿尔巴尼亚同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其余的要求，索古都予以满足了。于是两国接近没有什么困难了。这种新的接近意味着阿尔巴尼亚对法西斯意大利的完全从属。

这种接近没有改善国内贫穷的经济情况。工人和农民生活很苦。国家仍然处于财政危机中。因为意大利的“援助”现在被“吸液管”吸去了，预算仍然有巨大赤字。1935 年总的经济情况象 1934 年一样的悲惨。总的贫穷情况由于空前旱灾带来的粮食危机而更加严重了。在这种条件下索古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人民的疾苦。而在 1934—35 财政年度，国家预算仍然具有原先的反人民的性质。捐税制度没有作任何修改以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至于支出，41.37％用作军费，18.7％归财政部（包括皇宫的开支）。而在这一年皇宫消耗了国家预算资金的 3.7％，管理农业和工业的国民经济部只得到了约 2.4％的预算资金。

普遍的贫困化，首先是索古政府对意大利的投降，更加推动了意阿关系紧张时期似乎就要爆发的人民运动。1935 年标志着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急剧增长。这种运动在秘密状态和在警察迫害下继续壮大了。在国内反索古集团中，又提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以便推翻这个专制帝王，这个专制帝王通过自己的投降政策为法西斯意大利迅速占领阿尔巴尼亚作好了准备。参加过

六月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军人和文人所加入的"秘密团体"，提出了不同外国人联系而在比1932年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武装起义的任务。对于这些准备工作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是清楚的；他们没有以组织的名义出现，但决定支持每一个反



阿里·凯尔曼第（1897—1939年）——阿尔巴尼亚最初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一

索古的起义，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秘密团体"的密谋性质而且武装起义也只是在表面上作了准备。思想上更加成熟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阿里·凯尔曼第、里札·采罗瓦等人怀疑如果农民群众不参加起义，如果没有向他们进行思想工作（这种工作同"秘密团体"的密谋性质不能并容），

武装起义是否会胜利。然而共产主义者在准备起义方面还是做了巨大的工作，这表明他们是最积极最大胆的鼓动家。另一方面，“秘密团体”的首领为了扩大起义阵线，同意和反索古的地主官僚合作，但后者的参加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起义的民主性。

武装起义决定1935年8月15日同时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以迷惑索古的宪兵队和使起义易于迅速扩大。可是在规定日期的头一天，即1935年8月14日，“秘密团体”费里小组的领导人看到，出生于奥地利的索古派将军列昂·德·基拉尔德来到了他们的城市（实际上他是因为其他任务经过费里市的），于是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已被警察发觉）决定开始武装起义。将军被杀死，起义者在顺利地拿下全市以后，经过鲁什涅向地拉那前进。但是鲁什涅的索古的军队在这时加以反抗，这就使得中央机关有可能派大量的政府军队去援助他们，援军战胜了起义者。在第二天，其他城市“秘密团体”小组由于费里运动失败在精神上受了挫折，未敢发动起义。只有里札·采罗瓦领导下的贝拉特共产主义者守信用，开始武装起

义。由于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成了宪兵队迫害的对象，最后他们被击溃了，而他们的领导者里札·采罗瓦也在8月22日的战斗中牺牲了。

八月运动，所谓“费里”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在阿尔巴尼亚得到了巨大反应。逮捕了两千多人仍不能使在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索古集团安心。这次不可能把组织起义归罪于外国人。索古向阿尔巴尼亚社会让了步。1935年10月15日，他强迫潘德里·爱方捷利政府辞职，1935年10月21日新政府执政，总理是著名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梅赫吉·弗拉舍里，部长们都是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自由主义政府纲领中两项主要之点是：继续进行皇帝早已宣布的但是未为反动的保守的统治者实行的进步改革，实行王国法令中已经宣布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原则；但这个规定不包括对皇帝本人、帝制和对外政策的批评。

即使是答应给予的有限的自由，也推动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充满了年轻的文艺和政论人材的新的报刊，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各省开始增多起来了。人们最猛烈地批评了种种社会弊



1936年2月21日索古宪兵驱散工人为反抗失业和贫困在科尔察组织的游行示威

端：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到处存在的失业现象，没有劳动保护的立法，没有保护地方资本不受外国资本侵犯的立法，国家的财政破产，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和采取措施消除人民普遍贫困化方面的消极态度，等等。还用影射的语言批评了索古政权的对外政策和寄生性。政治生活的活跃为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934年在科尔察成立了名为“劳动”的工会，库恰瓦（大石油区）的工人建立了同名的工会，

以便保护自己处于意大利资本主义公司阿伊帕(АИПА)残酷剥削和殖民主义歧视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个公司经营整个库恰瓦石油区）。在这以后，国内其他矿业中心的工人也向政府要求允许照他们的例子建立工会。

但是政府官员的蛊惑辞句很快就完了。答应的改革还留在纸上，这时所谓“自由主义的”梅赫吉·弗拉舍里政府非常轻易地采取了镇压手段。政府在两千阿尔巴尼亚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上站在阿伊帕公司一边。当1936年2月11日石油工业工人为抗议阿伊帕公司开除“劳动”工会一些领导者而宣布总罢工时，政府用宪兵队镇压罢工，逮捕了许多工人积极分子。

过了几天，即1936年2月19日，科尔察市的手工制鞋工人为了抗议政府允许在该市建设制鞋厂而关闭了自己的作坊。他们的要求是由经济破产的危险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所引起的，他们认为这样便可以中止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以利于小家庭手工业生产，但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广泛居民阶层的支持。在共产主义者参与后，手工制鞋工人的要求做了一些修改。1936年2月21

日，科尔察的全体工人同手工制鞋工人一起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以抗议失业和贫困。政府机关调来了宪兵，他们毒打并大肆逮捕工人，以回答工人的“要面包！”“要工作！”的呼声。过了几个钟点，工人和市内的大学生又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机关的暴行和逮捕无辜工人。游行示威被宪兵队驱散了，宪兵队这次向工人开了枪。“自由主义”政府靠宪兵队镇压了以后几星期在国内另一些城市组织的一些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在对外政策方面，梅赫吉·弗拉舍里政府也走上了向法西斯意大利完全投降的道路。1936 年 3 月罗马和地拉那签订了几个经济条约，规定意大利给予阿尔巴尼亚新的借款，而阿尔巴尼亚则给予意大利新的租让权。同时还签订了秘密的政治和军事性的条约，条约确定了意大利政府对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完全控制权。阿尔巴尼亚承担了用意大利贷款修建通向阿南边界的战略道路的义务。1936 年 3 月的一些协定为以后法西斯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准备了条件。

在人民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被揭露的无能的梅赫吉·弗拉舍里政府不能再为索古的政治目的

服务了，索古现在想回到“铁腕”政策上去。在索古的授意下，国会表决不信任梅赫吉·弗拉舍里政府。同日，即1936年11月7日，梅赫吉·弗拉舍里政府辞职。过了两天，以皇帝的旧的驯服工具科乔·科塔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内务部长为暴吏穆萨·尤卡。

极其反动的科乔·科塔政府将其迫害的锋芒主要用来反对在阿尔巴尼亚不可抑止地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反对索古的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日益减弱，他们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纲领日益收缩。他们把打击的矛头只朝向索古本人。他们没有明确的健全的行动纲领，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相反地，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纲领中包括激动全国的问题，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这些问题是：反对法西斯意大利占领祖国的危险，反对殖民主义枷锁，反对意大利法西斯思想，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和地主剥削农民，争取真正的民主。除了健全的政治思想以外，共产主义者还拥有革命的组织。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拒绝采用阴谋和叛乱的方法，他们利用一切合法和不合

法的机会在工人中扎根。科尔察的共产主义小组很坚强，以致市内所有工人和大学生的团体都受到它的影响。1938年斯库台建立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在政治活动方面也取得了成就。在全国都建立了地下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它们或者是同科尔察小组有联系，或者是同斯库台小组有联系。在地拉那，共产主义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当然，这个运动还有缺点，这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知识不足，或者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或托洛茨基分子混进队伍来所造成的。但是，这些缺点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索古集团感到全国的革命精神在高涨，而又不能搜捕到共产主义组织和制止它们活动，所以感到焦虑。

因此，科乔·科塔政府一上台就立刻采取一系列镇压措施。它取缔了工人协会，对一切出版物实行严格检查，强迫报纸宣传意阿友谊、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仿效纳粹和法西斯的方法对苏联进行政治斗争；它颁发一系列经国会通过并经索古批准的法律，据以迫害、逮捕或流放一切有赞同共产主义思想嫌疑的人。

但是，尽管遭到警察迫害，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它虽然处在困难条件下，仍继续不断地发展，通过吸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来壮大自己的队伍。1938年，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出版自己的秘密机关刊物。名为《前进》杂志的较成熟的理论刊物发出全国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统一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号召，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通过自己的纲领而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的继承者和著名的民族复兴战士和民主主义者的理想在新条件下的体现者。

法西斯意大利强占阿尔巴尼亚

1936年3月罗马和地拉那之间签订的经济和政治条约是跟三个大法西斯侵略性强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野心所造成的总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意大利发动的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在当时除了国际联盟的制裁把戏以外，没有碰到其他大国方面的认真反对。正是在

这个时候，即1936年3月7日，纳粹德国也在未遭遇抵抗的情况下重新侵占了莱茵地区，从而最后破坏了凡尔赛和约。接着在1936年7月，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公开支持下在西班牙共和国爆发了法西斯叛乱。一贯受到西方大国消极立场鼓励的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了军事法西斯同盟，或者按当时的说法，建立了“罗马—柏林轴心”；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建立欧洲的“新秩序”，一个月之后，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

在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受到鼓励的这种形势下，阿尔巴尼亚就没有理由感到自己有不致受墨索里尼意大利方面的侵略的安全保障。西方各国当局预言，阿尔巴尼亚有朝一日会陷于罗马的军事统治之下，这是完全自然的。索古政府和其他国家间没有签订一个友好同盟，规定这些国家有义务在阿尔巴尼亚一旦遭到意大利的入侵时加以保护。根据盟约有义务保护小国不受外国侵略的国际联盟向来就没有力量阻止任何一个侵略者，何况对于象德国和意大利这样强大而难以抑制的侵略者，就更是无能为力。

1936年6月9日加里亚楚·齐亚诺被任命为意大利外交部长一事，证明罗马外交政策采取了更加积极灵活的方针。一个月以后，即1936年7月11日，英国大使德拉蒙德通知齐亚诺：随着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初国联对意大利所采取的制裁的撤消，英国海军舰队将从地中海撤出。但与此同时，他补充说，英国所承担的保护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不受侵略的单方面义务，仍将继续有效。这是公开地作出鼓励性的暗示，说明阿尔巴尼亚不在英国的保护之列。另一方面，希特勒通过德国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在他于1936年9月23日在罗马同意大利法西斯头目会见时，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认为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海，因此意大利有权控制地中海国家。同年10月，锡吉宫①研究阿尔巴尼亚问题的骗子手弗兰契斯科·雅科莫尼受命出任驻地拉那全权公使。这件事对于了解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方针来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尽管如此，意大利在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军事占领方面还存在着障

① 指意大利外交部。——译者注

碍，这是索古和他的顾问们不会不知道的。这个障碍就是意大利在巴尔干的劲敌南斯拉夫。墨索里尼决不愿意恰恰在南斯拉夫开始表现了有离开法国而接近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同盟的征象的时候，使本来在他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意大利—南斯拉夫关系尖锐化的原因。

把贝尔格莱德拉到“罗马—柏林轴心”的势力范围内，要比从军事上占领阿尔巴尼亚更有价值，因为归根到底这并不是舍弃已在控制之下的阿尔巴尼亚这块肥肉，而只是把占领它的时间推迟一下。在任命墨索里尼的女婿① 为罗马外交部长之后，如果说在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路线上有什么新的东西，那末这就应该说是墨索里尼力求在得到南斯拉夫的赞成下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军事占领，即使是同南斯拉夫合伙也好。

索古懂得，他的王位取决于意大利—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意大利—希腊关系的发展。但这方面的前景却是不妙的。随着南斯拉夫的斯托约吉诺维奇和希腊的马

① 指齐亚诺。——译者注

塔克萨伊的上台执政（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治上法西斯化之后），几乎整个巴尔干地区各国政府都完成了政治上的法西斯化。索古曾经采取了某些幼稚的尝试，想缔结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希腊友好同盟，但它们对此却始终很冷淡。1937 年 3 月 26 日斯托约吉诺维奇在同齐亚诺在贝尔格莱德会晤时告诉齐亚诺说，当欧洲的外交政策（指英国和法国外交政策）在煽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仇视时，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具有重大意义。塞尔维亚公使又补充说，当意大利—南斯拉夫关系处于新气氛的今天，阿尔巴尼亚问题不过是个简单的地方问题。

意大利强占阿尔巴尼亚的具体计划，是齐亚诺伯爵于 1938 年 5 月在前往地拉那参加索古国王结婚典礼回国后制订的。这个计划的主要之点是：把阿尔巴尼亚从国联中排除出去，以便在罗马挑起的危机爆发时其他大国不能干预阿尔巴尼亚问题；由派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意大利军官进行破坏活动来不断削弱阿尔巴尼亚军队，以便使它无力进行任何武装抵抗；巩固和扩大意大利资本主义企业在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特权；用金钱帮

助发展当时称为"第五纵队"的组织；通过许诺和收买来拉拢"上层分子"落入罗马的政治圈套；扩大在阿尔巴尼亚设立的一些法西斯和亲法西斯机构（这些机构与其说具有政治性质，不如说具有社会文化职能），以便争取群众的同情；最后，预先取得南斯拉夫的谅解。墨索里尼批准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从军事上强占阿尔巴尼亚和宣布成立"君合国"（作为掩饰吞并的手段）准备了基础。

齐亚诺计划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不过是对原有计划的加速继续执行。阿尔巴尼亚一般社会舆论对这些计划并非毫无所悉，因而引起了这个国家居民群众的惶恐，因为这个国家业已落到虎口旁边。但索古却听任意大利自由行动去执行罗马的疯狂计划。就在1938年春，地拉那政府还给予各个意大利公司以开采铜矿、铬矿和捕鱼的许多重要特权。意大利通过专门的协定使它对阿尔巴尼亚整个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得到了保障。同年5月，国会批准了由意大利顾问蒙塔涅里拟订的一个新的教育制度。一些有经验的狡猾的意大利法西斯鼓动者和组织者来到阿尔巴尼

亚，为的是要加强老宣传者在建立法西斯和亲法西斯组织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组织之所以没有建立起来，并不是政府执行不力，而是由于人民反对，由于罗马方面担心这种反对会变成公开的冲突。

1938年6月18日齐亚诺伯爵和斯托约吉诺维奇在威尼斯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见，齐亚诺伯爵取得了南斯拉夫的保证，即不干预意大利和平进入（但还不是军事占领）阿尔巴尼亚。过了六个月之后，他们之间于1939年1月18日至23日在贝尔格莱德会晤时，齐亚诺部长终于就意大利军事占领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同南斯拉夫达成了协议，他建议斯托约吉诺维奇对阿尔巴尼亚边界做有利于南斯拉夫的改变，签订意大利—南斯拉夫军事同盟，罗马方面支持南斯拉夫对萨洛尼卡的可能侵占，等等。意大利外交部长感到惊异的是，南斯拉夫摄政保罗亲王对于南斯拉夫侵占阿尔巴尼亚领土不象斯托约吉诺维奇那样感兴趣。根据意大利外交部长送交墨索里尼有关这次会谈的一份报告说，保罗亲王告诉齐亚诺："在我们境内已有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他们给我们造成了许

多麻烦，所以决不想再去增加他们的人数。”这样一来，原来的疑团冰释了。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便决定开始进行军事占领阿尔巴尼亚的必要准备。

阿尔巴尼亚的法西斯走狗加紧策划防止阿尔巴尼亚人可能进行的武装抵抗，并且特别拉拢所谓国内“上层分子”，即部长、议员、地方长官和高级军官之流参加罗马的谋划，以便孤立索古，并在他们帮助下实行“宪政”，把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在国王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统治下合并起来。地拉那王宫里笼罩着惊恐不安。可是索古以及总理科乔·科塔和内务部长穆萨·尤卡不但没有采取措施来对付猖狂反对他们的意大利法西斯奸细，反而继续对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进行警察迫害。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决要求建立全国所有爱国力量的解放统一阵线，甚至主张联合索古本人，只要他和他的政府愿意抵抗意大利的法西斯侵略。这一年的1月里，穆萨·尤卡的警察对地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进行了袭击，逮捕了大批共产主义者。1939年2月4日，其中的七十

三人被提送到地拉那政治法庭；他们当中有五十六人只是因为同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被判刑。

1939年3月，国际形势变得对法西斯意大利空前有利。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的法西斯势力赢得胜利而告终。这使墨索里尼解除了三年的隐忧。3月15日希特勒德国强占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遇到西方大国方面一点抵抗。在南斯拉夫，2月初斯托约吉诺维奇下台以后新政府登台，这个政府完全支持保罗亲王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投降主义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便把自己的军队调集在阿尔巴尼亚对面的意大利南方各港口，并于1939年3月25日向地拉那政府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一份条约草案，其中包括以下要求：允许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主要港口登陆；允许这些军队控制战略要道、飞机场和边境战略据点；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意大利移民区，这些移民享有阿尔巴尼亚公民的权利；建立关税同盟；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公民有权担任最重要的公职；政府各部秘书长应为意大利人；驻地拉那的意大利公使和互换的派驻罗马的阿尔巴尼亚公

使，均应为派遣国的内阁成员。几天之后，罗马向索古提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6日12时以前答复要求。索古及其政府对条约草案以及墨索里尼的最后通牒均严守秘密。但是社会舆论方面迅速揭露了罗马的意图。大量军队集结在意大利南方港口使阿尔巴尼亚全国为之震惊。1939年4月3日晚间在地拉那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首都青年的示威，这次示威显示了人们抵御意大利侵略和保卫祖国的决心。4月4日，人民群众又在首都街头举行了强大的示威，要求公布关于意大利人意图的可靠文件，并要求发给武器以便反抗法西斯敌人。在斯库台、爱尔巴桑、都拉斯、科尔察、纪诺卡斯特和发罗那等国内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这种示威。索古力求安抚舆情并为此目的面发布了政府公报，在公报中否认关于阿意关系恶化的传闻。同时在4月5日，科乔·科塔总理答复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提出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反建议，并要求延长最后通牒的限期。反建议规定：通过军事条约确定在什么场合下意大利军队可以开抵阿尔巴尼亚；仅仅赋予在阿尔巴尼亚居住五年以上的意大利人以阿

尔巴尼亚公民的权利；不缔结关税同盟，而把意大利同阿尔巴尼亚间的贸易关税率降低到2%；在阿尔巴尼亚国家行政机关中不任用固定的意大利职员，而只吸收组织者。

政府的报道并没有使国内安定下来。4月5日和6日，全阿尔巴尼亚到处都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索古政府仍和以往一样，对人民自愿应征参加保卫祖国的要求完全保持缄默。

意大利政府对地拉那政府的反建议甚至根本不予考虑。只是给最后通牒的时限延长了十二小时。索古陷入了毫无办法的绝境，为了摆脱由于他自己的投降政策所造成的这种绝境，索古决定弃国而逃，不作任何抵抗。第二天，即1939年4月7日这个不吉祥的星期五的清晨，约四万人的意大利军队乘着许多军舰，由数百架军用飞机掩护，在最高司令官古楚尼将军的指挥下驶抵阿尔巴尼亚的四个主要港口——都拉斯、发罗那、萨兰达和申津。为了赢得时间准备逃跑，特别是正在怀孕的王后的逃跑，索古曾试图同古楚尼将军谈判，但一无所获。4月7日早晨，意军开始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登陆，因为它相信由于意大利奸



1939 年 4 月初举行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威胁的爱国示威

细进行的破坏工作和索古的消极态度，将不会遭遇任何抵抗。法西斯走狗和索古集团进行的破坏勾当确实严重。弹药储备不见了，少数大炮不能使用，军心涣散，队伍混乱。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义勇军和士兵弄到了少数军火弹药来对意大利占领军进行抵抗，特别是在都拉斯港，占领军被迫又撤上兵船。随后敌舰上的炮火虽然集中猛轰都拉斯城，但并未获得预期效果。意军三度发动猛攻企图拿下都拉斯，但三次都被迫撤退到自己的战舰上。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在应该对这次

悲剧负责的王室以及索古逃往国外的时候。

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被迅速击破主要并不是由于敌人的优势，而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4月7日在都拉斯英勇阵亡的水兵穆纳·乌尔奇纳库成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的抵抗的象征。在这一天，都拉斯也象其他港口一样陷入意大利军队之手。4月8日法西斯军队进入地拉那，4月9日进入斯库台和纪诺卡斯特。翌日，即4月10日，几乎全国都被法西斯意大利占领，西方国家和巴尔干国家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只有苏联不承认这种可耻的占领。当然，所有阿尔巴尼亚爱国侨胞，除了“国民同盟”集团成员之外，都举行了群众集会抗议这种侵略，因为它葬送了经过重大努力和牺牲而赢得的祖国独立。全世界所有进步民主力量，首先是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对阿尔巴尼亚侨民的这种抗议都寄以同情。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

墨索里尼在官方文件中把1939年4月7日

的军事占领不是说成对阿尔巴尼亚的吞并，而是说成反对索古的反意大利“阴谋”的一桩行动，目的是要保证受到其他强国占领的威胁的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其方法就是在“君合国”的名义下，使阿尔巴尼亚王国和意大利王国在共戴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皇帝为国王的条件下实行联合。

索古的同谋者对墨索里尼的这种蛊惑性的图谋给予了帮助，其中除了少数几个部长之外（科乔·科塔、穆萨·尤卡等人），其余的人都留在阿尔巴尼亚，并且是为4月7日事件向法西斯首脑祝贺的最初参加者。1939年4月12日召开的所谓“制宪会议”宣布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在共戴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皇帝为国王的条件下实行“联合”。这个会议是由早在占领以前就同驻地拉那的意大利使馆秘密勾结的一帮人组成的。同一天就组成了以大地主谢夫切特·别依·维尔拉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卖国政府。这个政府于1939年4月20日同业已成为特命全权大使的弗兰契斯科·雅科莫尼签订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条约。根据这些条约，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是统一的领域，它们之间应该实行关税统一；阿尔巴尼亚货币应

该与意大利的里拉通用；阿尔巴尼亚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税应采取意大利帝国共同的税率；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公民应享有阿尔巴尼亚公民所有的一切权利，同时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公民也享有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6月3日在阿尔巴尼亚陷入真正奴隶地位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了一步。同一天公布的阿尔巴尼亚王国条例规定，把行政权和立法权都交给"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兼埃塞俄比亚皇帝"手里，国王任命弗兰契斯科·雅科莫尼为驻阿尔巴尼亚的"全权代表"。阿尔巴尼亚的国会不复存在了。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或是阿尔巴尼亚在意大利均不设外交代表。根据同一天签订的条约，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联系实行一体化，两国的国际联系均集中于罗马外交部办理；因此，阿尔巴尼亚在其他国家就不再有外交代表，而外国也不再有派驻地拉那的外交代表；阿尔巴尼亚军队已不再是它的武装力量，而被认为是意大利军队的附属部分。

所有这些文件强制地把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占领以及由于这种占领而产生的后果加以合法化。很快地就由罗马派出一批人来组织阿尔

巴尼亚法西斯政党以及该党所属的“法西斯”青年组织、“法西斯”儿童组织、“法西斯”妇女组织，和“业余”法西斯组织，这些组织在阿尔巴尼亚却从来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

当局依靠政治恫吓迫使职工连同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在相应的“法西斯”组织登记，并使他们接受法西斯思想的政治训练。大量新的意大利资本主义企业涌入阿尔巴尼亚，并以更加狂热的速度加紧掠夺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资源，首先是矿产来满足意大利战争经济的需要。除此以外又来了许多意大利建筑企业，为的是把联结沿海一带和阿尔巴尼亚—希腊及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边境地区的军事战略交通线系统化并加以扩增。两家意大利大银行(“那不勒斯银行”和“劳动银行”)连同“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该行现在几乎完全依靠意大利资本)，在全国遍设了十分活跃的分支行网。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直到1939年4月7日的占领以前，在货币流通方面奉行的都是毫无道理的通货紧缩政策，四月事件以后，在同一个总经理和同一个理事会的领导下，却立即改行“货币泛滥”政策，甚至发展到通货膨胀也在所不惜。

1936年的货币流通量为一千零六十五万三千法郎，1937年底增至一千一百一十三万一千法郎，1938年底为一千零五十二万九千法郎，1939年3月31日（占领前夕）为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九千法郎，一个月之间，也就是到1939年4月30日猛增至一千七百二十六万二千法郎，到这一年的年底达到二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法郎，至1940年底便达到八千零一十七万八千法郎，1941年底达到一亿零八百四十一万七千法郎，1942年底增至一亿四千一百八十九万七千法郎。在农业方面开始制订执行墨索里尼“改革”的方案，方案中规定“排干”阿尔巴尼亚沿海低地，在这些地方建立意大利移民区，并把阿尔巴尼亚农民从这些土地上迁往内地山区。

移民区主要分布于城市四郊，大量工人开始从意大利移居到这里，在1940年他们的数目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工人数目，强迫阿尔巴尼亚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全国行政活动采用意大利语和接受意大利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法西斯头目们、特别是本尼托·墨索里尼所追求的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化政策服务的。

因此，4月7日侵略所引起的普遍愤慨情绪在以后几个月间不断增长和加剧，这种情绪不仅集中在法西斯意大利占领者身上，而且也集中在阿尔巴尼亚走狗即阿奸身上，因为他们同意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潜在殖民地和对阿尔巴尼亚人实行人种同化的政策。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这完全是自发的抵抗——继续进行中，这种愤慨情绪又有了发展。在各个企业中，尽管行政方面大施压力，小职员和工人却都拒不加入法西斯政党；在学校方面，学生都远避法西斯青年组织；在意大利资本主义企业里，爆发了许多次工人罢工来反对老板的掠夺和殖民歧视。慕哲克区的农民反对丈量他们的土地。但他们这些带有地方性质的抵抗往往毫无结果。在阿尔巴尼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感到必须有一个爱国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要能领导人民不断加强抵抗。既然留在阿尔巴尼亚的索古原来的同谋者，以及原旅居国外参加“国民同盟”组织并在4月7日返回祖国的索古过去的反对派领导人，都宁愿滚入附敌的败类队伍里，那末组织爱国力量抵抗的任务便落到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身上。无论在法西斯占领以前或在此

之后，共产主义者在保卫祖国独立的事业上都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在解放斗争的方法上也是革命的；他们本身总是同工人、农民、职员和学生的自发抵抗站在一起，并且往往是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尽管这样，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还是有缺点的。在阿尔巴尼亚还没有统一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仍旧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歧。

抵抗运动即使在 1939 年 9 月 3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德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使得欧洲笼罩着一种悲观气氛）的时候，也没有减弱。1939 年 11 月 28 日，在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周年纪念日，地拉那爆发了反对法西斯外国占领的人民爱国示威。

1940 年上半年，向来就由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采取了更加富于战斗性和更加积极的形式，转为反对意大利备战的罢工活动。1940 年 6 月意大利站在纳粹德国一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抵抗经历了

反动派的政治和警察迫害的艰难岁月。在这个时期，大陆上的监狱和意大利海岛上的集中营都关满了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和阿奸败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把罗马想在巴尔干半岛上发动的战争说成是这样：作为一个独立国的阿尔巴尼亚好象有可能由此实现它的人种联合的目的，并把阿尔巴尼亚的领土科索沃和察梅里亚（这些地方是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和1913年大使会议的决定被南斯拉夫和希腊非法吞并过去的），重新纳入自己的版图。如果考虑到阿尔巴尼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不公正（因为它使几乎一半的阿尔巴尼亚同胞留在祖国以外），那末就可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奸险的计谋。阿奸败类充分利用了这个政治因素，要把阿尔巴尼亚拖入反对邻国的战争。阿奸们，特别是他们的主要代言人穆斯塔法·克鲁雅宣称：假如意大利能够纠正财阀寡头外交的错误，使四分五裂的阿尔巴尼亚能够实现自己的民族统一，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某些曾经抗议过4月7日侵略的阿尔巴尼亚活动家也附和这种滥调。其中之一就是侨居在国外的前索古政权阿尔巴尼亚驻美

国的全权公使法伊克·科尼特札。1940年8月22日他在美国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声明中写道："今天，当意大利正准备进行干预以推翻过去对阿尔巴尼亚民族所造成的不公正局面，并谋求恢复阿尔巴尼亚的自然的和历史的疆界的时候……真正的阿尔巴尼亚人竟会不满意这样的干预，难道这是合理的吗?"他又接着写道："如果说察梅里亚是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难道说仅仅因为意大利人捍卫它，这个真理就自动地不成其为真理了吗?"

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却有自己的逻辑。他们不愿意去为了罗马的帝国主义目的充当炮灰。1940年10月28日以后，当意大利利用它强制占领的阿尔巴尼亚领土向希腊进攻的时候，当谢夫切特·维尔拉威的卖国政府也附和这种典型的法西斯侵略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完全清楚了。人们马上就看到，法西斯和亲法西斯的宣传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被强制送上前线的两营阿尔巴尼亚新兵拒绝作战；在最初几天就出现了逃兵之后，两营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被关进了阿尔巴尼亚中部希亚克地方的集中营。在前线和后方都发生了怠工事件。正是在这个时候，在阿尔巴尼

亚山区由潜逃的士兵组成了第一批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部队。

大家知道，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在这个战场上遭到可耻的失败。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本人在1940年11月22日写给希特勒的信件中，归咎于战争准备不足和出乎意料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背叛”。希腊军队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进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并于11月22日占领科尔察，于1940年12月初占领纪诺卡斯特。阿尔巴尼亚人把希腊人的胜利看作是打击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把希腊军队看作是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在阿尔巴尼亚沦陷区数以千计的义勇军，要求希腊指挥部准许他们在阿尔巴尼亚旗帜下同希腊军队并肩作战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强盗。但是希腊指挥部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告诉他们说，只能接受义勇军在希腊旗帜下作战。此外，它还采取各种措施，例如禁止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设置希腊民政机关，逮捕并放逐阿尔巴尼亚爱国人士（尽管他们是在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这些措施说明雅典在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上并没有放弃过去的沙文主义目的。因此，在这个历史性关头，当

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处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的时候，它们的关系仍然很紧张。

1941年春天巴尔干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4月6日德国军队突然同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发动攻击，几天之内就粉碎了它们的抵抗，使防守一冬的意大利军队有可能把希腊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赶跑。随着南斯拉夫军队在1941年4月17日投降和希腊军队在4月21日投降，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和齐亚诺在维也纳拟制了巴尔干的新政治地图。在维也纳拟制的地图所依据的原则是由德意两国瓜分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

因为被比意大利小若干倍的希腊打败而威信扫地的罗马，利用地拉那卖国政府的领土人种要求，提出了扩大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的要求。稍经修改之后，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就为两个大“仲裁”国所接受。这样一来，随着南斯拉夫的被分割，1913年被吞并的科索沃地区和曾经被黑山吞并的几个阿尔巴尼亚地区，都归还了阿尔巴尼亚，在南方又把1913年被希腊吞并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察梅里亚还给了阿尔巴尼亚。

由于这些领土的归还，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因为原来被夺走的科索沃的土地比较肥沃，所以农产品经常不足问题马上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由一个粮食进口国一变而为粮食出口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和本地阿奸败类在他们的宣传运动中广泛利用这些事实，要阿尔巴尼亚公众相信："大"阿尔巴尼亚（他们这样称呼）的存在是同"罗马—柏林轴心"国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而"小"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则将随着以南斯拉夫和希腊为盟国的西方强国的胜利而成为问题。侨居国外归来的反索古派政客（穆斯塔法·克鲁雅、列捷普·米特罗维察、阿里·克尔楚拉、科里·特罗马拉及其他等人）对于这个运动支持最力。但是国内舆论却仍和过去一样没有受骗，并且对抗了这种强烈的宣传攻势。5月间，维克托·恩马奴伊尔三世国王兼皇帝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在地拉那被阿尔巴尼亚工人华西里·里亚齐谋杀一事，是对罗马的一个出乎意料的答复。

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抵抗了法西斯党徒的政治战略，这个战略的目的是要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他们在巴尔干的宪兵或者各个斗争战线上的帮

凶。但是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抵抗力量还是相当薄弱，因为他们仍旧处于分裂状况中，甚至比过去分裂得更厉害：除了原有的小组——科尔察小组和斯库台小组——之外，又另外形成了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它们在成员数量上以及在对国内舆论的影响上都比较小。其中之一是纯粹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所谓“青年”小组，另一个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所谓“火焰”小组。这几个小组之间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意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都存在着许多分歧。而且，它们虽然都处于地下状态，彼此间却仍有纠纷。最大的、最革命的和最有原则的小组——科尔察小组，更往往成为攻击的对象。尽管如此，在这些小组的队伍中还是有一些革命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谴责没有道理的分裂，并要求尽快地把各小组团结成为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直到1940年夏天，有关谋求团结的尝试都未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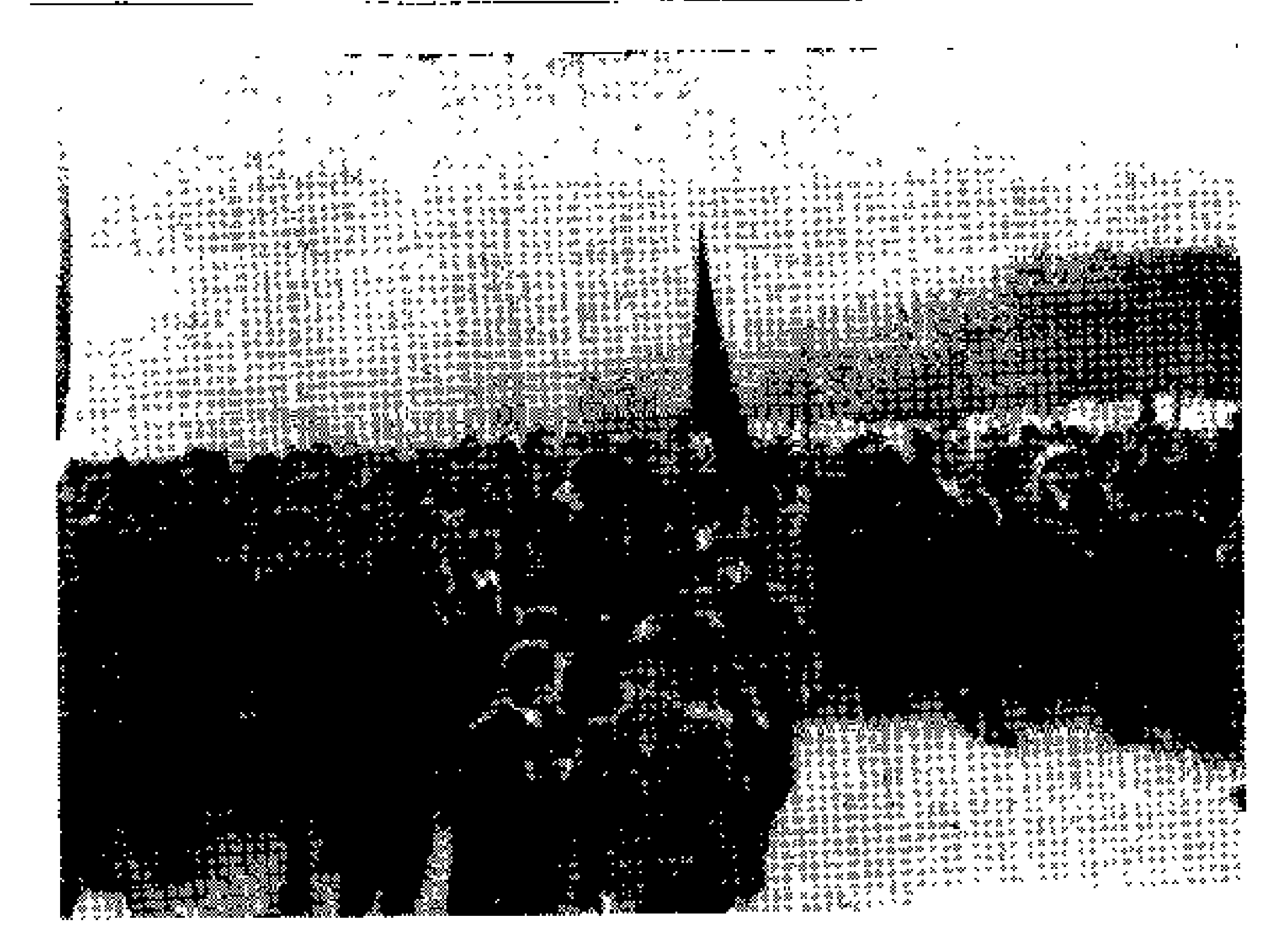
1941年夏，在纳粹德国于6月22日开始侵略苏联以后，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随着苏联的参战，反法西斯斗争的阵线扩大了，这就创造了粉碎德意集团的前景，并

且使阿尔巴尼亚产生了迅速获得解放的希望。由于苏联加入反法西斯联盟，阿尔巴尼亚人相信，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特别是希腊政府（这两个政府被认为是反法西斯盟国政府并得到英国支持）的沙文主义倾向终将消除。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爱国人士，认为竭尽一切办法加强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联盟，是保证祖国独立的唯一途径。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苏联领土腹地的迅速推进，丝毫没有动摇这种希望。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在夏秋两季大力进行了扩大武装斗争的活动。在各个城市里，散发了科尔察共产主义者小组印制的秘密传单，这些传单号召展开大规模的武装解放斗争。在山区，共产主义者把逃亡的爱国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成功地组织成为正规的战斗部队。另外还采取了各种必要措施来保证业已开始建立的城市地下军所需的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此同时，还在继续进行结束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分歧的工作，并谋求把它们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

这项工作取得了成果。尽管某些小组、特别是“青年”小组和“火焰”小组的领导进行抗拒，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还是终于克服了难以容忍的小组习气，并准备在地下状态和警察迫害的条件下在地拉那召开阿尔巴尼亚各个共产主义小组的非常会议。在这些力求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定基础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队伍中，当时三十一岁，但已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动经验的恩维尔·霍查开始表现出与众不同。恩维尔·霍查于1908年10月16日诞生于纪诺卡斯特，在科尔察的一个中学毕业，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同该城的共产主义者发生了联系。毕业后，他作为大学生和职员在法国和比利时住过一些时候（1930—1936年），曾经同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人共同工作。1936年返回阿尔巴尼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失业之后在地拉那的一所国立中学任教，而在1937—1939年则在科尔察国立中学任教。恩维尔·霍查是科尔察的共产主义小组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它的最活跃的领导者之一。1939年4月7日恩维尔·霍查被亲法西斯分子的行政当局撤职后卜居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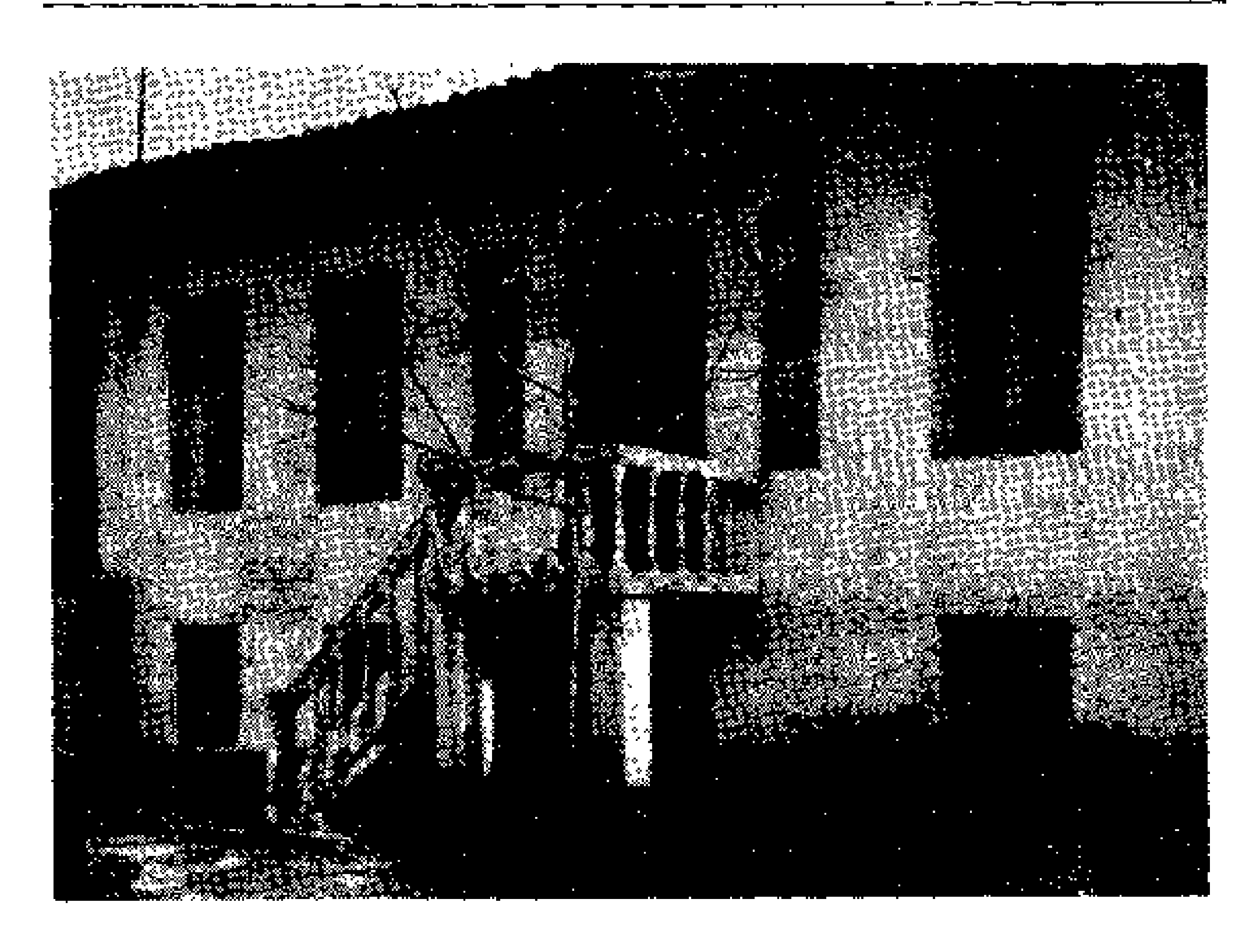
拉那，在那里完全献身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动，同时致力于建立联合全国爱国力量的战斗的反法西斯阵线。恩维尔·霍查在反对分裂和派别斗争当中逐渐成为首先要求结束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可悲分裂状态的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他所要求的不是派别分子所要求的那种各小组的联合，而是要求所有小组团结成为一个统一政党，在这个政党里要根绝一切过去状况的痕迹。他的基本观点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团结到统一的独立革命政党中，不应仅仅是由于放弃各小组的不正确观点的结果，不应仅仅是各小组成员都接受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的结果，而且也应是反对敌人法西斯的共同革命行动的结果，因为这种行动要比理论上的争论更能够使共产主义者接近起来。这个观点在各小组比较革命的成员中得到了支持。基于这个原因，恩维尔·霍查亲自出来领导了在地拉那卖国内阁官邸前面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示威，这次示威是在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周年纪念日，也就是在各小组共产主义者会议召开前几天由革命共产主义者倡议举行的。在这次示威中，共产主



1941年10月28日在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
地拉那反对意大利占领者的反法西斯爱国游行示威

义者必须不分是哪个小组彼此护卫以抵御意大利轻骑兵的干涉。这次示威证明(尽管还只是开始),革命行动不仅对于把所有共产主义者团结到独立政党中,而且对于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本地阿奸的伟大爱国斗争都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

194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地拉那召开了各个共产主义小组的非常会议,参加的有三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火焰”小组拒绝参加,单独



1941 年 11 月 8 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
地拉那的这座房屋里秘密成立的

脱离出去，一年之后就终于消灭了）。

在经过几天的辩论和克服了某些小组吹毛求疵的领导人的分裂的和取消主义的倾向之后，1941 年 11 月 8 日决定解散各个小组和成立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以决议的形式通过新的纲领。在会议上还选出了新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恩维尔·霍查受委托领导中央委员会。

决议扼要地确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政治纲

领是：动员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阿奸败类的武装斗争；争取阿尔巴尼亚的民族独立，这就要与全国一切民族爱国力量合作，要同巴尔干各国人民，特别是同南斯拉夫和希腊人民结成战斗友谊，要同反法西斯大同盟、首先是同苏联（要使阿尔巴尼亚人都知道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除了民族解放斗争以外，决议还指出要动员人民群众，首先是动员工人和农民同时进行人民革命，以便在全国解放之后推翻资产阶级地主政权，并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阿尔巴尼亚的武装爱国斗争和人民革命的发展

几天之后，即在1941年11月里，向全国秘密散发了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宣言，宣言在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之后，要求人民群众对法西斯占领者展开全面的斗争，不向敌人纳税，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杯水，并拿起武

器加入争取自由的战士队伍，以争取全国的彻底解放。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第一个宣言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呼吁，要求他们永远表现出革命的果敢精神、主动性和组织性的范例，永远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在最危险的斗争中永远站在第一线，为争取祖国的民族解放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同一个月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同武装部队建立了联系，这些部队遵照他们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发出的指示，对农民展开政治宣传解释工作，对法西斯占领者展开武装斗争，以加强在乡村中的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里也在新的基础上来组织地下军，准备实行秘密的破坏活动和对敌人进行袭击。1941 年 11 月 23 日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地拉那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地下组织，由捷马尔·斯塔法担任联盟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就在 11 月里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一支游击队射击了法西斯军的司令部，1941 年 11 月 28 日民族独立纪念日的前夕，地下军在地拉那杀死了一个专门迫害政治活动分子的阿奸警察队头目。

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内部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法西斯当局并不是毫无所知的。所有城市甚至连许多乡村都顺利地散发了第一批传单，警察连一个反法西斯战士都没有捉到；1941年10月28日在地拉那和11月8日在科尔察举行的游行示威发展成为群众同警察的冲突；在首都附近第一批武装部队开始出动以及其他一些行动，这一切说明共产主义组织的强大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法西斯最高官员用他们所说的“换岗”的办法来对付这种新形势。谢夫切特·维尔拉戚卖国政府负咎被扔在一边，因为事实证明它不能够在反法西斯力量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就把它消灭。1941年12月初以穆斯塔法·克鲁雅为首的“铁腕”政府上台执政。

法西斯领导不能够找到比穆斯塔法·克鲁雅更加合适的人来对付困难的局面，因为他是在阿尔巴尼亚政治生活中富有经验的骗子手，早从1914年起就是罗马的老牌奸细，并受到他们的信任。穆斯塔法·克鲁雅的所有政治武器的火力不是用来轰击一般反法西斯运动，而是轰击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分裂



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占领者和德国纳粹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同志

抵抗阵线，把非共产主义分子的爱国力量从整个民族解放阵线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个阵线的建立是和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有着紧密联系的。为了执行这一策略，穆斯塔法·克鲁雅采取了若干措施：他放松了过去在强制人们登记参加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和其他法西斯组织方面所施加的压力；保证接见任何反法西斯的公民并允许跟他讨论任何政治问题，而对他们不加任何制裁；答应不重犯前政府的错误；最后他宣称，意大利的军事占领只是暂时的，是由于战时情况而迫不得已的，战争一结束，阿尔巴尼亚就可以不流血地获得真正的自由。

穆斯塔法·克鲁雅的诺言的蛊惑性很快就被揭穿了。他的"同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和平"的政策和他采取的反对共产党人的严厉的警察措施，并未发生效果。虽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当时正忙于反对不遵守党纪的老派别分裂者的内部斗争，但它还是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展开反法西斯的斗争。由于它的党员的忘我的工作和无与伦比的英勇精神，在1942年期间就获得了空前成就。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到处都有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袭



1942年5月5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民族解放战争英雄捷马尔·斯塔法



1942年6月22日在争取祖国解放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贝里亚特·莱杰皮

击法西斯意大利的汽车队和部队，与此同时地下军也在城市中进行活动，消灭法西斯罪犯。1942年7月24日晚间，在同一时刻地下军切断了全阿尔巴尼亚的电话线，破坏了全国城市间的联系。在以后的日子里，地拉那的地下军放火烧毁了电话局，夺走了内务部的档案，炸毁了一座工兵军用仓库，大胆地袭击了飞机场，破坏了它的军事设施。在科尔察烧毁了法西斯党部，在斯库台袭击了政治监狱并打开了监狱大门，在发罗那把意大利军用仓库完全炸毁。与此同时，游击队还肃清了内地的法西斯政权和宪兵队。执行党的命令



1942年8月16日
在地拉那攻击敌人
的斗争中牺牲的
米斯托·马梅



1942年10月10日
同敌人坦克战斗
中英勇牺牲的
沃约·库希

的共产党人宁愿死去也不肯落到法西斯意大利警察或者穆斯塔法·克鲁雅民警手里，他们的英勇抵抗和坚贞不屈精神博得了全国的称颂。在首都，整队民警出动同单枪匹马的捷马尔·斯塔法作战，持续达数小时之久，从一个街区转战至另一个街区，斯塔法终于英勇牺牲了；7月间在斯库台的一座房子里，三个大学生贝里亚特·莱杰皮、布兰科·卡迪亚和约尔丹·米夏同警察讨伐队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后，英勇牺牲了；8月里在科尔察，米迪·科斯塔尼和基乔·格莱乔在经历各种非人所能忍受的拷问时和在绞刑架前表现了

英勇坚毅精神；首都地下游击军指挥员沃约·库希在地拉那经过了五小时抵抗之后扑向敌人的坦克而牺牲时表现了无比英勇精神，另外还有成百上千其他类似事例；所有这一切提高了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和阿奸败类反对共产党人的诬蔑运动完全破产。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把游击队或个人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通过秘密发行的定期公报和小册子报道给公众，在这些文件中同时解释党的政治路线，解释联合全国处于观望状态的反法西斯力量建立民族解放阵线的路线。1942 年 8 月 25 日秘密发行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第一号，它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政治运动理论纲领和战斗实践的向导。不久，又出版了名为《自由的号召》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第一个机关报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几个月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在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即法西斯意大利和十分狡猾的敌人即穆斯塔法·克鲁雅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程度。阿奸败类和政府方面的假民族主义者的反共蛊惑宣传遭到了很大失败。建立统一的民族

解放阵线的纲领在人民群众和在反法西斯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同情。考虑到实现纲领要点的一切条件业已成熟，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倡议，在游击队解放的贝萨地方（距首都十八公里）召开了民族解放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共产党人参加之外，还邀请了许多闻名的反法西斯爱国者，另外还有不少态度动摇的所谓“民族主义者”和反共分子。

在1942年9月16日开幕的贝萨会议上，经过了几天辩论之后，根据恩维尔·霍查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名义所作的建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的三个具有特殊意义：（1）建立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在这个组织中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不分思想、地域或宗教信仰，在民族解放最高会议的领导下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阿奸败类的斗争。最高会议由选出的共产党人、民族民主人士、索古拥护者、反法西斯青年与妇女代表等组成；（2）扩大和加深在各个战线上反对外国占领者和阿奸败类的武装解放斗争，对敌人决不作任何妥协；（3）在全国各个乡村和市镇建立由本地居民选出的地方和地区的民族解放会议（在解放

区建立公开的，而在沦陷区则建立地下的）。这些会议应该执行以下两项职能：它们应该是动员武装起义的机构同时又是地方政权机构，因为它们应该取代法西斯政权，以便不使封建资产阶级旧政权死灰复燃；因而民族解放会议在全国解放后尚未创造召开制宪会议的条件以前应该成为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

这些决议意味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制订的政治路线的无可争辩的胜利；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证明了力求离间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关系的穆斯塔法·克鲁雅政府政策的破产。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关于加深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的决议又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的胜利。这些民族主义者提出“反对占领者的时机尚未来到”的口号，想要稳住社会舆论，等待他们所期望的西方强国在巴尔干登陆，直到在战后能够毫不费力地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关于建立民族解放会议的第三个决议，意味着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革命的民主方法对保守的和反动的各“上层”社会阶级直到目前为止所采用的那种传统做法的胜利。

这样，贝萨会议的决议就把两个历史过程从

时间上和空间上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革命，这两个历史过程就是争取祖国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真正民主制的人民革命。被这些“骇人听闻的”——如穆斯塔法·克鲁雅所说——决议弄得惶惑不安的、以雅科蒙尼为首的法西斯意大利当局以及地方阿奸败类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新的军事和政治措施。军事讨伐队迅即被派往贝萨，同时对其他游击队也派出了更大的讨伐队加以征讨。各个城市里展开了反对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恐怖运动。法西斯分子由于不能够打垮游击队，便大量屠杀无辜的农民和过路人，并开始时常是无端地烧毁房屋和整个村庄。各城市里宣布无限期的戒严，成千上万市民被逮捕，被投入监狱或加以流放，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送到意大利的集中营里受折磨。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发生效果。游击队的人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增多；它们的行列里不断补充新人；它们通过斗争从占领者的手里解放出整个整个的地区，因而在阿尔巴尼亚内地形成了一些自由区。在贝萨、斯克拉巴里、库尔维列施、柴尔麦尼卡、马尔塔涅希、奥帕尔、马拉卡斯特等地，到处都有



阿尔巴尼亚最早的游击队之一——贝萨游击队
及其指挥员穆·佩查同志

民族解放会议开始自由地、正常地行使权力。这一切提高了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内的威信。很快地从国外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1942年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读了英国政府的声明，这个声明承认阿尔巴尼亚的自由和独立，并提出在战争结束后由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体。声明最后补充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战后边界问题将由和会加以讨论。第二天，即12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外交



由穆罕默德·谢胡同志指挥的马拉卡斯特游击队

部长莫洛托夫在表达了对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解放斗争的深挚同情和宣布不承认法西斯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任何野心之后，表示愿意看到阿尔巴尼亚获得自由和独立，并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有权自主地选择他们自己愿意的政治制度。接着苏联政府表示，由于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所作的斗争，他们应该成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同盟者。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赞扬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斗争和重新肯定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国家的权利之后，也宣称它的战后政治制度问题应由当地

居民自己解决。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买办集团对整个民族解放阵线，特别是对这个阵线的支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取得的这些成就感到不安。这些集团中的某些代表——主要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反索古派——于1942年年底成立了名为"国民阵线"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号称为民族主义的反索古组织的台柱是以笔名留莫·斯肯多闻名的米德哈特·弗拉舍里。这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著名的反索古派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但除了他以外，在"国民阵线"组织的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一些没有政治声望的政客，例如前穆斯塔法·克鲁雅政府叛国司法部长哈桑·道斯蒂，卖国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阿里·克尔楚拉、科里·特罗马拉、科乔·慕卡，以及野心勃勃的地主努莱丁·别依·发罗那等人。

用简洁语句表达的"国民阵线"组织的纲领，并不掩饰这一组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反共精神。在这个纲领中，争取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反法西斯斗争并不占首要地位。这是有原因的，而这种原因很快便清楚了。"国民阵线"领导

人既不想使他们同法西斯占领者的关系尖锐化，也不想使他们同阿奸政府的关系尖锐化，而是想利用信誉扫地的政府当局所处的不利地位，谋求恢复自己的组织。果然，在受到阿奸行政当局鼓励的秘密情况下，“国民阵线”很快地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扩展了自己的组织网，并且毫不费力地建立了许多准备随时出动的武装部队。过了一些时候，“国民阵线”利用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游击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国际合作，展开了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似乎是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党的代理人，似乎要使阿尔巴尼亚从属南斯拉夫和希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头目们最后说：因此，必须在同法西斯意大利进行歼灭战中保持阿尔巴尼亚的力量，以便用来对付未来的敌人——南斯拉夫和希腊。

“国民阵线”组织在开始的时候得到了许多拥护者。国家面临着新的分裂，随时有爆发有利于法西斯占领者的内战的危险。1943年头几个月里，法西斯占领者本身也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图谋迷惑阿尔巴尼亚社会舆论和孤立民族解放阵

线。1943年1月10日，威信扫地和政治上失败的穆斯塔法·克鲁雅政府被推翻了。艾克列姆·里波霍瓦政府上台不久，1943年2月22日又由马里奇·别依·布沙提领导的“妥协”政府登台执政，这个政府同“国民阵线”保有密切联系，它成为罗马新政策，即所谓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让步”政策的执行者。当时意大利方面答应修改1939年4月20日的阿意关税和货币协定，以及1939年6月3日关于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际关系一体化的协定。几天之后又决定取消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而代之以所谓“大阿尔巴尼亚保卫团”的新组织。此外还决定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宪兵部队，而根据1939年6月3日的条例，阿尔巴尼亚宪兵队被认作是意大利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的一部分。1943年3月17日，墨索里尼宣布撤除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憎恨并为罗马所不再需要的弗兰契斯科·雅科莫尼的意大利国王兼皇帝的全权代表的职务，而以阿里贝托·帕里阿尼将军（前意大利派驻阿尔巴尼亚军事使团团长和前意大利国防部次长）代替他。

与其说是罗马的蛊惑措施，不如说是有“国

民阵线”的活动渗入的宣传运动，使共产党继一年之前穆斯塔法·克鲁雅所采取的蛊惑措施和警察措施以后又一次面临严重的考验。尽管如此，游击队还是进行不断的攻击和反对敌军的暗中破坏活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43 年 1 月 14 日一举解放了伏斯科波亚；1943 年 1 月 31 日在克腊姆施附近的战斗中，游击队俘掳了二百名左右的法西斯官兵；1943 年 2 月 23 口在萨洛尼卡沥青矿附近战斗。在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人召集了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以便分析党内组织问题，党的过去的活动，以及在占领者、阿奸败类和“国民阵线”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采取联合政治攻势所造成的新形势下，在苏德战线上由于 1943 年 2 月 2 日斯大林格勒战役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所带来的转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下，对于确定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

1943 年 3 月 17—22 日在距离爱尔巴桑不远的拉比诺特召开的代表会议，批准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过去的政治路线，认为在以后也没有理由对它加以改变。拉比诺特会议所做的分析以及所

有各地区代表的发言，肯定了由恩维尔·霍查所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正确性。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成立以来的十六个月期间壮大和巩固起来了，它的政治路线在所有各个方面都迅速地获致了胜利，游击战扩大了，结果使敌人受到严重损失；业已组成的民族解放阵线遍及全国；国内建立了一些自由区，新的政权机关在这里行使职权；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在国外获得了反应，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三个主要国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十二月声明；许多外国敌人和阿奸败类都陷入惶恐万状和混乱动摇的状态（“让步”政策就反映了这一点）；等等。代表会议在指出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时，认为这些成就对于今后也是有益的，那就是：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决不同敌人作任何妥协；加强阿尔巴尼亚人同反法西斯大同盟、特别是同苏联的联盟；不断扩大民族解放阵线，直接依靠工农群众而不是依靠那些具有不可信赖的权势的“领导人”；吸引忠诚的爱国知识分子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从小规模的游击支队过渡到大规模的军事组织单位，首先是组成游击纵队，以便奠定建立正规的民族解放军的

基础；等等。代表会议还决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对待原有的和可能新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问题上，应该采取明智的和耐心的态度，尽管阿尔巴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具有通敌卖国倾向，党还是应该极力争取他们走上反法西斯爱国斗争的道路，争取他们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的队伍，采取一切办法防止内战，因为内战只会对敌人有利。如果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奏效，那就转而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作为卖国附逆的败类组织的实质。对这些组织的部队采用武力只是为了进行自卫，以制止它们图谋进行的挑衅性的攻击。

拉比诺特会议以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再一次建议“国民阵线”组织参加民族解放阵线，或者至少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本地阿奸的战斗。“国民阵线”领导者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们的借口是公开起义的时机还没有到，需要等待，言外之意是要等待英国和美国答应在欧洲开辟的“第二战场”；他们指望这个战场会在阿尔巴尼亚开辟。可是不久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获悉某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揭露，“国民阵线”首领们正以上述理由作掩护，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着广

泛的阴谋活动，特别是要取消它的动力——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国民阵线”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委员——阿里·克尔楚拉和努莱丁·发罗那——同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占领军总司令兰乔·达尔马乔于1943年3月15日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达尔马乔—克尔楚拉议定书》。根据这个条约，“国民阵线”负责不使阿尔巴尼亚南方发生任何武装起义，而意大利占领军司令部方面则应允对于凡是遵守这个条约的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不予攻击。条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国民阵线”借此得以自由地组织武装部队，以便一有机会不是去反对外国占领者，而是反对游击队。另外一方面，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获悉，地中海联合司令部派到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游击队中服务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同“国民阵线”中那些仍然假装处于秘密状态的首领们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些首领们还同最著名的索古派领导人阿巴兹·库皮保持秘密联系，而阿巴兹·库皮就是在他们这些人的影响下退出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他还是1942年9月在贝萨刚一建立民族解放阵线时加入的）；此外，他们还同那些

在国内落后山区保有一定影响的其他反动头目和亲伪的山区族长建立了秘密联系，——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的反共阵线。

但他们的这些图谋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害怕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在法西斯占领者和阿奸败类的暗中支持下建立民族主义的反共阵线的趋向已经表露出来了。显然，只要能够消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他们就不惜牺牲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争。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是用原来那些有关通力合作进行爱国斗争的建议，用游击队对意大利占领者和地方阿奸军队的规模空前的武装斗争，来答复这种秘密活动。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响应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关于加强解放斗争的号召。1943年5月，开始建立志愿游击营，设有军事指挥员和政委，这些游击营又分成较小的支队，也由指挥员和政委指挥。1943年5月底，游击队的人数比四个月前增加了一倍，而至1943年6月底它们的人数增加了三倍。5、6月间在全国普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的时候是游击队攻击城市中的



1943年7月2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无畏指挥员——阿西姆·掟涅里

和汽车队上的意大利军队，有的时候则是意大利军对游击队进行阵地战，以便摧毁民族解放运动的抵抗力量并征服各解放区。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各游击支队和营都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意大利军在贝萨地区对游击队和农民的三天激战中（6月14—17日）遭到惨败，有三百多名官兵被击毙。在马拉卡斯特地区进行的四天的战斗中，意大利军队和雇佣军队遭到同样的惨败，被击毙数百人。之后，在1943年7月1日，游击营向驻佩尔梅特的数千意大利军队发动了攻击，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并于7月5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之后解放了这个城市。第二天，即1943年7月6日，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在距科洛尼亚附近的巴尔马什不远的地方，第一次同德国希特勒军队发生遭遇战，这批德军是从马其顿方面开来阿尔巴尼亚的，敌军打算在这里打开一条通往希腊的雅尼亚城的可靠通路。在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第一

次接触中敌军就遭到严重损失，德国希特勒匪帮为了报复把波罗瓦村烧成灰烬，并屠杀了村中未能逃走的人共一百零七名男女老幼。

在全国到处展开连续不断的战斗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最高会议在拉比诺特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鉴于当时业已建立了约一万人左右的正规义勇军，因而于1943年7月10日决定建立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由前陆军少校斯庇罗·莫伊修担任指挥员，而以恩维尔·霍查为政委。总司令部的建立预示要在今后加强阿尔巴尼亚的武装民族解放运动。

总司令部成立之日正是英美联军在西西里登陆之时。这两个事件引起了法西斯统治集团的惊恐。为了在盟军有可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登陆前的安全，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占领军司令部采取了新的广泛的战斗行动以摧毁民族解放军。装备有大炮、坦克和飞机的四个意大利师于7月14日在马拉卡斯特地区开始了新的行动，在这场战事中烧毁了将近八十个村庄，杀死了数百农民，但没有能摧毁人数不过两千的游击营。相反地，游击营在获得农民群众的支持下进行的抵抗和反


行军中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

攻，经过了四天的战斗，却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死亡数百名。意大利军队的其他各次讨伐也毫无结果。根据总司令不给敌人一分钟安静的命令，游击队在全国对意大利驻军和汽车队发动了无数次攻击。

"国民阵线"以为盟军可能很快就在巴尔干登陆，于是开始以它的匪军部队向游击队进攻（虽然还不是公开地）。事件的逻辑必然地演变成了"国民阵线"的民族主义力量同意大利占领当局的合作。后来，"国民阵线"的首领们企图掩饰和否认这一事

实。然而对于社会舆论说来事实是相当清楚的。在科洛尼亚事件中，“国民阵线”军队在意大利人的支持下攻击游击队。更严重的是在马拉卡斯特事件中，“国民阵线”分子的部队从后方袭击正在同意大利师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的游击队。这些非常恶劣的事实给人们提出警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头目，以及被疯狂的反共情绪迷住心窍的米德哈特·弗拉舍里，都赞成这种行动，并逐渐转向了公开的叛变。

1943年7月27日墨索里尼倒台和巴多里奥元帅政府执掌政权以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放慢自己的步子。相反地，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下令继续尽全力进行战斗，直到意大利和德国象各大盟国所声明的那样无条件投降为止。这时，民族解放阵线最高会议最后一次号召“国民阵线”放弃同占领军的暗中合作，而同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对外国占领者进行斗争。“国民阵线”首领终于同意进行谈判。1943年8月1日和2日在克鲁雅区的穆基村举行了双方代表的会议。“国民阵线”的首领为关于合作的谈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们要求建立“阿尔巴尼亚救国

委员会”，以代替民族解放最高会议这个一直领导着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组织；他们要求“阿尔巴尼亚救国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由“国民阵线”的成员和“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各选半数；他们要求撤销在乡村、城市和各地区建立的民族解放会议，建立新的、有“国民阵线”成员按比例参加的机关。

显然，在中央以及在地方机关中各占半数席位，会使“国民阵线”实际上占多数，因为它把民族解放最高会议里的非共产党成员也计算在这些机关中与它相对的另一半席位之内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例如阿巴兹·库皮甚至开始公开反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因此，不论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民族解放最高会议，都没有接受这些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有利于那些准备在他们的外国朋友帮助下实行反共恐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战后夺取政权。

经过穆基的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急剧尖锐起来了。“国民阵线”通过老办法，按照《达尔马乔—克尔楚拉议定书》极力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准备在一旦可能时就对



1943 年 8 月 15 日在科尔察区维特库奇地方成立的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第一突击旅的一部分

爱国力量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民族解放最高会议和游击队却在差不多每天都对意大利占领军展开的进攻中，继续获得日益巨大的成就。8 月里，游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长了，游击营改编成为游击旅。1943 年 8 月 15 日，根据总司令部的决定，在科尔察区的维特库奇地方建立了由穆罕默德·谢胡任指挥的民族解放军第一突击旅。谢胡同志曾以志愿人员的身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曾是马拉卡斯特游击队的英勇的指挥员。后来，第一

突击旅和三十个游击营转战全国各地，一直到解放各城市。

1943年9月4日又在拉比诺特召开第二次民族解放代表会议来讨论政治形势。这次会议就将近一年前在贝萨举行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以来出现的各项新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代表会议在批准了直到目前为止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总委员会在穆基谈判中所持的态度之后，鉴于"国民阵线"首领们所采取的挑拨和叛逆立场，相信已不可能通过谈判把他们吸引到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来。于是代表会议决定，作为对"国民阵线"的答复，从政治上在社会舆论面前揭露他们，并从组织上粉碎"国民阵线"，而允许这个组织的普通成员可以自由加入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会议确定了地方民族解放会议的职能，决定在全国各区和各个城乡建立民族解放会议，并通过了会议的章程。代表会议预见到意大利很快就会投降，于是决定继续以更大的力量对希特勒侵略者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1943年9月8日拉比诺特会议工作结束的时候，意大利投降了，这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创

造了新的特殊形势。游击队按照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到处都停止了武装战斗，向原来的敌人意大利军队建议停止冲突，联合起来继续对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共同敌人——由马其顿和希腊侵入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德国希特勒军队——进行斗争。意大利占领军司令兰·达尔马乔将军拒绝了；大多数意军遵照他的命令向德国人投降了。其余部分既不同意与墨索里尼的同盟者合作，也不愿意站在游击队方面对他们作战，于是溃散了。数千名士兵从军营里逃跑，请求阿尔巴尼亚农民给予庇护。只有数百名意大利士兵同意作为志愿军参加游击队的行列，最初组成一个营，随后改组成为一个名为“安东尼奥·葛兰西旅”的独立旅。在这些日子里，除了一些主要城市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转入民族解放军手里。

反希特勒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阿尔巴尼亚的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意大利投降以后马上侵入阿尔巴尼亚的德国部队，遭到了游击队的激烈抵抗。在一些情况下，战斗一连几天不停。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发罗那附近的德拉索维察和玛弗罗瓦地区。战斗结果，游击队从德拉索维察的集中营里解放了几乎七千名意大利战俘(士兵和军官)，迫使希特勒匪军在受到严重的损失之后撤退。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从巴尔干其他地方调来了增援部队的德军以更多的兵力发动进攻，因此一座座城市和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又落到了他们手里。对于苦难深重的阿尔巴尼亚，开始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阶段。

希特勒占领军司令部毫不费力地就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昨日的附敌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在意大利投降的日子里，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是被民族解放最高会

议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根本不想了解：他们的弱点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占领者所采取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立场，在于他们对全国人民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所采取的反动立场；为了摆脱灭亡的命运，他们除了同新来的德国占领者合作，就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这种合作是建立在荒谬而矛盾的原则上的。在德国希特勒匪徒看来，他们应当把阿尔巴尼亚这块被占领的土地当作一个军事基地，用以防止同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同时用来抗击反希特勒大同盟，抗击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反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却认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使命在于在反对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尤其是反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斗争中加强自己。当希特勒德国利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作为抗击同盟军的军事基地的时候，当阿尔巴尼亚的人力物力被德国用来抗击反希特勒同盟的巴尔干盟军的时候，他们却认为“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应当“中立”，这就荒谬到了极点。显然，以这种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是希

特勒匪徒在政治方面无以伦比的胜利，因为这一胜利使得希特勒匪徒能够利用本地附敌分子的势力，反对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然后又反对南斯拉夫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运动是反法西斯大同盟公认的组成部分）。

在欧洲一场空前的虚伪的政治阴谋中，德国纳粹既公开又秘密地尽量帮助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重新布置和重新组织了力量。1943 年 9 月 11 日，在地拉那宣布了国家的“独立”，在不久即将召开的制宪会议之前，成立了以伊布拉希姆·维恰克契为首的“临时执行委员会”。这时开始了一种狂热的活动：恢复阿奇夫·别尔梅特将军统率下的阿尔巴尼亚军队和希斯尼·德马上校指挥下的阿尔巴尼亚宪兵。这两个人都是过去的索古分子和意大利占领者的走狗。不论首都或其他地方，“国民阵线”都始终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继续加强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除了“国民阵线”之外，在十二名山区族长（索古和后来的雅科蒙尼的拥护者）的支持下，地拉那附近成立了名为“合法派”的索古党，领导这个党的是阿巴兹·库皮，但他依然是民族解放最高会议的一个领导成

员。在斯库台，有人企图建立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天主教组织，由意大利法西斯参议院前议员吉翁·玛尔克·吉欧尼（山区族长领导者）领导，拥护他的都是天主教的神甫和依附墨索里尼的分子。猖獗的反动势力十分迅速地组织起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为外国占领者效劳。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民族解放最高会议，不仅没有离开既定的立场，而且继续活动，准备和富有经验的希特勒占领军进行实力悬殊的斗争，同时准备进行迫不得已的国内战争。1943年秋季，情况对于进行国内战争是很有利的。游击队顺利地抗击了政府军队和国民阵线军队的挑衅和进攻，取得了多次胜利，消灭了大量敌人。在城市范围以外，政权仍在民族解放最高会议手里。城市本身也在游击队的视野之内，不断受到袭击。首都完全被包围。游击队离首都很近，1943年10月18日，所谓“制宪会议”刚刚开幕，第三旅的炮兵就准确地轰击了正在举行会议的皇宫，在参加会议的代表中间引起了一片惊慌。因此，皇宫里的会议只得停止，改在另一个半秘密的地点继续举行。整个秋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



左雅·古列——在解放祖国战斗中牺牲的许多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之一

机构，除了公报和消息之外，照例发出了五十多份呼吁书和小册子，在舆论面前揭露反对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阴谋，这些阴谋是在地拉那和国内最反动的地区酝酿的。

这些阴谋的具体表现，是1943年10月20日四人摄政委员会“制宪会议”的召开和1943年11月4日阿尔巴尼亚卖国政府的成立。不论摄政会议也好，部长会议也好，都是各种反动势力的联盟，它们依靠的是“国民阵线”组织、“合法派”党、“天主教会”、“独立民族主义者”和希特勒特务机关的间谍一起进行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德国人用一架专机从意大利送来了从前索古国王的总理梅赫吉·弗拉舍里；这人在意大利过着“寓公生活”，在法西斯占领时期，他倒没有败坏自己的名声；他和其他三人在“摄政会议”里各占了一个位置，这三个人就是：“国民阵线”党的成员——弗阿特·吉布罗依，“天主教会”的成员——弗兰切斯坎·安东·哈拉

皮，“独立民族主义者”的成员——列弗·诺西。这种妥协也表现在政府的成员上，这个政府是由依附意大利法西斯的列捷普·米特罗维察领导的，差别仅仅在于政府中最有势力的人物是内务部长——希特勒特务机关的间谍札费尔·戴瓦。许多机密文件引用的《每日政治情况》就是明证，这些机密文件揭穿了“国民阵线”和“合法派”党的头子与德国武装部队如何合作对付游击队。在政治方面，民族解放最高会议取得了胜利。继续维持秘密“爱国组织”门面的“国民阵线”和“合法派”党，被民族解放最高会议指责为卖国投敌的组织。1943年12月7日，阿巴兹·库皮被开除出民族解放最高会议的领导机构。

卖国政府和冒牌地下组织的武装力量在和游击队的斗争中遭到的失败，特别是这些游击队的进攻经常给德军造成的损失，使希特勒占领军司令部不得不广泛采取军事行动，以便粉碎阿尔巴尼亚的武装抵抗。这种军事行动继续了1943年和1944年之交的整个冬季，成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武装斗争的一个紧要关头。

阿尔巴尼亚从那时起所说的“冬季”战役，是

早在十一月里开始的；起初，德军和卖国的“国民阵线”军队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11月5日至10日进攻在首都附近贝萨地区活动的第三游击旅；11月16日至21日进攻迪布拉地区的游击部队，占领了这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地区；11月19日进攻游击队解放的贝拉特，也占领了这个城市；几天以后又进攻保卫自由的马拉卡斯特的第一突击旅；1943年12月10日进攻发罗那区的游击队；1943年12月19日，一个有过山地作战训练的德国师，在卖国政府军的配合下，在地拉那、马尔塔涅希和柴尔麦尼卡的山区采取了出人预料的军事行动；当时这些山区已经冰封雪盖，民族解放军的总司令部就在这里，第二和第三游击旅也集中在这里。游击部队未能挡住德军的进攻，经过英勇的抵抗，才得以十分困难地避开了这个圈套，撤退到另一个地区。

在序幕式的军事行动中，双方都受到了重大损失；随后，1944年1月，在最冷的时候，德军向大部分游击队集中的阿尔巴尼亚南部发动了联合进攻。民族解放军面临着非常困难的考验。冰天雪地，天气严寒，而游击队员穿的却是十分单

薄的衣服和鞋子，而且常常连鞋子也没有。由于以前意大利军队和附敌部队的军事行动，成百的村庄都已烧光，许多农户都没有住房，受到饥饿的威胁。游击队不仅缺乏吃的穿的，装备也很有限，而德军却装备精良，多数的师都在苏联前线参加过战斗，有冬季作战以及和游击队作战的经验。

1944年1月7日，三个德国师照例在卖国政府军和“国民阵线”匪帮的配合下（阿尔巴尼亚南部没有一个索古派的组织或匪帮），从科尔察、爱尔巴桑和贝拉特出发，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开始了深入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企图消灭游击队，摧毁游击队的农村根据地。国内的许多地方已被占领；成片的地区变成了废墟；无数农民遭到野蛮屠杀。德军和阿尔巴尼亚游击部队（第一和第四两旅以及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其他游击队）之间发生了多次战斗，游击部队阻挡不住德军的猛攻，或者更向南撤退，去占据新的阵地，或者突破战线，从后方袭击敌人。1944年1月21日，腾德-久帕发生了这一战役中的一场血战。1944年1月26日，又有一个德国师投入战斗，这个师是从希

腊调来的，从背后进攻游击部队，企图加以包围。尽管大雪纷飞，河水汹涌，穿的吃的极度缺乏，装备不足，第一旅和刚刚建立的第六旅以及其他游击队，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奋不顾身地抗击了继续拥有优势兵力和主动权的希特勒匪军残酷而机动的进攻。德军以为他们已消灭了游击部队，便向发罗那和库尔维列施地区进发，但在那里遇到了当地的游击队和也是刚刚建立的第五游击旅，这些游击部队善于机动作战，以免被消灭。德军的冬季战役继续了几乎三个月。

在德军和卖国政府军以及"国民阵线"匪帮进攻的日子里，一座座城市遭到了希特勒式的空前残暴的蹂躏。成千上万的正直的爱国者（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进城治病的游击队员、甚至一般市民，都被逮捕，有的投入监狱，有的送往普里什提纳、贝尔格莱德、布痕瓦尔德、马特哈金等地的死囚集中营。这些市民都是所谓"嫌疑犯"：或者说他们同情民族解放运动，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加入附敌的组织。"国民阵线"组织这时搜罗了许多罪犯和冒险分子，已经成了希特勒特务机关和卖国警察局的得力的情报组织。1944 年 2

月，恐怖行动特别嚣张。2月4日，德国和卖国贼的警察，在希特勒德国的大尉朗格率领下，由加入了伪警察队伍的“国民阵线”分子参加，进行了一次更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天早晨，地拉那有八十四个和平居民无缘无故被打死在自己的住所附近。随后，这样的屠杀还发生在国内其他地方。

在那些日子里，地拉那的附敌分子和他们的一伙以为，德军的冬季攻势和纳粹—“国民阵线”分子在首都和外地的恐怖行动，即使不把民族解放军完全消灭，也得使民族解放军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摧残，无法恢复过来了。但是，德军的进攻结束以后没过几个星期，就有引起敌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地拉那。象神话中的凤凰在灰烬中复活一样，民族解放军又从英勇牺牲当中很快恢复了元气。当游击队在阿尔巴尼亚整个南部建立民族解放会议政权的时候，穆罕默德·谢胡率领下的第一旅，为了解除德军和卖国贼对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封锁，于1944年2月底，翻越雪山，向阿尔巴尼亚中部作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3月中旬到达了首都附近，在敌人中间引起了严重

的不安。随后，1944年4月里，在苏联军队重大胜利的鼓舞之下（苏联军队开始进攻纳粹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而且由于得到成千上万年轻志愿军的增援，春天的太阳刚刚开始普照大地，民族解放军就转入了反攻，在全国各地（不仅在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和南部地区，而且在山区族长和僧侣反动势力比任何地方都强大的北部地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些胜利使得民族解放最高会议能够召开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根据不同情况从各地选派来的：有的来自解放区，有的来自德军和卖国贼恐怖统治下的地区。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是1944年5月24日在解放了的佩尔梅特城召开的，参加大会的几乎有两百人，他们都是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广大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代表，其中有正直的民族主义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游击队战士、后方的积极分子以及其他男女青年。在大会上，恩维尔·霍查代表民族解放最高会议和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作了重要报告。报告中谈到了国内和国外形势，谈到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

民民主革命，谈到了在反对法西斯敌人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谈到了全国人民的巨大牺牲，谈到了公开的附敌组织（“民族保卫队”、“公理保卫队”和“天主教联盟”）和秘密的附敌组织（“国民阵线”、“合法派”党和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立场；这些组织和希特勒匪徒一起，对于民族奴役、纳粹恐怖活动、无数罪恶暴行以及成百村庄的焚毁是负有责任的。在听了恩维尔·霍查的这个报告以后，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开展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决议。佩尔梅特大会选举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和人民主权的执行机关；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由七十八名委员组成，而以老爱国民主主义者奥梅尔·尼沙尼为首。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又选举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执行临时民主政府的职权；这个政府由十个机构组成，而以恩维尔·霍查为首；恩维尔·霍查同时还被任命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大会还作出决定，阿尔巴尼亚究竟选择什么制度的问题，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结束之后马上由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解决，就象1942年10月同盟

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一样。因此，决定禁止阿赫梅特·索古回到阿尔巴尼亚，免得重复1924年的事件，免得国内或者国外可能出现的其他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政府得到承认，因为已经有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这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却是在爱国斗争的烈火中由多年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亲自选出来的。大会还决定重新审查以前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主要是索古政府缔结的一切政治协定和经济协定，而且一经审查完毕，立即宣布废除破坏人民主权和国家经济利益的一切反民族的协定。佩尔梅特大会最后还决定：更加努力地继续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斗争，彻底粉碎公开的和秘密的附敌组织，在全国巩固和建立地方民族解放会议，作为新的民主政权机关。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联合，大会决定要求苏美两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参加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工作；这些代表团几个月以后到达了。大会闭幕时，向反法西斯大同盟三大国的领袖——约·维·斯大林、温·丘吉尔和富·罗斯福——发出了一份电文，致以热烈的问候。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文写得特别热情，表



苏联军事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里的军官(1944 年)

达了阿尔巴尼亚战士对苏维埃国家的无限友好：这不仅是由于苏联在反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不仅是由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战斗中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主要是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民信赖苏联进步的政策，他们把苏联的政策看做是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胜利的保障，看做是防止国际阴谋家夺取这些胜利的保卫者。

1944 年 5 月 28 日，在佩尔梅特大会结束工作的那一天，德国占领军司令部对民族解放军发

动了第二次攻势，这次攻势是6月间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展开的。德军四个多师，超过三万三千人，以及卖国政府、“国民阵线”和“合法派”党派来受德军指挥的近一万五千名武装士兵，照例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从四面八方进攻民族解放军。这时，民族解放军约有三万五千名男女游击队员，编成一个突击师、九个突击旅和几十个地区游击营。整个阿尔巴尼亚重新变成了战场。德军到处碰到游击队的抵抗，这些游击队是善于勇敢灵活地协同反击的，有时组织埋伏，有时往后撤退，使敌人受到尽量多的损失，让自己尽量减少损失。这一次，民族解放军也没有被敌人粉碎，虽然外部和内部的敌人都千方百计地想消灭它。在这次继续了大约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中，游击队牺牲了将近五百人，几乎一千个农民遭到枪杀，而德军和伪军被击毙的官兵却将近三千人。但民族解放军受到的损失，几天之内就由几千名年轻的志愿兵补充上了，——当敌人正在因失败而陷入草木皆兵的状态的时候，这些志愿兵加入了民族解放军。为了扭转防御的地位，为了实现佩尔梅特大会的决议，1944年6月26日，第一突击

师根据总司令的命令，开始往北挺进，去解放仍被敌人占领着的地区，摧毁国内反动派的基地。游击部队第一突击师的进军，地方居民欢迎游击部队的热情，在附敌分子中间引起了一片真正的惊慌。当地拉那还没解决卖国政府6月16日发生的危机的时候，第一师的游击队员和地方游击营一起，接连解放了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个个地区，然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所谓“索古分子的”和“国民阵线派的”马蒂地区，进入了迪布拉地区。索古分子和国民阵线派的头子们，预感到自己很快就要灭亡，因此放弃了“地下活动”的假招牌，在6月间新成立的政府周围集合起来；这个政府的首脑是“合法派”党的领导成员——山区族长费启尼·丁尼。迪布拉地区的政府军队和依附政府的军队联合起来，进行了一次绝望的挣扎。可是，持续了几乎两周的酷烈血战的结果是他们遭到了惨败。1944年8月后半月，德军和雇佣军联军又作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结果他们完全被粉碎了。在迪布拉城及其周围的地区，终于建立了民族解放会议的政权。

迪布拉正在战斗的时候，8月初新建立的民

族解放军第二突击师开始北进。8月中旬，第二师到达了首都附近，使地拉那和外地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随后，这两个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军事单位——民族解放军第一军，向国内反动势力最后的巢穴，向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宗法地区，发动了胜利的进军。游击队来到崇山峻岭的米尔吉塔（由于过去的制度，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愚昧的状态），在附敌分子中间引起了地震似的震动。米尔吉塔的中心——奥罗什，几百年来都在抵抗土耳其占领者，但是勇敢的游击队员毫不困难地就把它攻陷了，因为游击队员是善于取得勇敢的山地居民的好感的。游击队员们烧毁的唯一房屋，是米尔吉塔极端反动派在奥罗什的头子——吉翁·玛尔克·吉欧尼的官邸；这种作法是表示半封建宗法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几乎是王朝的家族的统治的垮台；自从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以来，这个家族就激烈地反对任何进步的和文明的措施，为帝国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外国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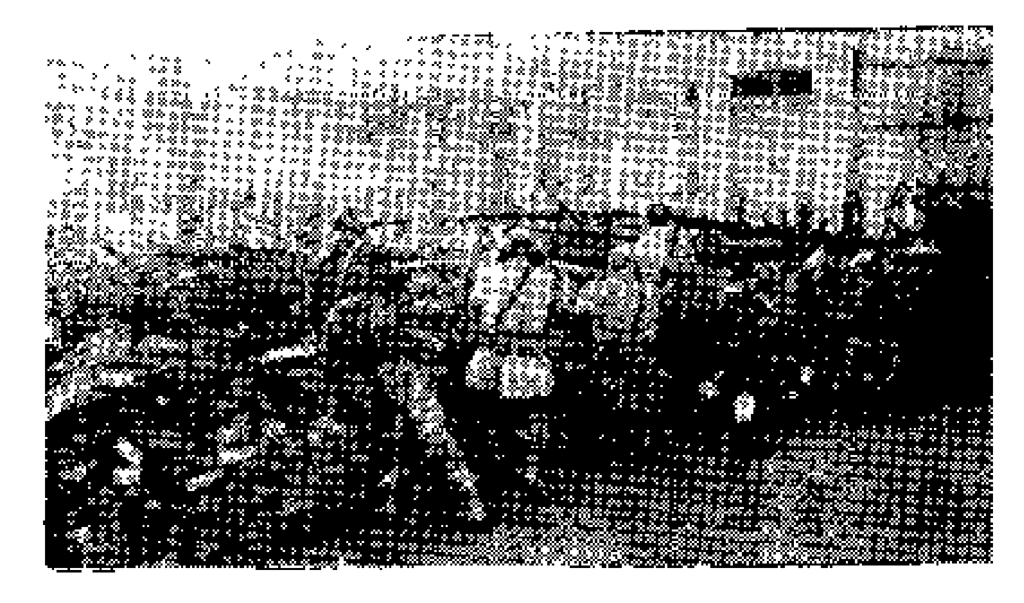
到1944年8月底，游击队解放了大部分国土。声名狼藉和被彻底击溃的德军和附敌分子掌握的只有几个大城市和某些孤立的地区了。

1944年9月，民族解放军进入了爱国斗争的最后阶段——为最后解放各大城市和整个国家而展开猛攻。恩维尔·霍查签署的特别命令表达了这种愿望。当时情况也是有利于这种愿望的，比如：苏联军队在东欧的猛进，英美军队终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民族解放军的不断壮大（这时约有五万战士），投敌卖国集团军事力量的迅速瓦解。这种瓦解表现为士兵的大量逃亡，尤其是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于1944年9月22日向宪兵、雇佣兵以及国民阵线派和索古分子的"志愿兵"提出最后警告以后。希特勒军队本身已经放弃了深入内地作战的计划，决定防守主要城市和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以便在盟军登陆时可以从希腊撤退。果然，1944年10月，盟军就登陆了。

游击队不断袭击交通要道，使德军汽车队受到很大损失；游击队也不断向城市进攻，开始把它们一一加以解放。9月12日解放了贝拉特，9月18日解放了纪诺卡斯特，而地拉那的德军卫戍部队几乎每夜都遭到包围首都的第一师游击队的袭击。1944年10月10日，游击队员们对地拉那的希特勒卫戍部队发动了进攻，到达了城内的









解放地拉那的战斗时刻

中心地区。过了六天，即10月16日，解放了沿海的发罗那，而阿尔巴尼亚南部最后一座敌人占领的城市——科尔察，也在1944年10月24日的猛攻后获得了解放。

在这些军事的和政治的重大胜利的气氛中，1944年10月20日，在解放了的贝拉特城里，举行了佩尔梅特代表大会选出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指出：鉴于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进入了最后阶段，阿尔巴尼亚正处于完全解放的前夜，民族解放会议已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上掌握政权，因此，摆在全国面前的就不只是将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的军事和政治的任务，而且还有独立自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任务；鉴于这一切情况，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于1944年10月22日决定把佩尔梅特代表大会选出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由恩维尔·霍查上将担任总理，下设十一个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经济部和文化部，尤其是复兴部，这个复兴部负责领导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工作和恢复工作。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通

过了民族解放会议的选举法，此种选举应在全国解放以后进行；也通过了关于民族解放会议的权力和职责的法规。从这个时候起，民族解放会议应当执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而它以前根据贝萨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的政治方面的职能，则应当由民族解放阵线执行（民族解放阵线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就在这一天，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民权宣言》。1944年10月23日，总理恩维尔·霍查上将，代表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向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阐明了一个纲领性宣言，其中说明：政府必须忠于佩尔梅特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进行斗争以争取阿尔巴尼亚的迅速解放，捍卫阿尔巴尼亚的民族独立，巩固民族解放会议的政权，在国家完全解放以后，全力进行制宪会议的自由选举，由制宪会议通过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根本法；重新审查索古政府和外国签订的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条约，废除违反民族利益的条约；保障和捍卫一切公民权利，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和英、苏、美三大同盟国以及反法西斯同盟的其他成员国的合作，要求三大同盟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其他成员国承认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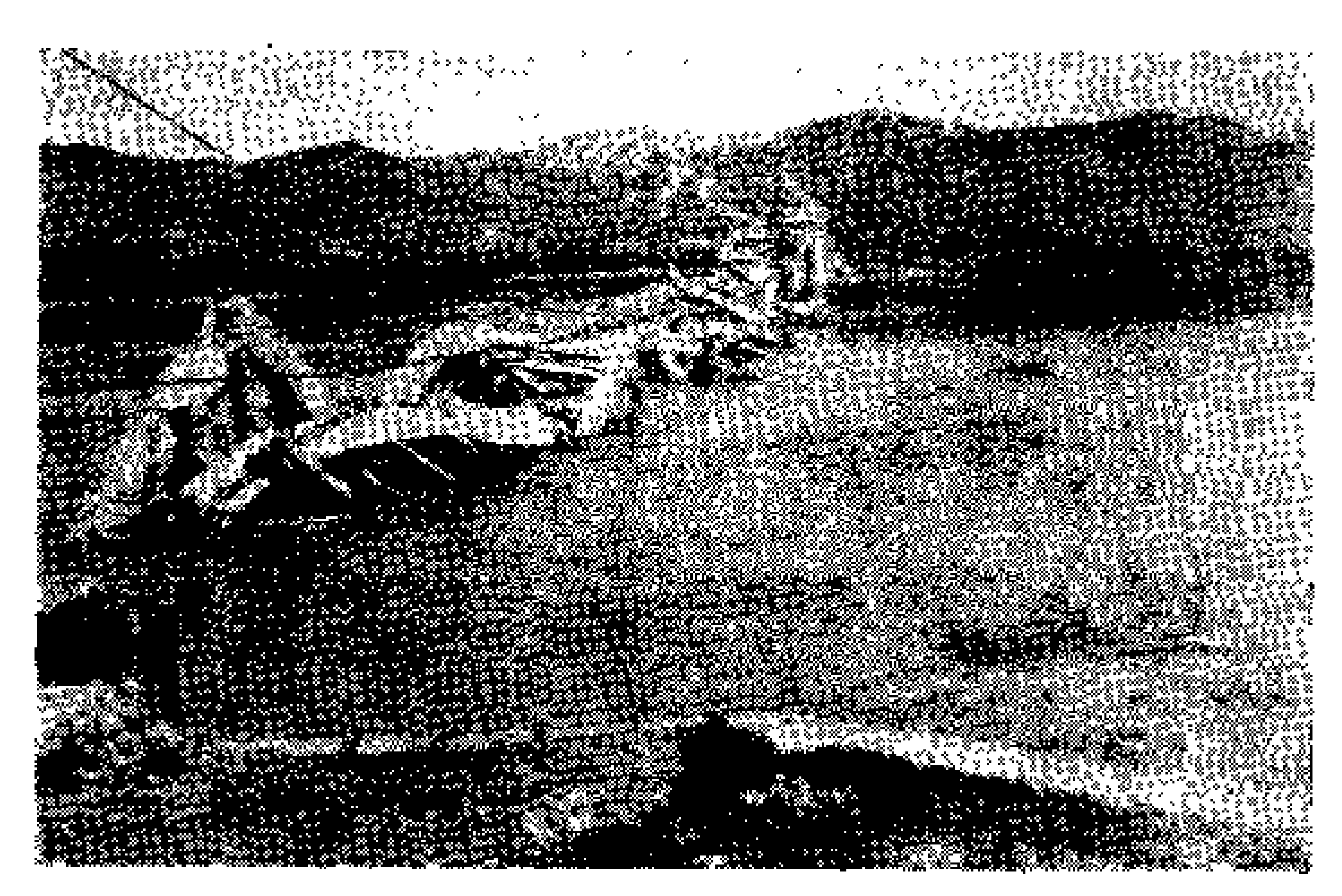
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政府。

贝拉特会议结束以后，民族解放军（这时约有七万名武装战士，其中将近六千名是妇女）马上加强了进攻，使得从希腊经过阿尔巴尼亚领土撤退的德国军队受到严重损失，在少数仍被德国占领的城市里陷入包围的希特勒卫戍部队中间引起了一片惊慌。1944年10月25日，德军总司令部从地拉那迁到斯库台，只留了一个师在首都，这个师的使命是保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的部队从希腊撤退完毕为止。德军司令部为了缩小包围首都和封锁德军北撤退路的游击队的进攻规模，迫使卖国政府的最高机关(摄政会议和部长会议)公开宣布辞职和停止任何国务活动。但是，不论是这种手法还是希特勒匪徒通常的恐怖活动（10月23日，在普里什提纳集中营里，枪决了一百零三名流放的阿尔巴尼亚人；后来，在一些住宅门前打死了几百个公民；在地拉那郊外烧掉了整整一个区），都没有缩小解放斗争的规模。1944年10月29日，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游击队第一师在穆罕默德·谢胡少将的指挥下，开始了彻底解放地拉那的攻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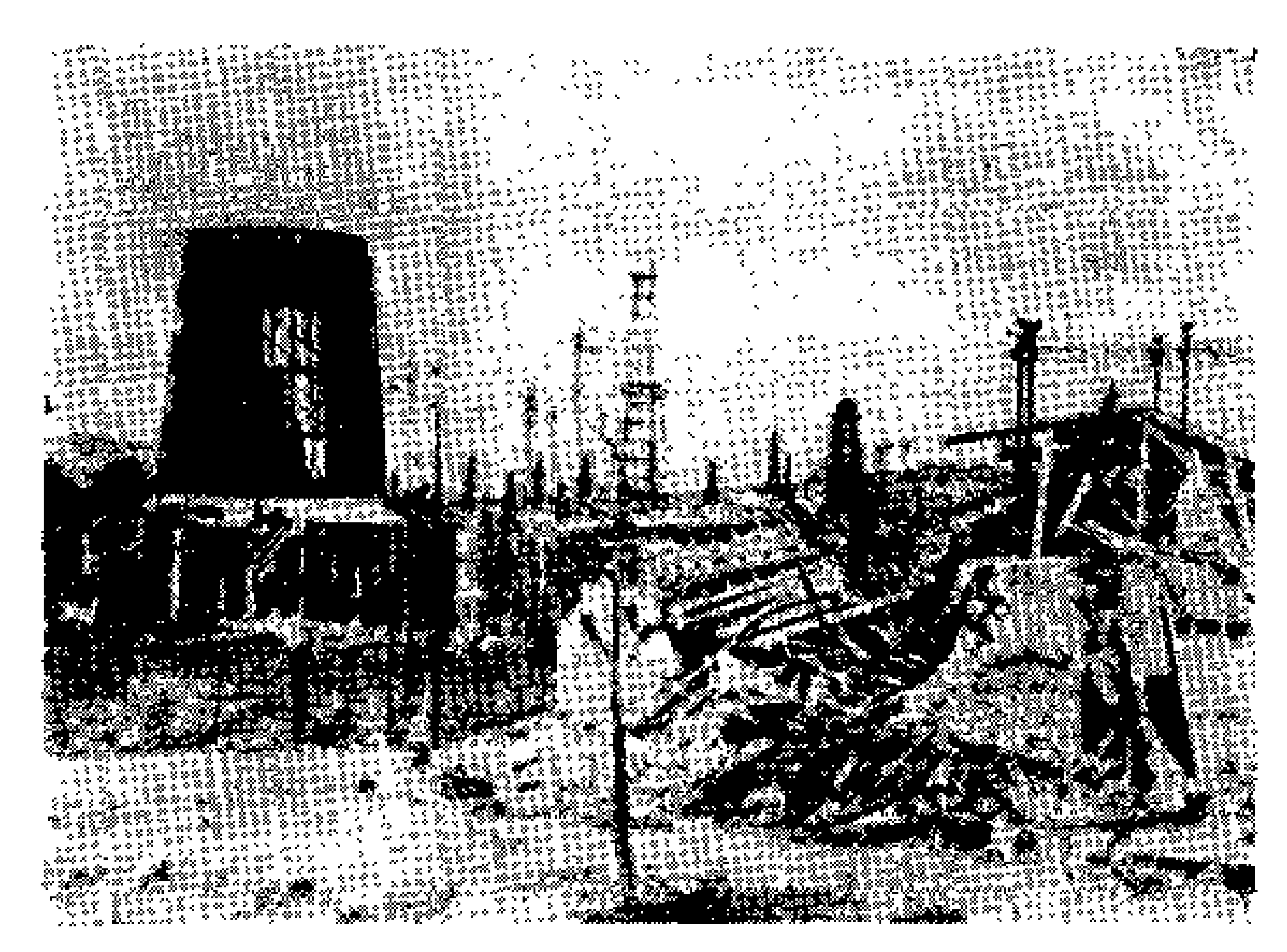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获得解放的地拉那发表演说

（1944年11月28日）



解放的最初几天，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追击下
撤退的德国纳粹分子所破坏的桥梁

解放地拉那的战役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高点。在第一夜，几乎半个城市转到了游击队手里；游击队和前来支援的市民一起，和装备了坦克以及其他武器的德国军队英勇地战斗。1944年10月30日，战斗在城市中心区进行。这一天，游击部队第一师师部就驻在市中心区。解放地拉那的战斗，在每一条街道上、每一个街垒里、每一座房子里进行。苏列曼·巴格尔金尼清真寺附近发生了一场酷烈的战斗；在那些日子里，这所清真寺已被德国迫击炮完全破坏；目前，这个地方已



希特勒军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时破坏的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工业中心——库恰瓦石油区(现在的斯大林城)

经竖立起了一座游击英雄纪念碑。

在城内各个地方，在政府各办公大楼和兵营里，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1月5日，出现了进攻和反攻的血战。城外，有些德军企图援救城内被围的卫戍部队，也和游击队展开了激战。但是，流血特别多的是11月13日和14日发生在穆什凯特村（克拉巴）附近的一次战斗。11月15日，游击队的各个分队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1944年11月17日早上，经过十九天的战斗以后，阿尔

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终于解放了。(在两千一百五十天当中，对于法西斯纳粹的压迫，地拉那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的。)

在争夺地拉那的十九天的战斗中，德军卫戍部队被击毙了两千多名官兵（其中有三名上校），受伤的很多；被俘的三百多人，被缴获的大炮二十五门，机关枪一百多挺，汽车二百辆，等等。在这些战斗中，游击队伤亡四百十七人，有几百个和平居民遭到希特勒匪徒的野蛮枪杀。

地拉那的解放说明祖国的迅速解放。勇敢的游击队员继续跟踪追击往北撤退的敌人；敌人破坏了一座座桥梁，进行了最后的屠杀。当1944年11月28日，在宣布国家独立三十二周年的那一天，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的领导人员和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在兴高采烈的居民们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了获得解放的首都的时候，不知疲倦的游击队员们正准备进攻斯库台——希特勒匪帮和一伙卖国贼的最后据点。但是，敌人大概为了避免无益的损失，炸毁了城市周围的一座座大桥，在许多附敌分子的伴随下，连夜逃出了阿尔巴尼亚的国境（附敌分子由于自己背叛祖国，希望逃

脱惩罚)。1944年11月29日黎明，游击队未经战斗就进入了斯库台。

斯库台一经解放，整个阿尔巴尼亚也就解放了。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认为自己是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一个盟国，决定继续执行反法西斯的斗争任务，直到完全摧毁希特勒德国为止。民族解放军的两个师（第一师和第四师）受命追击德国军队，并且在阿尔巴尼亚的国境之外——在盟国南斯拉夫的领土上和敌人作战。在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的部队合作之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这两个师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把敌人追到南斯拉夫中部的波斯尼亚。在这些战斗中，最酷烈的是维谢格拉德城附近的一次战斗。1945年2月14日，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解放了这座城市。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的投降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也是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盟国——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

*　　*　　*

在人类战胜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中，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作出了微



游击队追击希特勒军队时在南斯拉夫领土上行军

薄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却是超过它的人力和物力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由于自己的爱国斗争，把将近七万名意大利兵和同样数量的德国兵长期拖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使两国的占领者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打死两万六千五百四十三人，伤两万一千二百四十五人；俘虏约两万零八百人，这样，就使意大利和德国的武装力量损失了六万八千六百多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缴获和击毁了敌人的汽车和坦克两千一百辆，迫击炮、大炮和机关枪四千多门，烧毁了弹药库二百一十六个。

战争也使阿尔巴尼亚在人力物力方面受到重大损失。阿尔巴尼亚人口为一百一十二万五千人，损失了两万八千八百人，即总人口的2.48%；按人员损失的百分数计算，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占第五位。伤员的数目达一万一千六百人，即每一千居民中几乎有十一人负伤，高出反法西斯同盟国伤员平均百分数的三四倍。在战争时期，被占领者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阿尔巴尼亚人约四万四千五百人，相当于阿尔巴尼亚总人口的3.96%。死伤等总数是八万六千人，占阿尔巴尼亚总人口

的7.3%。占领者及其走狗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物质损失，超过十六亿零三百万美元。烧掉和毁掉的住宅占全国住宅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即烧毁六万一千座建筑物，相当于国内全部建筑物的36.66%）；宰杀和抢走的牲畜超过牲畜总头数的三分之一；毁掉的果树和葡萄园也超过三分之一（果树毁掉34.2%，葡萄园毁掉33.65%）。几乎所有的矿山、港口、道路、特别是桥梁都给破坏了。工业设施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在阿尔巴尼亚人民面前，特别是在他们的革命领导人面前，出现了需要尽速解决的重大历史任务。用鲜血争得的祖国的独立，需要防止外国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觊觎；被战争破坏的国家，需要在尽量短的时期之内恢复；完全停顿的民族经济，需要振兴；而且需要保证人民有吃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市民家庭在冬天都没有安身之所，这就需要给他们

房子住。早在战争当中开始的人民民主革命，需要继续进行，以便摧毁旧的反动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将是新民主的、反帝的政权的基石；这种政权能把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被压迫的和饥饿的国家变成自由的、先进的和富裕的国家。

在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诞生的最初几个星期，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就着手解决这些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首先是建立新的国家机关，以代替为战争消灭掉的旧的国家机关，从中央各部和其他机构直到法院和人民警察，都建立起来了。1945 年 1 月，全国进行了乡村的、城市的和地区的人民会议的选举，这种人民会议成了中央和地方的新的政权机关。根据战犯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材料，1945 年头几个月，人民法院惩办了一些从事叛国活动的罪大恶极的附敌分子；这些附敌分子由于和占领者一起进行烧杀掳掠等等反民族活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当阿尔巴尼亚军队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继续和希特勒匪帮战斗的时候，根据民主政府的命令，

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已经动员起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开始了恢复国家经济的英勇的斗争。被破坏的桥梁和道路、矿井和工业设施，都非常迅速恢复起来；在城市和乡村里，重新修建起了遭到破坏和被火烧掉的住宅；战争中破了产的家庭得到了广泛的帮助。

同时，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帝性质的重要措施。以前的政府签订的一切经济协定和政治协定都被废除。意大利和德国在阿尔巴尼亚的财产都被没收；被没收的还有外国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根据特别法令，外国资本在阿尔巴尼亚设立的三家银行一律收归国有（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现在改为阿尔巴尼亚国家银行）。国家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监督。

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民主性质的措施。为了调节生产和消费，确定了国家对工业企业和阿尔巴尼亚公民的商号一切活动的监督；照价收购为了恢复经济和加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物资；为了制止投机分子的活动，国家整顿了粮食买卖，确定了商品的市场价格；照价征用了一切运输工具和车辆修理厂；为了和黑市进行斗争，在国家帮

助下成立了第一批消费合作社；对于战争期间外国资本家和阿尔巴尼亚资本家以及商人的额外收入，规定了特别累进税。在1945年和1946年，这种累进税成为国家的一笔重要收入，使阿尔巴尼亚政府能够抵补恢复经济的重大开支，而不必去求外国帮助。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农民欠地主的债款被取消；解放以前借的债，也一笔勾消；以前私人所有的水渠无偿征用，成了农民集体所有。1945年8月，开始实行土地改革，这种改革深刻地（虽然并不是彻底地）触动了阿尔巴尼亚的地主所有制。在社会生活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首先，颁布了保护工人的新的劳动法。阿尔巴尼亚第一次确定了工人的八小时工作日和夜班工人的七小时工作日。保证每周一天的休息和每年十五天的休假。为了保证人人都有工作，采取了一些很有成效的措施，短期之内就消灭了失业现象。早在1945年年初，就成立了工会，同年10月举行了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5年秋，全国开展了制宪会议的选举运动；制宪会议应解决人民革命最重要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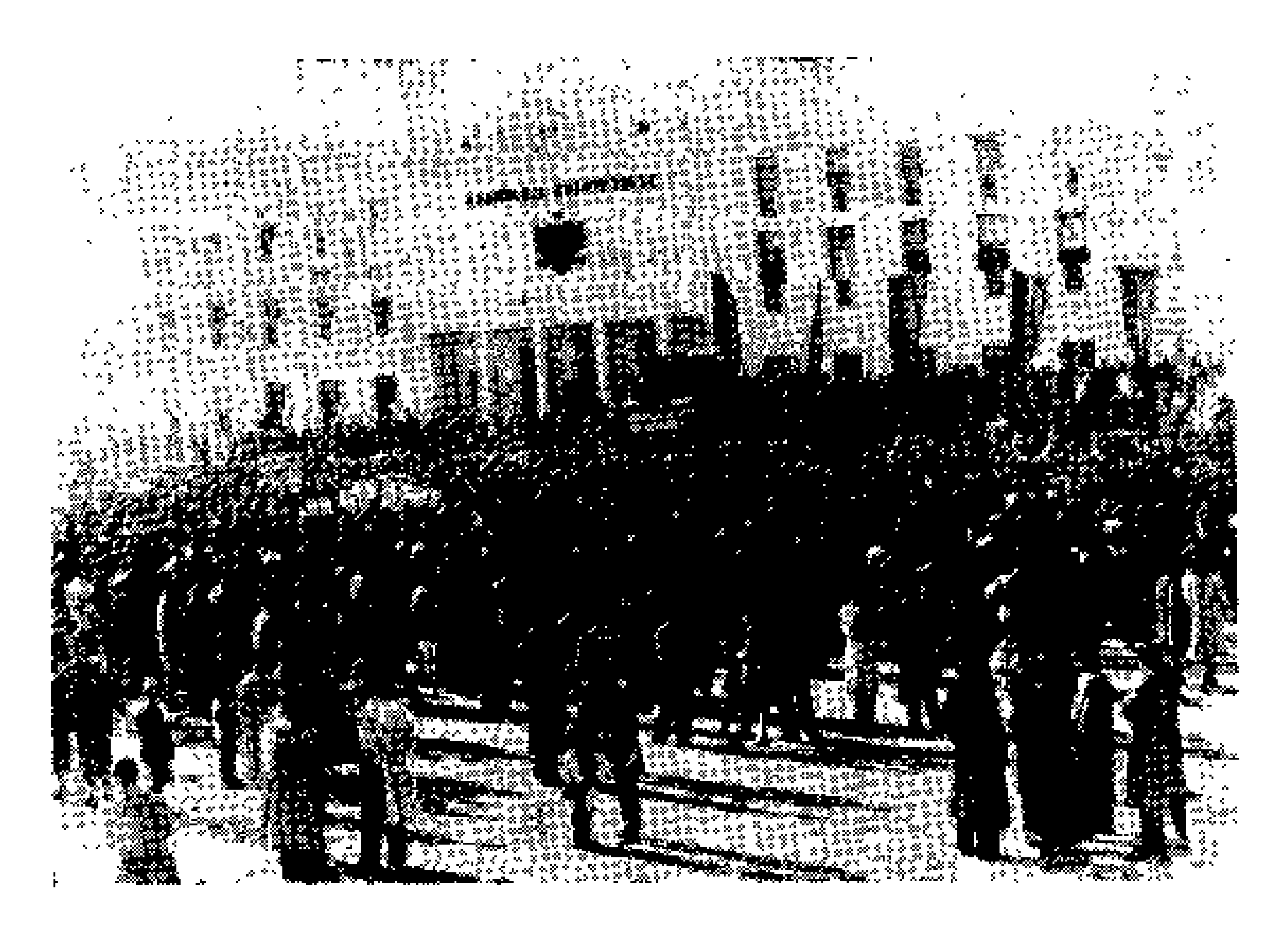
确定新阿尔巴尼亚的政体。这次选举运动的特点，是代表新的革命政权的民主阵线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山区族长和僧侣阶级的敌对分子之间激烈的斗争；这些敌对分子妄图保存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在进行选举运动时，民主阵线在国际舞台上也碰到了困难。正当南斯拉夫、波兰、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承认恩维尔·霍查领导的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却因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改革直接侵犯了它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利益而大发雷霆，因此声明：如果这次选举不在外国代表监督之下进行，它们就不承认阿尔巴尼亚政府。这简直是对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侮辱。除了这种条件之外，华盛顿还要求阿尔巴尼亚承认 1939 年 4 月 7 日以前和外国缔结的协定，而这些协定是阿尔巴尼亚政府不久之前曾宣布无效的。同时，美英两国在地拉那的代表团成员还唆使民主阵线的敌人在阿尔巴尼亚发动政变。

制宪会议的选举于 1945 年 12 月 2 日举行，参加投票的占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的 90.02%；其中 93.18% 投了民主阵线候选人的票。1946 年 1 月

11日在地拉那召开的制宪会议，宣布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广泛的讨论，制宪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捍卫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成果，确立了这么一种原则：新的政权是建立在乡村、城市和地区的人民会议的基础上的，而各级人民会议则由所有年满十八岁的阿尔巴尼亚公民通过自由的、直接的、普遍的、平等和秘密的投票定期选举。

全国解放以后最初十五个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有这一切措施和改革并不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这一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完成的，而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完成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而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

宪法规定的这些重大历史任务完成以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面临的是进一步推进革命的问题，是选择国家未来应走的总的道路问题。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考虑到国内和国外的有利条件，根据自己的总纲领，决定让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前进，以便在亚得里亚海



1946 年 1 月 11 日的地拉那。人民群众在制宪会议会场前等候关于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边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方针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早在 1946 年 2 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全会上就确定了的。

根据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宪法确定的原则，1946 年和 1947 年上半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按照一些特别法令，一切工业企业、矿山和矿井、作坊、建筑企业、农业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这样，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徽

到1947年年底，就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不论国际贸易或者国内批发商业，都转到了国家手里。1946年4月，国家责成所有商人向有关机关呈报他们拥有哪些商品。一切主要建筑材料和日用必需品，都按价征集起来。1945年成立的商号被取消了。粮食的运输和采购转到了国家手里。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企业开始建立，代替了私商。就在这一年里，药房、试验室、旅馆、疗养地、海滨浴场也改由国家经营。同时，1945年实行的、并未完全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彻底的土地改革。1946年4月，颁布了禁止任何形式的出让土地的法令，而同年5月公布的这一法令的补充条款，则完全消灭了大土地所有制，这



恩维尔·霍查同志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农民祝贺
(1947年11月17日)

就触及了农村中资产阶级（富农）的经济地位。农村中采取了“土地属于耕者”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私人所有的、自己并不耕种的耕地、葡萄园、橄榄林和果园，都无偿剥夺。按照规定，工人、手工业者和职员可以拥有不超过零点五公顷的果园，或者零点二公顷的葡萄园，或者三十株橄榄树，而宗教团体拥有的土地则不能超过十公顷。1945—1946年实行的土地改革，从有产阶级手里剥夺了十七万二千公顷耕地（整个阿尔巴

尼亚的耕地是二十二万一千五百公顷）、四十七万四千棵橄榄树和六千头耕畜。从剥夺的土地中，有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九公顷分配给了七万零二百二十一个农户，这些农户从前都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小块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还有二十三万八千七百棵橄榄树和从地主手里剥夺来的全部耕畜。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所有制，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村中几乎没有贫农了，因为他们都分到了土地，成了所有者。农业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被堵塞了，中农成了农村中的中心人物。1947年11月17日，完成了土地改革。

然而，土地改革并不能使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在小所有制的范围内，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从这种情况出发，表示了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想法。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是1946年秋天在克鲁特村（从前缪则切的地主庄园）里成立的，这个农业合作社应当成为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

完成这些革命改革，曾遇到被推翻的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大商人）的激烈抵抗，他们不可能赞成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曾遇到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的反对，它们不能赞成的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有阿尔巴尼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和苏联亲近的活动。人民政权的敌人试图组织反革命运动。1946年，在地拉那，这样的阴谋活动是由几个破坏团体——“保皇”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进行的；在斯库台，是由过去德国占领时期的“天主教联盟”进行的（后者由天主教神甫改组为“阿尔巴尼亚联盟”）。尽管它们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但这些阴谋活动并没有成功。警察机关把它们破获以后，它们的头子受到人民法庭审问以后，这些人数很少的破坏团体就被粉碎了。只是在1946年9月，阿尔巴尼亚反动集团受到美英两国代表团代表的唆使（这些代表答应他们由外国进行军事干涉），曾向斯库台城发动了一次武装袭击；可是，过了几个小时，这次袭击就遭到了失败。这是阿尔巴尼亚反革命力量的最后一次武装图谋。所有这一切图谋都遭到了失败，因为新的政权得到人民群众的完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反动集团就改用一些司空见惯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破坏活动，妄图给年轻的国家制造困难，在人民群众面前破坏

它的威信，从而为实现反共产主义的、反革命的复辟创造条件。大规模的破坏行为是在国内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进行的，比如：在玛里奇（这里正在进行湖泊排干工作），库恰瓦的石油企业，鲁比克的铜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这些办法并没有奏效。此外，一个所谓“代表小组”也搞过一次阴谋，但也没有成功。其所以叫做“代表小组”，因为参加这个“小组”的，除了已被消灭的政党的反动分子之外，还有人民议会的几个代表，他们或者还没有放弃旧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或者在美英两国间谍的压力下投降了。

除了国内的困难以外，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也碰到了严重的困难。美英两国不仅不承认阿尔巴尼亚政府，而且企图阻挠阿尔巴尼亚派代表参加1946年7月在巴黎开始工作的和平会议。由于苏联的坚持，恩维尔·霍查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才被接纳参加和平会议，作为一个同盟国的代表。然而，希腊政府代表团竟向阿尔巴尼亚提出领土要求，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不得不回击它的进攻。不难看出，希腊代表团是受到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唆使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发表演说

的。1946年11月，由于两艘在科孚海峡航行的英国军舰触雷炸毁（那里的鱼雷还是战时留下的），阿尔巴尼亚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尖锐起来。伦敦谴责地拉那，说鱼雷似乎是地拉那敷设的。自从这次事件以后，阿尔巴尼亚和美英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至今仍然如此。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极大困难中，阿尔巴尼亚政府又遇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制造的严重困难。阿尔巴尼亚革命领导人根据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之

间的关系应当是兄弟的和国际主义的关系这么一个原则，相信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声明。但是，铁托元帅和他的同僚利用这一点，在“建议”的幌子下，开始干涉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些干涉是早在战时（即1944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会在获得解放的贝拉特召开的时候）开始的。铁托的代表企图凭借站在他们一边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组织书记科奇·佐治的协助，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把阿尔巴尼亚推上投降南斯拉夫的道路。南斯拉夫在“加强友好关系”的口号下施加的压力，在1945—1947年间更加厉害，简直令人无法容忍。南斯拉夫企图利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1945—1947年签订的经济协定和政治协定，把阿尔巴尼亚变为贝尔格莱德的附庸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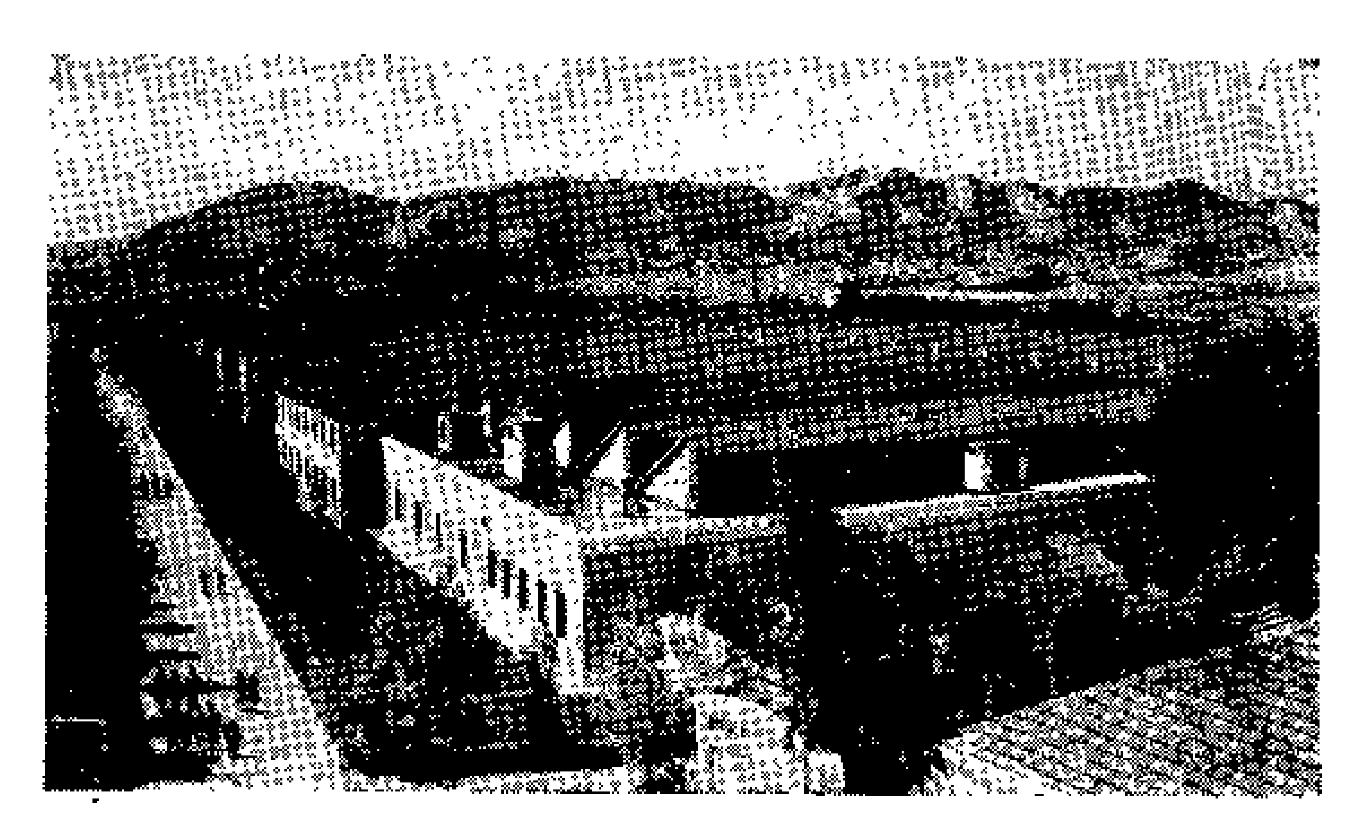
1948年中期，贝尔格莱德的压力最大的时候，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通过的决议，谴责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这才使阿尔巴尼亚有可能摆脱已经形成的处境。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立即断绝了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了

由于南斯拉夫特务干涉所犯的一切错误。一直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开始公开活动。同年 11 月举行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建立以来的活动。代表大会谴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和犯了这些错误的分子；审查和通过了党章；提出了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新的方针，这种方针在于巩固祖国的独立，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立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基础，加强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苏联的友好关系。

经过 1948 年的转变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在劳动党（这是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决定的新名称）的领导下，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都以新的力量展开活动。这种活动是按照由部长会议根据党的方针制订并由国民会议批准的一定时期的计划进行的。1949—1950 年的两年计划的指示，是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1951—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是 1952 年 3—4 月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1956—1960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是 1956 年 5—6 月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是 1961 年 2 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

下面简单谈谈，为了使阿尔巴尼亚摆脱技术、经济和文化方面落后的状态，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国家电气化以及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方面，在动员全体人民参与这些措施，以及利用国家的各种物力和财力方面（在这方面不否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贷和支援的作用。阿尔巴尼亚得到了苏联很大的帮助和大量贷款，也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历次五年计划究竟应当完成哪些任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更快的速度继续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便到五年计划完成时，使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农业工业国。在1949—1950年间，建成了一些工厂和联合企业，如：地拉那的“斯大林纺织联合厂”，爱尔巴桑的“11月8日糖厂”和“纳科·斯皮罗木材加工厂”，费里的棉花加工厂，斯库台的烟草发酵厂，发罗那的水泥厂，地拉那的“列宁水电站”以及其他几十个工厂。到1955年年底，这些工厂的产量已经超过1938年工业总产量的九点五倍。农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和1938年相比，耕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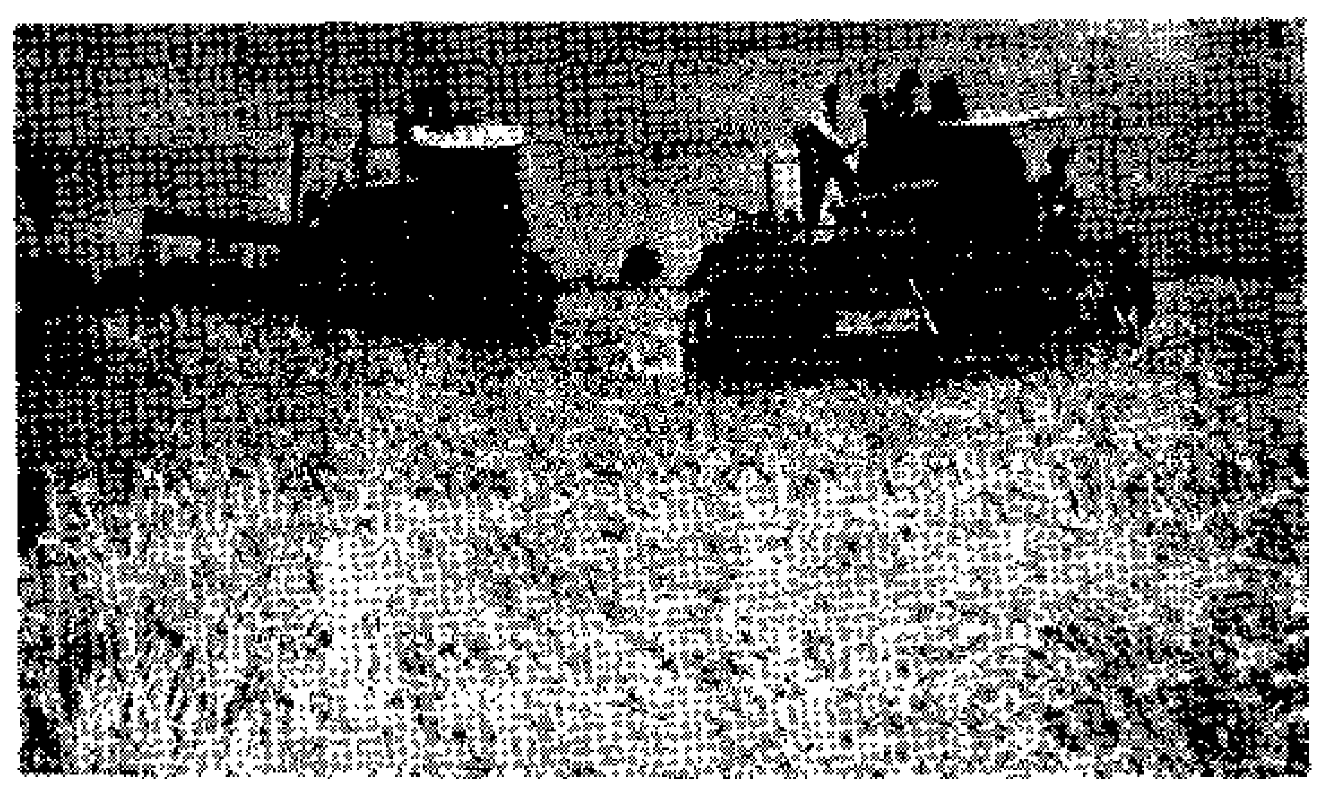
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工业许多项目之一——
地拉那附近的“斯大林纺织联合厂”

小麦播种面积从1938年的五万五千一百公顷增加到了1955年的十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五公顷，而单位面积产量却从1938年的每公顷七公担增加到了1955年的每公顷十点三公担。以十五匹马力计的拖拉机数量，从1938年的三十台增加到了1950年的三百四十四台和1955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台。1938年，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康拜因机、脱谷机和收割机，而在1955年，康拜因机有一百四十四台，脱谷机有三百三十五台，收割机有二百八十三台。结果，农产品的产量也增加了；农产品的价值按货币计算，从1938年的一

千二百八十二万六千里克增加到1955年的二千零九十五万里克。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工业，特别是采矿工业，并且迅速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的办法是通过农业集体化改组农业生产；排干沼地扩大耕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内，成就是很出色的。1960年，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提供了将近90%的国民收入。1938年，工人及其家属总共只有几万人；现在约有三十六万人，占总人口的22.5%。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6.9%，1960年的工业总产量为1955年的两倍多，而和1938年相比，却增长到了二十一倍。在工业产品的增长中，采矿工业的生产占有主要地位。除了开采石油、铬和煤之外，开始使用采掘铁、镍、铜、铬的新矿井，而且新的油井也投入生产。原来的小型火力发电站，由运用新技术的大型水力发电站和火力发电站代替了。其中，马蒂河上的“卡尔·马克思水力发电站”占主要地位。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建成和开始使用的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项目有二百五十多项，比如：斯大林城和切里克城的炼油厂，阿拉鲁普





阿尔巴尼亚农业的机械化

的煤矿井，库尔布涅什的铜矿，皮什卡什和切尔文纳克的铁矿和镍矿，特罗波亚和马尔塔涅希的铬矿，地拉那的食品联合企业，发罗那的渔业联合企业，以及其他许多砖厂、绒布厂、玻璃厂、

水果和蔬菜罐头厂、酒厂、烟草发酵厂等等。1960年，机械工业保障了经济部门对备件需要量的40%——比1955年多7倍。农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完成了农业的集体化。1960年，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占有全国86.3%的可耕地，其余部分土地仍然在山区农民手里，因为这些山区没有条件实行农业集体化。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进行了大量投资。许多沼地都已排干，如：台尔布菲、弗曼尼、符尔格、罗斯科维彻等等沼地。由于排干这些沼地，农业得到了一万七千公顷新的土地和四万三千公顷改善了的土地。1960年，拖拉机的数量大大增加，每一千公顷播种面积就有十台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

1961—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执行。在这一时期内，阿尔巴尼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把阿尔巴尼亚从一个农业工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的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的一些建筑工程业已完成，其他的建设正在继续进行。这些建设每天都在改变祖国的面貌。

在几个五年计划时期，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38年，80%的居民是文盲，但是经过广泛的扫盲运动以后，1956年就在四十岁以下的居民中间消灭了文盲。1947年，阿尔巴尼亚成立了第一所两年制的师范学院，而1951年又成立四所四年制的高等专科学校。1957年成立了地拉那国立大学，由六个系组成，学生有四千人。1960年建立了一所美术学院。1960年，阿尔巴尼亚有三千所学校，三十一万三千名学生，一万一千名教师。阿尔巴尼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在初等学校、中等学校或高等学校里学习。1960年，每一万人中就有四十八人在国内和国外的高等学校里学习（法国——三十七人，西德——二十七人）。

在过去的年代里，还成立了许多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研究机构。目前，每一个城市都有博物馆和剧院。在地拉那，早已建立了“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国立音乐馆。在最近几年中，阿尔巴尼亚的书籍出版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5—1960年出版了三千多种书籍，印数达到二千九百万册。



“地拉那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一个剧团在演出

所有这些成绩也是在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取得的。不过，国内反动集团的打击力量已经渐渐削弱。这是巩固人民政权的结果。美国和英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敌视态度，并没有挡住阿尔巴尼亚走自己的道路。它们企图不让阿尔巴尼亚加入联合国，终于遭到了失败。1956年，阿尔巴尼亚在联合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希腊和南斯拉夫统治者的挑衅，也没有成功。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巩固。目前，阿尔巴尼亚和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正象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经常所说的，亚得

里亚海边这个小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在于保卫和平和独立，在于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而斗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阿尔巴尼亚史纲
作者=
页数=455
SS号=0
出版日期=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